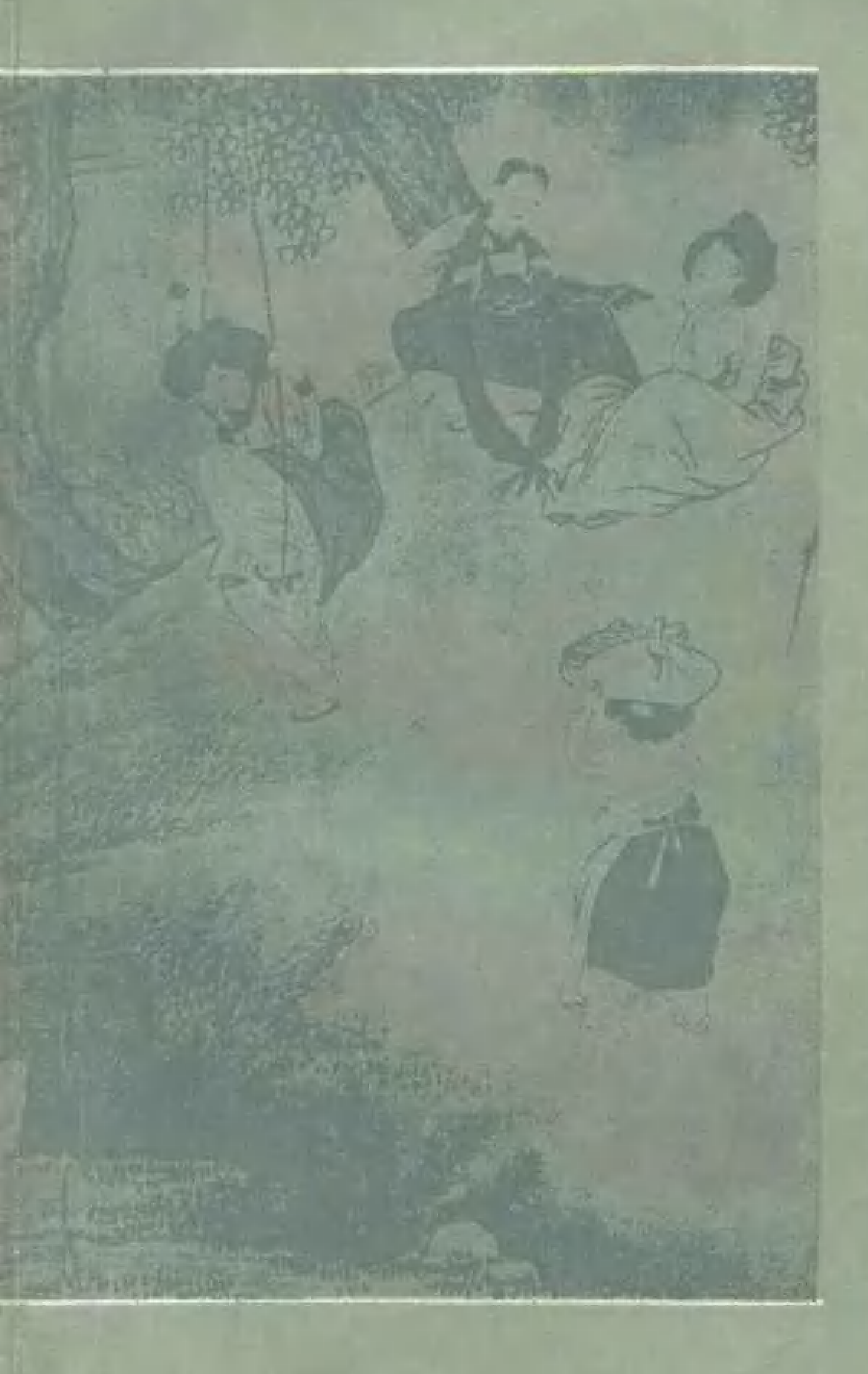
朝鲜文学史



韦旭升 著

朝 鲜 文 学 史

韦旭升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封面画：

朝鲜李朝画家申润福作

《端午水边嬉戏图》

朝鲜文学史

韦旭升 著

责任编辑：郜兰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1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册

统一书号：10209·111 定价：2.45元

前　言

朝鲜是我国的紧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国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交流也比较频繁。历史上，两国的一些学者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的学者对我国的著名作家、作品，早就十分注意，并有介绍与研究的论著。对于朝鲜文学，我国以往不无介绍，但大多是零散的，迄今为止，我国没有出版过面向全国读者的介绍朝鲜文学发展历史的系统论著。本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

朝鲜历史悠久，文学源远流长。本书采取与国内流行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类似的做法，即把本书叙述的内容定在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十九世纪末）结束以前的范围内。书中的编排则依朝鲜历史的分期。李朝时期文学繁荣，作家辈出，作品丰富，分为上、中，下编论述。

作者力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来探讨朝鲜文学发展的过程，依据本人所能接触到的作品和自己进行的研究，对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与作品做出必要的介绍、分析、论述和评价。同时也参考了朝鲜古今有关论著。书中所引用的朝鲜国语作品例文，除个别作品之外，一般是由本书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的。

限于水平和条件，书中种种缺点与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作者　1985年12月

目　录

第一编　上古至三国时期的文学

第二编　统一后的新罗时期的文学

第三编　高丽时期的文学

第四编　李朝时期的文学

上编　前期(十五—十六世纪)

中编　中期(十七世纪前后)

下编　后期（十八—十九世纪）

第一编　上古至三国时期的文学

（公元前—公元七世纪前半期）

概　　说

朝鲜民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朝鲜民族的前身——各个种族集团分别居住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根据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公元前若干个世纪内的分布状况，可以大致推断如下：

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方有古朝鲜部落，在鸭绿江中游有高句丽部落，在高句丽以东至朝鲜半岛东海岸有沃沮部落，沃沮以南即今之咸镜南道和江原道北部一带有涉貊部落、半岛南部有三韩，即马韩、弁韩、辰韩。其中马韩居汉江下游，向南延伸，辰韩在今之庆尚北道和南道的一部分。弁韩居洛东江下游。这些部落，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内就已经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建立了国家政权。其中，古朝鲜最早进入阶级社会。在中国学者认为作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到朝鲜当时的名称"稷（涉）"、"良夷（东夷）""高夷（高句丽）"等。中国汉朝初年的卫满在古朝鲜境内扩张势力，于公元前一九四年自立为朝鲜王，然而，不到一个世纪，古朝鲜就灭亡了。

在各部落封建因素逐渐滋生的情况下，高句丽的发展较为迅速，它从鸭绿江中游即现今的集安为中心，统一了各个部落，吸收古朝鲜的遗民，到五〇年顷，高句丽已成了一个拥有清川江以北直到辽东地方的一个大国了。一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成立了百济国。二世纪前半期，在半岛的东南部成立了新罗

国。此外，在洛东江流域一带则形成了六个小国，通称为六伽倻。

高句丽建国后，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进行了反对隋朝侵略的斗争。在七世纪中叶又进行了反对唐朝侵略的斗争。

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也常发生战争。七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朝军队灭了百济，不久又灭了高句丽，从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半岛上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国。

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建立，直到新罗征服其他两国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史称"三国时期"。

古朝鲜宗教信仰是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结合。在三国时期，高句丽和百济统治阶级把儒教当作维持其封建秩序的精神工具。在四世纪末，佛教先后传入高句丽和百济，五世纪中叶，又传入新罗，于是朝鲜原有的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便和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佛教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象在其他国家中所见到的一样，朝鲜的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劳动密切相关。中国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对当时朝鲜人民原始性的艺术生活都有所反映，其中以《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的较为详细：

> 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
> 常以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曰舞天。
>
>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

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朝鲜人民的歌舞和农业劳动相关。"五月下种讫"，"十月农功毕"等，都是劳动人民歌舞活动的高潮时期。可见，当时的歌舞活动是用以表现劳动生活和农业丰收时的欢乐的。这种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演出，群众同时也是观众。民间诗歌便是由这种群众性的歌舞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歌谣虽然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肯定

它的内容和数量都是相当丰富的。

除民间诗歌外，作为口传文学的还有神话、传说，由《三国遗事》一类的书籍部分地保留下来了。

书面文学在高句丽建国之后开始产生，在三国时期有较大的发展。由于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当时书面文学使用汉文。《三国史记》中提到一世纪高句丽使用汉字的情形时说："国初使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到了六〇〇年，高句丽婴阳王"诏太学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在百济出现了《书记》，在新罗编成了《国史》。这些史书虽未保存下来，但从高句丽时期所编成的《三国史记》中所借用的材料来推断，当时的历史散文、传记文学作品，数量已相当可观。保存至目前的少量碑文也零星反映出当时使用汉文的情况。

由于汉字的输入，也出现了少量的汉文诗。还有少数民间诗歌译成了汉文，得以保存下来。

三国时期，新罗流行一种十句体的定型诗。这些诗歌中的极小一部分，在新罗统一以后，被当时人借用汉字的音、义记录了下来，它们属于个人创作，是当时朝鲜国语诗歌发展阶段的一种标志。此外，还有一些诗歌，仅于史书中见其名称，其歌词则已失传。

第一章　古代神话

神话，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古代人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也是他们用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理想的方式。正如马克思说的，古代神话是“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

由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科学的理解，不能按照这些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本身给予正确的解释，他们往往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各式各样的社会现象归之于神。而这些神的形象性格、法力大小又往往是以自然界的某种事物或现象为现实基础的，如日神、月神、火神、雷神、风神乃至于熊、虎等图腾崇拜。

除直观地、被动地反映现实，古代人在神话中更多的是用自己的丰富想象来补充他们对客观现实了解的不足。因此，古代神话在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的同时，也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朝鲜的古代神话也是如此。但是，朝鲜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人，对神话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或以儒家思想加以排斥、抹煞，如高丽王朝大臣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或根据佛教宣传的要求加以篡改、歪曲，如高丽王朝僧人一然编写的《三国遗事》。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文献中看出朝鲜古代神话的概貌，可以从中了解远古时期朝鲜口传文学的成就。

著名的朝鲜古代神话有《檀君》、《东明王朱蒙》、《驾洛国》及《延乌郎与细乌女》等。

《檀君》是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收在《三国遗事》卷一的《纪异》中。此外，在十三世纪高丽李承休的《帝王韵记》及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内容是这样的：

古时，有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就选定了三危、太伯二地，并给了桓雄三个“天符印”作为天上神仙的标志。桓雄率领了三千人降到太伯山顶（即今妙香山）的一株神檀树下，建立“神市”，自称“桓雄太王”。他设置了“风伯”、“雨师”、“云师”等官职，主管农业、疾病、刑罚、善恶等三百六十余事。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中。它们来到桓雄大王面前，请求大王把它们变成人。桓雄大王就给它们一炷艾和二十头蒜，叫他们吃下去，并且告诉它们：吃了之后要躲藏起来，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熊照办，于是变成了一个女人。但虎没有照办，就未能变成人。熊变的女人没有配偶，就去祈求桓雄大王。桓雄大王就与她结婚，生下了王俭，即檀君。这个檀君就是古朝鲜的开国君王。他在中国尧五十年即位，以平壤为首都，在位一千五百年。后隐居于阿斯达为山神，活到一千九百零八岁。

这篇神话表明：它产生于原始社会，以后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思想和氏族公社到部落的演变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所谓“虎”、“熊”相处于同一洞穴，可能反映了以虎和熊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所谓桓雄太王系天帝之子，可能是对其族长或酋长一类统治者的美化和神化。熊女与桓雄成婚而虎未能变成人，是指两个血缘相近的氏族在合并为一个部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变化。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取得了主导地位，而部落的酋长则来自这个氏族。所谓“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之说，可能是当时的氏族公社流动的一种反映，也可能是氏族公社之间征伐交战的一种表现。所谓风伯、雨师、云师、主刑等等，反映了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这篇神话说明朝鲜民族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广开土王的陵墓碑文以及高丽时期所编成的《三国遗事》中，对高句丽开国君王朱蒙的传说都有记载。十三世纪高丽著名诗人李奎报根据这一题材写成长篇叙事诗《东明

王》，描绘了朱蒙祖先的身世和他创造高句丽王国的艰苦过程。内容是这样的：

天帝之子解慕漱自天而降，用神法变出宫殿，引诱河伯女儿柳花出水嬉戏，并与她定情。柳花因此遭到河伯的严厉惩罚，但不久就被东扶余国王金蛙王所救，成为宫女。后来，柳花产一卵，卵破而朱蒙出。朱蒙长大以后，十分善射（扶余语谓善射者曰"朱蒙"），才能出众。为了防备金蛙王及其太子的迫害，逃往南方淹滞（鸭绿江北）。在这里得到龟鳖之助，渡江到沸流水（今浑江）畔的纥升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高句丽。

这一建国神话在《后汉书·东夷传》、《魏书·高句丽传》和《朝鲜史略》中都有类似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详略不等。李奎报写长诗《东明王》时，所根据的是今已失传的朝鲜《旧三国史》。

同《檀君》相比，这篇神话情节曲折复杂得多，出场的人物众多，活动的范围也较为广阔。它和檀君的神话一样，认为开国君王一定来历不凡，把朱蒙的父亲解慕漱说成是天帝之子。但是这个来自天上的神人却比前一个神话中的桓雄大王具有更多的凡人色彩。他象一个多情而又狡黠的青年。他用巧妙的办法把柳花诱出水面，并与之定情。柳花虽出生于龙宫，但也和一个遭遇坎坷的人间妇女一样幼稚不幸，在艰难的日子中她变得聪明起来了。她起初受骗，继而被专制的父亲责罚，之后又备受歧视，最终却能为她儿子设计出逃，免遭迫害。朱蒙虽有一个破卵而出的神奇出身，但也是一个人间失意的豪门子弟的形象。他多才多艺，且有天佑神助，但也是历尽艰辛，靠着自己的奋斗才得以逃出虎口，完成开国伟业的。

从《东明王》神话中所涉及的一些地名和国名来看，可以推断出与高句丽国家的形成有连带关系的若干历史过程。如由北扶余分离出东扶余，又由东扶余分离出卒本扶余（高句丽）。神话中提到的铜室、金簪、铁网等器物反映出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

与《檀君》神话对比，《东明王》中所反映的高句丽分明是比古朝鲜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东明王》神话中，体现出高句丽人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对国家更加繁荣兴旺充满信心。十二—十三世纪的卓越诗人李奎报面对腐败的高丽朝政和频繁的外族入侵，曾借这个神话表达了对"怠惰"的后代君王的谴责和对祖国前途的美好憧憬。《东明王》神话还表现了古代朝鲜人民艺术才能与智慧。

如果说《檀君》与《东明王》是有关北方的建国神话，那么《朴赫居世》和《驾洛国》则是南方的建国神话了。

三国之中的新罗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边，始祖是朴赫居世。传说原有六个村，其祖先都是来自天上。相传大约在公元前六十九年，六个村的祖先率子弟们寻求有资格为王的人。他们发现南边有奇气如同闪电，一匹白马下跪作叩头状。跟踪找去，发现一个青紫色的蛋。把蛋打破以后，一个俊美的童子从中而出。沐浴之后，童子全身光彩照人，鸟兽为之起舞，日月分外明亮，起名为赫居世。因为蛋和瓢的模样相近似，赫居世就以"朴"（瓢）为姓。

与此同时，在一个水井边，有鸡龙出现。这个鸡龙自胁下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但嘴唇很长，有如鸡喙。经洗浴，长唇腐落。

朴赫居世长到了十三岁，便娶这个鸡龙所生的女孩为妻，夫妻两人成了新罗的王和王后。

神话中隐隐约约地反映出血缘相近的氏族公社结合为部落的过程。六个氏族的结合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所谓祖先来自天上的说法，和古朝鲜及高句丽的建国传说相同。

驾洛国一名伽倻，大约存在于二世纪到六世纪之间，位于半岛南端的洛东江下游，是一个疆土不大的国家。

驾洛国也有它自己的建国神话。传说当时有九个"干"——即氏族公社的酋长。一天，忽然从龟旨岭山中发出了一种声音，这声音告诉他们天帝指派人来当这九个"干"的王，要他们唱着

《迎神歌》去迎接。于是，人们便唱起来。这时一条紫色的绳子从天上悠悠降下，下系一个红布包裹的金盒。金盒中有六个金色的蛋。不久，每个蛋中都钻出了一个男孩。六个孩子在十年之后都成长为魁伟的青年。六个青年中，首先由蛋内钻出来的被称之为"首露"，成为了驾洛国的王，是为首露王。

这一神话也模糊地反映出了伽倻国形成的过程。九个"干"代表了九个氏族，六个男子同出于一个金盒子的说法可能是指九个氏族之中的六个血缘较近的氏族，在它们联合成部落之后，又以其中的一族年长者为酋长。和"朴赫居世"相象，这里也没有发生征伐或氏族迁徙流动，更没有《东明王》中的那种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首露王登位是通过各氏族族长的拥戴或选举，而不是靠武力征服，这反映出南方原始社会末期还保留的那种原始的民主习惯。

总的来讲，正如《朴赫居世》和《驾洛国》两个关于其始祖的神话中所表现的，南方在和平的环境里进行了氏族联合。这是否由于南方的社会发展处于较早的历史阶段或者由于南方古代朝鲜人的特殊风尚与民俗所造成的，应留待历史学界去考查研究。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可以断言，朝鲜古代神话较为发达。这些神话往往是以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成为基础，以部落始祖的产生为其基本内容的。这种古代神话，可以说是朝鲜民族文学的滥觞。

第二章 传　　说

三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的情节都不太复杂，人物性格的描写比较粗糙、简单，但是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也表现出一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朝鲜文字，许多民间传说不能按照其本来的面目记录下来，面是在长时期的口头传播之后，才被上层人物用汉文表达和保存下来。中古时期的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所编辑的《三国遗事》就是记录这些民间传说的最主要的文献。

一然编《三国遗事》其目的在于宣扬佛教，而佛教主要又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收录在《三国遗事》之中的古代民间传说、故事，就不可能完全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

首先从选择、取舍方面看，只有那些有利于宣传佛教宗旨的传说、故事才能被选中。《三国遗事》的传说、故事，大多和帝王将相或沙门信徒有关。有的，即使讲的是关于一个平民的故事，但其结局往往也是主人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贵族人物，如《薯童》。有的虽有离奇的恋爱情节，但也和“善恶有报”的佛教思想密切相关，如《金现感虎》。那些纯粹表现人民反对封建束缚、向往自由幸福生活和表现他们形形色色的思想感情的故事、传说，几乎完全被屏弃，或者在情节和人物性格上加以增删改写，并涂上了宗教色彩。

尽管如此，也还是能透过体现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迷雾，看到三国时期民间传说内容的若干侧面或局部。尽管我们所依据的文献是完成于高丽时期的，但作为口头文学，它是三国时期的产物，因此，这里就把它放在三国时期的文学中来叙述。

收集在《三国遗事》等书中值得介绍的有《延乌郎与细乌女》、

《射琴匣》、《鼻荆郎》、《金庾信》、《瞽童》、《旁㐌与弟弟》、《龟与兔》等。

《延乌郎与细乌女》，这一传说反映了新罗和日本交往中的爱国思想。新罗第八代王阿达罗四年（157年），居住在东海之滨的夫妇延乌郎与细乌女两人靠捕捞为生。一天延乌去海上采裙带菜，海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飘浮的岩石，托住了他的脚，飘过大海，把他送到了日本。日本人一见这位被岩石载来的人，大为惊异，就把他立为边邑王。细乌不见丈夫归来，十分奇怪，就到海边寻找。海边没有人影，却见到丈夫的鞋子搁在海岸上，于是她也脱下了鞋子，走上一个岩石。岩石竟浮动起来，把她托住飘过大海，抵达日本。日本人越发惊异，连忙报告边邑王延乌。于是夫妇相会。细乌被封为贵妃。此时，新罗本国突然日昏月暗。天文官向新罗国王奏道："日月精灵原本降生在我国，现已去日本，使得新罗日月无光。"新罗王于是派遣使臣到日本去请延乌夫妇回国。延乌回答使臣说："我在这里，是上天的旨意，怎么能够回去呢？现在贵妃织成了一些彩绸美缎，给你带回去祭天，新罗就会恢复正常。"使臣把绸缎带回新罗，奏明国王。国王于是下令用这些绸缎祭天。果然，日月复明光辉灿烂，一如往日！于是这块绸缎被举国上下视为国宝，收藏于国库中，国库也被命名为"贵妃库"。祭天的地方则改名为"迎日县"，又名"都祈野"。

这一传说载于《三国遗事》卷一之中，也出现在《新罗殊异传》和《日本书记》之中，可见流传之广。

揭去这个传说的神话般的外衣，这对飘洋过海去日本定居，并在那里开辟新天地的劳动夫妻的形象是十分生动的。丈夫先去，随后，妻子怀着对丈夫的思念和爱情，靠一叶扁舟渡过茫茫大海找到了丈夫。祖国的人民怀念他们，他们也思念祖国。于是把他们珍贵的劳动产品托人带回祖国。

这个简短的传说表现了古代朝鲜劳动人民开发海外的坚强意

志和求生能力，也表现了他们的爱情和热爱祖国的思想。

《射琴匣》是和朝鲜古代的一个民族节日——“乌忌之日”有关的一个传说。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新罗第二十一代王昆处王十年（488年），国王在天泉亭时，乌鸦和老鼠来到他面前，不断啼叫。老鼠竟口吐人言：“跟着乌鸦去！”国王于是命令骑士紧跟着乌鸦追去。往南走到避村的时候，只见两猪相斗。在骑士观看这两头猪的当儿，乌鸦已飞得无影无踪。正在他彷徨之际，突然从池塘中出来一位老翁。老翁把一封信交给了骑士。信封上写道：“开见二人死，不开一人死。”

骑士于是把信带回，呈交国王。国王接信之后说：“与其打开信封使两人死亡，不如不开，只死一人。”这时掌管占卜的官向国王禀奏道：“二人是指一般老百姓，一人是指国王。”国王于是打开信封，只见信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射琴匣”！

国王回到宫中，见到一个装玄鹤琴的大琴匣，就用弓箭射它。琴破，大匣中有男女二人通奸。男的是内殿焚修僧，女的是王妃。国王于是下令把两人处死。

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正月的第一个亥日、子日、午日，诸事必须慎重，还有不少禁忌。而正月十五日这一天也就被定为“乌忌之日”，以糯米饭祭乌鸦。

这个传说反映了宫庭的一些讳莫如深的隐私。

《鼻荆郎》是一个情节较为复杂的传说：

新罗沙梁部的一个民间少女，姿容艳丽，人称“桃花娘”。国王舍轮王听说就把她召入宫中，企图奸污她。桃花娘严词拒绝，对国王说：“我有丈夫，即使你是一国之王，也不能损伤我的节操。”国王以死威胁。桃花娘坚定地回答：“宁愿被斩于街市，也决不会改变初衷！”国王以戏弄的语气问娘，她若丧夫，可否嫁他。桃花女表示可以。于是国王放了她。

后来，国王因其朝政腐败被黜而死。两年后，桃花娘的丈夫也死去。夫死十天，国王的鬼魂便来找她，要娘实现再嫁的诺

言。桃花娘禀告父母。父母以君命不可违而令她实现诺言。桃花娘乃与国王同房。七天之内，五色彩云笼罩屋上，异香满室。七天过去，国王无影无踪。桃花娘因而受孕，产一男，起名“鼻荆”。

国王真平王听说此事以后，就把鼻荆收养在宫中。鼻荆长到十五岁，真平王授予他一个官职。但鼻荆每夜逃出远游。真平王派士兵五十人看守他。士兵发现他每次都越过城墙，到荒川岸上与许多鬼一起游乐。直到拂晓时分，众寺院钟声齐鸣，众鬼才散去，鼻荆也回家来。士兵将此情况如实报告国王。国王就把鼻荆找来，鼻荆如实承认。鼻荆还答应率众鬼凿石造桥。果然，在一夜之间建造了一座大桥，名为“鬼桥”。

国王又要鼻荆从众鬼中选拔可以辅佐朝政的人。鼻荆推荐吉达。国王遂任命吉达为官。吉达为官忠心正直。国王又把吉达送给大官林宗为义子。林宗命吉达在兴轮寺南边建造楼门，每夜住在楼门上。

一天，吉达突然变成狐狸逃去。鼻荆派鬼去捉住他，把他杀了。众鬼为之震惊，一听到鼻荆之名就纷纷逃走。从此，人们就把鼻荆当成为驱鬼之神，在门上贴诗一首以辟鬼。诗是这样的：

圣帝魂生子，鼻荆郎室亭；
飞驰诸鬼众，此处莫留停。

这个传说情节离奇，内容诙谐。传说中舍轮王的形象是奇特的，似乎有两重性。尽管这个舍轮王在世时“政乱荒淫”，却没有对敢于拒绝他的女子进行迫害。甚至在死后也依然钟情于桃花娘，化为鬼魂去与娘相会。他与桃花娘所生儿子鼻荆郎更怪。他非人非鬼，或亦人亦鬼，神通广大，能支使众鬼，可以调动众鬼一夜之间建成大桥，又能推举有才的吉达辅佐国政，在吉达不听他调度时还能处死他。

传说中对鼻荆的赞扬实际上也包含着对桃花娘的歌颂。国王后妃众多，子女亦为数不少，而惟独与桃花娘所生的儿子鼻荆超

群出众。其原因正在于这位普通的民间妇女具有勇敢高尚的品德和坚强的性格。

这个传说导致了一种习俗的产生，可见它在民间流传的广泛和深入人心的程度。这一点。和中国端午节的贴辟鬼的钟馗像颇为相似。

关于金庾信的传说，也是家喻户晓的。金庾信是对统一三国有功的新罗名将，《三国史记》中有关于他的传记。而民间口头传说不象传记作品那样全面地叙述他的生平事业，却有传记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情节，主要是关于他的前世及其一段奇遇的传说。

金庾信才能出众，加入了新罗的青年军人组织——花郎徒，立志征服高句丽及百济统一半岛。当时花郎徒中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名叫白石。白石也对征伐两国十分关心，昼夜与金庾信共商作战计划。某天，白石向金庾信建议，和他一同秘密去敌国搜集军事情报。金庾信欣然同意，和白石连夜出发。途中在一个山岗上休息时，见到两个女子。两女子一直尾随着他。到骨火川过夜时，又来了一个女子。三女子遂在一起以味美的果品招待金庾信，与他畅谈，并要求金庾信和她们一起进入树林。一进入林中，三女子就现了原形——原来她们是奈林、穴礼、骨火三处地方的护国神。她们告诉金庾信说："现在敌国正诱你出来企图害你。你却一无所知。我们是来提醒你的！"话音刚落，三位神人立即无影无踪。金庾信大惊，赶紧回到骨火馆住处，对白石谎称忘带文件，必须立即回去取来。到家以后，金庾信立即把白石绑住，拷问他。白石这才吐露真情。他承认自己是高句丽人，并说出了谋害金庾信的原因。他说：金庾信前生原是高句丽的占卜者名为楸南。楸南根据高句丽突然出现的江水倒流的反常现象忠告国王，说王后违反阴阳之道，招致此种反常现象。国王大惊而王妃大怒，说楸南是妖言惑众，就用另一件事来试验他。国王命人将一只老鼠藏在盒中，要楸南说出其中为何物。楸南说是八只老鼠。楸字不符，国王要斩楸南。楸南说："我死之后必为大将来灭掉

高句丽。”楸南被斩后，人们把老鼠杀死，发现鼠腹中怀有七只小鼠。楸南说的完全正确。当天夜里，高句丽国王梦见楸南入于新罗国舒玄公夫人怀中，因此知道金庾信就是楸南投胎，必欲除之而后快。

金庾信得知事情的原委以后，杀了白石，隆重祭祀三神。三神皆现身享供。这一传说将金庾信说成是天运的体现者与执行者。天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一、“国界有逆流之水”，产生了“雄雌反复之事”。在古人看来，水倒流、雌雄互变正是国之将乱的象征。

二、高句丽“大王夫人逆行阴阳之道”。国王不但不采纳楸南的忠言，还不相信楸南对盒中八鼠的准确推断，误杀了有才之士。这种昏愦无道君王颠倒忠奸的作法预示国将衰败。

三、天神三人在金庾信陷于危险境地时，前来提醒他，使他免遭灾祸，并及时发现敌人阴谋，根绝了隐患。

这三点，正说明高句丽亡于新罗之手乃是天命。楸南托生为新罗大将报仇雪恨，正是顺乎天意的表现。

这一传说还表现了金庾信的足智多谋：他没有在途中仓促除去白石，而是不动声色地把白石又带回家后弄清事实，然后处决。这种作法表明金庾信当时虽还年轻，但确系将帅之材，不同凡人。

民间流传的这个传说，经过僧人一然之手便带上了“冤冤相报”的宗教思想。传说中所反映的当时人盼望半岛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正是这一故事的中心思想。

《薯童》这个传说讲述的是百济武王少年时代的经历。薯童出身于贫贱的下层，本系新罗人，原名璋，为池中的龙和一寡妇交合而生，住在京城附近。靠卖白薯为生，因此人称薯童。

薯童听说新罗真平王的第三个公主善花美艳无双，就想娶她为妻。他来到京城，把白薯散发给街上的孩子们，叫他们传唱一首歌谣。歌根的内容是说善花公主每天晚上和薯童幽会。歌谣一传开，大官们就信以为真，奏请国王把善花公主流放到远方。薯

童则悄悄尾随公主，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薯童突然出现在公主眼前。公主不认识他，但对他产生了好感，答应让他陪行。公主这才知道他就是薯童，认为这是天定姻缘。

到达百济之后，公主取出了出发前她母亲所给的黄金。薯童一见大笑，问是什么东西。公主告诉他是黄金，靠着它可以过一辈子富裕的生活。薯童告诉公主，自己幼年挖白薯之处，此类东西甚多，公主一听，要薯童把它们取来送入王宫。薯童收集了大量的黄金，堆积如山。之后就托龙华山师子寺的知命法师用神力把黄金运到新罗。于是，薯童大受善花公主之父真平王的敬重，在百济因此也大得人心，终于成了百济的第三十代国王。

这一传说颇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一个贫贱的卖薯少年，竟取要求和公主结合，而且有足够的智慧愚弄那些王公大臣和国王，终于如愿以偿。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他们对王公贵族的藐视。薯童能从地里挖掘出大量的黄金，显示出劳动人民对自己创造力的信心和他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

但封建时代的农民在世界观上毕竟仍然是皇权主义者，他们拥护“好皇帝”。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同时，往往把人的最理想的结局归结为当官为王。他们在传说中仍然把薯童送上国王的宝座。

传说中以佛教思想加工润色的部分十分明显，这就是薯童依靠法师的力量运输黄金，最后建立了弥勒寺。

《旁㐌与弟弟》是关于人情世态的传说。收在中国唐朝段成式编的《酉阳杂俎》续集卷一中，《东史纲目》也载有这一传说。旁㐌是新罗第一贵族金哥的远祖。他乞食为生。人们同情他，给了他一小块地。他就去向他的财主弟弟去借蚕子和稻种以便靠劳动维持生活。弟弟心术极坏，把蚕子与稻种蒸了以后给他。旁㐌不知，照样拿了回去。蚕子竟变成了一条大蚕，不多几天就长得和牛一般大。弟弟嫉妒，就设法把蚕杀死，却意外地出现了更多的蚕，结了无数的茧子，缫出许多丝来。稻种子种下以后，

长出来的稻穗有一尺多长。鸟衔了稻穗飞走。旁㐌跟着追。追过五、六里到了山中，鸟钻进岩中缝中不见了。旁㐌就守在石缝旁直到天黑。忽然看见有一群小鬼来石缝旁玩耍。他们手中拿着一个金椎子。用金椎子向石上一敲，就出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群鬼敲出了酒、菜、饼等食品大吃一番，吃完之后就把金椎子往石缝中一插，扬长而去。旁㐌子是把金椎子取到手，靠它发了家。

弟弟又羡慕又嫉妒，向哥哥问明原由以后，要求哥哥也用同样的方法给他蚕子和稻种。好心的哥哥不愿照弟弟的办法做。但弟弟坚持，旁㐌只好照办。弟弟拿回蚕子，蚕子中出来的只不过是普通的蚕。稻种长出的也不过是普通的稻穗。弟弟守在穗旁，忽见一鸟衔穗飞去。他大喜追去，追到山中石缝旁，遇到了群鬼。群鬼把他狠揍一顿，命令他给挖出三个池塘来。弟弟挖了三天，又疲乏又饥饿，没有挖好池塘。群鬼就拉他的鼻子，结果拉成了象鼻模样，长达一丈。弟弟回家后，受尽嘲笑，羞愧而死。

这个传说辛辣地讽刺了心肠狠毒的财主，歌颂了勤劳而善良的贫苦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合乎逻辑。故事以弟弟的鼻子长达一丈而告终，极为辛辣地嘲笑了那种贪婪吝啬的恶人。

这一传说由新罗一直传入中国，由中国文人把它记录下来，可见它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从李朝时期与此传说类似的小说《兴夫与乐夫》，也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龟与兔》是一个寓言，出现于《三国史记》的《列传》之中。高句丽宠臣先道解曾用它来暗示被囚禁于高句丽的新罗使臣金春秋，他他从中受到启发，逃脱了高句丽王的迫害。

从先道解的提法可以看出，这寓言并非他自己编的，而是广泛流传于高句丽的口头创作。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从前东海龙王的女儿得了一种病，必须用兔肝才能治愈。海中无兔，有一龟向龙王表示自己可以搞到兔肝。龟出海上陆，找到了兔子，骗兔子说海中有一岛，岛上美味的果子无数，并且没有凶猛的鹰隼，是兔子最理想的安身之处。兔子信以为真，就骑

在龟背上让它驮着走。

到了海上，龟向兔说了实话，告诉兔子要用它的肝为龙王公主治病。兔子对龟说：“我是神人的子孙，可以把心肝五脏取出洗涤。最近心里不舒服，把肝与心取出洗了一遍，放在岩石底下了。我一听你说海岛那么好，就赶紧随你来了，忘了把肝带来。不妨让我去把肝取来。这样，龙王公主的病就一定能治好，而我没有肝也照样过日子，岂不两宜？”龟信以为真，把兔驮向陆地。

兔子上岸之后，一跃而进入草丛中，转头对龟说：“你这笨蛋！你想：取出心肝还能活吗？”乌龟这才知道上当，灰溜溜地走了。这个寓言赞扬了兔子的智慧。

此外，民间传说还有《春秋公》与《九层塔》等等。《春秋公》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描写了新罗第二十九代太宗大王金春秋即位前娶妻和著名花郎金庾信智嫁小妹的事，说明了朝鲜民间的一种婚礼风俗的来源。《九层塔》叙述新罗第二十七代王善德王凭借神力修成皇龙寺九层塔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表现了当时人们力求三国统一的历史愿望，还反映出新罗的外交关系。

所谓三国时期的传说，严格地讲，并不一定是出现或流传于三国时期，其中有些也可能是出现并流传于以后的统一新罗时期，其出现与流传的确切时期已不可考。这里只能根据传说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而把它归纳在此一时期中加以叙述。

第三章　朝鲜国语诗歌

朝鲜古代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直到中古时期的十五世纪中叶才创造了朝鲜文字，一直使用到现在。

这种情况造成了三国时期朝鲜国语诗歌的大量失传。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一些该时期的诗歌中，有三种情况，即：一、译成汉文的；二、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而被记录下来的；三、只见于文献记载中所提到的诗歌名称，诗歌本身业已失传。

此外，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一些懂得汉文的士大夫阶层的人物，直接使用汉文创作，这种诗被称之为汉文诗（亦名“汉诗”）。

由于有上述情况，在叙述三国时代的诗歌时，就必须按实际情况把用两种不同语言文字创作的诗歌分开，即：第一种是朝鲜国语诗歌，其二为汉文诗。

第一节　民间歌谣汉译诗

迄今为止在古代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朝鲜民间歌谣汉译诗是《迎神歌》。第一章“古代神话”关于驾洛国的建国神话里，就提到有九个氏族公社的族长曾唱着迎神歌去迎接天帝派给他们的王。歌词是这样的：

龟何龟何，首其现也！
如不现也，燔灼而吃也！

这首歌出现于首露王在位时期，即一世纪。原文载于《三国遗事》卷二中的《驾洛国记》。

这首歌虽似乎是用作迎神的祷词，但从它的内容上看，和宗

教仪式毫无关系。在《三国遗事》中的关于水路夫人的传说中，有一首与此相类似的歌谣：

龟乎龟乎出水路，掠人妇女罪何极？

汝若悖逆不出献，入网捕掠燔之吃！

水路夫人是一位绝色美人，被海龙掳入海中，于是她的丈夫江陵太守请求海边居民聚集起来唱这首歌，迫使海龙王归还水路夫人。

两首歌谣结构与用词都很相似。第二首只不过加上了对海龙掠人妻子的谴责并勒令海龙交还水路夫人，分明是在原有歌谣中加上一些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

从原诗的内容上来看，它并非一种祷词，也没有什么宗教色彩，倒很象是一首由捕龟者唱的歌谣，表现出劳动生活中的愉快和情趣，具有劳动人民开朗、乐观而又诙谐的特点。它演变成为一种宗教诗歌，是有一定过程的。很可能最初在某种欢乐的场合或庆典上用以表现愉快的情绪，继而在某种仪式上用作颂祷诗歌，最后用于宗教仪式，成了祷词。前面提到的驾洛国建国神话实际上反映了若干个氏族公社联合成部落的过程，而这首“迎神歌”恰恰就是在庆祝联合的集会上唱的。由氏族公社联合成部落的历史进程逐渐涂上了神话的色彩，随之这首普通的劳动歌谣也就成了迎神仪式上的祈祷歌了。它流传了几百年，到了《水路夫人》所反映的八世纪（新罗圣德王）时期，就带上了更多的宗教色彩。

朝鲜国语歌谣中被译成汉文的还有一首《箜篌引》，这是高句丽时出现的一首诗歌，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保存在中国西晋时期崔豹所著的《古今注》中：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坠河而死，将奈公何？

据载，这是古朝鲜人艄公霍里子高的妻子丽玉所作。霍里子高早晨撑船，突然有一白发狂夫披头散发，手提酒壶，走入河中。

妻子随后紧追，没能追上，眼睁睁看着丈夫被淹死了。妻子悲哀欲绝，弹起箜篌表达自己悲伤的心情。霍里子高见此场面以后，回家告诉他妻子丽玉，丽玉深深同情那位女子的丧夫之痛，于是作了这首歌。这首即兴之作被译成为汉文四言诗，简短地描写狂夫淹死的经过，表达出他妻子的悲哀。

第二节　以乡扎标记法记录的诗歌

三国之中，新罗的诗歌风气较盛。《三国遗事》的编著者一然说："罗人尚乡歌者多矣。盖诗颂之类欤？故往往能感动天地鬼神者非一。"

李承休在其《帝王韵记》的《新罗条》中叙述新罗社会上盛行诗歌的情形："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

新罗的国语诗歌一般被称为"乡歌"。"乡"，即本乡本土。由于这种诗歌是用本民族语言，即本乡本土的语言作成的，遂有了这样一个名称，以表示它和中国唐朝乐歌——"唐乐"的区别。这类诗歌所以能够保存至今，是由于它被用"乡扎标记法"记录下来的缘故。"乡扎"中的"乡"字，也表示同样的意思。

所谓"乡扎标记法"是利用汉字的音、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方法。三国时期，就已采用这种方法记录朝鲜语。到了统一新罗王朝的神文王时期，大学者薛聪曾对此种记录法加以整理，使之趋向正规化与统一化。三国时期的一些国语诗歌，就靠着这种标记法记录下来，保存于《三国遗事》之中，如《薯童谣》、《彗星歌》和《来如歌》。

《薯童谣》的作者是百济武王。关于薯童妙计娶新罗真平王公主善花的传说，在前一章里业已介绍。这首《薯童谣》就是他教给街头群童的原歌。以乡扎标记法记录的歌词是这样的：

善花公主主隐

他密只嫁良置古
薯童房乙
夜矣卵乙抱遣去如

译成汉文是：

善花公主
偷偷嫁了人。
每到夜晚，
就搂着薯童走了。

歌词诙谐，表现出平民对最高统治阶级的嘲弄和揶揄。

《彗星歌》是十句体定型诗，这种诗体产生于新罗，时间大概是在四至七世纪之间。全诗共有十句，按四、四、二分段。即第一和第二段都是四句，第三段是两句。在第三段开头有感叹词“啊”，在感叹词后面的这两句被称之为“落句”或“后句”。

作者是新罗真平王时的大僧人融天师。《三国遗事》中有关于此歌来历的记载：

> 第五居烈郎、第六实处郎、第七宝同郎等——三花之徒欲游枫岳，有彗星犯心大星，郎徒疑之，欲罢其行。时天师作歌歌之，星怪即灭。日本兵还国，反成福庆。大王欢喜，遣郎游岳焉。

《彗星歌》原诗译成汉文，是这样的：

国境线上燃起了烽火，
向着那古神女游荡的东海之滨，
发出了警报：
“倭兵来犯了！”

听说三花郎去游山，
于是焦急地数数月份，
猛抬头，望见了那颗打算扫地的星。
有人呼叫：“啊，看那扫帚星！”

啊！它已黯然飘离远去，

朋友，那讨厌的彗星会有多大能耐？

另根据《三国遗事》的记载：融天师作此歌以后，彗星远去，日本兵也撤退了。其实这都是巧合。

这首歌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保存至今的一首最早的、完整的十句体定型诗。其中反映了当时倭兵对新罗的侵扰，以及新罗人民反对日本入侵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出新罗的花郎（出身于新罗贵族之门的青年军官）在军事上的作用以及新罗社会以彗星为不祥之兆的习俗。

《三国遗事》的《良志使锡》中载有这样一首民间歌谣：

来吧，来吧！

我们悲哀愁苦，

为了修功德，

我们来啦！

这是人们为造灵庙寺的佛像运土时所唱的歌谣。《三国遗事》记载自从造了这个佛像以后，每当春米或干重活儿的时候，人们都唱这首歌。实际上，这是一首劳动歌谣。

虽然提到“修功德”，但实际上表现出了劳动人民在剥削与压迫下的痛苦，是他们对贫困处境和悲惨命运发出的叹息。歌谣收最者的主观动机是以此来说明善男信女对神佛的虔诚和以修佛像来寻求解脱，而在客观上却暴露出了宗教对人民的麻痹与欺骗以及人民的不幸和痛苦。

以上所说的用乡扎标记法记录的诗歌统被称之为“乡歌”。这种乡歌，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节　歌词失传的诗歌

朝鲜古代的不少歌谣虽没有能传下来，但是在一些历史书籍

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高丽史》中记载了一些歌谣的名称、来历或基本内容。这些只知其名称与来历或内容的诗歌，也是朝鲜古代诗歌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叙述具体作品以前，先谈谈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两种最早两类诗歌，即“兜率歌”和“会苏曲”。

“兜率歌”一词见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儒理尼师今》中记载：

> 五年冬十一月，王巡行国内，见一老妪饥冻将死，曰：“予以眇身居上，不能养民，使老幼至于此极，是予之罪也。”解衣以覆之，推食以食之。仍命有司，在处存问鳏寡孤独老病不能自活者，给养之。于是邻国百姓闻而来者众矣。是年，民俗欢康，始制兜率歌，此歌乐之始也。

“兜率”系佛教用语，由梵文“Tusita”而来。《三国史记》的上述故事发生在二十八年，相当于中国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而佛教最早开始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经的大量翻译则更是在此以后的事。佛教是在传入中国以后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因此上述新罗儒理王五年即二十三年时根本不可能有表示佛教思想的专门用语出现。故上述“始制兜率歌”中的兜率二字显然是后加的。

新罗在唐朝的影响下接受了佛教。“兜率”一词只能是在这以后才被使用的。“兜率”在梵文中是指佛教所说的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意为知足、喜足、妙足、上足等，意思是受乐知足而生欢喜之心。《三国史记》中说兜率歌之产生是由于人民安康幸福，而人民安康幸福又是由于儒理王以“仁慈”之心对民间老弱贫病者施行“德政”所致。分明是把贫苦人民生活的稍稍改善归功于统治者，而又把佛教的这种用语套在民间乐歌上，封它为“歌乐之始”的。“兜率”二字，就是这样被借用到民间诗歌中来的。

“兜率”的“率”读shuài，另一个音为lü。朝鲜南方一种

流传至今的农乐叫du-lei，因此新罗时期的人取“率”字的“律”音，结合这种农乐歌唱丰收之乐的原意，加上“兜率”原有的“受乐知足生欢喜心”的意思，遂把这种农乐叫做“兜率歌”。

总而言之，“兜率歌”正是三国时期歌词失传的诗歌中最早的一种民间歌谣。作为一种农乐，它也是一种劳动歌谣。关于它的体裁与形式，《三国遗事》中有所记载：“始作兜率歌，有嗟辞，词脑格。”“嗟辞”即感叹词，“词脑”即新罗古代的另一名称“斯卢”一种音近字异的表示法，指的就是新罗。因此，可以看出：兜率歌的形式与新罗其他歌谣基本相同，和上述的乡歌很接近。

和兜率歌同样古老的另一种民间歌谣是会苏曲。据《三国史记》卷一所载，新罗儒理王九年，王命令两个公主各率领一批女子，聚集在一起进行绩麻竞赛。从七月十六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为止竞赛一个月，多者为胜。败者应备酒招待胜者，并有歌舞助兴。败者之中有一女子边舞边叹息道“会苏！会苏！”声音凄凉而清雅。后来，人们群起仿效，因其声而填词作歌，叫“会苏曲”。

由此可见，《会苏曲》也是一种和劳动有关的民歌，有较为广泛的群众性。

此外，一些与某种政治事件有关的诗歌也得以借历史记录而传名于今，如《实兮歌》、《勿稽子歌》、《鵄述岭曲》、《奚论歌》、《阳山歌》、《长汉城歌》。

《实兮歌》为新罗士人实兮所作。实兮是新罗真平王时代的人，为人性格刚毅正直，因此被佞臣所谗，被贬于荒僻之地。遭贬之后，他自比屈原，作长歌以抒胸臆。

《勿稽子歌》作者勿稽子，高句丽第十代王奈解尼师今时人。他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屡建功勋，但未得封赏，自感羞惭，遂披发荷琴进入深山，在隐居中作此歌寄情。

《鵄述岭曲》：新罗第十九代讷只王派朴堤上去日本之后，朴妻思夫心切，携女儿登上鵄述岭远望丈夫所在的方向，痛苦不

已而亡。其后，新罗人编了《鵄述岭曲》以歌颂这位为国牺牲的爱国者的亡妻。

《奚论歌》：新罗人为追念奋勇反击百济侵略，血洒战场的爱国将军奚论而作的一首长歌。《阳山歌》：新罗花郎金歆运为反击百济侵略而英勇牺牲。国人为纪念他而作此歌。

《长汉城歌》，长汉城为新罗之重镇，为高句丽侵占。之后，新罗举兵收复该城，遂作《长汉城歌》以志纪念。

此外，还有一些以民间生活为题材，表达下层人民感情的诗歌，如《禅云山歌》、《智异山歌》、《木州歌》、《天官寺歌》等。

《禅云山歌》是百济的一个征夫的妻子所作。她登上禅云山，远望丈夫所去之处，唱此歌表达自己无限思念和哀怨之情，表现出当时下层人民所受的征役之苦。

《智异山歌》：百济某贫家女子为拒绝国王纳她为妃而作的歌，表现出这个民间女子蔑视荣华富贵，不畏强暴的高尚情操。

《木州歌》为新罗一民间少女所作。生母死后，她受继母和父亲虐待。她虽竭尽孝道，仍得不到他们的欢心，于是怨恨而作此歌。

《天官寺歌》是一个被遗弃的妓女天官作的思念恋人（金庾信）的歌，表现出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的痛苦。

很多歌谣的词所以失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朝鲜还没有本民族文字来记录这些口头诗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对于民间口头文学的歧视。从保存下来的诗歌如《彗星歌》、《来如歌》、《薯童谣》的内容及与其有关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符合统治阶级思想体系和政治要求的诗歌，才得以流传。《彗星歌》宣扬僧人可使国家免受兵灾之苦，其内容还涉及到当时贵族青年军官——花郎的活动。《来如歌》虽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悲哀，但它是在修造佛象运土时唱的，足可表示百姓对神佛的虔诚，表现了借助佛力解脱苦难的宗教思想。《薯童谣》虽然

没有任何有利于统治者的地方，但它的作者在以后成了百济国王，从而他年轻时代带浪漫色彩的故事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受到了重视。

就歌词失传的诗歌来看，它们大多也是可以被统治阶级用来宣传忠孝、节烈的。其标题因此才有幸被载入史册。其中如《勿稽子歌》中有对赏罚不明的惆怅，《木州歌》中的曲尽孝道而仍遭虐待的哀怨，虽是对君王和父母的不满，但也表明主人公确有尽忠、尽孝的美德，使当时人们一洒同情之泪的同时，还对他们的这种美德产生敬佩和仿效之意。这些诗歌也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

既然当时统治者可因自己的需要而保留一些诗歌，也就会因不需要或感到对自己不利而淘汰一些诗歌。因而不少诗歌连同标题一起完全消失。这些诗歌的失传，并不能说明三国时期民间诗歌的贫乏。可以断定：作为具有歌舞传统的朝鲜民族，当时的民间诗歌是相当发达的。

第四章　汉文文学

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汉文很早就传入朝鲜，但传入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纪》有“国初始用文字”的说法。在高句丽初期，还出现了以汉文写成的长达一百卷的《留记》。可见高句丽在一世纪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汉文了。百济则在三七五年编成了《书记》（高兴编）。新罗曾经派遣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唐朝学习汉文经典诗文。据《三国史记》记载，在唐文宗（827—840）时，新罗曾经派遣百人以上的留学生到唐朝留学，学成归国。这一批批留学生回到本国以后，无疑会起到传播汉文知识、促进汉文发展的作用。新罗的汉文文章家有强首、金仁问、良图等人。其中，强首得到了文武王的极高评价：

> 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

至于新罗末期的汉文大诗人崔致远，则更为汉文学者中的巨擘。关于他的文学成就，本书将在第二编第四章中叙述。

汉文的使用，对古代朝鲜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统治阶级长期重视汉文，轻视本国语言，汉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朝鲜的唯一书面文字。朝鲜本民族的文字直至一千几百年以后才产生。

尽管汉文对朝鲜来说是一种借用的外国书面语，但古代朝鲜人用它写成的作品，则完全是朝鲜社会本身的产物，是朝鲜社会种种实际情况的反映，是属于朝鲜的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正如欧洲中世纪时一些国家的作者用拉丁文写成的作品属于该国的文学一样。古代朝鲜人用汉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完全属于朝鲜文学宝

库，是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珍贵遗产。

鉴于这种特殊情况，朝鲜古代文学可按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分成为汉文文学与朝鲜国语文学两种。三国时期，汉文文学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下面，就分散文与诗歌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节　汉 文 散 文

由于只有上层人物才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汉文，汉文多数情况下是用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它首先用于政务、外交，其次用于编写记载历代王朝兴亡的史书。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一些散文作品是史书。这里先提一下当时历史著作发展的情况。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记载："国初始用文字时，有《留记》百卷。"这说明在一世纪时就已经有多卷集史书问世了。此后，在三七五年，百济有高兴所编的《书史》。五四九年，新罗有金居柒夫编写的《国史》，六〇〇年有李文真编成的五大卷《新集》。此外还有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编写者引用过的《古记》、《古史》。由此可见，从一世纪到七世纪之间曾有大批史书出现。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的一些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传记体文章看来，它们所据以成文的那些古代史书中，是不乏文学性的作品或资料的，但可惜皆已散佚。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朝鲜古代的散文有一定成就，从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它对此后朝鲜中古时代的散文发展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一些传记文章，固然可以视为由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资料构思写成的，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对古代史书中的某些文章进行加工、润色、整理、改编的结果，有的甚至基本上是从古书上转录下来的。如今有些文学史把《三国史记》中作为书面文学的传记列入三国时期的文学中，是有一定原因的。

除了传记以外，古代的一些碑志和书函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散文的面貌。

现存的最早一篇文章是高句丽大武神王致汉朝辽东太守的书函。它写于大武神王十一年（28年），保存在《三国史记》中。该书所载事情经过为：汉辽东太守率兵攻打高句丽，高句丽闭城固守。汉兵围城数十日不退。高句丽方面推测，汉兵久围不退的原因是：他们以为城内无水源，想以围困的办法迫使高句丽不战自降。于是高句丽王取池中鲤鱼，包上水草，派人将鱼和酒送往汉营。随同赠品附信一封：

> 寡人愚昧，获罪于上国，致令上将军率百万之军，暴露敝境。无以将厚意，辄用薄物致供于左右。

汉军见鲤鱼之后才知道城内有水，一时不能攻克，只得引兵而退。

碑志保存至今的有《广开土王陵碑文》、《牟头娄墓志文》。《广开土王陵碑文》立于四一四年，是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第十九代广开土王而立的，总共约一千八百余字。碑文开始部分记叙了有关高句丽开国君王邹牟王（即朱蒙）建国的神话：

>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即剖卵降出。生子有圣德。邹牟王奉母命，驾巡即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即邹牟王，为我连筏！"浮鳖应载，即为连筏。浮鳖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碑文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了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冲突和广开土王抗击倭寇入侵朝鲜半岛的斗争。

《广开土王陵碑文》现存于中国吉林省辑安，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原碑文篆隶并用，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风雨侵蚀，有些字已模糊难辨。文章中对高句丽国势的发展充满自豪感，文理拙朴而风格雄浑，可称为三国时期碑志的代表作。

《牟头娄墓志文》与《广开土王陵碑文》时代相近，全文八百余字，是高句丽大使者牟头娄的墓志铭。

新罗的碑志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六代真兴王（540—576）的巡狩四碑。碑是为记录国王率领臣下巡视所开拓的疆土而立

的"现存于今日的昌宁、北汉山、磨云岭、黄草岭。碑志中有"朕绍太祖之基，纂承王统，兢身自慎，四方托境，广获民土。邻国誓信，和使交通"等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国势。

三国时期新罗的散文现存者有金后稷的《谏猎文》。作者对新罗第二十六代真平王（579—632）荒废政事、终日打猎进行了谏阻。他首先说明为王者应当做到：

古之王者，必一日万机，深思远虑。左右正士，容受直谏。孜孜矻矻，不敢逸豫，然后德政醇美，国家可保。

接着他坦率地指出真平王的荒唐行为：

今殿下日与狂夫猎士放鹰犬，逐雉兔，奔驰山野，不能自止。

为了规劝国王改去恶习，他引用了中国古书上的话：

老子曰："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最后他向国王指出了危险，提出了忠告：

由是观之，内则荡心，外则亡国，不可不省也，殿下甚念之！

这位直言进谏的大臣的意见，当时虽未为国王采纳。可是在他死后，终于使国王悔悟，从此不再打猎。其后新罗之所以国家渐趋兴盛，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统一半岛，和国君乐于纳谏，幡然悔悟不无关系。

金后稷的这篇谏猎文简洁有力，有说理，有指责，有规劝，引用典籍也十分得体，说明六世纪时的新罗汉文所达到的水平。

七世纪时，百济也有一位敢于直谏的臣子——成忠，他的《上义慈王书》也是古代散文的名篇：

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臣常观时察变，必有兵革之事。若异国兵来，陆路不使过沈岘，水军不使入伎伐浦之岸，举其险隘以御之，然后可也。

义慈王（641—661）整日纵情酒色，不问政事。成忠直谏，反被

下狱。虽身陷囹圄，他也念念不忘百济安危，以上的《上义慈王书》就是他在狱中病危时，写下的临终遗言。可是他最后的这点耿耿忠心，也依然未被采纳。百济终因王政不修而灭亡了。

以现代人对"文学"一词的理解和要求来看，以上所列举的碑志、书函等的文学性并不强。这些零星的作品，毕竟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朝鲜文人士大夫使用汉文字能力的一种标志，使我们能看到当时作为书面文学之一的散文的若干侧面。从内容上看，它们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方面，如战争、国势、统治阶级的生活腐化等等。

此后的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如寓言、游记、传奇、散文，就是在三国时期的散文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汉 文 诗

朝鲜现存最早的一首汉文诗是高句丽琉璃王于公元前十七年所作的《黄鸟歌》，这是一首四言诗：

翩翩黄鸟，雌雄相依。

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琉璃王是高句丽第二代王，始祖东明王朱蒙的长子。《三国史记》记载了这首诗的来历：

琉璃王三年，妃松氏死，王娶二女为继室，一名禾姬，鹘川人；一名雉姬，汉人。二妃常有矛盾。一次，王去箕山打猎，七天未回。二人相互争吵。禾姬骂雉姬说："你是汉人家里的婢妾，为什么如此无礼？"雉姬因愤愧而出走。国王听说以后，骑马追去。但雉姬十分愤怒，再也不愿回去了。国王无可奈何。一次，国王在树荫下休息，见黄莺飞集一起，触景生情，乃作此诗。

朝鲜有人认为，此诗原文可能是朝鲜语，后译成汉文诗，记录于史册。虽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下这种论断的根据毕竟不充分。就古代朝鲜人受汉文化的影响来看，高句丽的最高统治

者——琉璃王未必不懂得汉文，作汉文诗以怀念他出走的汉人爱妃雉姬，也在情理之中。

《黄鸟歌》内容简单，语言朴质无华，风格与同时代的中国汉代的诗风相近似。

高句丽僧人定法师（六世纪后半期人）曾来中国留过学。他所写的五言律诗《孤石》是一首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技巧娴熟的写景诗：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
岩隈恒洒浪，树杪镇摇风。
偃流还清影，侵霞更上红。
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

三国时期的汉文诗中，有两首是直接为当时的政治与外交服务的。即高句丽爱国名将乙支文德所写的《遗于仲文诗》和新罗真德女王的《太平颂》。

六一二年，隋炀帝派大军进攻高句丽，乙支文德奉命与隋军交战。他起初亲自去隋营诈降，借以探听虚实，继而又佯装败退，引诱隋军开到离平壤三十里的地方。后来就写了一首诗给隋军主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劝他应“知足”退兵，并遣使向隋军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表示愿意投降。待宇文述撤退时，乙支文德派兵四面包抄，终于大败隋军。乙支文德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
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这首五言绝句虽然没有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沉的感情，但用语巧妙，不亢不卑，表面上似乎是对敌将的恭维和劝告，实际上却是暗含讥刺和揶揄，它在字里行间向对方暗示了这样一种自信心：我们并非没有力量击退你们，但希望你们能“知足”，自动撤走。

这首在外交和军事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短诗，在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三国时期汉文诗中，一向受到人们的珍视。

除统一三国外，新罗外交上采取了联合唐朝的政策，以便借用唐朝的力量击败对手——百济和高句丽。新罗真德女王四年（650年），中国唐高宗永徽元年，新罗开始采用中国永徽年号，女王把织在锦缎上的五言排律《太平颂》一首赠送给唐朝皇帝，表示对唐朝的敬意和联唐的愿望：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
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
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
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
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锽锽。
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
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
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
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
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

中国的《唐书》和高丽诗人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及《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上都有此诗，个别字句不同，这里引用的是《三国史记》上所载的全文。

全诗气魄雄伟，对仗工整，表明新罗七世纪时对汉文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作者不一定是真德女王本人，据推断，可能是当时汉文名叫强首的大诗人所作。中国的诗界对此诗评价甚高，《唐诗品汇》称道它“高古雄浑，与初唐诸作颉颃。”

这首用于外交事业的诗，是新罗联唐措施中的一部分。它对促使唐朝帮助新罗征服其他两国起了积极作用。六六〇年百济灭亡，六六八年高句丽灭亡，这是新罗外交政策的胜利。

第二编　统一后的新罗时期的文学

（公元七世纪后半期—九世纪）

概　说

新罗联合唐军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在半岛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对农民采取了一系列让步政策，如减少租税、减免农民的债务，还对一部分反对王朝政策的贵族保守派进行了镇压。

新罗实行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国王可以赐给贵族“封邑”或“食邑”，受赐的贵族死后，土地仍收归国王。这是一种限制大土地占有扩大化的政策。与此同时，新罗王朝参照中国唐朝中央集权的各种制度，对统治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和完善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政治机构。

但是，保守的贵族对这种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很不满意。在八世纪以后，屡有贵族叛乱事件发生，削弱了新罗中央集权制的土地政策。封建贵族兼并土地日益严重，同时出现了地方土豪和大批新兴地主，许多农民失去更多的土地，陷于更为贫困的境地，并造成新罗王朝政治上的混乱。到了九世纪，随着新罗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趋于衰落，商人势力兴起，农民在土地兼并、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下，日益贫困。农民起义连续发生，给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各地土豪与大官僚也都起而拥兵称霸，各据一方。

九〇〇年，甄萱崛起于百济故地完山，自号曰“百济”。九〇一年新罗王族后裔弓裔起于北方，由松岳（开城）至江原道铁

原，建立泰封国，形成了新罗、后百济、泰封三足鼎立的局面。九一八年，弓裔大将王建篡夺弓裔之位，改国号为“高丽”，由此形成了新罗、后百济和高丽三权对峙的“后三国”，九三五、九三六两年，新罗与后百济先后亡于高丽，于是结束了短期的分裂局面，半岛复归统一。

新罗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同时也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手段。国家派遣了许多求法僧和留学生到唐朝，培养了一批汉文学者，其中著名的求法僧慧超还由中国出发经海上去印度，复由陆地返回长安。建筑和雕塑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颇有发展，保存至今的许多佛寺、佛像、艺术品如庆州的佛国寺多宝塔、庆州石窟庵中的释迦与观音塑像、奉德寺的巨钟等等，都说明了当时建筑、雕塑、工艺的发展情况。

新罗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民间传说有进一步发展，它在日益强大的佛教影响下，内容带有不少佛教色彩。产生于统一以前而盛行于统一以后的十句体定型诗之中，有不少带有佛教思想。九世纪末，魏弘编成了名为《三代目》的诗歌集，说明当时国语诗歌发达的情况。汉文诗也比前一时期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出现了崔致远这样的优秀诗人。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传奇文学，由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出现了篇幅较长的纪行文。此外还出现了寓言。

第一章　传　　说

统一新罗时期，民间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王朝提倡佛教，大建寺院，扩大对佛教的宣传，民间也深受其影响。来自民间的传说中也出现了不少神、佛、鬼，表现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统一新罗时期的民间传说，和前一时期一样，主要保存在《三国遗事》之中。这些记录下来的传说中的佛教色彩，无疑有《三国遗事》的编著者一然根据佛教宣传的需要增添上去的。但传说既产生于佛教极盛的统一新罗王朝时期，其本身必然受到的佛教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民间传说的基本内容正是统一新罗时期社会状况的部分反映。

这里叙述一些比较著名的、有代表性的民间传说。

《驴耳王》是关于新罗第四十八代景文王的传说：

景文王本为花郎，为宪安王的驸马，宪安王死，传位于他。传说这位国王性格古怪，即位前很喜欢蛇。每到日暮黄昏，无数的蛇就聚集到宫中来。宫人惊骇，要把蛇赶走。他却说："如没这些蛇，我就睡不安稳。"他睡下以后，蛇在他胸脯上爬来爬去。即位以后，一天他的耳朵忽然变长，有如驴耳。王后和宫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专门为国王制作头巾的幞头匠知道。幞头匠直到临死前，才敢跑到道林寺的竹林深处无人的地方，对着一片竹子大声喊道：

"国王耳朵可长啦！和驴子一样！"

幞头匠死后，每当风吹竹子，竹中就发出同样的喊声。国王非常狼狈，下令砍去竹子，改种山茱萸。但风吹到山茱萸上，依然发出类似的声音"我们的国王耳朵可长啦！"——只是把"驴子"一词省略而已。

这传说记录于《三国遗事》中。关于景文王登位前娶宪安王女儿的经过，《三国史记》所记载的和《三国遗事》内容相同，但只字未提“喜蛇”和“驴耳”等事。《三国史记》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出发，当然不会记录这个有损君王威望的传说。可是热中于宣传宗教迷信思想的《三国遗事》却照样把这一民间传说记录了下来。

景文王在位的时间是九世纪中下叶（861—875）。九世纪新罗的时代特征是农民生活进一步的贫困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王朝统治风雨飘摇。《驴耳王》的传说就表示了人民对王权的轻蔑、嘲弄。它非常幽默地揭露了这个妄图掩盖丑恶面目的国王的那副狼狈相。

《处容郎》是和朝鲜古代民间风俗有关的一个传说：

新罗第四十九代宪康王游开云浦（今蔚山）之后打算回京，在海边停下休息时，忽见云雾弥漫，道路难寻。他感到奇怪，忙问左右侍从。负责管天文气象的官员回答说：“这是东海龙王造成的，必须为他做件好事才能云消雾散。”国王于是下令为海龙王建一佛寺。结果随即天晴如初。东海龙王高兴地率领七个儿子在国王面前歌舞，赞美他的德行。从七个儿子之中挑一个儿子处容随国王入京，辅佐朝政。后来，国王选一美女给处容为妻，并封他官职，希望他永远留住京城。处容的妻子美丽非凡，瘟神便产生了爱慕之心，他于是化成人形，趁处容外出之时，黑夜潜入处容家与其妻子私通。处容从外面回来，发现床上有两个人。他竟“宽宏大量”并不恼怒，边歌边舞而退。歌的内容是对妻子之与人通奸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此时，瘟神现出原形，跪倒在处容面前告罪：“我爱慕你妻子，与她相好，但承蒙你不见怪发怒，甚感愧疚不安。从今后，只要一见到你的画像，我就再也不进你家门了。”

从此，民间流传下了这么个风俗：在门上贴上处容的画像，用以辟邪求福，祛魔求安。

一些古书的记载表明：当时曾确有处容其人。《三国史记》的《新罗本记》中说：

> 宪康王五年春……三月，巡幸国东州郡，有不知所从来四人，诣驾前歌舞，形容可骇，衣巾诡异，时人谓之山海精灵。

《世宗实录地志·庆尚南道蔚山》载：

> 处容岩：在郡南三十七里开云浦中。世传新罗时，有人出其上，状貌奇怪，好歌舞，时人谓之处容翁。今乡乐有处容戏。

又据《东京杂记》卷二《古迹》载：

> 月明巷：在城南……处容每月夜歌舞于市，后人名为月明巷。

高丽时期的一些诗人也曾写汉诗赞扬处容的歌舞。

据朝鲜一些学者推断，处容无疑是一位能歌善舞的人，他率领一批人遍游各地，表演歌舞，是一位为民间所熟悉的艺人。而以上有关处容的传说，可能是对类似的事实加以渲染，使之富有神话色彩。传说中的所谓“瘟神”可能是暗指某种有权有势的人物。处容对他的“宽容”实际上也是慑于权势。瘟神的谢罪和民间画处容像驱赶瘟神恶鬼的做法，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势人物的厌恶情绪及抵制态度，也是对接近人民的多才多艺的处容的一种同情与赞美。

《居陀知》记述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奇遇。新罗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时，王子良贝奉旨出使唐朝。因传闻百济海贼霸占津岛，就挑选了弓箭手五十人随同前往。船行至鹄岛时，风浪大作，在这里停泊了十天左右。良贝非常担心，命人占卜，卜曰：“岛上有一个神池，祭祀之后，风浪可止。”于是良贝就在池上祭奠。突然池水涌起，高达一丈多。当天夜间，良贝梦见有位老人对他说：“请挑选一位射箭能手，令他留在岛上，就会有顺风了。”良贝醒后把梦中所见告诉左右，问谁可留下。众人主张拈

阁。找来五十块木片，每块上分别写上各人的姓名，扔到水中。军士居陀知的木片沉入水中，于是决定把他留下。这时，刮起了顺风，良贝带着从人乘风开船前进，离开了鹄岛。

居陀知独自留下，正发愁时，忽见池中出现了一位老人，他对居陀知说："我本是西海的海神。如今有一个小和尚，每当太阳出山的时分就自天而降，念着咒语绕池三转。这一来，我们全家包括我夫妇二人和我的儿孙都不得不浮上水面。这小和尚就捉住我儿孙，掏出肝肠吃。现在只剩下我们老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了。明天这小和尚还要来，请你用箭把他射死。"居陀知欣然同意，老人表示感谢后隐身不见。

居陀知于是隐藏起来，伏在地上观察动静。次日拂晓时分，果然见一小和尚绕池念咒，企图掏老龙的肝。居陀知瞄准他一箭射去，小和尚应声而倒，化为一只老狐狸。

随即，老人又出现了，对居陀知表示感谢："承蒙你帮助，救了我的性命。我愿意把我女儿嫁给你。"老人把女儿变成一枝花，放在居陀知怀中，并派遣两条龙把居陀知送到新罗使臣良贝的船中。在两条龙的护卫之下，船平安进入唐朝国境。唐人见新罗船下有两条龙托住船底，大为惊异，立即奏明天子。唐朝天子说："新罗的使臣必非凡人。"就赐宴招待，让良贝坐于群臣之首，并赠以大量黄金、绸缎。

后来，居陀知回新罗，由怀中取出花枝，花枝化为一女子，与居陀知结为夫妻。

这一传说内容与海关系密切，可见它的最初作者是与海关系较为密切的人。传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如其中所提到的"百济海贼"，说明百济亡国以后，部分百济人流落海岛，袭击新罗过往船只。此外还反映出新罗王朝与唐朝的国际交往及海路交通情况。传说的主人公是普通士兵，歌颂了他的正义和勇敢的行为。情节离奇，想象丰富，富于传奇色彩，是新罗民间传说中引人入胜的一篇。

佛教色彩浓厚的传说有《调信之梦》、《善律还生》、《孙顺埋儿》、《正秀师救冰女》、《金现感虎》等等。

《调信之梦》叙述新罗世逵寺僧人调信倾慕金昕太守之女的故事。他日日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他能和金氏女结合。数年之后，忽闻该女子已许配他人，心中哀怨交集，情思绵绵，昏然入睡，忽见金女来到面前，遂与之结为夫妇。婚后四十年间家境贫寒，四方流浪乞食。他们共生儿女五人，长子饿死，葬于溟州蟹县岭；十岁女儿行乞被狗咬伤。夫妇各携两个孩子，各奔东西。正为生离死别而凄怆欲绝之时，忽然梦醒。见残灯摇曳，正值更深夜半。及至天色大明，调信已是须发尽白，成了老翁。从此看破红尘，摆脱儿女私情。后来去到梦中埋儿的蟹县，掘开儿墓，原来是个石弥勒。他把石弥勒供奉于邻寺。回到京城后，捐出全部财产建成净土寺，潜心修道，后不知所终。

《调信之梦》所宣传的是典型的佛教的虚无思想。但传说中所提到的调信与金氏女梦中结合之后，“家徒四壁”、“藜藿不给”、“落魄扶携”、“饲口四方”等贫困生活境遇和长子饿死，幼女行乞为犬咬伤等惨状的描绘，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善律还生》叙述僧人善律向菩萨许愿，还未还愿，便忽然死去。在阴间，他诉说尚未还的愿是完成六百般若大品经，阎罗王同情他，放他还阳。由阴府到人间的途中，他遇到一女子向他诉说父母偷取金刚寺水田一亩的罪孽，求善律还阳后劝其父母交还土地，并取出她生前的胡麻油和细布，将油献给寺庙作灯油，将卖布所得，作为抄写佛经的费用。善律还阳后一一照办。后来梦见女子告诉他，由于他的帮助，她已脱离苦海。这个故事看来是佛门中人编造的。其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宗教神圣，但客观上暴露出了寺院对劳动农民的欺骗和剥削。

此外，《正秀师救冰女》、《孙顺埋儿》一类的传说，或为宣扬佛教的“普渡众生”和“救苦救难”的大慈大悲，或系提倡

为母埋儿的封建孝道。其结局也不外“善有善报”，按照佛教教义行事，都会得到神的保佑，受到国王的表彰。

这类“善恶果报”的传说中，也有情节较曲折，故事颇感人的口头创作。如《金现感虎》就是：

新罗风俗，每当仲春之月，京城男女在初八至十五日去往兴轮寺的殿塔祈福。元圣王时有花郎金现，绕殿塔祈福直至深夜。有一姑娘跟随在后，彼此眉目传情，终至相好。该女子与金现亲热一番后要离去，金现尾随不舍。走到西山下进入一茅店。有个老太婆问女子后面是何人。女子如实相告。老太婆担心地说：“事情虽好，但实在是多此一举。既已如此，就把他藏起来，以免你兄弟厌恶。”于是把金现藏起。不久有三只老虎咆哮而来。虎作人语发问：“家有腥膻气，可以美餐一顿。”老太婆与女子就骂他们，说并没有可吃的东西。这时，天空中忽然有人说话：“你们伤生害命太多，理应受到惩罚！”三虎听说，十分惊恐。女子对他们说：“三位兄长如能远走他处自行悔改，我愿代你们受罚。”三虎闻言欣喜而去。

三虎走后，女子对金现说：“我本不愿让你来到我们同类中。你既执意来了，我只好把真情告诉你。我与你虽非同类，但既已有一夕之欢，理应有夫妻情分。三位兄长作恶多端，天欲报应。全家的灾难由我一人承担。我与其死于一般人之手，不如死在你的刀下，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明天，我跑上街头为害，人们将对我无可奈何。国王如果以高官厚禄来征募捉虎的人，你放心地追赶我，一直追到城北林中，我在那里等着你。”

金现听此言，表示不忍以伉俪之情换取高官厚禄。女子对金现说：“我的寿命已尽，我死，既是天命，又是我所愿，还可使你得到幸福，使我们族类免遭祸殃，使黎民百姓得平安。一死而得五利，不可违背。但希望在我死后为我建庙，宣讲因果报应、轮回循环之理。”言罢彼此洒泪而别。

次日，果有猛虎进入市街，无人能抵挡。元圣王悬赏捉拿。

金现表示可以捉拿老虎，于是元圣王立即赐以高官。金现执刀追虎入林。虎变为女子，笑对金现说："愿你别忘记昨夜你我的恩情。今天被我用爪抓伤者，涂兴轮寺的酱，即可痊愈"。说毕，自取金现所佩之刀，自刎而死。

金现作了官，建立虎愿寺，以报答虎女杀身相助之恩。

记录这一传说的一然，把金现的艳遇和当官的原因归结为信佛虔诚，能绕寺塔祈福直至深夜，这无疑是为佛教作宣传。传说的头尾虽掺进了一些宗教思想，却依然保持它那浓郁的感情色彩。

另一个传说《申屠澄娶虎》，也是人与虎女结婚，之后女子复现原形而去的故事。

为了宣传佛教，统治阶级不惜耗费大量金钱修建寺院和佛塔等宗教建筑。传说《无影塔》就暴露了这种作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新罗统治者在动用大量人力建筑庆州的佛国寺释迦塔与多宝塔时，一些石匠被迫长期服劳役，多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有位石匠的妻子来到工地探望久别的亲人，但和尚们却以建塔是为菩萨积"功德"为借口，不准女人靠近塔旁。历尽千辛万苦而来的妻子怀着悲伤和激愤在工地附近徘徊。这儿有一水池，可怜的女人日日凝视水中的塔影怀念丈夫。塔越修越高，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也越来越深切。塔中凝结着丈夫的血汗与泪水，塔影倒映在水面上，最后，她纵身跳入池中淹死了。从此，水中的塔影突然消失了。人们认为：塔影的消失正是由她的死和无限悲愤所引起的，于是就把这个释迦塔称为无影塔。

犹如我国的《孟姜女》传说一样，《无影塔》的传说以哀婉的情调表现出劳动人民爱情的深挚和纯洁，通过这种幸福爱情受到的阻挠摧残以及主人公的悲剧，揭露和控诉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由于释迦塔是为以"慈悲为怀"的菩萨修建的，《无影塔》的传说更带有对佛教虚伪性的讽刺意味，这是它和《孟姜女》的不同点。

第二章　散文的发展

统一新罗时期，散文文体有所发展，尤其是具有一定形象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如人物传记、寓言、游记和传奇等都开始出现。

在八世纪，出现了金大问所写的《花郎世记》、《高僧传》和《鸡林杂传》，还出现了金长清所写的《金庾信行录》。

《花郎世记》记述了作为新罗社会的军事支柱的花郎们的生平事迹。所谓“花郎”是一些出身于新罗贵族家庭的青年。他们在王朝的组织、支持和鼓励下结成为“花郎徒”的军事和习武团体。在这里接受忠、勇、信、义等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教育，学习武艺并游历全国名山大川以丰富知识和磨练意志。国家从这些花郎中选拔军官，一些优秀的军官如金庾信就是花郎出身。花郎们既有刻苦的学习和训练，也有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和经历。《花郎世记》是具有一定文学性的传记作品。

新罗是佛教盛行的国家。《高僧传》是记叙著名僧人生平及其业绩的作品，当然在传记文学上也有一定地位。

可惜，《花郎世记》和《高僧传》已全部散佚。

《鸡林杂传》也已失传。可以推断，它是记录新罗社会的各种人物逸事和传说的作品。

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长达十卷，是对这位为统一三国屡建奇功的名将生平的详细记录。高丽时期金富轼所编《三国史记》中，人物传记篇幅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庾信的传记。其中的一些材料无疑是直接或间接来自《金庾信行录》。我们目前虽已不能见到该书的原貌，但通过《三国史记》上的有关部分，可以推断它是一部相当详细的、成熟的传记文学作品。

这里就目前尚存的散文作品来叙述当时散文文学发展的情形。

第一节 寓言和游记

寓言《花王戒》为薛聪所作。薛聪（654—701）是名僧元晓之子，最初学习佛经，后改学儒学经典。据传，他曾经创制了乡扎标记法。《东京杂记》说他“又以俚语制吏礼，行于官府。”《三国史记》说他“以方言续九经，训导后生”。

“俚语”、“方言”指朝鲜语。看来薛聪虽属于文人士大夫之列，但他是比较重视当时为统治阶级所轻视的本民族语言的。从朝鲜接受与使用汉字的历史来看，薛聪是乡扎标记法的一个整理人。据传，他曾在唐朝到中国留过学，但已难以确考。

《花王戒》是薛聪奉神文王之命而作的一篇寓言。国王的目的是为了听一些“异闻”散心解闷，薛聪却针对国王平素的缺点讲了这个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最后又奉命把它写成文章。

《花王戒》以花王喻国王，以蔷薇喻宫中美女，以白头翁（植物名）喻忠直之士。寓言中的蔷薇的形象是这样的：

> 一佳人，朱颜玉齿，鲜妆靓服，伶俜而来，绰约而前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对镜清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袂清风而自适，其名曰蔷薇。闻王之令德，期荐枕于香帷……”。

白头翁的形象则是这样的：

> 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

前者外貌美艳，香气袭人，但徒供观赏，使人迷醉。后者朴实无华，外貌无动人之处，但可以祛病延年。二者必择其一，花王犹豫不决，对美貌佳人颇为爱怜难舍，对朴素的白头翁，却漠然冷淡。于是白头翁对花王说道：

吾谓王聪明识理义，故来焉耳，今则非也。凡为君者，鲜不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是以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

这番恳切的批评使花王顿时醒悟。他面对忠直的白头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三国史记》记载：神文王听了薛聪的这个寓言之后，不禁"愀然作色"，认为这寓言"诚有深志"，命薛聪把它写出来，作为今后王者之戒，并给薛聪加官晋爵。于是这个寓言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名篇。

《花王戒》对神文王的荒淫生活暗含讽刺，对当时腐败的朝政也有所指责。所谓"蔷薇"明虽指宫中美女，实则是泛指一切奸佞之徒。他们以"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来奉承国王。他们"无不奔走上谒"，趋炎附势，邀宠加官。寓言比拟生动，叙述简洁。

《花王戒》在朝鲜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李朝时期的林悌写了讽刺当时国王腐败的《花史》，其蓝本就是《花王戒》。

记行文《往五天竺国传》是这一时期一项重要的文学成就。这部作品的作者僧人慧超是新罗第三十三代圣德王（702—736）时人，十六岁到唐朝学习佛教典籍，后决心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去考察。他于七一九年从中国南海登上商船漂洋过海到达印度，遍访了印度的五个天竺国之后，经过西北方的克什米尔等处，转而取道西南方，途经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到达了当时属于东罗马帝国领土的拂临（叙利亚）。慧超由此处踏上归程，经过中亚细亚的十几个国家，翻过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高原，路经新疆，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回到唐首都长安，行程十万多里。

慧超把他在这次长途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写成了长达三卷的《往五天竺国传》。可惜原文大多散失。在唐朝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第一百卷中载有其音义。到一九一〇年，才在中

国敦煌石窟中发现《往五天竺国传》第一卷的残本六千多字。这部著作记录了所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宗教、风俗习惯、地理、气候、生产、语言等情况。

慧超作为僧人，总以佛教为出发点来观察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如对信佛教的国家，则说它是“足寺足僧，大小乘俱行”，对不信仰佛教的国家，则说它是“不识佛法”，还着重记述各国僧人修行、圆寂、国王敬佛的情形。

此外，这部游记中还流露出慧超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例如，对迦罗国的矿产、农产、畜产情形都有所记载，对该国国王、小官和百姓的不同的生活状况也有描写，表现出当时朝鲜人要求了解外国的愿望。

慧超在他的游记中还对一些落后的风俗和制度作了批判。如对吐火罗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共娶一妻，安国、波斯等国以母及姊妹为妻等等，他都斥之为“极恶风俗”。

第二节　传奇文学——《新罗殊异传》

统一新罗时期还没有小说，但是小说的前身——传奇文学已开始出现了。

新罗和唐朝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关系都比较密切、频繁。唐朝时期，传奇文学开始产生与发展，出现了一连串富于故事情节的传奇作品。差不多与唐朝同时，新罗也产生了一批以汉文文言写成的传奇作品，出现了《新罗殊异传》这样的传奇作品集。

《新罗殊异传》原书已佚，但其中有若干篇分别收录在《太平通载》和《大东韵府群玉》中。

关于《新罗殊异传》的作者，说法不一。据权文海的《大东韵府群玉》记载，作者为崔致远。但觉训的《海东高僧传》中则认为作者是高丽初的朴寅亮。从《新罗殊异传》的九篇作品内容来看，除《仙女红袋》象是个人创作外，多数作品似乎是以当时

民间的口头传说为基础，经文人加工而成的。崔致远和朴寅亮可能都曾参与收集、整理和加工，但是很难断定各自的具体贡献的多寡和主次。

殊异传中，有关于历史人物的逸事，如《竹筒美女》、《老翁化狗》，有恋爱故事，如《首插石楠》、《心火绕塔》、《虎愿》等。

《竹筒美女》的故事梗概是：新罗一著名英雄金庾信一次在路上见到个举止异常的人。此人四顾无人，就从怀中取出一竹筒。他把这竹筒叩了几下，就见有两个美人由竹筒里出来。他就和她们坐在一起叙谈。谈完之后，他又把两美人纳入筒中揣入怀中离去。金庾信大为诧异，就追上去和他攀谈，与他同去京城，并在南山松树下设酒宴款待他。此时，两美人也出来一齐吃酒。此人告诉金庾信：他本住在西海，去东海娶妻，现在正带妻子去拜望岳父母。话音方落，立时风云大作，天昏地暗，此人与二美女顿时消失。

《老翁化狗》也是和金庾信有关的一个故事：新罗时，一老翁来到金庾信家门外。金庾信握住老翁的手，把他请入房中，并设宴招待他。金庾信举杯问老翁："依归善变如前否？"老翁一听，立即变为老虎，接着又变为鸡，变为鹰，最后化为狗遁去。

金庾信在统一三国的事业中屡建殊勋，是新罗的名将。他的有勇有谋、对事业的热诚以及他的卓绝艰苦的斗争，博得了世人的赞扬，从而使他成了传奇人物。以上两篇传奇虽以路人及老翁为主人公，而金庾信不过是旁观者，但实际上也表现出了金庾信的非凡经历，他能目击凡人难得一见的怪异神奇之事。就连比较注重史实、不愿收录荒诞神怪之言的《三国史记》也记载了金庾信年轻时遇神人、受兵书的传说。

上述两篇有关金庾信见闻的传奇虽然情节简单，但也说明了金庾信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心火绕塔》的大意是：新罗活里驿地方有一个名叫志鬼的

人，悄悄爱上了貌美的善德女王。他在女王去庙中进香的那天，偷偷跑进庙中，躲在庙塔下边。在等待女王的过程中不觉睡去。女王得知此事以后，就脱下手镯放在正在熟睡的志鬼胸上。志鬼醒后，才知道女王曾来到过自己身边，但自己却和她失去交臂，不禁悔恨交加。因而心中生火，火起而将庙塔烧毁，志鬼本人也被烧死，成了火神。女王于是下令术士高念咒语，驱逐火神。咒语如下：

志鬼心中火，烧身变火神；
流移沧海外，不见不相亲。

这篇故事表现出了对爱情自由的大胆幻想和刻意追求。志鬼这种蔑视身份制度、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愿望，虽未实现，却有一个神奇的结局：炽热的恋情化为火焰，烧去了塔和自身。感情是这样纯洁、炽烈，结局是这样的富于悲剧色彩。

女王命令术士以咒语驱逐火神的作法，是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的：封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总是传统等级制度的维护者，它不但不能接受平民的纯洁爱情，而且更害怕这爱情的火焰烧毁自己的宝殿。

更直接、更写实地表现人民力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传奇作品是《首插石楠》：

新罗人崔伉和一女子倾心相爱，但为父母所禁，不能与她相见，长期抑郁寡欢，一病身亡。死后，灵魂夜间潜至女子家。女子不知道崔伉已死，就跟随崔伉一同出走。崔带女子走到家门口以后，立即逾墙而入。女子在门外等候，等到天明，不见崔伉，却只见崔家人开门出来。女子将经过如实告知他们，拿出崔伉天明前所赠的石楠枝给他们看。打开棺材，只见崔伉尸体头上插着石楠枝，所穿鞋子犹带露水。女子痛不欲生。此时崔忽复活，女子转悲为喜。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而终。

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还有《虎愿》，它收于《大东韵府群玉》卷十五之中，内容和《三国遗事》中的《金现感虎》相同，

说明它原本是民间传说。

收于《大东韵府群玉》卷十五中的《仙女红袋》写的是关于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一段风流韵事。《太平通载》卷六十八中有一篇内容相同的作品，名为《崔致远》，是一篇诗文并茂的作品。其情节如下：

崔致远去唐留学，及第后任溧水县尉。一天，去县南边的招贤馆游玩，见馆前有一座葬着两个女子的古坟，于是诗兴大发，作诗一首贴在石门上而归。当夜，有一女子名翠襟手拿红袋而来，自称是来向崔传八娘子与九娘子的话，并从红袋中取出酬答诗两首递给崔致远。诗作得很好，诗末说孤魂畏惧生人，不能透露姓名，敬请原谅，还表示愿意和崔见面。崔颇感奇异，就写诗作答，表示同意见面。翠襟把诗带回。不久，两个绝色女子来到了崔面前。崔又惊又喜，交谈以后才知道两女子是本县楚城乡张氏的女儿，姐十八岁，妹十六岁，二人因不满父母订的婚姻，郁郁身亡。于是崔与二女子作诗唱和，并且与二女同衾，情意缠绵。待晨鸡啼叫声传来，二女惊起，作诗表达难舍难分的心情。崔见二女的诗也不禁泪下。二女求崔：如再来，望修扫荒冢。言毕，顿时消失。崔次日晨重临古坟前，只见荒草萋萋，无限感伤，作长诗一首而归。

如果说《心火绕塔》、《首插石楠》以简单的情节、朴素的幻想表现出了一般平民对爱情自由的追求，那么《仙女红袋》则以矛盾的人物性格、对感情的细腻描写以及丰富的辞藻表现出了文人对爱情的态度。在封建礼教束缚下，文人固然在爱情上不能称心如意，但是，他们毕竟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平民不尽相同，和受歧视的劳苦大众尤其不同。文人由于其政治和经济地位较为优越，在他们成了达官贵人以后，就可以娶三妻四妾。文人中官微职卑者，虽不能象达官贵人那样随心所欲，但也难免沾花惹草、逢场作戏。《仙女红袋》中的男主人公虽也对受礼教摧残至死的女子表现出同情与爱恋，但远不如《心火绕塔》中的志鬼和《首

插石楠》中的崔伉那样爱情炽烈、纯真、执着。《仙女红袋》的男主人公在他记叙他的艳遇的诗的末尾，竟然写下：

大丈夫，大丈夫，

壮气须除儿女恨，莫将心事恋妖狐！

这些话看来似乎和主人公对于所爱者的感情相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封建文人对爱情态度的流露。他对这种"艳遇"不过是逢场作戏，一旦觉得对他的仕途和地位不利，就无情地与之一刀两断，甚至把他所眷恋过的人也称为妖狐。

《仙女红袋》中死于父命威逼之下的两女子的形象是对封建婚姻制的一种揭露和谴责。

这篇传奇构思巧妙，辞藻优美，人物心理刻画较细致，是现存的新罗传奇中的最长的一篇，艺术水平也较高。

第三章　统一新罗时期的朝鲜国语诗歌

新罗统一三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朝鲜国语诗歌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罗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时，大矩和尚与魏弘合编了诗歌集《三代目》（888年）。此书虽已失传，但它的编成说明了当时诗歌发展的盛况。

由于《三国遗事》而得以幸存的新罗乡歌十四首之中，有十一首是在统一新罗王朝二百六十多年内的产物。连同三国统一以前新罗总共存在了九百九十二年，在这大约近一千年的漫长时期内，统一新罗存在的时间只不过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六，可是这个时期保留下的乡歌却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虽然说前一时期的乡歌部分失传，但这一时期的乡歌也并不完整。以上数字虽难以精确说明前后两个时期乡歌总数的比例，但也足以表明：新罗统一三国以后，国语诗歌大为盛行，作品数量进一步增多了。

统一新罗时期正值中国的盛唐、晚唐和五代时期。繁荣发展、绚丽多彩的唐诗和方兴未艾的词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于同中国交往较密的新罗，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新罗乡歌发展的基本因素则是它的固有文化和本乡本国的诗歌传统。

统一新罗之后，高丽王期时期的名僧一然在《三国遗事》卷五中说：“罗人尚乡歌者多矣”。

同一时期的诗人李承休在其《帝王韵记》的《新罗》条中描写当时诗歌盛行的情形：“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

可见当时的新罗乡歌——或名“词脑曲”已为人们喜爱和广泛流行了。幸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的十一首乡歌之中，作者有僧人、花郎、士人、妇女、歌舞艺人和官吏，足以证明这一体裁是盛行的。

第一节　以乡扎标记法记录的诗歌(新罗乡歌)

在前一时期的三首乡歌之中，有两首是四句体的（《薯童歌》、《来如歌》），一首是十句体的（《彗星歌》）。此一时期的十一首乡歌中，按体裁分类如下：

（一）十句体

愿往生歌	广德妻作	文武王代
慕竹旨郎歌	得乌谷作	孝昭王代
祭亡妹歌	月明师作	景德王代
安民歌	忠谈师作	景德王代
赞耆婆郎歌	忠谈师作	景德王代
千手观音歌	希明(女)作	景德王代
遇贼歌	永才作	元圣王代

（二）四句体

献花歌	牵牛老人作	圣德王代
兜率歌(散花歌)	月明师作	景德王代

（三）八句体

怨树歌	信忠作	孝成王代
处容歌	处容作	宪康王代

与前一时期的三首乡歌相比，这一时期的体裁多了一种八句体。实际上，八句体的原本是十句体。因感叹词“啊”后面的两个落句在传唱或记录中消失，从而形成了八句体这种格式。所以说，乡歌的体裁实际上是两种：即长体（十句体）和短体（四句体）。十句体的乡歌，一般是按“4·4·2”分段，在最后的两句以前，加一个感叹词“啊”。形式较为固定，被人称之为“十句体定型诗”。

由于《三国遗事》的编者一然是僧人，他在编此书时，不可

避免地流露出宣传佛教思想的意图。从而在乡歌的取舍上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现存的乡歌作者不少是僧人和佛门信徒，其内容多数与佛教有关。此外，还有表现花郎的思想、士人的感情与君臣关系的。这也是由于对宣扬传播统治阶级的道德与伦理观念有利，才被一然选中得以保存下来。

十一首乡歌，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反映当时社会的动荡或统治者内部矛盾的。此类乡歌与政治关系较密切。如《安民歌》、《遇贼歌》、《怨树歌》、《兜率歌（散花歌）》。

第二类：以颂神拜佛为主要内容的乡歌，如《千手观音歌》、《愿往生歌》。

第三类：抒情诗，用以表示爱慕、思念、怀想及至悼念的乡歌，如《慕竹旨郎歌》、《赞耆婆郎歌》、《祭亡妹歌》。

第四类：其他，如《献花歌》、《处容歌》。

《怨树歌》：新罗孝成王(在位时间737—742)在登基前，曾经和贤士信忠在柏树下而下围棋。下棋时，他指着柏树向信忠立下誓言："他年若忘卿，有如柏树。"数月之后，孝成王即位，在对臣下论功行赏时却把信忠忘得一干二净。信忠满腹牢骚，怨而作此歌，写下来贴在柏树上。树因此枯萎。孝成王颇怪异，命人察看，发现此歌，后悔不迭，立即召信忠来，赐以官爵，于是柏树转青。

《安民歌》：新罗景德王（在位时间742—765）一天在归正门楼上，命令左右找一高僧来。左右起初找来一位衣着整洁华贵的僧人，景德王不满意，命退去。后又找来一位身穿补丁衣服、背着樱木筒的僧人来。景德王一见甚喜，邀请僧人上楼。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就是国王喜爱的《赞耆婆郎歌》的作者僧人忠谈。于是王要求忠谈为他作有助于治国安民的歌。忠谈就作了这首歌。歌成后，王要封他为"王师"，忠谈固辞而去。

《安民歌》大意如下：

君王有如严父，

臣下有如慈母，
百姓好比年幼儿，
如是，百姓方能爱护国家。
初生儿有如轮回轮盘的轴，
要让他们温衣饱食！
如是，他们将不再颠沛流离，并懂得爱国。
啊！
君不愧为君，臣守臣职分，百姓就能安守本分。
太平世界从此更昌盛！

到景德王为止，统一的新罗王朝不过才八十年左右，但社会矛盾就已相当激化了。景德王二十二年，一些名僧、宠臣如信忠、李纯等人或隐退山林，或辞官归里，朝廷累召不至。他们还以中国古代桀纣的亡国作为"国家败灭"、"覆车在前"之鉴，力谏景德王"改过自新"，可见当时王朝政局不稳。景德王亲上门楼寻求名僧作歌安民，正是为了解决封建政府所遇到的种种难题。

全诗所贯穿的是力求恢复和巩固封建秩序的思想，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紊乱，民不聊生的情况。诗的结尾部分要求君不愧为君，臣应守职分，虽是向统治者进的忠言，读来却颇使人感到带讽刺意味。

《兜率歌》，一名《散花歌》，四句体。景德王为禳解"二日并现"的凶兆而作"散花功德"，这首歌就是名僧月明为这一佛教仪式而作的。歌词甚简单，目的是祈求保佑国家消除动乱，和《安民歌》的性质类似。

《遇贼歌》：新罗元圣王（在位时期785—798）时僧人永才将隐居于南岳，途中遇到了所谓"盗贼"。永才作此歌感化他们，使他们终于放下屠刀为僧。其实，所谓"盗贼"正是迫于饥寒、走投无路、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贫苦人。永才以消极遁世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反抗意志。从这首歌中可以看出佛教正是麻

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千手观音歌》是景德王时一位民间妇女希明所作。歌的内容是祈求千手千眼观世音赐眼睛给她的盲儿。据《三国遗事》所载，观音菩萨在这位虔诚妇女的祈求下，果然使她的儿子重见光明。

《愿往生歌》是佛教徒广德之妻所作。广德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为了修行成佛，十多年未与妻同床。他的朋友严庄同为佛教徒，却在广德死后向德妻求欢。德妻的责备感化了他，他立志苦修，也得了正果。这首歌就是广德妻用以表示自己的虔诚敬佛之意的。

十一首乡歌之中，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较高的是那些具有浓厚抒情气息的诗歌，如《慕竹旨郎歌》：

送春归去，
我悲泪盈眶——他已不在人间。
曾蒙受过他的慈爱关怀，
我当百事谨慎，避免灾害。
转瞬之间，
我就将与他重相见：
花郎啊，一心把你思念，
我在向前复向前。
啊！
在艾蒿丛生的深巷之中，
哪一夜我能睡熟入梦间？

竹旨是新罗三十二代孝昭王(692—702年在位)时的花郎，协助主将金庾信完成统一三国的事业，功劳卓著。这首乡歌的作者得乌谷（又名得乌失）是他的门徒，曾受过竹旨的深切关怀，得以摆脱不法官吏强加于他的苦役，恢复花郎的身份。竹旨死后，得乌谷作此歌缅怀老师。

歌中对逝者深表哀痛，歌颂了竹旨高尚的品德，同时表示将

永不违背恩师的教诲，兢兢业业完成重任。

歌中还反映出新罗统治阶级中最有生气的力量——花郎及其郎徒之间为实现统一事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爱国思想。它以暮春为自然背景，以艾蒿、深巷烘托悲哀的气氛，以忧思难眠和只求相会于来世的愿望来表达自己怀念恩师的深情。在古代国语抒情诗中，这算是艺术手法较高的一首。

《赞耆婆郎歌》是僧人忠谈所作。景德王曾经向他说过："朕尝闻师《赞耆婆郎词脑歌》其意甚高"，就是指这首歌。

耆婆郎的生平事迹不详。歌的内容表明耆婆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品德高尚的花郎。作者不愿作随风逐云的明月，象征耆婆郎的不随波逐流的坚定精神，又以不畏冰霜严寒的海松来比拟耆婆郎的大无畏的气魄，表现出作者对这位花郎的崇敬。

仰望天空：
明月在散发出清光，
白云悠悠，月儿却不愿随风逐云，来往飘荡。
耆婆郎的身影，
映照在那碧波荡漾的渡口旁。
逸乌川绝壁上，
那花郎的心意呵，
我将永远奉之为榜样。
啊！
看那巍然挺立的海松！
那不畏冰霜严寒的花瓣！

《祭亡妹歌》是一首挽歌，为僧人月明为哀悼亡妹而作。虽有宗教色彩，但感情真挚动人。歌中以萧瑟的秋天为背景，把妹妹的逝去和自己的身世比为随处飘落的树叶，最后表示希望自己死后和妹妹重逢于地下的心愿。

生死有别，
虽愿留在世上而不得。

也不说一声‘我去了’，
你就默默地告别了人间。
象是秋风中离枝而去的树叶，
悠悠荡荡，渐飘渐远。
一旦脱离开枝干，
也就不知会流落在何方！
啊！
但愿我们重逢在弥陀刹中，
我决意潜心修道——为了迎接那一天！

《祭亡妹歌》中的关于来生来世的思想，是僧人的诗歌中不可避免的。他的哀惋凄伤、悲观厌世情绪虽是由于妹妹的死亡，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

《献花歌》为圣德王时山间一牵牛老人所作。当时的江陵太守纯贞公携其夫人赴任，途中，其夫人水路见海边悬岩上有盛开的踯躅花，想摘下来，因悬岩危险，左右人无法为她攀折。刚巧有一牵牛老人经过，就将花折下，边唱此歌边将花献上。歌为四句体。

《处容歌》和新罗时期《三国遗事》中的《处容郎》中主人公所作的歌内容相同。

第二节　《井邑词》及其他

古代朝鲜国语诗歌之中，除乡歌这种十句体定型诗或四句体短歌形式以外，还有一种分段落、每段有副歌的民间诗歌。这种诗歌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首，即李朝的《乐学规范》中所载的《井邑词》。

据《高丽史》中的《乐志》记载，这首歌为百济旧地全州所属的井邑地方某行商的妻子所作。丈夫出门经商，久久未归，妻子登高远眺，思念丈夫，忧心忡忡，唱出了这首歌：

月儿呀，高高地升起吧！
啊呀呀，照亮远方！
啊呀呀，欧于嘟里，
啊——达弄的里！

郎君远行去赶集啦，
啊呀呀，可别掉进那泥坑！
啊呀呀，欧于嘟里！
啊——达弄的里！

你把包袱放下吧，我就去接你！
啊呀呀，眼看太阳落山啦！
啊呀呀，欧于嘟里，
啊——达弄的里！

这首歌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韵自然流畅，充分表现出一个妇女对于远行未归亲人的挂念。诗的音韵也很优美。各分节中反复出现的副歌，加强了全诗忧虑不安的情绪。一唱三叹的诗句间隔，体现出妇女思念丈夫的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不尽情怀。全诗以含元音a的音节为韵，又夹以含元音i的后缀句，使全诗具有一种优美的音乐感和动人的节奏感。

《井邑词》并不是用乡扎标记法记录下来，而是靠口头相传保留下来的。传至十五世纪，在《乐学规范》中用朝鲜文字记载了下来。古代朝鲜的国语歌谣除了靠乡扎标记法和口传外，还有靠译成汉文诗流传下来的，属于三国时期的有前面提到的《箜篌引》等，属于此一时期的则有《海歌》。

《海歌》出现于《三国遗事》的《水路夫人》之中：圣德王代，江陵太守夫人水路，因姿色动人，被海龙劫入海中。太守命百姓齐唱此歌，迫使海龙交还水路夫人。此歌和前一时期的《迎神歌》相似，只是增加了有关水路夫人的内容。

第四章　新罗的汉文诗和诗人崔致远

古代朝鲜人以汉文写诗，很早就开始了。但是汉文诗的大量创作则始于统一新罗时期。

新罗在实现了统一半岛的目的以后，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采用“读书三品科”的制度选拔人才，其标准是对汉文典籍的通晓程度和汉文的写作能力，以其学问的高低和汉文熟练的程度来决定官职。与此同时，新罗还派遣了一批士人去唐朝留学，培养了一些汉文学者。唐朝此时正处于五、七言诗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影响，汉文诗人辈出，汉文诗读者也大量增加。写作汉文五、七言诗，成了当时文人抒情、叙事、写景、咏物的主要手段。九世纪，即新罗末期的卓越诗人崔致远，就是汉文诗人中的佼佼者。

当时汉文诗虽然不少，可惜由于无专人收集，散佚不少。其中有的汉文诗甚至只是因为保存在中国《全唐诗》之中，才得以流传。这一时期保留下的早期的汉文诗是八世纪上半叶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本中的《月夜》：

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
缄书参去便，风急不听回。
我国天涯北，他邦地角西；
日南无有雁，谁为向北飞？

这是慧超在艰难漫长的旅途中写下的一首怀乡诗。旅途中萧瑟的夜景和他天涯孤旅的惆怅情怀跃然纸上。他在吐火罗国遇到了唐朝使节，两人都远离故土，身在异国，又分别来自两个文化相近、关系密切的东方国家，相同的文化修养与感情使他们倍感亲近。在彼此倾吐了感受之后，慧超写出了自己的感触：“君恨西番远，余嗟东路长……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悲凉的诗

句中，透露出慧超思念祖国的深挚感情。

在《三国史记》和《全唐诗》中还保留了王巨仁的《愤怨诗》。

据《三国史记》记载：王巨仁是新罗真圣女王时人。真圣女王性好淫，先与魏弘私通，魏死后，又偷偷选拔面首若干入宫，并委以高官。从而造成了贿赂风行、赏罚不公、纲纪紊乱等现象。有人写文章针砭时弊，贴在大路上。女王大怒，命人搜查，但没有结果。有人向女王诬告：此文章必为宦途不得志的文人大耶州隐者王巨仁所写。于是女王下令逮捕他。王巨仁愤怨，作此诗贴于狱中墙壁上：

于公痛哭三年旱，邹衍含悲五月霜；

今我幽愁还似古，皇天无语但苍苍。

据说贴诗当天夜间，忽然乌云密布，雷声震耳，冰雹纷纷降落如骤雨。女王畏惧，释放了王巨仁。《全唐诗》关于此诗的解题中虽有王巨仁下狱一事的简略记载，但没有乌云震雷和王巨仁获释等说法。

女诗人薛瑶的诗《返俗谣》是一首反抗佛教束缚的佳作：

化云心兮思淑贞，洞寂寞兮不见人。

瑶草芳兮思芸蒀，将奈何兮青春！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七七九卷，作者是新罗左武卫将军承冲之女，十五岁出家为尼姑，二十一岁还俗，嫁与郭元振。这首诗就是她在决心还俗时作的。全诗以短短的二十七个字叙述了她出家的原因，以及对六年死气沉沉的生活的切身感受，抒发了她热爱生活和憧憬人间幸福的心情。

金地藏写于中国安徽九华山的《送童子下山》是一首技巧娴熟的七言律诗：

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

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

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

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

作者系新罗王子，于景德王十五年（756年）航海来中国，住在中国四大佛山之一的九华山，此诗在九华山所作，载于《全唐诗》。

此外，还有崔承祐、朴仁范、崔匡裕等到过中国的文人留下七言律诗若干首。如崔承祐的《送曹松入罗浮》，朴仁范的《九成宫怀古》、《泾州龙朔寺》、《江行呈张秀才》，崔匡裕的《长安春日有感》、《郊居呈知己》、《忆江南李处士》等。

麻衣难拂路岐尘，鬓改颜衰晓镜新。

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园芳树梦中春。

扁舟烟月思浮海，羸马关河倦问津。

只为未酬萤雪志，绿杨莺语太伤神。

崔匡裕的这首《长安春日有感》表现了他身居中国而心怀祖国新罗的感情。

统一新罗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崔致远。

崔致远（857—？）生于新罗京城沙梁部（一说是湖南沃沟），号孤云，又号海云，十二岁时到唐朝留学，十七岁在唐朝中进士，后任中国宣州溧水县尉。后应节度使高骈之聘，又去淮南。

黄巢起义，高骈被任命为诸道兴马都统，崔致远担任他的巡官，曾为高骈写过一万余件表状、书启等，后被提升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并得到"紫金鱼袋"的赏赐，在唐朝颇受重视。

崔致远在唐朝颇有文名，《唐书·艺文志》有关于他的记载，在新罗人中他居首位。他与唐朝诗人顾云友善，在他离唐返新罗时，顾为他写了这样一首送别诗：

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

山之上兮，珠宫贝阙黄金殿。

山之下兮，千里万里之洪涛。

傍边一点鸡林碧，鳌山孕秀生奇特。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校印〈桂苑笔耕〉集序》的作者徐有榘对崔致远也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崔在当时中国文人之中确实是享有盛名的。

崔致远在唐朝期间，经常怀念故土，关心祖国的命运。新罗宪康王十一年，他以唐朝使节的身份回到新罗，时年二十八岁。在临离开祖国以前，崔的父亲曾严诫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

此时身负唐使的重任，衣锦荣归，充分实现了他严父的要求。回顾留学唐朝期间的悠悠岁月，他未免感到得意与自豪，他以这样的两句诗概括了在唐十六年的成就：

巫峡重峰之岁，丝入中华，

银汉列宿之年，锦还东国。

崔致远回到新罗之后，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二十九岁时（886年），他向新罗国王献出自己的诗文集共二十八卷。三十七岁时，他向真圣女王献《时务策》十条，力图帮助王朝改革时政。由于他所献的《时务策》，国王封他阿飡的官职，却没有实行他所提出的建议。

九世纪的新罗社会大土地兼并盛行，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到处发生农民起义。尤其是到了九世纪末，佞臣当政，朝政腐败，新罗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崔致远无法实现自己振兴新罗的理想，于是抛弃了富城郡太守之职，隐居于伽倻山。当时他四十一岁。

传说他在晚年曾同情并支持王建的势力，相信王建能够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甚至为他写过檄文。他在致王建的信中曾有"鸡林黄叶，鹄岭青松"之句（"鸡林"指新罗，"鹄岭"指高丽），表示出他对新兴势力的赞扬。

崔致远不满新罗王朝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兼并土地，鱼肉

人民的官僚贵族，曾写诗抨击他们。诗人热爱祖国的山川和人民，写过一些写景诗，还写过一些描绘民间舞蹈的诗（《乡乐杂咏》）。

据崔致远在唐中和年间所写的《桂苑笔耕》序中所述，他的诗文为：今体赋五首共一卷、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中山覆簣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一部二十卷。据传，他归国后还著过《帝王年代历》，但现今所存者只有《桂苑笔耕》及《东文选》中所保存的三十篇诗和《三国史记》中的诗《乡乐杂咏》。一说《新罗殊异传》为崔所作，不确。

崔致远的诗中较为有价值的作品大约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他在唐朝所写的怀念故土的抒情诗，如《秋夜雨中》：

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
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诗人身居异国，周围没有自己的同胞，当然也没有人能深刻体会到他思念远方祖国的心情。于是在秋风萧瑟、秋雨绵绵的凄凉气氛中写出了此诗寄怀。

再看另一首诗《东风》：

知尔新从海外来，晓窗吟坐思难裁；
堪怜时复撼书幌，似报故园花欲开。

这是诗人在春风骀荡时的心情，和秋风秋雨之夜写下的诗篇大不一样：暖风拂面除了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以外，还使他产生一种希望、憧憬。东风来自渤海之东的祖国，吹到了这里，仿佛向诗人报告故乡的喜讯。

在《山阳与乡友话别》中，诗人表示了他在异国见到本国同胞时的欢乐和与分别时的惆怅：

相逢暂乐楚山春，又欲分离泪满巾；
莫怪临风偏怅望，异乡难遇故乡人。

在七律《陈情上太尉》中，崔致远不仅写出了他远离祖国时的孤

寂，还表明了来异国的目的：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
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
客路虽愁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
济川幸遇恩波广，愿濯凡缨十载尘。

所谓"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表面上是他只想为实现父亲的嘱咐而求取官职、功名，以显宗耀祖，但实际上还包含着他立志为新罗的发展而努力的意思。

在《再经盱眙县》一诗中，他有"路迷霄汉愁中老，家隔烟波梦里归"的诗句。崔致远客居中国的时候，新罗社会正在动荡，诗人的怀乡诗中无疑包含着对祖国政治状况、前途与命运的关心。

第二类诗是崔致远不满现实之作。他带着满腹经纶回国以后，却发现处于没落阶段的新罗王朝政治腐败，弊端丛生，他堕入了失望的深渊。他的《古意》就讽刺了新罗官僚的自私、虚伪和狡猾：

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
谁知异物类，幻惑同人形。
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
欲辨真与伪，愿磨心镜看。

由于对以美女、书生面目出现的种种"狐狸"深恶痛绝，他当然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因而备受排挤、打击，极感孤独、失意。《寓兴》、《蜀葵花》、《夜赠乐官》都是抒发这种感情的作品。

崔致远对政局和社会的关心，虽出于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观愿望，但他没有无视人民的生活。他厌恶懒惰、奢侈的寄生虫，同情勤劳朴实的劳动者。从《江南女》一诗中可以看出他这种思想：

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
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
所学非雅音，多被春心牵。

自谓芳华色，长占艳阳年。

却笑邻家女，终朝弄机杼。

机杼纵劳身，罗衣不到汝。

这种写人民生活的诗歌留下的不多，但仅此一诗也可以窥见诗人思想的一个侧面。

第三类是描绘自然风景的作品。有不少收集在《桂苑笔耕》之中。唐中和四年（884年），崔奉使东泛，泊舟于大珠山下，将他所见景物一一加以描绘——"啸月吟风，贮成十首"，这就是：《石峰》、《潮浪》、《沙汀》、《野烧》、《杜鹃》、《海鸥》、《山顶危石》、《石上矮松》、《红叶树》、《石上流泉》。回国以后，崔致远在金海附近的黄山江岸边绝壁上垒石成台，命名为临镜台，并写诗一首。

烟峦簇簇水溶溶，镜里人家对碧峰。

何处孤帆饱风去，瞥然飞鸟去无踪。

前面两句是写静态，后两句是写动态。孤帆的动态是缓慢的、宁静的，飞鸟的动态是迅速的——眨眼即逝，但它不但没有破坏整个静态，反而更衬出它的静谧。全诗并无奇特或绮丽的辞藻，淡淡的画面，恰似一幅水墨山水画。另外还有《芋江驿弯》、《题伽倻山》、七绝《入山诗》和五言律诗《赠智光上人》等不少写景佳作。

第四类是描写新罗民间舞蹈的诗，即《乡乐杂咏》。新罗民间自古以来就流行一种戴假面具的舞蹈，常在正月十五和端午节演出。崔致远热爱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他以诗的形式描绘了这些舞蹈中的五个角色的形象，即"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如其中的《月颠》：

肩高项缩发崔嵬，攘臂群儒斗酒杯。

听得歌声人尽笑，夜头旗帜晓头催。

这首诗既生动地写出了"月颠"这个角色的姿态和舞蹈场面上的气氛，也讽嘲了那些故弄姿态、虚张声势和胁肩谀笑的阿谀逢迎

的儒生。崔致远描写新罗民间舞蹈的诗为后人研究朝鲜的古代民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崔致远有些诗表现他和中国文人的交往，如《陈情上太尉》、《归燕吟献太守》、《酬杨赡秀才送别》、《留别女道士》、《楚州张尚书水郭相迎因以诗谢酬吴峦秀才惜别二绝句》等。

此外，泊舟于大珠山下时所写的十首景物诗，也是用以"寄高员外"的。这些诗中，虽不免有应酬之作，但足以说明他和中国文人的友好关系，在中朝文化关系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

在这些诗中《酬杨赡秀才送别》一诗对于希望随诗人一同去新罗的杨赡，表示出可贵的深情厚谊：

海槎虽定隔年回，衣锦还乡愧不才。
暂别芜城当叶落，远寻蓬岛趁花开。
谷莺遥想高飞去，辽豕宁渐再献来。
好把壮心谋后会，广陵风月待衔杯。

崔致远的汉文诗对朝鲜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千年来，他一直被朝鲜的历代学者尊之为朝鲜汉文文学的鼻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也必须指出：早在崔致远以前，汉文就已传入朝鲜，而且产生了诸如强首、薛聪这样的汉文学者和定法师、慧超这样能写出技巧成熟的汉文诗歌的僧人。但是，自幼来到唐朝，长时期受唐代灿烂文化的熏陶并对祖国怀有无限热爱的崔致远，却创作出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更高的诗歌，数量上也超过了前人。从上面所列举的诗作来看，崔致远在文学史上所受到的高度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附带提一下关于长诗《双女坟》的问题。此诗载于《新罗殊异传》中，是以崔致远为主人公的传奇故事《仙女红袋》里的一首诗。有的文学史著作认为它就是崔致远所作，并加以分析、论述。笔者则认为：不能把它看为是崔的作品。

《新罗殊异传》中的《仙女红袋》是一篇人鬼相恋的故事，

是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既然这种情节本身不存在，那么崔致远也不可能作诗以“记叙”他与鬼相交往、恋爱的“经历”。应当说，《双女坟》一诗只不过是《仙女红袋》的作者为其传奇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作的诗。因此，本书在此处不论述此诗。

第三编　高丽时期的文学

（公元十一十四世纪）

概　　说

九三五年高丽王国统一了朝鲜半岛，成立了新的封建王国。新王朝在九三六年实行了田柴科，用以调整新罗末期混乱的土地所有制，以缓和阶级矛盾。田柴科就是将国内全部土地登录于田籍，由国家掌握全国土地，而把其中一部分土地的收税权按社会地位交给文武官僚及原有地主，这样，中小地主的土地就可以免遭大地主兼并。对于农民，则减收租税，从而稳定新的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使新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高丽国外，契丹于九二六年灭渤海国以后，从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即九九三年至一〇一八年，对高丽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十一世纪后半期，高丽统治者采取了各种劝农政策，如积极奖励开垦土地，贷给农民粮食、种子、农具，以及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等等，从而使农业生产能有所发展。但到了十二世纪，国家公田逐渐减少，地主、贵族的私田逐渐扩大，加重了对农民的中间剥削。加上国家和商人更多地以高利贷的方式剥削农民，这就使得农民日趋贫困，阶级矛盾开始尖锐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妙清之乱和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等政治事件，高丽王朝政局不稳，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一一六七至一一七八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亡伊率领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攻陷城镇，袭击官府和寺院，夺取粮食，处决官僚贵族和僧侣。但因缺乏政治经验，武

器和粮食又不足，他们的英勇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一一九三年至一一九四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在官府的软硬兼施的政策下，再次被镇压下去了。在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农民的大规模起义延续了三十年之久。在此之后，武人崔忠献一手把持了王朝的政权。崔氏政权虽对农实行了若干带欺骗性质的让步以遏止农民的斗争，但不久又加重了剥削与压迫，终于又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一一九八年开京发生了以万积等人为首的公奴和私奴的武装起义。一二〇〇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公奴起义，这些斗争得到了农民的响应。但是在崔氏政权的狡猾欺骗和高压下起义都失败了。

一二一六年、一二一八年，契丹侵犯高丽，被高丽人民的英勇斗争击败。从一二三一年起，蒙古攻高丽，高丽人民奋起反抗，农民起义军也主动倡议和政府军联合抗击侵略者，人民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王室和官僚贵族却采取了妥协的政策。他们先是迁都于江华岛以图苟安，不和不战达二三十年之久，到一二五八年则完全投降蒙古。但是高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则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此期间，高丽社会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停滞不前，动荡不安。整个高丽被蒙古（元朝）划为“征东行省”。

在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丽又受到了红巾军的骚扰，在七十年代受到了倭寇的侵扰。这些骚扰和侵犯在高丽人民和官军的联合打击下被击退。

将近百年的蒙古统治和屡经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上大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人民所受的剥削日益加深，王权统治因而削弱。风雨飘摇之中的王朝，终于被新兴势力李成佳一派取而代之。

为推翻高丽王朝，李成佳曾实行“科田法”以缓和当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的现象，受到了中小地主的欢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对外方面，李成桂推行睦邻方针，对明朝

友好。通过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秩序，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最后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李氏王朝（简称“李朝”），改国号为“朝鲜”。

高丽时期统治阶级将佛教定为国教，僧侣享受和文官同样的待遇，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儒佛并重的做法，但又较多地依靠儒家思想维护和加强其封建统治。较之新罗时期，对儒家思想更加重视。中国宋朝朱熹的学说传入高丽，并成为当时一些封建学者主张改变混乱状况、整顿封建政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和宣传工具。为了进一步提倡吸收、学习汉文化，高丽政府对中国文人学者的归化采取了欢迎态度。中国的后周人双冀、宋的周伫、胡宗旦等都进入高丽，并曾身居高丽政府要职，是汉文的权威。高丽光宗九年（958年），高丽统治者采纳了双冀的建议，开始实行科举制。科举沿用唐制，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景宗二年（977年），国王还亲试进士，表现了国家最高层统治者对提倡和奖励学习汉文化的高度重视。

高丽时期手工业技术有相当高的成就。高丽的青瓷、镶嵌瓷器制作精美，技术精湛。金属活字印刷的出现，对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有很大意义。

高丽时期的文学成就超过了以往时期。在散文方面，金富轼所编写的《三国史记》和一然所编写辑录的《三国遗事》是有关古朝鲜、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不少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高丽后半期的所谓“稗说文学”则在文学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在朝鲜国语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民歌、民谣，把前一时期的民间诗歌创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促使封建文人、士大夫开始探索用朝鲜国语进行诗歌创作的新道路。其结果就是“景几如何体”诗歌的产生和时调的出现。这两种新的国语诗歌体裁对此后文人国语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汉文诗方面，郑知常、李奎报都有很高成就。特别是李奎报的诗，在对封建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上，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

高度。比前一时期，汉文诗歌中爱国感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显然加强了。此外，李齐贤的长短句——词，在朝鲜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的地位。

第一章　高丽前期的汉文诗

高丽建国以后，为了强化其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培养一大批管理国家政务的人才，于是就积极地吸收汉文化，采用中国选拔人才的方法。十世纪中叶，光宗在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下，首次实行科举制，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士。十世纪下半叶，成宗进一步倡导汉文化的教育，由各州郡选拔优秀子弟进京修业，由官家负担学费，又在西京设修书院，命儒生抄录史书储存。又设国子监，并从中选拔人才送往宋朝国都汴京留学。成宗还规定了所有在中央和地方的文臣每月作诗三篇、赋一篇上交，还曾亲自以诗、赋复试应举者。在王朝这样大力提倡下，学习汉文之风大盛。十一世纪初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首创私学，一些学者起而仿效，私学大兴。形成了十世纪下半叶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光宗、显宗以后"文士辈出，词赋四六秾纤，非后人所及"（徐居正《东人诗话》语）的气象。

汉文既已成为高丽文人应举求官的必修主课，汉文诗的写作也在文人中形成了普遍风气。比之于前朝新罗，汉文诗的数量大有增加。

高丽前半期封建社会内的阶级矛盾比新罗末期有所缓和，新建立的王朝处于较为安定和发展的时期。反映在文人诗中的就是对"太平盛世"的歌颂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的抒发。诗人常以吟风弄月表示高雅，以至于此时期的汉文诗竟以"风月"为其别称。结果形成内容空洞、片面追求技巧的风气。

此时期中较为著名的诗人有朴寅亮、郭舆、金黄元、金富轼、高兆基、郑袭明等人，而最有才华及作品最富于个性与独特风格的诗人，则是郑知常。

郑知常生活于高丽第十六代睿宗和第十七代仁宗时期，生年不详，卒于一一三五年。他出生于西都——平壤，初任舍人，最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诗人生性豪放豁达，情感丰富，一向讨厌虚伪造作、繁文缛礼的儒教思想，喜爱自然旷达、超尘脱俗的老庄思想。为此他常为封建道学家及都城开京一些官僚贵族所不容，与当权者格格不入。最终因参与妙清之乱而遭杀害。其诗虽闻名于当时诗坛，却由于上述原因，竟无人为他作传。郑知常死后十七年才出生的诗评论家李仁老在其《破闲集》中提到他时，还不敢提他的名字，只说"睿宗时，有俊才姓郑者，忘其名"。他的名字出现在崔滋的《补闲集》中的时候，诗人已逝世一百二十年左右了。

同高丽前半期的其他诗人相比，郑知常的诗感情真挚，洒脱不羁，清丽自然。如他的名作七绝《大同江》：

雨歇长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动悲歌。

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绿波。

大同江为高丽时西都——平壤的水路要道，江山形胜，风景甚佳。自古以来，由平壤远至中国和近往朝鲜的西南西北各地者常以此为重要通道。南浦为大同江的一码头，历来为送别的地方。

以郑诗和民歌对照比较，可以看出诗人对这里的离别场面描绘得多么真切。《补闲集》的作者崔滋指出，此诗后两句"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作（一作"绿"）波"，"当时以为警策"，并且拿中国诗人杜甫的"别泪遥添锦江水"和李白的"愿结九江波，添成万行泪"来和这两句对比，认为"皆出一模"。

另一首题为《送人》的诗实际是怀人，以五言律诗形式写出，风格和前者完全不同：

庭前一叶落，床下百虫悲。

忽忽不可止，悠悠何所之？

片心山尽处，孤梦月明时。

南浦春波绿，君休负后期。

此诗的感情较之前诗深沉凄凉，表现手法是借景抒情。末两句提到南浦和归期，点出了诗人对远方友人的怀念和盼望。

郑知常的景物诗也是佳作。他的七绝《西都》描写了高丽时期平壤戏剧艺术繁荣的景象，是一首以自然景色为背景的社会风俗画。

紫陌春风细雨过，轻尘不动柳丝斜。

绿窗朱户笙歌咽，尽是梨园弟子家。

从诗中可以看出高丽初期平壤戏剧艺术繁荣的景象。

郑知常擅长写自然风景。在《醉梦江南》、《题登高寺》、《开圣寺》、《长源亭》、《边山苏来寺》、《月咏台》、《春日》等诗中，他以优美的诗句描绘出了祖国——高丽的自然山川。

石径崎岖苔锦斑，锦苔行尽入禅关。

地应碧落不多远，僧与白云相对闲。

日暖燕飞来别殿，月明猿啸响空山。

丈夫本有四方志，吾岂匏瓜系此间？

（《题登高寺》）

诗中描绘的幽静的自然环境和诗人表现出的志在四方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诗人虽崇尚道家思想，但也不甘于远离社会，过一辈子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在政治上他未尝没有抱负。李仁老说他"赴上都擢高第，出入省阁，謇謇有古诤臣风"他后来参与妙清反对当权者的斗争，和他的这种政治抱负不无关系。

然而郑知常毕竟备受儒门道学家排挤，难以见容于士大夫阶层。消极遁世、隐逸无为的思想增加了他与大自然的接触，使他能更仔细地观察和表现山川草木。因此他较为成功的写景诗，往往离不开幽静的寺院，上面所引《题登高寺》就是代表作。所不同的是，其他一些写景诗，连这点"四方志"也很少见到了，如《开圣寺》：

百步九折登巑岏，家在半空惟数间。

灵泉澄清寒水落，古壁暗淡苍苔斑。

石头松老一片月，天末云低千点山。

红尘万事不可到，幽人独得长年闲。

这些象风景画一般的诗，历来得到诗家的称赞。如崔滋在谈到上述《开圣寺》中的“石头松老”两句时就说：“予尝爱其辞意清绝，时时吟玩。及为全罗道按廉，当二月生明，登边山，不思议房后峰傍有老松参天，新月隐映，下望平原，际天众山，如炙灶尖抹云烟。忽忆郑公诗，沉吟咀嚼，以为不到此境，安知郑公得意之处也”。

郑知常诗中常出现写景妙句，为后人所喜爱、传诵，如写春天黄昏：“江含落日黄金水，柳放飞花白雪风”（《春白》）；写茫茫雪景：“轻风不动阴云卷，白玉花开万树春”（《新雪》）；写湖光山色：“松老坛边苍藓合，天低云末片帆来”（《月咏台》）；写皎洁明月：“一溪明月凭栏夜，万里清风卷箔天”（《岭南寺楼》）等等，都是诗中有画的名句。

郑知常的一些抒情诗激情奔放，真挚自然。另一些则写得意境深远，如《团月驿》：“饮阑欹枕画屏低，梦觉前村第一鸡。却忆夜深云雨散，碧空孤月小楼西”。

尽管郑知常因“背叛”朝廷而受诛，他的诗却长期为人所喜爱、传诵，说明他的诗歌成就不凡，有独到之处。他的诗歌形象鲜明，写离别则令人惆怅难排，写怀友则引人低回不已。写景物则色彩丰富，诗中见画，写闲情逸致则如行云流水。诗的语言隽永秀逸，清新流畅。历代诗人都推崇他的诗文，从“飘逸出尘”（李仁老）、“语韵清华，句格豪迈”（崔滋）、“晔而不扬”（成见）、“飘飘有烟霞之想”（李齐贤）、“艳逸”（申纬）以及“绮丽”、“清艳”等有关他诗文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诗人郑知常诗歌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成就。

第二章　高丽中期的汉文诗与“海左七贤”

高丽中期，汉文诗有更大的发展。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的朝政和高丽前期很不一样。高丽王朝前期的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逐渐结束。十二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外戚李资谦之乱，使一些王朝重臣遭到了杀害，国王也受了很大震动，接着又发生了僧人妙清发动的叛乱，这次叛乱起因于西京（平壤）大臣与王都开京（开城）文武官僚之间的斗争。到了十二世纪中下叶，又产生了毅宗时期的武臣之乱，武臣郑仲夫、李义方等人趁国王毅宗去开京近郊的寺庙普贤院游览的机会，动员军队包围寺院，把随国王去的所有文臣和内侍全部杀掉，继而又转回开京，又杀了一批文官，并且废黜毅宗，立其弟明宗。从此，开始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武臣统治时期。

在此时期，武臣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和兼并土地，进行经济掠夺，彼此之间又产生了倾轧、斗争。结果农民不堪其苦，由一一七七年起，相继发生了多起农民起义。武人的跋扈、肆虐、对文臣的残害和朝政的紊乱状态，使得一些文人视作官为畏途，既不满朝政，又无可奈何，只得隐遁山林之中。这样既可免遭伤害，又显得清高，寄情山水，把诗文作为发牢骚排遣愁闷和自我安慰的工具。

于是一些文人模仿中国的竹林七贤，成立类似的文学组织。神宗时期，崔谠与其弟崔诜加当时文臣共七人成立了耆老会。庾资谅与此同时也成立了耆老会。稍后，又有后老会的组织成立。一时间，竹林文学思潮，蔚然成风。

其中最著名并在汉文诗创作中成就较高者，是李仁老所组织

的竹林高会，其成员为林椿、吴世才、皇甫抗、咸淳、李湛之、赵通，连同李仁老总共七人，时人仿照中国“竹林七贤”的称呼，称他们为“海左七贤”。

武人的专横、文人政治上的失意刺激了诗歌的发展。除了他们创作的一些山水风景诗歌之外，由于他们对当权者采取了不合作、对立的态度，他们比上一代的文人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对民间疾苦、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而且也多少能挣脱名缰利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除海左七贤外还有金克己、金良镜、陈澕、金之岱等人。

李仁老（1152—1230）字眉叟，明宗十年中举。曾作为高丽赴宋使节团的书记官来过中国。官至右谏议大夫。他力主文学创作中人人平等，不应有贫富贵贱之别，在海左七贤中，他以林椿为诗友，以赵通为山林友，以李湛之为酒友。著作有《银台集》、《双明斋集》、《破闲集》，传至今者唯《破闲集》。

李仁老的不少诗篇反映出他对武人专横、政治形势动荡不满，在七言诗《赠接花者》中，他对“玉尺金刀管春色”、“移红转紫在须臾”的嫁接花木者表示羡慕，认为他们能改变自然现象。而中国名医如扁鹊虽称妙手名医，却不能把人的心肝换一换。诗人借此比喻恶人本性难移，黑暗现实难改。

他的三首《行路难》中对紊乱的朝政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感情：“登山莫编怒虎须，蹈海莫采眠龙珠”，“东陵昼膳脯人肝……直道由来作人难”。他的心理是矛盾的，既想模仿中国东汉时严子陵辞官后隐居于富春山“七里滩头一竿竹”的悠闲，又为自己没有能力除去人间害虫而遗憾：“罴虎难逢周后猎”、“匣中双剑蛟龙泣”。

《行路难》三首，集中地表现出他心中的愤怒而又无能为力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别的诗中也有所流露，只不过比较隐晦曲折罢了。如七律《游智异山》，就以对陶渊明“桃花源”式的理想国的向往、追求，表示出他的这种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头流山回暮云低，万壑千岩似会稽。
策杖欲寻青鹤洞，隔林空听白猿啼。
楼台缥渺三山远，苔藓微茫四字题。
试问仙源何处是？落花流水使人迷。

原诗附于李仁老所作散文《青鹤洞记》之中。诗和散文的基本思想及内容是相同的，可以称为高丽时期的《桃花源记》。

李仁老到过中国，他描写中国自然风光的诗，也写得清新隽永，如七绝《潇湘夜雨》：

一带苍波两岸秋，风吹细雨洒归舟。
夜来泊近江边竹，叶叶寒声总是愁。

如《过渔阳》：

槿花低映碧山峰，卵酒初酣白玉容。
舞罢霓裳欢未足，一朝雷雨起猪龙。

海左七贤中的另一人物林椿，也是当时名噪诗坛的歌者。林椿字耆之，号西河。为十二世纪后半期人，生卒年不详，自幼即显露出诗才，但一生未中举作官。武臣郑仲夫作乱杀文人时，林椿全家遭难，只身幸免，终身穷困潦倒。他曾与当时著名诗人李奎报以诗文相交。诗作大多散佚，靠挚友李仁老的保存、收集，才编成了《西河先生集》，流传于世。李仁老在该诗文集的序中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先生之文得古今，诗得雅骚之风骨，自海而东，以布衣雄世者，一人而已"。《慵斋丛话》的作者成伣把他和李仁老加以比较："仁老能锻炼而不敷，林椿能缜密而不关"。以他的七绝《闻莺》为例：

田家葚熟麦将稠，绿树初闻黄鹂留。
似识洛阳花下客，殷勤百啭未能休。

粗粗一看，这只是一首田园诗：田家葚熟麦稠，黄莺在绿树丛中婉转啼鸣，但在这明丽的画面中，却隐含着作者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失意心情。

林椿一生布衣，接触平民较多，对于遭歧视、受虐待者，深

怀同情。他的七律《戏赠星州倅》虽类似游戏笔墨，却包含着对一个妓女的同情。七律《与李眉叟会湛之家》和《次友人韵》是林椿对自己落拓一生的概述或总结。

海左七贤中另一位诗人吴世才也是宦途上的失意者。吴世才字德全，曾于明宗时中举登第，但因性情“疏脱不检”不容于当时的官场，最后竟穷困而死。他的五律《病目》也是发泄宦途失意的牢骚诗。其五律《戟岩》则写得奇崛峻峭，气势逼人：

北岭石巉巉，邦人号戟岩。
迥舂乘鹤晋，高刺上天咸。
揉柄电为火，洗锋霜是坛。
何当作兵器，破楚亦亡凡。

与海左七贤属于同一时期的金克己曾为翰林，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诗坛上有“言多益富”的美称。他号老峰，高丽明宗时人（十三世纪初）。他志行高洁，厌恶趋炎附势、奔于达官贵族门下的俗物。他善于描写农家的田园生活。他以五言律诗形式写成的《田家四诗》四首《春》、《夏》、《秋》、《冬》，为高丽乡村画出了四幅图画，其中有乡村的四季自然景色，温暖的春天“草箔游鱼跃，杨堤候鸟翔”、“唤雨鸠飞屋，含泥燕入梁”；炎热的夏日“柳郊阴正密，桑坞叶初稀”、“薰风惊麦垅，冻雨暗苔矶”；秋季则是“雁霜枫叶坞，蛩音菊花湾”、“牧笛穿云去，樵歌带月还”。在描绘乡村自然景色的同时，诗人也看到了农民的困苦生活：“捐捐田家苦，秋来暂得闲”、“岁事长相续，终年未释劳”。在冬季，他看到农民的茅屋险些被雪压塌，破旧的窗户挡不住怒号的北风：“板檐愁雪压、荆户厌风号”。他正写下了贫苦人在冬天清晨去打柴，月夜还得修补茅屋顶的情形：“霜晓伐岩斧，月宵升屋绹”。诗中对农民生活与劳动艰苦尽管描写得还不够深刻，但身为翰林的封建文人能在描绘田园景色中提及农民的处境，就比同辈诗人略高一筹了。

金克己的《醉时歌》则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伤时的苦闷思想情

绪。这首诗气势雄浑："钓必连海上之六鳌，射必落日中之九乌"——诗的开头就不同凡响，诗的前半部分就反复说明他的雄心壮志："男儿要自立奇节，弱羽纤鳞安足诛？""炼石欲补东南缺，凿石将通西北迂"。但是这一切都没法实现："嗟哉计大未易报，半世飘零为腐儒"。诗人清苦穷愁而又无所作为："论诗说赋破屋下，却把短布抱妻孥"。他为这种处境悲愤，却又找不到出路："时时壮愤掩不得，拔剑砍地空长吁"。最后他虽然也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何时东风破巨浪，坐令四海如唐虞"，"凌烟阁上图形容，半是书生半武夫"，但并不能掩盖贯穿全诗的一种悲愤的情绪——空有凌云壮志却徒唤奈何。

在武臣统治下，金克己的这种情绪在文人中带有普遍性。《醉时歌》的优点就是把这种思想情绪集中地体现了出来，而且包含着对当权者横行霸道的藐视。

此外如诗人金良镜（？—1235）、金之岱（？—1266）、陈澕（十三世纪初）、朴垣（1227—1281）等，也都是当时诗坛的名家，也各有传世之作。金良镜的《石不可夺坚》，以岩石和铜、铁比较，歌颂了石头的坚硬，认为铜、铁都可以被熔化，被任意做成器具和钱币，可是岩石却宁可被冲击变成碎块，绝不失其原性："有石中含质，无人外夺坚，势堪从击破，性莫失生全"。诗人以此来勉励正直人，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曾经参与反对蒙古侵略斗争的金之岱所写五绝《代父出征》，以朴质的语言，表现了爱国热情：

国患臣之患，亲忧子所忧。

代亲如报国，忠孝可双修。

他的七律《瑜伽寺》、《义城客舍北楼》中有"茶罢松檐挂微月，夜阑风榻摇残钟"及"香风十里卷珠帘，明月一声飞玉笛"等写景的珠玑妙句，是一位儒雅的武将。

当时与李奎报齐名的陈澕颇有一些写景的佳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七绝《春晚》、《春兴》、《柳》，七律《月溪寺晚

跳》等。

他的《桃源歌》虽主要是歌颂桃源的美好，却不失为对当时官吏盘剥人民的一个有力批判。诗开头部分以“等是当时避秦处，桃源最号为神仙”两句来表明他是根据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来写这首歌的。他笔下的桃源是这样的美：

溪流尽处山作口，土膏水软多良田。

红霞映云白日晚，落花满地春风颠。

清流涓涓寒月漫，碧树寂寂幽禽喧。

又把为避乱世而遁入桃源中的人写得这样超脱、悠闲、自在：

乡心斗断种桃后，世事只说焚书前。

坐看草树知寒暑，笑领童孩忘后先。

但可惜的是，由于官吏对村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个原来的乐园，却在一天天走向破落：

所恨居民产业日零落，县吏索米长敲门。

诗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可恶的官吏来侵扰那就会是“山村处处皆桃源”。最后，诗人要求人们永远记住他在这首诗中所提出的看法——大有深意的这两句：“此诗有味君莫弃，写入郡谱传儿孙”。这首诗体现出了陈澕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这位歌颂小农的自然经济的诗人已跳出个人圈子以外去写农民，去探索劳动农民受苦的原因，并为他们提出了一个社会理想。这首诗的思想意义正在于此。

第三章　爱国爱民的诗人李奎报

高丽时期最著名、也是最能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国家命运的诗人是李奎报。

李奎报一一六九年一月十五日诞生于朝鲜京畿道骊州，原名仁氐，后改奎报，字春卿，自号“白云居士”。一二四一年去世时，高丽国王高宗为之震动，三日不视朝，并谥以“文顺公”。一些文献称他为“李文顺”。

李奎报生于士大夫家庭，父亲是高丽王朝的户部郎中李允绥。仕宦的家庭和京城的政治生活使他自幼就受到了高度的文化熏陶，九岁就能写诗文，有“奇童”之称，甚至名闻于牧童马夫之中。但是，他轻视科举，“不事科举之文，作赋荒芜不合格律”，在十八岁、二十岁时，经父亲的督促，虽勉强两次赴试，皆未中。直至二十二岁时，却考了个第一。

二十三岁时，赴礼部试，被提拔为第同进士。但李奎报“嫌其科劣”，想辞掉它，只是由于严父的干预，未能辞去。二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寓居天磨山，自号“白云居士”。

三十三岁时，李奎报任全州牧司兼掌书记。由于他性格耿直，不满官场中的丑恶现象，在宦途中，屡遭贬谪，甚至流放。直到近于晚年时，才因文章受到把持朝政的崔瑀的重视，被荐任较高的官职，最后做到宰相。但李奎报对官场生涯已不感兴趣，七十岁时，辞去官职，返归故里，直到七十二岁去世。

李奎报曾任右正言知制诰、右司谏知制诰和左司谏知制诰。他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文章大家。《东国李相国集》的序中说他“名振海外，独步三韩，翱翔玉堂，出入凤池。王言帝诰，高文大册，皆出一手”。他常为朝廷起草对外文件，在外交上也起

过很大作用。他起草的给鞑靼人的文告，感动了鞑靼人。但是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来看，他主要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古诗、律诗，仅仅收在《东国李相国集》中的就达两千首左右。实际创作的诗歌量远远超出此数。

《东国李相国集》是朝鲜历史上直到李奎报为止作品数量最多的一部个人文集。

李奎报生活在一个农民起义频繁、祖国不断遭受异族侵凌、武臣专政、高丽王朝备受冲击的时期。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和诗人宦途的坎坷，使得他的一生都过得不大平静。

李奎报对于当时流行于文人学士之中的形式主义诗风不以为然。这种形式主义只追求辞藻，不注重内容，一味无病呻吟，矫揉造作。

李奎报的创作思想和上述的形式主义相反，他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数度谈到过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如《论诗》：

迩来作者辈，不思风雅义。
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
意本得于天，难可率尔致。
自揣得之难，因之事绮靡。
以此眩诸人，欲掩意所匮。
此俗寝已成，斯文垂堕地。

李奎报反对那种一味雕琢，因文害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揽华遗其实，所以失诗旨”，就是他对于这种文风的抨击。

李奎报在创作实践上努力以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在创作观点上强调实际内容的根本意义。诗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是和他的社会观、人生观有连带关系的。

李奎报热爱自己的祖国。早在他二十六岁时，就满怀着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写出了有名的长篇叙事诗《东明王篇》。此诗共一千三百九十字，以历史神话传说为题材，描写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的过程。其具体情节已在关于朱蒙的神话部分中叙述

过了。在十二世纪末写此诗时，他自称是根据朝鲜《旧三国史》的记载写成的，在《东明王篇》的序文中点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 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事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述，后将何观？是用作诗之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

“圣人之都”，用现代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神圣的独立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李奎报创作此诗的政治目的。

在《东明王篇》中，诗人不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朱蒙的英雄形象，叙述了这位开国君主为建国而经历的艰难、曲折、神奇的过程，还借古讽今：

> 自古帝王兴，征瑞纷蔚蔚。
> 末流多怠荒，共绝帝王祀。

诗人希望朝廷以人民为重，使得朝鲜民族永远兴盛不衰。

李奎报在二十七岁时还写过一般称之为“三百零二韵诗”的一篇长诗（全称为《次韵吴东阁世文呈诰院诸学士三百零二韵诗并序》），这首诗虽然艺术性稍差，堆砌了过多的典故，但它热情洋溢地赞美了祖国历史和文化。

李奎报对侵略者表示了极大的仇恨。这种憎恨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是密切结合的。在五言古诗《九月六日闻虏兵来屯江外，国人不能无惊，以诗解之》中一再安慰人民，敌人虽然其势汹汹，但他们无法渡江。大家不要惊慌，不要被张牙舞爪的敌人所吓倒，敌人终究逃脱不了败亡的下场。诗人把敌人比做狗，“犬也好吠人，其终免者鲜”。表示了对敌人的无比鄙视，充满胜利的信心。

《闻达旦入江南》一诗中，诗人对经常侵入朝鲜国土肆意掠夺烧杀的敌人切齿痛恨：“安得天上剑，一时堕胡头”，他希望借得天上的宝剑，尽斩敌人头颅。“不然大海水，倾注使漂流；化为鱼与鳖，作脍我民喉”。他希望倾大海之水淹死侵略者，使这些任意掠夺无辜的朝鲜人民的丑类一概化为鱼鳖供人民享用。

在《十月电》中，他写道：

天放骄儿毒已弥，当冬震雷又奚为？

翻然若向胡头击，纵曰非时可曰时。

在《二月闻虏兵犹在南》中，他写道：

候雁已归北，胡雏犹在南；

南方朱鸟窟，何不啄皆歼？

诗人甚至祈祷雷电和"天之四灵"之一的朱鸟帮助人民消灭敌人。

在《闻胡种入江东城》一诗中，作者又写出了对敌人的深恶痛绝："得肉幸平分，万人甘共脍"。这种诗句不禁使我们想起宋朝岳飞的《满江红》中的豪言壮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李奎报的反侵略的爱国诗篇中大部分都意境凝重，抑郁悲凉，这和当时高丽对外战争失利有关。但在五言古诗《闻官军与虏战捷》（与契丹战）中，则充满着一种轻快明朗的色彩：

胡骑犹未歼，夜卧难交睫，

邮筒疾似飞，报道官军捷。

一国喜浓浓，簇贺如云合。

李奎报对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底层人物——劳动人民怀着深切同情心，他的作品中最宝贵的部分是描写贫苦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他笔下的形象有：贫穷的老妇、因为家贫而被丢弃在路旁的小女孩、整日辛勤耕作的农民等，使读者看到了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下一幅幅劳动人民的受难图。

五言古诗《孀妪叹》描写了在秋风萧飒寒秋季一个老婆婆的节，当妇女们都忙着准备冬衣的时候，她却独自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拱手祈求炎热的夏天再回到人间。这首诗以作者和这个老婆婆一问一答的方式刻画出了这个贫穷老妇人的悲惨处境。诗人对她说：

时节固有程，进退宁为汝？

园枫行欲丹，尔可寻故絮。

老婆婆答话催人泪下：

答云‘是何言？妾本最贫女，

故絮久已典，新衣谁复与？’

最后，诗人对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表示了衷心的同情：

我闻恻然悲，心若挂私虑。

要趁穷愁时，尺帛期可惠。

在《路上弃儿》一诗中，诗人就他所看到的一个弃在道旁的婴儿作了种种推测：是不是再婚的妇女不愿带走前夫之子？是不是因为今年歉收养不起孩子？结尾诗人用“世薄民漓已可知”这句话来指责弃婴者，实际上则谴责了造成这种“母子一朝成仇敌”的怪现象的社会。

李奎报对农民的处境尤其关心，他用同情的笔调描绘了农民从事田间劳动时的艰苦：

赤身掩短褐，一日耕几亩。

才及稻芽青，辛苦锄粮莠。

（《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

带雨锄禾伏亩中，形容丑恶岂人容？

（《代农夫吟》）

千块化碧畦，费尽九牛力。

针芒到黄穗，劳却万人役。

幸免水旱灾，万一倘收得。

见兹稼穑艰，一粒何忍食？

《（东门外观稼》）

农民劳动如此艰辛，却不能享受用自己汗水的劳动果实。朝廷竟然下了这样的命令：禁止农民饮清酒和吃白米饭！对这种无理的命令，诗人十分愤慨，为此他以五言古体写了一首长诗《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光是诗的题目就明确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了。诗中这样描写了农民的苦难：

无何遭夺归，一介非所有。

乃反掘凫茈，饥扑不自救。

劳动果实，全遭夺走，自己反而靠挖野荸荠充饥，最终不免于饿死荒野。

诗人揭露了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伪善面目，尽管剥削者有时也让农民吃上一些自己种的粮食，但这不是为了爱护农民，而仅仅是要他们为剥削者卖命：

除却劳作时，何人饷汝厚？

所要赌其力，非必爱尔口。

诗人为劳动人民受到非人的待遇而愤愤不平：

粲粲白米饭，澄澄绿波酒。

是汝力所生，天亦不之咎。

为报劝农使，国令容或谬。

诗人为劳动人民鸣不平，同时对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贵族则极为憎恶。在《代农夫吟》中，他揭露了对农民剥削的残酷性，并怒愤地谴责了剥削者：

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

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

正是在高度评价农民劳动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上，诗人对满身污泥，“形容丑恶”的农民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在《新谷行》中他写道：

一粒一粒安可轻？系人生死与富贫。

我敬农夫如敬佛，佛难养活已饥人。

高丽时期是佛教十分盛行的时期，李奎报本人也颇爱读佛经。但是在李奎报眼中，农民比佛更重要，更值得尊敬。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没有对劳苦农民生活的细致了解体察和极为深挚的同情，是写不出这种诗句的。

最能体现李奎报的这种农为国基、民为国本的思想的是《雨中观耕者赠书记》一诗：

一国膏肥民力内，万人生死稻芽中。

他时玉粒堆千廪，请记今朝汗滴功。

李奎报同情关心农民的诗中，有一种很宝贵的思想，就是拿自己和农民对比。虽然身为一个脱离农业劳动的文人士大夫，他却不是纯客观地叙述苦难，也不只是单纯地表现他忧农民之忧，喜农民所喜，而是把自己这个四体不勤，不劳而食的读书人拿来和农民的艰难及其贡献进行对比。前面已引用过的诗句如“我敬农夫如敬佛”（《新谷行》）、“力耕富国关吾辈”（《代农夫吟》）以及“如我合为饥死鬼，无功食禄几多年”（《是夜又作》）等诗句都说明了这点。此外如《正月七日受禄》的：

平生无片功，受禄岁几斛。

口费万民膏，身还一室伏。

以及《新谷行》中的：

可喜白首翁，又见今年稻谷新。

虽死无所歉，东作余膏及此身。

也都是十分具体地表现这种反观自己的思想。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这种批判地对待自己，把自己坐享其成同终年辛勤劳动、却难获温饱的农民生活加以比较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在他的以关心农事为主题的诗歌中增添了新的光彩。

虽然就整个社会观来说，李奎报所持的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态度，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对封建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反感是十分强烈的。

在《钓名讽》中他质问那些沽名钓誉的文人学士，批评了那些不学无术之辈：

钓鱼利其肉，钓名何所利？

名乃实之宾，有主宾自至。

无实享虚名，适为名所累。

诗人还进一步用辛辣的语言讽刺嘲弄了这些有名无实之徒：

有如无鉴女，涂饰暂容媚；

粉落露其真，见者呕而避。

在《林秀才求金钱花移栽》中，诗人十分含蓄、幽默而又深刻地嘲讽了那财迷心窍，移栽金钱花以求发财致富的一名秀才。

在《衾中笑》中，他又嘲弄了那些接受贿赂却又假装清廉的官吏的伪君子面目。对于一贯敲诈勒索人民的贪官污吏，李奎报则更是嫉恶如仇。在《闻郡守数人以赃被罪》中，诗人这样揭露了贪官污吏的罪行：

岁俭民几死，唯残骨与皮。

身中余几肉，屠割欲无遗。

《七月三日闻云梯县为大水所漂》中描述该地发生空前严重水灾的情况。对于老百姓遭灾，诗人十分同情，对官吏遭灾，诗人则毫不怜悯，认为罪有应得。

在《望南家吟》中，诗人揭示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富人花天酒地，穷人饥饿难熬，从而痛斥了剥削者：

南家富东家贫，南家歌舞东家哭。

歌舞何最乐？宾客盈堂酒万斛。

哭声何最悲？寒厨七日无烟绿。

东家之子望南家，大嚼一声如裂竹。

君不见：

石将军日拥红妆醉金谷，

不若首山饿夫清名千古独。

正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李奎报的这首诗也以贫富的强烈对照，把矛盾的尖锐性、严重性揭示在读者面前：一方是“歌舞”，一方是“哭声”；一方“宾客盈堂酒万斛”，一方是“寒厨七日无烟绿”。这就是造成当时农民和公私奴隶不断起义的社会原因。诗中“君不见”以下两句，借用中国的历史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两种人的态度。问题不在于他对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评价，是否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传统看法，

而在于他借伯夷叔齐来表达什么思想。很明显，李奎报是借此以表示他鄙视剥削者而尊重贫苦人民的立场。

李奎报为官多年，甚至一度身居高位，但生活并不富裕。他关心民间疾苦，厌恶贪污，以清廉自守，而且不屑于为治家产而忙碌。有不少诗反映出他的清贫生活，如《近有屡空之叹因赋之》：

三韩宰相几多人，我亦曾叨宰相身。
不是自清他不尔，如何独未免忧贫？

接着，他拟了一首《代人答》：

渠县三韩宰相官，从前尸禄尚何颜？
公难润国私宜涸，以道观之是好还。

这里说明了他之所以身为宰相依然贫困的原因："不是自清他不尔"——清廉。接着又以别人的口气说明了自己对国家贡献不大："公难润国私宜涸"，不能富国，落得个清贫也是应该的。这种安于清贫的思想比那些"千里为官只为财"的禄蠹，高尚万倍！

李奎报还用这种清廉正直，安于清贫的思想来教育他的子孙后代。在《送长子涵以洪州守之任有作》中，他谆谆嘱咐将赴任的儿子说：

清白是第一，其次慎而谦。

他的七言绝句《嘱诸子》这样写道：

家贫无物得支分，唯是箪瓢老瓦盆。
金玉满籯随手散，不如清白付儿孙。

诗人家里缺吃少穿，住房也不很好。碰上大雨，一部分墙倒塌，另一部分也够危险的，屋顶雨漏如注，只能打着伞过夜。在《九月苦雨》中，他这样描写大雨中的家屋：

南墙已曾倒，西北亦几圯，
漏屋百难防，持伞夜不寐。
妻儿苦无知，怨咨声不已。

李奎报家里有时只得靠典当衣物勉强度日，长篇五言古诗《典衣有感示崔君宗藩》中反映出了李奎报的这种困窘的情况。

尽管诗人本人生活时常陷入困境，但他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一家，他还想到所有的穷人。在《明日偶题》一诗中，他记叙自己得到了宰相晋阳公惠赠的炭和粮食以后，把它分给了饥寒交迫的穷邻居的事：

吝惜非吾志，均分饥冻人。

表现出他推己及人的同情心。这种博大的同情心，在《苦寒吟》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吾非孔墨贤，
胡为突不黔兮席不暖？
妻儿莫啼寒。
吾欲东伐若木烧为炭，
炙遍吾家及四海，
腊月长流汗。

这种"炙遍吾家及四海"的想法颇有点类似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意思。在封建社会中，这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而已，但它表现了诗人的崇高思想境界。

李奎报一生多次遭受挫折，他因得罪权贵人物而不受重用，甚至多次被降职、免官。三十岁时，冢宰赵永仁等文儒四相联名给朝廷上札子推荐他，但有人从中作梗，札子被窃，未能上达。三十三岁时，他在全州为官，因不满该地通判的不法行为被谗遭贬。四十岁时又被弹劾。五十二岁时，因上司琴相国未采纳他的正确意见，以致公务出了差错。他被朝廷错加怪罪而遭弹劾。琴相国本人获免，李奎报却代人受过。六十三岁时，因"执法不挠"和其他三名"正直敢言"的人同遭无妄之灾，被流放于猬岛。

李奎报诗中对这种坎坷曲折的宦途是颇有感触的。"白首犹居百寮尾"（《元日朝会退来有感》）、"朝野应讥解绶迟"（《病中有作》）、"萧然白发老居士，谁谓曾经鼎鼐司"（《自嘲》）都表现了诗人常居微官末职的处境和心情。

但李奎报并不热中于作官，尤其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直到去世

的二十年间，曾先后七次向朝廷上辞呈。

李奎报的文才出众，一生中却遭受这么多的挫折，原因正在于他为人正直清高，不屑于同流合污。“任人惟贤”只是一句空话，象李奎报这样才能出众的文人屡屡受挫，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典型的。《典衣有感示崔君宗藩》一诗中所透露的因酒后失言而招祸，不过是一个偶然因素，一个表面现象而已。《读书》中说他“为政刚猛”，“为人宽雅正直”。《文集》的《序》中说他“屹立为正直”。他的诗中也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直方迂阔人皆知”（《衾中笑》），“方直汝尤剧”（《辛卯正月九日记梦》），“拙直由天赋，艰难见世情”（《偶吟二首有感》），“是亦与事迁，营生信淡薄”（《苦寒》）。《自嘲入京后作》则说得更明确了：

> 冷肩高磊落，病发短萧疏。
> 谁使尔孤直，不随时卷舒？
> 诬成市有虎，正坐水无鱼。
> 只合作农老，归耕日荷锄。

这首诗象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了诗人的思想性格和由此而陷入的困境。在“谁使尔孤直”自我责难中，包含着他辛酸的遭遇，也有他对靠阿谄谀奉承谋官求财的世俗儒生的嘲讽。

李奎报的诗中，有不少是咏物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乃。至于通常使用的物品和家常菜蔬及自然景物，都是他描写的对象

写动物的有《鹦鹉》、《咏雁》、《悄鸟啼》、《闻莺》、《啄木鸟》、《旧燕来》、《鹊巢》、《奇尚书宅赋怒猿》、《鼠狂》、《谕犬》、《责猫》、《伤瘦马》、《蝉》、《园中蝉》、《观脊虫上壁化蝶》、《金笼蟋蟀》、《蛛网》、《蝇》、《游鱼》、《稻畦鱼》、《蛙》等。

写观赏植物的有《玉梅》、《蔷薇》、《矮松》、《松花》、《惜花》、《木芍药》、《冬柏花》、《重秋日咏菊》、《菊花》、《咏菊》、《石榴花》、《四季花》、《咏黍饭花》、《海棠》、《大

树》、《相磨木》、《咏桐》等等。写食用植动的有《家圃六咏》中的瓜、茄、萝卜、葱以及向日葵，还有《栗诗》、《茄枝》等。

写物品用具的有《素琴》、《竹夫人》、《咏笔管》、《素屏》、《砚池诗》、《偶见气球因寓意》等。

写自然景物的有《题石泉》、《寒泉》、《咏雪》、《雪咏》、《路上咏雪》、《妬花风》等。

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各种生命和无生命物体的细腻观察，其中有些颇类似静物画或写生画。这一幅幅静物写生画，也是诗人表达自己的情趣和情操的途径之一。

借咏物抒怀，是李奎报擅长的一个手法，这些咏物诗，和其他思想内容较好的诗一样，是李奎报作品中很珍贵的一部分。

诗人李奎报通晓中国经史、诸子和佛老典籍，对中国文学是很熟悉的。他热爱中国文学和文学家。他的诗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屈原、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在《晚望》中，他对李白、杜甫做了高度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敬慕之情：

李杜啁啾后，乾坤寂寞中。
江山自闲暇，片月挂长空。

在《郁怀有作》中，他在千愁万绪中怀念李白、杜甫：

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
吐出郁气长虹？

诗人在《读李白诗》中列举了中国唐代有名的诗人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等，拿他们和李白对比，证明李白诗的艺术成就超过他们，证明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是极为恰当的，全诗显示出李奎报对中国文学具有十分丰富的知识，文笔奔放，气势非凡，格调清新，不落俗套。

李奎报也很欣赏陶渊明的诗，在《读陶潜诗》中，李奎报评价陶诗是：

至言本无文，安事雕凿费？
平和出天然，永嚼知醇味。

他对陶渊明的愤世嫉俗和洁身守志也颇为仰慕："读诗想见人，千载仰高义"。

此外，他的诗中也曾提到白居易、苏东坡的名字。

李奎报诗的技巧受到了朝鲜历代的汉文诗歌诗人的重视。十五世纪李朝的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说李奎报的咏史诗《开元天宝四十二咏》"随笔讽咏，抑扬顿挫，沉深痛快，虽置之唐诗作者亦无愧焉"。

比李奎报晚生八十五年的崔滋在其《补闲集》中对李奎报诗的艺术水平作了高度评价：

> 观其诗文，如日月不足誉。近代律诗，于五七字之中，有声韵对偶，故必俯仰穿琢以应其律，虽宏材伟器，不得肆意放言，披露妙蕴，故例无骨气。公自妙龄，走笔皆创出新意。吐辞渐多，骋气益壮，虽入于声律绳墨中，细琢巧构，犹豪肆奇峭。然以公为天才俊迈者，非谓对律。盖以古调长篇强韵险题中，纵意奔放，一扫百纸，皆不践袭古人，卓然天成也。

在朝鲜文学史上，李奎报是第一个创作长篇叙事诗的诗人。《东明王篇》就是一首气势磅礴、形象丰富的长篇叙事诗。

第四章　卓越的诗家与词人李齐贤

在朝鲜文学史上，李齐贤（1288—1367）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他是朝鲜古代诗人中与崔致远、李奎报齐名的三大诗人之一，而且也是大量创作长短句——词的人。他还是朝鲜民歌的热爱者和整理者、翻译家。他在诗、词、朝鲜国语民歌上的贡献使他在朝鲜文学史成为一位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

李齐贤曾长期留居中国，写过不少歌颂中国山川名胜、历史人物的诗、词，因而使中国读者倍感亲切，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第一节　李齐贤的生平

李齐贤字仲思，号益斋，比李奎报晚生一百多年。一二八八年一月八日（阴历十二月二十日）生于高丽的京城开城，为当时名诗人、“后耆老会”的组织者李瑱之子。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极其良好的文化熏陶，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李齐贤于十五岁时参加成均馆考试合格，十七岁时进入仕途，任录事，二十二岁时被选拔入艺文春秋馆，二十六岁任西海道的安廉使。二十八岁时，应居留元朝首都燕京的高丽逊位的忠宣王王璋之召，到燕京。在中国他结识了元朝的一些知名文人学士如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他到过中国西蜀，还随王璋到过江南。

当时的高丽臣属于元朝。李齐贤为保全高丽国号，努力奔走于元朝与高丽之间。王璋曾受到其侄王暠一派的诬陷，被元朝流放到吐蕃。王暠企图废忠肃王，取而代之，自立为王。其阴谋失

败后，其同党又企图把整个高丽变成为元朝的一个省以取悦于元朝。李齐贤竭力反对，并上书为王璋辨诬。他又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历经艰难，去找受贬谪的王璋，表现出他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李齐贤于一三四一年即忠惠王元年回归祖国，此时他已五十四岁了。因群小猜忌，他深居简出，埋头书斋，写成《栎翁稗说》。五十八岁时，他担任时方八岁的忠穆王的老师，同时编写忠烈、忠宣、忠肃三朝实录及其他史书。恭愍王即位后他被拜为右政丞，七十一岁时辞官隐居。一三六一年红巾军侵犯高丽、攻陷开京，李齐贤为退敌立下了功劳。一三六七年七月，八十一岁病逝，谥文忠公。其著作流传至今者除上述《栎翁稗说》以外，还有《益斋乱稿》。

李齐贤生活于高丽王朝备受蒙古压迫的时期，加上大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人民困苦不堪，反抗的浪潮席卷全国。李齐贤的一生经历及其见闻，使他对人民产生了同情，并激发出他强烈的爱国思想。收集在《益斋乱稿》中的一些《策问》，提出了改革税制和调整土地关系的主张以减轻人民痛苦，一些诗歌则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第二节　李齐贤的五言七言诗

李齐贤的汉文五言七言诗中，最有意义的是表现他热爱祖国和关心人民的作品。他和他的前人李奎报不同。李奎报的爱国诗往往是直接抒写他对侵略者憎恨、表示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在长篇叙事诗《东明王篇》和《三百零二韵诗》中也表现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自豪感。但李齐贤的爱国诗篇中就很难见到类似的情况。由于此时高丽王朝已降蒙古，处处受蒙古的牵制、束缚、压迫，朝鲜半岛成了元朝征东行省的一部分。高丽国王只不过是这个行省中的一个长官，元朝可以随时把这高丽王召入元

都，甚至可以惩处、流配。加之他个人又曾陪同忠宣王居留元朝达二十六年之久，“在人屋檐下”的处境使他无法直接倾诉他对入侵的异族的憎恨，也不能象李奎报那样无所顾忌地歌颂祖国的历史与文化。他的爱国诗一般都是委婉、含蓄、沉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忧愁幽思的流露。这类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旅思离愁、即兴咏景、送别故人等，但都渗透着他思念故土、关心祖国命运的心情，象《定兴路上》、《豫让桥》、《眉州》、《思归》、《燕都送朴少卿东归》、《多景楼陪权一斋用古人韵同赋》、《北上》、《黄土店》、《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发京师》、《白沟》、《王祥碑》、《题长安逆旅》、《泾州道中》、《感怀》、《辽阳路上》、《庚辰四月将东归题齐化门酒楼》等都是这类作品。

试看七律《多景楼陪权一斋用古人韵同赋》：

扬子津南古润州，几番欢乐几番愁。
佞臣谋国鱼食饵，黠吏忧民鸟养羞。
风铎夜喧潮入浦，烟蓑暝立雨侵楼。
中流击楫非吾事，闲望天涯范蠡舟。

诗中提到的权一斋字汉功，官至赞成事，曾和李齐贤同舟到过中国江苏、浙江一带。李齐贤在这首诗里向他表明了他对国内某些现象的忧虑。诗人对那些“佞臣”、黠吏表示鄙视，预言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正如鱼之贪饵、鸟之贪食一样，终究会成为盘中之餐的。对那些贪权误国、致使异族统治者得以控制高丽的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抨击。尽管诗人看出了国内的一些消极现象，他却自感无能为力，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再看七律《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发京师》：

主恩曾未答丘山，万里驱驰敢道难。
弹剑不为儿女别，引杯聊尽故人欢。
五云回首笼金阙，片月多情照玉关。
唯念慈亲鬓如雪，数行清泪洒征鞍。

这首诗写于李齐贤即将离开燕京去找被流放到吐蕃的忠宣王时。国君含冤受屈被发配到远方，慈亲年迈，白发苍苍，却不能侍奉左右，这一切都是骑在高丽人头上的异族统治者造成的。国难家愁萦绕于诗人胸怀，全诗凝聚了国忧乡愁，凝结着作者深切的爱国之情。

五古《王祥碑》中借中国晋代有名孝子王祥卧冰求鱼孝母的故事，抒发他对远在祖国故乡的慈母的怀念，和前诗一样，这也是一种借家愁抒发国忧的作品。在五律《泾州道中》之中，这种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

出谷天无际，登坡路始平。
塞云拖雨黑，野日隔林明。
万里思亲泪，三年恋主情。
哦诗聊自遣，渐觉锦囊盈。

思亲万里，恋主三年，两者贯串着同一个思想：祖国遭践踏，百姓受欺凌！诗的最后两句于忧思惆怅之中，流露一种幽默感：难以排解的愁绪却带来了诗创作的丰收，这种聊以自慰的语言背后，却又隐藏着多少感慨辛酸。

以《题长安逆旅》为题的五律一首和七律两首也全都是思念故国之作。只不过各有具体的中心意思。五律中，表示自己多年来风尘仆仆，“辙环天下半”走遍了半个天下，但“心逐水东流”心里却总是象江水东流一样朝向东方的祖国与家园。

七律二首，其一情调较比五律尤为低沉：“梦里家山空蕙帐，酒阑檐雨落灯花”，境界凄凉，结尾的“宦情已似秋云薄，胸次唯余一寸霞”虽然对未来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但为官之意早已如秋云之薄，如死灰之冷了。另一首同名的的七律，比较特殊，格调高亢，不但有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还透露出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对高丽的复兴寄以极大的希望：

海上箕封礼义邦，曾修职贡荷龙光。
河山万世同盟国，雨露三朝异姓王。

贝锦谁将委豹虎？干戈无奈到参商。

扶持自有宗祧力，会见松都业更昌。

这样情绪明朗的诗作在李齐贤的爱国作品中并不多见，除此以外，只有他的七绝《白沟》可以称得上更加明朗而且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

谁将督亢饵强邻？空费金缯岁结亲。

尺水区区遏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

这首诗借用了战国时代燕国不畏强暴，拒绝强秦对燕国疆土的无理要求的典故。白沟是中国河北省的地名。李齐贤通过写中国的历史事件来暗示高丽应具有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诗人在元朝的统治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隐喻的手法。

李齐贤的爱国诗中几乎大多含有忠君思想。虽然说封建时代文人一般都难以区别忠君和爱国的不同，但是李齐贤的诗中这一点特别明显、突出。如“早晚归来报明主”（《定兴路上》）、“主恩犹未报，努力敢求安？”（《北上》）、“主恩曾未答丘山，万里驱驰敢道难”、“万里思亲泪，三年恋主情”（《泾州道中》）等。之所以如此，除了他有一般的封建正统思想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这就是高丽国君被迫离开祖国，屈居人下，而李齐贤又一直陪伴着这位不自由的国君。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更多地看到国君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不幸是和国君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忠君思想中是含有爱国观念的。

李齐贤是关心和爱护人民的，他所创作的一些描写人民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以及他对民间歌谣的重视和翻译等，都足以说明这点。

他的《促织》一诗借咏蟋蟀表达了他对织布的贫困妇女和寡妇、征夫的同情：

促织复促织，哀鸣何恻恻。

终夕弄机杼，平明无寸缕。

嫠妇才闻泪似泉，

征夫一听凋朱颜。

在《古风七首》之一中，他有“开炉具灯火，坐听风枝号。念彼穷谷士，谁与同其袍？”的句子，表现出诗人天寒地冻时为穷人担忧的人道思想。

在《送金海府使郑尚书得时字》中，诗人为郑尚书可以为民除害而感到高兴，“汝蛊岂不剔？汝疾岂不医？嘘以燠汝骨，哺以肥汝肥”。这里的“汝”指的是百姓，诗人把为百姓消灾除害、谋求温饱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

七言古诗《送田孟耕赴任全罗道》是李齐贤揭露当时昏官顽忽职守、压榨人民最突出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地描写当时百姓和文官武将的情形：

……

南方近者频年荒，捐瘠往往僵路傍。

守令识字百二三，坐视弄法犹盲暗。

旋驱农夫防海倭，贼刃未接先奔波。

大将坐幕拥笙歌，小将汗马输弓戈。

豪奴联骑攘公里，官征逋租不计年。

呜呼民生至此极，谁与吾君宽旰食。

……

时值凶年，哀鸿遍野，而守令之类的官吏却贪得无厌，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他们追使农民去送死，自己却不战而退。大将们欣赏歌舞，寻欢作乐，下级军官们则以打仗为借口盗窃大量武器……简炼的诗句写出当时社会和军队中一桩桩丑恶的事实，反映出高丽社会中的种种黑暗现象。当然，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只能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能为“民之父母”的好官和国君的圣明上：

田郎夙慕君子儒，岂比老我空嗫嚅。

往哉问瘼公无私，驰奏得令明主知。

这些想法和要求是不大切合实际的。一两个能关心“民瘼”

的清官未必就能完全消除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黑暗现象，也不一定就把百姓引上安居乐业的幸福大道。但是，诗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不法官吏的揭露还是可取的。

李齐贤擅长写景，其景物诗在当时诗界颇享盛名。由于他青壮年时期长期居住在中国，他的写景诗大都是描绘中国的自然胜景的。此处只举他的少数诗为例，如《金刚山二绝——普德窟》：

阴风生岩曲，溪水深更绿。

荷杖望层巅，飞檐驾云木。

最有名的是《山中雪夜》：

纸被生寒佛灯暗，沙弥一夜不鸣钟。

应嗔宿客开门早，要看庵前雪压松。

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评此诗："能写出山家雪夜奇趣……崔拙翁尝曰：'益老半生诗法，尽在此诗'"。全诗只有一字提及雪，用大雪所造成的结果把读者的想象带入了纷纷扬扬的雪夜奇境之中，隽永、含蓄、余味无穷。

七绝《九曜堂》也写得颇有意境：

溪水潺潺石径斜，寂寥谁似道人家？

庭前卧树春无叶，尽日山蜂咽草花。

此外五古《朴渊》也以生动的语言描绘出朝鲜名胜朴渊瀑布的奇景妙观。

高丽时期民间歌谣盛行。和轻视朝鲜国语文学、轻视民间歌谣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李齐贤不但重视、珍爱本民族的民间文学，而且还把它们译成汉文诗收于自己的文集《益斋乱稿》卷四《小乐府》之中。这类诗总共有十首如《沙里花》、《济危宝》、《居士恋》、《长岩》、《水精寺》等。这里只举出《水精寺》的汉译诗为例说明李齐贤译诗的艺术水平：

都近川颓制水坊，水精寺里亦沧浪。

上房此夜藏仙子，社主还为黄帽郎。

李齐贤译成汉文的诗歌既能充分表达原意，又很符合汉文诗

的格律，得到了诗评论家的好评。徐居正在《东人诗话》这样高度评价了这些译诗："乐府句句字字皆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谏猊山、牧隐，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唯益斋备述众体，法度森严。"

第三节 李齐贤的词

朝鲜文学史上产生了大量的汉文五、七言诗，但是长短句——词却为数极少。尽管高丽王朝的存续时期大部分与盛行填词的宋朝同时，但直到南宋灭亡时为止，词的数量极少。高丽的文人士大夫，间接地受了由新罗著名诗人崔致远传播的唐诗影响，继承了他所开创的汉文诗歌传统，创作了大量汉文五、七言诗，但截止李齐贤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以前，也就是说直到十四世纪初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人正式从事词的创作。虽然李齐贤以前的林椿、李奎报所作汉文诗中已出现极少数长短句和零零星星的词，但未曾引起诗界的重视，得不到诗话作者的评价，当然也称不上词家。只有到了李齐贤，才可以说，朝鲜文学史上才出现了词人。词这一重要的诗歌体裁才算是正式被引入朝鲜诗坛，并有所成就。

词之所以很晚才被引进朝鲜，其原因是复杂的。原因之一就是词的创作，对朝鲜的文人来说，写作技术上较为困难。词在中国，比之于汉文五七言诗，音乐性强，容易上口，对于不熟悉中国音律和主要从书面上学习汉文(文言)的高丽文人来讲，其理解和创作都较五、七言诗困难。从李齐贤以后朝鲜文人中仍然只有极少数人创作词这一情况看来，上述这个原因，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李齐贤既是词的引进者，又几乎是文学史上的唯一的优秀词人，在朝鲜汉文诗歌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李齐贤的词收集在他的《益斋乱稿》卷十中，共有五十余首，其中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以写景抒情较多。《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菩萨蛮·舟中夜泊》流露出他身居异

域的乡愁和思念祖国的心情：

银河秋畔鹊桥仙，
每年年，好因缘。
倦客胡为，此日却离筵？
千里故乡今更远。
肠正断，眼空穿，
夜寒茅店不成眠。
一灯前，雨声边，
寄语天孙，新巧欲谁传？
懒拙只宜闲处著，
寻旧路，卧林泉。

（《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作》）

九店在山东省蓬莱县西九里。李齐贤七夕雨中到达这里，由七月初七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神话而想到故乡、家园。词的意境苍凉，耐人寻味。

《巫山一段云词·松都八景》描写了祖国高丽都城——开京的秀丽景色，总共八首，描写了八处地方：《紫洞寻僧》、《青郊送客》、《北山烟雨》、《西江风雪》、《白岳晴云》、《黄桥晚照》、《长湍石壁》、《朴渊瀑布》：

万壑烟光动，
千林雨气通。
五冠西畔九龙东，
水墨古屏风。
岩树浓凝翠，
溪花乱泛江。
断虹残照有无中，
一鸟没长空。　　　（《北山烟雨》）

“五冠”指五冠山，九龙亦北山地名。群山万壑，层林千树，尽被笼罩在烟雾细雨之中，隐隐约约。在夕阳的映照下，彩虹半隐

半现横跨长空，一只鸟儿展翅飞入晚霞中，宛然一幅动静结合、浓淡宜人的山水画。

他的小令如《大常引·暮行》、《浣溪纱·早行》、《菩萨蛮·舟中夜泊》、《菩萨蛮·舟次青神》等，都是一些精彩的抒情小品。

第四节 与中国有关的诗词

李齐贤长期居留中国，时间之长可以说是居历代朝鲜文人之冠。他在中国与中国著名文人学者交往既多，所到之处又广，加以他对中国历代诗文典籍的钻研和高度的文学才能，他写下了不少内容上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其中有反映他和中国文人友谊的，也有对中国历代古人的歌颂和对中国各地风景名胜或古迹的描绘和赞美。这些诗词在其全部诗词作品中所占比例之大，在朝鲜历代诗人中，也是最为突出的。可贵的是，尽管他对给高丽带来不幸和痛苦的元朝统治者不满，但是对于以汉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及其历史则始终热爱，不曾露一微辞。

他的七律《奉和元复初学士赠别》是他在向元复初告别时所作的：

昔从倾盖眼能者，载酒同游遍洛城。
直欲执鞭如鲁叟，岂惟结袜比王生。
感公灯火三更话，慰我关山万里行。
更得新诗入囊褚，剑南人识汝南评。

诗中头两句简短地回顾了他与元复初相逢、相识和交往的过程，接着叙述了他对元复初的感激心情，称赞对方的亲切接待和关怀，并在临行前与他深夜谈心。结语感谢元复初给他写的赠别诗，为在异域能得挚友而感欣慰。

七律《二陵早发》与七绝两首《和呈赵学士子昂》是李齐贤与元朝著名书画家赵子昂（孟頫）交往期间所作。“二陵”指中国河南省洛宁县峭山中的南北二陵，南陵为夏禹之墓，北陵为周

文王避雨之处。李齐贤在离京师去成都前夕，赵子昂曾以古调一篇送别。其中有"勿云锦城乐，早归乃良图"之句。秋后，李齐贤归途中经过此二陵时，忽想起赵所赠诗，于是作此《二陵早发》一诗，寄赠赵子昂，披露了自己的心情。《和呈赵学士子昂》二首对赵子昂的诗文、书法极力赞美，表示自己对赵及其夫人管道升的敬佩。

五绝《简李员外》中，李齐贤向一位中国的知心朋友写道：

吾生如寄耳，方寸只君知。

岁晚深期在，东归定几时？

他的《庚辰四月将东归题齐化门酒楼》，是他离开中国前的惜别之作，表现了他希望再度来中国的心情。

李齐贤笔下涉及的中国历史人物很多，有的因观览古迹或历史胜地而联想到，如《比干墓》、《则天陵》，有的因读史书而提及，如《咏汉史》。他的这类诗词涉及的人物有：黄帝、龙逢、比干、范蠡、陈胜、项羽、田横、韩信、萧何、张良、诸葛亮、武则天、杜甫等人。

李齐贤到过中国的不少地方，目睹中国的一些名山大川、风景胜地、名胜古迹，引起了他对中国锦绣河山的热爱和对中国历史的回顾。他把这些写进诗词，形诸笔端，描写的有虎丘寺、焦山、金山寺、峨嵋山、华山、蜀道、黄河、汾河、洞庭湖、武则天陵、汉武帝茂陵、函关、扬州平山堂、姑苏台、井陉、华阴、长安豫让桥等等。

李齐贤以"巫山一段云"的词牌，描绘了中国的潇湘八景，总共十六首（其中《烟寺暮钟》一首已失传，只剩有题目），又用同样的词牌描写了高丽松都八景。《松都八景》同样也是十六首。由此可见李齐贤对中国的山川景物和高丽的锦绣河山怀有同样的热爱之情。《潇湘八景》写景真切、意境深远，其中有关的一些典故传说使用得贴切自然，与所写景物浑然一体。如《潇湘夜雨》二首：

潮落蒹葭浦，
烟沉橘柚洲。
黄陵祠下雨声秋，
无限古今愁。
漠漠迷渔火，
萧萧带客舟。
个中谁与共清幽，
唯有一沙鸥。（其一）

暗淡青枫树，
萧疏斑竹林。
篷窗夜雨冷难禁，
倚枕古乡心。
二女湘江泪，
三闾楚泽吟。
白云千载恨沉沉，
沧海未为深。　（其二）

李齐贤身在中国，心念高丽，中国的一些名胜古迹不但没有使他忘却祖国的处境，反而勾引他感触时事，思念故土。反映在他作品中的，有的是在对中国历史的思古幽情中隐含着力求解救祖国危难的壮志雄心，如五古《渑池》，有的则是借题发挥，直抒胸臆，如《豫让桥》。

渑池为古城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是战国时郑国领土，先并入韩，又并入秦。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曾会盟于此。当时蔺相如随赵惠文王到会，使赵王免受屈辱，因功被封为上卿。李齐贤的《渑池》一诗歌颂了蔺相如的功绩。"强秦若猰虎，懦赵真首鼠"诗人所写秦赵之间的这种关系，和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多么相象！李齐贤同样也是国王身边的大臣，而忠宣王的处境比赵惠文王还不如！对高丽王朝忠心耿耿的李齐贤，到此怎能不

有所感触？“驾言池上游，去我今几秋？余威起毛发，万木寒飕飕”。诗人在对蔺相如表示崇敬的诗句中，明显地包含着他欲仿效前人，为国雪耻，振兴高丽的意念。此诗虽为写中国的历史胜地，却是一首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诗！

李齐贤之所以在诗词的创作、民歌的翻译中有如此高的成就，和他长期在中国受到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汉文化熏陶有关。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说李齐贤“北学中原，师友渊源，必有所得者。”证明了这点。李齐贤大量以中国为背景和题材的诗词，同样也是他“北学中原”的产物，这不仅是中朝文化交流史和两国友谊的珍贵遗产，更可贵的是诗人通过这样的诗词，表现出念念不忘高丽的爱国热忱！

李齐贤的文学成就在后世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李朝中期的名臣柳成龙在《重刊益斋集跋文》中指出：

> 高丽五百年间，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备，始终一致，巍然高出无可议焉者，惟先生有焉。

可见他在朝鲜历代文学家中的地位。今人夏承焘认为“益斋翘企苏轼，其词虽动荡开阖，尚有不足”[1]，指出他的《水调歌头·过大散关》等词，都有元遗山的风格，推崇他为朝鲜词人的“巨擘”。可见他在中国迄今仍享有高度的评价。

第五章　高丽晚期的汉文诗

高丽晚期的汉文诗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不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写景抒情的艺术水平上，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所提高。

高丽晚期汉文诗歌的这一发展有着社会原因和文学的原因。

高丽晚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官僚贵族和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生活日益贫困化。社会和政

① 见《域外词选》，夏承焘选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治的动乱，使得一些文人学士内心激荡不安，引起他们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忧虑。另一方面，高丽中期的李奎报以他充满人道主义和爱国思想的诗篇为汉文诗坛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使得高丽晚期的诗文转向正视现实和反映现实。高丽末期比李奎报所处时期潜伏着更多危机，因而也有更多的诗人写出了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同时，还出现了不少忧心国事的诗歌。描绘祖国山川的作品也有所增加。作为民族主体的平民的思想感情也在汉诗文学中得到了较多表现，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也逐渐增多。尽管这类诗歌远不如以后时期朝鲜国语文学中表现得那么大胆、泼辣，但较之前一时期，已前进了一步。

高丽晚期，最负盛名，同时也是高丽汉文文学最后一个成就较大的诗人是李穑(1328—1396)。他为名儒李穀之子，字颖水，号牧隐，和郑梦周(圃隐)(1337—1392)、吉再(冶隐)(1353—1419)皆为高丽末的的名儒重臣，被称为“三隐”。李穑十四岁时已中成均试，恭愍王二年在元科举中得第二甲第二名，使主考官欧阳玄为之惊叹，被任命为翰林文学承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由元归国后，任高丽政府要职，尤致力于奖掖后进。他晚年曾遭流配，李朝建立后，他受封爵。他的诗文得到很高的评价。权近（1352—1409）说他“凡为文章，操笔即书，如风行水流，略无凝滞，而辞义精到，格律高古、浩浩滔滔，如江河注海”。论及高丽文学者，一般常将他和李奎报、李齐贤并提。但实际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稍次于前两人。

高丽晚期诗人及作品皆比前期多，这里，就按作品的内容来分别介绍当时的诗坛概况。

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是那些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对统治阶级进行某种程度揭露的诗歌。

李衍宗所写的《苦寒吟》对于挣扎在严寒中的穷苦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铜壶冻裂响空堂”、“潜身屋底骨若冰”时，

他想到：

丝绵吾身尚如斯，况被蓝缕不掩胫。

愿天火急布阳和，活尽寰中穷百姓。

对穷苦人的悲惨处境写得最具体、生动的是李穀的七言古诗《橡栗歌》。

这首诗长达三十六句，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句到四句）是一个“引子”，先把橡栗提了出来，用讽刺、幽默的语气说明了橡栗对于饥民的“好处”：“橡栗橡栗栗非栗，谁以橡栗为之名？味苦于荼色如炭，疗饥未必输黄精”。

第二部分（第五句到十四句）叙述农民去拾栗的辛苦：“晓起趁取雄鸡声”。一大清早起来，要爬到陡峭的高山悬岩上去才能采得橡栗：“陟彼崔嵬一万仞”。从清晨到夕暮，采到的橡栗不满一箩筐，肚子却早已饿了：“天寒日暮宿空谷，烧柱燃松煮溪籁。夜深霜露满皎肥，男呻女吟苦凄咽”。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得折松枝、舀溪水，煮点野菜充饥，天寒日暮，赶不回家，就露宿空谷之中。

第三部分是作者借老农之口来揭示乡民们生活如此艰难困苦的原因：“近来权势夺民田，标以山川作公案。或于一田田主多，征后还征无间断”。民田被豪门官家夺去，而田主又多，秋后打下的粮食，被一层层的田主一征再征，所剩无几了。再加之水旱灾害，生活就更没有着落了：“或罹水旱年不登，场圃年深草萧索。剥肤椎髓扫地空，官家租税奚由出？”结果是年壮者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老弱则靠拾橡栗度日。

第四部分（第二十九句到三十六句）是叙述作者听到老农倾诉之后的感想，以及对靠吮吸劳动者血汗以自肥的豪门贵族穷奢极欲的愤怒谴责：“君不见：侯家一日食万钱，珍馐星罗五鼎列。驭吏沈酒吐锦茵，肥马厌谷鸣金埒。焉知彼美盘上餐，尽是村翁眼底血”。这首诗为高丽末期的农民与豪门地主的矛盾绘出了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画面。它不但真实地刻画出了农民饥寒交迫的惨

状，还指出了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社会原因——大土地兼并的盛行。这首诗还表明：高丽晚期的社会矛盾比李奎报所处的高丽中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李穀的另一首诗《久雨水涨城中多捕鱼》也表现了他对农村久雨成灾的深切关心。

崔瀣的《三月二十三日雨》为久旱逢雨的庄稼感到喜悦，诗中的"万民落饥坎"、"道路多饿殍"反映出了当时农村凋敝的景象。

李穑的《蚕妇》也是一篇歌颂劳动妇女的诗：

城中蚕妇多，桑叶何其肥。
虽云桑叶少，不见蚕苦饥。
蚕生桑叶足，蚕大桑叶稀。
流汗走朝夕，非缘身上衣。

这首五言诗以其朴素的语言，民间歌谣的风格描写了蚕妇的辛勤劳动，最后两句寓意深刻，指出劳动者享受不到，而剥削者不劳而获，为勤劳的蚕妇鸣不平。

金若水的《题任实公馆》以含蓄的笔法，运用人与禽对比的方式，写出遭受饥荒的乡民的苦况，以自然浅显的诗句表达出无限的同情：

老木荒榛夹古溪，家家犹未饱蔬藜。
山禽不识忧民意，唯向林间自在啼。

吴洵的《观稼亭》借题发挥，叙述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苦劳动，讽刺了君王对民间疾苦的漠不关心：

春耕欲耨夏多热，秋敛未终天已寒。
安得兹亭移辇道，君王一见此艰难。

元天锡的五律《过杨口邑》写出了权贵豪门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变本加厉剥削造成大批农民逃亡的惨状：

破屋鸟相呼，民逃吏亦无。
每年加弊瘼，何日得欢娱？
田属权豪宅，门连暴虐徒。
孑遗殊可惜，辛苦竟何辜？

郑以吾的七绝《次茂丰县壁上韵》中反映的同样也是"权豪宅"和"暴虐徒"掠夺农民土地造成的极不合理的现象，他这首诗用的对比笔法及其诗的风格是和上述金若水的《题任实公馆》类似的：

立锥地尽入侯家，只有溪山属县多。

童稚不知军国事，穿云互答采樵歌。

作者的另一首七绝《送人出守忠州》也描写了农民无地可种，井邑萧条的景象。他在诗中为民请命，要求赴忠州上任者及早想出拯救苦难百姓的办法来。

百姓遭难，使一些正直和具有同情心的诗人注意到当权者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揭露统治者的诗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郑枢所写的五言诗《污吏》：

城中乌飞啼，城下污吏集。

府牒暮夜下，岂辞行露湿。

穷民相歌哭，子夜诛求急。

旧时千丁县，今朝十室邑。

君阍虎豹守，此言无由入。

白驹在空谷，何以得维系？

这首诗写出了污吏之多，犹如鸟雀聚集，"穷民"痛苦难解，唯有号哭。以前人口稠密的地方，如今或死或逃，只剩下了寥寥几户。作者对统治阶级最高代表——君王还是寄以希望的。

另外有一些对官僚贵族表示不满的诗，虽没有直接描写普通百姓遭受的苦难，也多少反映出当时朝政腐败，当权者全不以民情国事为念，一味追名逐利、彼此勾心斗角的丑态。如郑枢的七绝《演福寺》、李縠的七绝《街上望西山》、李崇仁的《行路难用古人韵》、《呜呼岛》等。

统治阶级一方面加深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加剧内部相互倾轧，为了争权夺利，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不惜彼此仇视，相互排挤、陷害。诗人李崇仁的《行路难用古人韵》就描述了当时的这

种情形：

行路难，行路难，我今一鸣君一顾。
平时坦道尽荆棘，白日大都见虎豹。
万虑烧胸肠欲烂，听鸡未禁中夜舞。
明朝出门将安如，水能覆舟山摧车。
君不见：
长安陌上富贵儿，终然不读一卷书。

官僚明争暗斗、陷害忠良的情景令读者一目了然。作者对这些“豹虎”发出了警告：“水能覆舟山摧车”。所谓“水”、“山”即指黎民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就会起来推翻这些暴虐无道的统治者。诗的最后，作者嘲笑了那些荒淫颓废的豪门子弟一个个都是不学无术之徒。“朱门出败子”，这正是当时称霸一时的腐化官僚贵族必将衰亡的征兆。

李崇仁另一首七古《鸣呼岛》以中国秦末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为例，谴责了那些朝秦暮楚，丧失气节的投机分子：“君不见：古今多少轻薄儿，朝为同胞暮为敌！”表现出诗人对这些无耻之徒的厌恶。

在此期间也产生了不少表现爱国思想的诗歌，如罗兴儒的《奉使日本》、韩修的《永慕亭行》、金九容的《乙亥年红贼》、郑枢的《闻倭敌破江华郡达旦不寐作蛙夜鸣以叙怀》、李穑的《高歌》、郑梦周的《奉使日本》和《九城吟》、元天锡的《挽崔莹将军》等。

这些诗篇虽都以爱国为其主题思想，但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其中有的“忠君”思想较浓，而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与人民的利益联系不多；有的则主要是和反侵略斗争有关；有的是身处异国抒发怀念故国之情；有的则是追念爱国的先烈之作。从而它们的思想意义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在高丽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备受异族侵忧和民族意识逐渐高涨时期出现的

作品，程度不等地反映出了当时高丽的国家地位以及高丽文人士大夫的国家观念。

罗兴儒的七绝《奉使日本》表现出使日本时思念故土的心情。诗中包含着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写出了当时冲破惊涛骇浪去日本的艰苦历程，诗最后落脚于岁暮时身处异域的愁思、寂寞和惆怅：

千年古国三韩使，万里洪涛一叶舟。

留滞海东惊岁暮，寂寥山月水明楼。

郑枢的《闻倭敌破江华郡达旦不寐作蛙夜鸣以叙怀》长达四十句，诗中描写了外族侵扰造成的惨祸："城中万家尽坐甲，海上千村生杞荆"。他叹息儒生无力去抵御入侵之倭寇："腐儒空有泪，无力能经营"，但他更憎恨文武官员对国家与人民遭受战祸不闻不问，只顾念图安逸享乐："文恬武嬉莫为虑，我心焉得不悯悯？"他希望有"圣神天子"出现，来扭转乾坤，击退倭寇："安得有手斡天运，坐使群龙洗甲兵"。表面上是寄以希望，实际上责备了国王的无能，一片忧国忧民的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李穑的《高歌》为国家屡遭外患忧心忡忡，抒发了爱国情怀：

独吟又高歌，心中血如何？

皇天与后地，至死矢靡他。

外患似冰雪，消之将奈何。

春风方将兴，白日如飞梭。

哀哀君子心，有泪双滂沱。

郑梦周的五律《奉使日本》、七律《奉使日本》、《旅寓》是他在日本怀念祖国所作。高丽末，倭寇经常侵扰高丽沿海一带，1377年秋郑梦周奉命出使日本，为使祖国安全得到保证，他费尽心力，与日本当局交涉，至翌年夏返回高丽。这两首短短的五言律诗叙述了个人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写出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诗中既有对于景物的生动描写，又有委婉而又幽远的抒情气

息，是高丽爱国诗篇中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比较高的佳作：

生平南与北，心事转蹉跎。
故国海西岸，孤舟天一涯。
梅窗春色早，板屋雨声多。
独坐消长日，那堪苦忆家。　　（《旅寓》）

水国春色动，天涯客未归。
草连千里绿，月共两乡明。
游说黄金尽，思归白发生。
男儿四方志，不独为功名。　（《奉使日本）》

元天锡的三首七律《挽崔将军莹》对于这位扫荡倭寇有功的将军最终遭杀害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诗中以“赫然功业终归朽，确尔忠诚死不灰”对崔莹之死表示惋惜，对其耿耿忠心表示赞扬，以“为从六道默黎望，能致三韩社稷安”高度评价了崔莹的卓著功勋。

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写自然风景的诗，其中有不少描摹朝鲜一些风景优美的胜地，如安轴的七绝《登太白山》、柳淑的五绝《碧澜波》、李穑的五律《浮碧楼》、七绝《骊江迷怀》、金缘的七律《大同江》、郑枢的五律《万景台》、洪侃的七律《上李蒙庵》、《次韵李蒙庵西京怀古八韵》等。

此外的写景及借景抒情的作品有洪侃的《孤雁行》、李藏用的七律《红树》、李瑱的七绝《山居偶题》、郑诵的五绝《江口》、七绝《西江杂兴》三首、李崇仁的五律《新雪》等亦属佳作。

以前时期的汉文诗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不多。传说为崔致远所作的《双女坟》是根据《仙女红袋》的传奇故事而写的。其他的诗人很少以讴歌爱情为主题。可是在高丽晚期却产生了一批爱情诗歌。如郑诵的七言古诗乐府《怨别离》、白元恒的七言诗《白丝吟》、李达衷的五古《闺情》、偰逊的五言诗《拟戍妇捣衣词》五首、郑诵的七绝《梁州客馆别情人》、郑梦周的七绝

《江南曲》与《征妇怨》等。所有这些爱情诗都是以女子的口吻写的，而内容又都是哀怨、愁思，反映出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及家庭中，女子的处境的低下和悲惨的遭遇。加之高丽末期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动荡不宁，不少男子被征入伍，远离家园，使一些征夫和戍边者的妻子长期陷于孤苦无依的境地，这也增加了爱情诗歌中的哀怨色彩。

郑诵的《怨别离》以女子的口吻倾诉她与丈夫远离久别的痛苦。诗中并没有说明别离的原因是什么，一开头讲的是自己年少时节的天真想法："妾年十五娇且痴，见人惜别常发嗤"。离别的痛苦降临到自己身上时，她才懂得："岂知吾生有此恨，青鬓一夜垂霜丝"。短短的四句话，作为全诗的序言。跟着展开的是离别的场面和别后的孤单寂寞。"归程已过康城省，抱琴久立江南湄"、"床头妆镜且不照，那堪更着宴时衣"，写出了思妇的心情。

白元恒的《白丝吟》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叙述了她遭受遗弃的原因和过程。小姑的恶意中伤，使这个女子不但不能为丈夫裁布做衣，还被逐出公婆家门。虽是一个悲剧，但诗的结尾却是充满信心的："白丝一染无白时，弃妾重来当有时"。

李达衷的《闺情》是一个女子对喜新厌旧丈夫的埋怨。诗最后的四句"婉娈能几时，光阴疾于倩。焉知如花人，亦有斯皱面"。是她的预见：这个代替自己而受到丈夫宠爱的女子，一旦年老色衰，也终究逃脱不了和自己一样的命运。

偰逊的《拟戍妇捣衣词》共五首五言古体诗，写戍妇怀念征战在边疆的丈夫，牵肠挂肚地担心丈夫的健康和安全：

皎皎天上月，照此秋夜长。
悲风西北来，蟋蟀鸣我床。
君子远行役，贱妾守空房。
空房不足恨，感子寒无裳。　（《捣衣词》其一）

捣捣闺中练，裁缝如霜雪。

缄题寄边庭，中有泪成血。

妇人得所归，终始惟一节。

云胡妾薄命，与君长相别。　（《捣衣词》其四）

《拟戍妇捣衣词》五首风格与中国汉朝《古诗十九首》十分相象，甚至其中的一些诗句和《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词句都很相近。如《捣衣词》前二首的首句都是“皎皎天上月”或“天上月皎皎”、第三首的头两句“天上月皎皎，中宵入罗帷”和《古诗十九首》末首的头两句“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相似。此外，第五首末两句的“君亮执精忠，妾当死中闺”和《古诗十九首》第八首末两句的“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词句也类似。

不过《捣衣词》反映的却是高丽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作者的语言易懂、简洁而又自然流畅，诗中的感情深挚，表达方法上则十分委婉含蓄。颇有民歌风格。

郑梦周的《江南曲》是写少女嬉戏和怀春情绪的：

江南女儿花插头，笑呼伴侣游芳洲。

荡桨归来日欲暮，鸳鸯双飞无限愁。

全诗上半部分是轻快、明朗的气氛，写少女们活泼、欢快嬉戏的场面，第三句写景是个转折，本身还表示不出什么样的感情。最后一句道出了姑娘们在欢快过去之后的情形：见到鸳鸯之成双成对，想到自己还没有觅到佳偶。一个“愁”字，道出了她们的心思。全诗虽以“愁”结尾，但全诗总的看来，是一支富有民间气息和生活情趣的青春颂歌。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伤今吊古、感慨时事、怀友念旧之作，如李穀的七绝《途中避雨有感》、五律《燕》、李穑的七绝《访密阳先生》、五律《遣怀》、七律《自京师东归》、李崇仁的五律《忆三峰》、七律《秋回》、张仲阳的七律《成川途中》、元天锡的五绝《立春》等。

病里情怀每自悲，苍天肯复管安危。

时时对镜怜黄瘦，事事临机怅白痴。
颇信流光如电影，又惊芳信到花枝。
牢笼物色知无力，驱使由来只小诗。

（李穑《自京师东归》）

行迈靡靡道里延，郊原处处草如烟。
征骖远指新罗域，客路经由故国边。
伐宇虽非松壤日，江山犹是马韩天。
伤心往事凭谁问？风雨前林哭杜鹃。

（张仲阳《成川途中》）

李穑、张仲阳都曾目睹高丽王朝灭亡，李成桂一派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作为高丽的文臣，他们一心忠于旧王朝。上面两首诗的写法不一样：李穑假借自己的病体和花开花落等自然界的变化，来隐隐寄托自己对旧王朝没落衰败的伤感；张仲阳则借怀古来抒发他对高丽灭亡的哀思。

和高句丽、百济、及统一后的新罗不同，高丽王朝始终对中国大陆上的汉人政权宋朝保持友好关系。女真、蒙古对宋朝的侵犯和宋朝国势的减弱，丝毫没有影响高丽对宋的友好态度，加上前一时期王朝对学习汉文化的大力提倡，高丽时期文人士大夫更加重视中国的典籍。于是出现了不少表现朝中友谊、涉及中国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和文化的诗篇。这一方面，在李奎报和李齐贤两位大诗人的诗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高丽晚期的一般诗人作品中，也常出现这样的内容。如崔思齐的五绝《使宋船山》，是作者受高丽王朝派遣到宋途中在船上所作，虽然诗里提到的是关于地理上的远近，却表现出高丽人对中国宋朝的亲近和友好的情谊：

天地可疆界，山河自异同。
君毋谓宋远，回首一帆风。

李穑的七绝《寄圭斋欧阳玄》则表现了高丽诗人与宋朝诗人之间的友谊。欧阳玄（1274—1358）祖籍江西，为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之后，“圭斋”是他的号。他善于词章、通达理学，曾修

《经世大典》，并主要负责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工作。官至翰林学士，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诗人。欧阳玄很早发现李穡的才能，赞叹李穡为天下之异人。李比欧阳小五十四岁，但两人之间交谊甚厚，真可谓“忘年之交”。这首《寄圭斋欧阳玄》中，李穡表示他还铭记着欧阳对他的评价，同时也披肝沥胆地向友人谈自己的心思，可见这一对年龄相差五旬有余的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衣钵当从海外传，圭斋一语尚琅然。
迩来物价皆翔贵，独我文章不值钱。

涉及到中国的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化的有崔瀣的七绝《四皓归汉》、《太公钓周》、李穀的五律《李陵台》、李穡的七绝《黄花诗》、五律《读汉史》、七律《读杜诗》、郑地的五绝《题锦江松亭》、李崇仁的七绝《漂母坟》、《呜呼岛》等等。

许国身何有？成功命不侔。
汉皇虽好武，飞将未封侯。
苦战知无赖，生降亦可羞。
高台衔落日，为尔故迟留。

李穀的这首《李陵台》对汉代李陵的遭遇寄予了同情，其观点和中国封建时期对李陵的一般看法是相同的。

锦里先生岂是贫，桑麻杜曲又回春。
帘钩丸药身无病，画纸敲针意更真。
偶值乱离增节义，肯因衰老损精神。
古今绝唱谁能继？剩馥残膏丐后人。

李穡身处旧王朝没落的乱世，对杜甫忧国伤时、风格沉郁的诗，是很赞赏的。他的这首《读杜诗》对中国唐代诗圣杜甫作了高度的评价，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崇敬。他的七绝《洞庭晚霭》歌唱了中国洞庭湖雄伟壮丽的景致：

一点君山夕照红，阔吞吴楚势无穷。
长风吹上黄昏月，银烛纱笼暗淡中。

第六章　高丽民间国语歌谣

高丽以前的统一新罗时期盛行国语歌谣，出现了以十句体定型诗为代表的被称之为“乡歌”的大量歌谣。虽然保存下来传至今日的不多，但是可以从中了解到乡歌流行的盛况。高丽紧承新罗之后，新罗时期的带有民间色彩的国语歌谣传说及其影响，当然不会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消失，民间歌谣必然会在新罗歌谣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但是，由于高丽时期王朝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鼓励学习汉文典籍和写作汉文诗，文人士大夫也就认识不到发展国语文学的必要性。这一时期内，虽然有李齐贤这样的诗人用汉文翻译了民间国语诗歌，有郑叙这样的失意文臣用本国语言唱出了满腹牢骚，甚至还有些文人创作出了《翰林别曲》这样的长歌和象时调那样的短歌，但是文人国语作品的数量和汉文诗无法相比。

对国语文学——尤其是民间国语文学的忽视，导致大量的民间歌谣失传。四五百年的高丽文学遗产之中，我们只能从李齐贤的文集、《高丽史》和李朝的一些乐歌文献上发现为数不多的高丽民间歌谣，有的只见歌名而不知其详细内容，有的则只有汉文的译文而难以了解其国语原貌。基本上按原貌保存下来的只不过寥寥十篇左右。这幸存下来的寥若晨星的国语诗歌，已成了高丽文学史上的珍品。

第一节　民间歌谣汉译诗

高丽时期由武臣之乱起，政治上常常动荡不安。外族的入侵，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及官僚的腐化，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民谣

有时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些状况，因其政治色彩很浓，就被文人、史家搜集起来，以汉文形式载入一些文献之中。这些民谣是作为说明当时政界情况的一种材料，而不是作为受到重视的文学作品被保存下来的。

《东国通鉴》、《文献备考》、《高丽史》、《东阁杂记》中的《普贤刹谣》、《瓠木谣》、《墨册谣》、《阿也歌》、《牛大吼谣》就属于这类民谣。

《普贤刹谣》是表现武臣之乱的一首民谣。高丽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八月，国王去开京近郊寺院普贤刹游乐。武将郑仲夫、李义方和李高等人趁机调动开京的军队，包围普贤刹，把随国王前去的文臣、内侍全部杀死，随即又返回开京杀害了大小文官多人。毅宗被废黜，其弟明宗即位，武将趁得势之机，窃居高位，瓜分了文臣的财产，并取代先前的文臣，对人民进行统治和压迫。

收于《东国通鉴》卷二十五中的《普贤刹谣》表明了人民对王朝统治者的这场内讧的态度：

何处是？普贤刹！
随此尽，同刀杀！

不论是文官掌权还是武将执政，对老百姓都一样是灾难。这首民谣是对两类官僚发出的诅咒。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以免百姓遭殃。

《墨册谣》载于《文献备考》中的《象纬考》：

用综布，作都目。
政事——真墨册。
我欲油，
今年麻子少。
噫！不得。

高丽二十七代忠肃王时期，贪官金之镜不是任人唯德才，而是根据所受贿赂的多寡来决定所任命的官职的高低。官吏的花名册因此常有变动。名字与官职，涂了又改，败了又涂，名册被涂

得乱七八糟，成了个黑墨册。民谣嘲弄道：干脆让我们把这个黑墨册油它一油，好叫你再也涂改不了。可是，要油的墨册实在太多了，今年产的麻子太少，没那么多油，真是毫无办法！对贪污行贿、卖官鬻爵作了极为辛辣的嘲讽。

《阿也歌》是载于《文献备考》的《象纬考》上的另一首民谣：

阿也，麻古之那。

从今去，何时来。

据《东国通鉴》解释：忠惠王死于元朝的岳阳县。因为他素不得人心，死迅传来，高丽国内不以为意。据说，忠惠王活着的时候，宫内宫外就曾经流传着这首民谣。忠惠王一死，就有人把这民谣的原文本义揭示了出来：

岳阳，亡故之难。

今日去，无时还！

其实，这首民谣未必作于忠惠王死以前，很可能是作于他死以后，却假托他在世时所作，用以避免官府的追究。忠惠王置高丽的利益于不顾，对元朝一味卑躬屈膝，招致了人民的不满。这首民谣就是对他的诅咒，反映出人民憎恨他的情绪。

《牛大吼》也是人民对王室腐败表示不满的民谣：

牛大吼。

龙离海，浅水弄清波。

恭愍王十年（1361年）高丽两度遭外族入侵，朝廷未作抵抗就弃开京而逃往庆尚道。在百姓遭殃、国家蒙难的情况下，恭愍王不思御敌救民，却去映湖楼乘船游览，引得湖岸上观者如堵。人们对这种行径表示愤慨，乃作此谣以讽刺之。（当年为辛丑年，丑即牛）"牛大吼"指的是在辛丑年异族入侵扰高丽。"龙离海"指的是国王逃离京城。"浅水弄清波"说的是国王置国难于不顾，逃到了这个小地方，还要驾舟游览，犹如龙已离开大海却仍醉生梦死，到浅水池中来嬉戏。这种生动的比喻刻画出高丽

王室的腐败。

以上这些民谣内容都和王朝政事中的消极不良现象有关。其中有假托为事件发生以前所作的，以此作为凶事的预言，因之有“谶谣”之称。

文学色彩较浓的民歌是由李齐贤译成汉文的“小乐府”。不论是从“小乐府”的内容还是从其汉译诗的技巧水平来看，都比上述“谶谣”一类的民谣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首先看一看揭露剥削者的民歌《沙里花》：

黄雀何方来去飞？一年农事不曾知。

鳏翁独自耕耘了，耗尽田中禾黍为？

这首民歌讲的是黄雀，责备它对农事一无所知，只知道飞来飞去在田里寻找吃的。孤苦无依、白发苍苍的庄稼汉辛苦一年种出的粮食，却被这些可恨的黄雀吃个干净。“黄雀”实际上是指地主、衙门官吏等剥削者，鳏翁则分明是普通农民的代表。

《长岩》则是对官迷的讽刺：

拘拘有雀尔奚为？触着网罗黄口儿。

眼孔元来在何许？可怜触网雀儿痴！

此歌作者为长岩地方的一位老人。他曾对一个遭受贬谪的名叫杜英哲的人说，为官不是一条好路，劝他今后再也不要进官场了。杜被释后没有听从老人的话，又挤入官界，不久又遭贬谪。这首诗就是老人为嘲弄他而作的。歌中所借用的形象也是“黄雀”，虽然和《沙里花》中的黄雀处境和行为不同，但同样也是指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这首歌虽说的是杜某，但实际上反映出当时高丽王朝官场上的彼此倾轧的丑态。

再看表现爱情的民歌《居士恋》、《济危宝》、《西京别曲》。

鹊儿篱际噪花枝，蟢子床头引网丝。

余美归来应未远，精神早已报人知。

鹊儿噪鸣，蟢子结网，民间认为这都是有喜事的预兆。一个士兵的妻子在思夫心切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好兆头，当然喜不自胜。

这首民歌题名为《居士恋》，道出了许许多多被追服役的征人之妇的心理状态和愿望。

题名为《济危宝》的一首民歌，则是一个纯朴的姑娘所唱的恋歌：

浣纱溪上傍垂杨，执手论心白马郎。

纵有连朝三月雨，指头何忍洗余香？

《高丽史·乐志》认为这首民歌是表现女子拒绝轻薄男子的调戏而作的歌。《高丽史·乐志》的这种解释完全是一种曲解。这首民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一个少女在溪边浣纱，她的情人骑着白马来到她身边，两人手挽手诉说彼此的爱慕之情。被对方紧握过的手上余香不散，在心头留下了甜蜜和温馨的回忆，即使接连下雨三个月，也不愿让雨水冲走指头上的余香。歌中简炼地写出了事情发生的背景和情节的片断，更着重写姑娘以永远保存指头的余香来表达对意中人的深情。

民歌《西京别曲》是分节歌，它的原文流传至李朝，被记录于《乐章歌词》之中，保留至今。李齐贤把其中的一节译成汉诗：

纵然岩石落珠玑，缨缕固应无断时。

与郎千载相离别，一点丹心何改移？

即便珠子散落，缨缕却不会断。即便与郎君离别，自己也不会变心。弱女子的一片痴情经过李齐贤的笔，跃然纸上。对照原文，更可看出李译诗忠于原文和高超的翻译技巧。

民歌《少年行》描写农村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在菜花田里追扑蝴蝶、玩耍嬉戏的情形，充满了生活气息：

脱却春衣挂一肩，呼朋去入菜花田。

东驰西走追蝴蝶，昨日嬉游尚宛然。

第二节　国语歌谣

高丽歌谣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漫长过程中，有些歌谣以其富于

音乐性而曾被采入王宫中。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朝鲜文字，这些歌谣只能靠口传而得以保存。一四四三年创造了朝鲜语的文字之后，十五世纪末叶，成俔编纂了《乐学规范》，其后约八十年，即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朴浚又编成了《乐章歌词》。这两本主要论述当时朝鲜乐歌的书，虽然都用汉文写成，却用朝鲜文字把一些长期盛行不衰的民歌记录了下来。收入《乐学规范》的民歌有《动动》（咚咚）、《井邑词》、《处容歌》等，收入《乐章歌词》的有《青山别曲》、《西京别曲》、《思母曲》、《双花店》、《别离》等。现在分别对其中一些主要的民歌作些介绍。

《思母曲》，这是因丧母，或因其父休妻而失母，只能跟随父亲过活的人所作的。作者姓名不详。

尽管小锄也有刃，
它总不如镰刀快。
双亲中尽管有爹在，
吁，登嘟咚甸，
可他不如妈慈爱。
休，休，休，
他总不如妈慈爱！

犹如口语，非常率真朴素。把妈比为镰刀，把爹比为小锄，只有那手中日日不离农具的庄稼人才能使用这种比喻。在保存下来的高丽民歌之中，这是唯一的一首歌颂母爱的歌谣，也是最富有劳动人民纯真感情、乡村泥土气息最浓郁的作品。

民歌中表现爱情的较多。《别离》是其中的一曲：

别离，别离，为什么要别离？
丢下我这孤单身，
你怎能忍心离去？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丢下我这孤单身哪，

你叫我怎的过下去？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多么不愿放你走呀，
可又怕你发脾气！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含泪送走你，我呀我——
只望你去去就归还，
快回到我这里来！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这首歌谣感情极其真挚，语言朴素，就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在丈夫离家以前对他的叮咛嘱咐。她不愿丈夫离开自己身边，象是担心他的安全，又象担心会变心；想留住他，又怕惹恼了他，放他走，又不知何时能回来。话语不多，但坦率真诚。

《西京别曲》是一首分节歌，也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但是比《别离》要长得多，感情也复杂些，以其中的几段为例：

颗颗珍珠啊，
珠粒落在石头上！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珠线呀，
珠线哪能断脱啊？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千年呀，
纵然别离一千年——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情义啊，
情义绵绵怎能断绝啊？

吁，嘟欧弄句，大弄的里。

《西京别曲》中的这一部分，被李齐贤译成汉文诗，可见此曲在十四世纪以前——最晚也在十四世纪初就产生了。

全曲共分十四小节，按意思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大段落：

第一段落由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在西京送走心上人时自己的忧伤、惆怅。其中虽有愿丢下纺织机随郎远游之句，也是表示自己恨别离、不愿爱人远行的意思。但又似乎感到实际上做不到。

第二段落由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海誓山盟，表示自己永不变心。言下之意是希望对方也不要变心。李齐贤所译的正是这一段。

第三段落由第九节至第十二节是在眼望着心上人乘舟离岸逐渐远去，心情激动时发出的呼喊。

第四段落包括第十三、十四两节，是在郎君船已远去，不复可见的情况下，陡然产生的疑惧：害怕男子另觅新欢。

从歌谣的内容上看，主人公是一位主妇，她从事纺织。她的忧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男子可以不忠于自己的妻子，可以随便寻花问柳，甚至可以任意抛弃他曾经爱过的女子，而女子却只能听天由命。以爱情为主题的歌谣中表达离愁别恨的往往是女子，正说明了这点。这首《西京别曲》和上述的《别离》与另一首歌谣《动动》一样，都是以女子的离愁、思念、疑惧为主要内容的。

《动动》应译为《咚咚》，即以鼓伴奏声，是舞蹈时唱的一种歌。其内容也是有关爱情的。但它比《西京别曲》更复杂。它以一年十二个月为序，按月分节，全首歌把一个女子的出生、恋爱、结合、欢乐、被遗弃和又被别的男子看中、玩弄等过程全部叙述了一遍。和《西京别曲》、《别离》一样，它在每个分节最后也都有一种无具体含义而又有助于加强音乐性的副歌，只不过这里的副歌几乎全是摹仿鼓声而已。

在歌谣正文开始以前，有类似序文的一节：

把德堆得高高的捧出，
把福装得满满的献上。
载德又载福，
载歌又载舞，
啊欧，咚咚达里！

接着就是正月的月令了，在这一年开头的一个月里，作者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出生：

正月里来呀小河水，
啊，冻了又化开。
孤单单的我这身子呀，
生到这世上来。
啊欧，咚咚达里！

看来，这个女子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上层家庭。所谓“孤单”，远不是独生女的意思，而是孤苦无依的意思。女子出身微贱，从她后面叙述的一连串遭遇中可看出这一点。

三月份说的是少女的容貌，到了四月份就是青春少女在怀春了。她所爱的对象是录事：

四月里来不能忘，
啊，展翅回飞的莺儿你别忙！
为的是啥事情呀，
录事郎儿呀——他偏偏把我忘！
啊欧，咚咚达里。

“录事”是地位低下的小吏。这少女心之所思，情之所钟的不过是这样的人，可见，女子本身社会地位也不会高，录事也不把她的爱慕放在心上。

五月份叙述的是女子在端阳节捧上酒递给录事，祝他长命百岁，说明他们已经结合了，或至少是暂时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六月份，女子就被遗弃了：

六月哪六月，

象把梳子呀，被扔在了峭壁旁。

郎君不再把我看，

我追也追不上。（副歌略）

七月里是这个遭遗弃的女子在祝愿她能和情郎团圆。她准备了不少吃的东西，把粮食和水果堆得满满的，看着这些丰美的食品，她一心希望和心上人在一起享受它。

八月里，男子回到女子身边，两人在一起过了个欢乐愉快的中秋佳节。

九月一节讲的是九九重阳节这一天的民间泡菊花酒的风俗，感叹季节已晚了。接着在十月这一节中女子自比为被削成片的木果。木果被折下后扔掉，却没有人把它捡起来。意思是自己终于被男子抛弃了。

十一月一节中，则是表现她被抛弃后的凄凉和颓丧：

十一月里来呀睡土阶，

啊，只有件单薄的汗衫身上盖！

我心多悲哀。

俊美的郎君呀，

他不再把我来理睬。（副歌略）

"土阶"是朝鲜房屋门外用泥土砌成的台阶。十一月天已寒冷，睡在土阶而不进屋去，表示女子遭弃后的潦倒和悲伤。

到了十二月，女子仍未忘怀旧日的情人，久等仍不见郎君来，却被别的男子来占有了。

《动动》表现的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心地纯洁善良、感情执着的妇女的悲剧。她的哀怨情绪是受害者对以男性为中心、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控诉。它有抒情成分，也有叙事成分，或者说是寓抒情于叙事。这也正是它与抒情诗《别离》及《西京别曲》大不相同的地方。

这篇民间的叙事诗中，含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高丽时代的民族风俗习惯。副歌部分除去"啊欧"这样

的感叹词以外，全是击鼓而“咚咚”和敲鼓沿“哒哒”声，朗读起来使人如闻鼓声，如见身背长鼓的舞者的婀娜舞姿。

这首民歌由于民族特点鲜明、音乐节奏感强，在民间广泛流传，从而受到了高丽统治阶级的注意，并被吸收到宫中，成为舞歌之一。《高丽史》的《乐志》中提到了它：“动动之戏，其歌词多有颂祷之词，盖效仙语而为之，然词俚不载”。

关于《动动》的舞蹈，同书记载道：“动动：舞队乐官及妓，衣冠行次如前仪……妓二人先出，向北分左右立，敛手足，蹈而拜，俯伏兴跪，奉牙拍，唱动动词……”

《高丽史》所说的“颂祷”，是对原诗的一种曲解。《动动》中并非无祝愿、祷告之语，如祝心爱的男子长寿，祝愿与郎君团圆等等，但总的来说，都以哀怨为主。至于第一节序文中的“德”、“福”一类的颂语，很可能为宫中乐队所加，用以取悦于王公贵人，即使它为原诗所固有，那也不过是一种“吉利话”而已。《高丽史》作者为了使这首已成为宫中乐歌的歌谣为王室歌功颂德，光说它是“颂祷之词”，显然抹煞了全诗的基本主题思想。

《高丽史》还记载着，侍中柳濯镇守全罗的时候，打败入侵骚扰的倭寇，士兵们唱这首歌庆祝胜利，可见这首民歌流行之广及其为人民喜爱的程度。

以男女关系为主题的歌谣还有载于《乐章歌词》的《双花店》。这首歌谣与上述《别离》、《西京别曲》、《动动》不同，它表现的主要不是爱情，而是打情骂俏。歌的内容是说回回老头、寺院的主持人、井边的“龙”（可能指地头蛇一类人物）及酒店老板调戏一女子，而她也就答应和他们过夜。此歌内容庸俗淫猥，在客观上暴露出了高丽封建社会内剥削者的腐化生活、淫靡之风，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一定意义。

高丽歌谣中有一首歌谣名为《青山别曲》，它的主题思想比较隐晦，作者的阶级和社会身份不十分明确。但由于它的音律整齐严谨，音韵优美动听而十分流行，在歌谣中是很引人注目

的。

《青山别曲》载于《乐章歌词》。它和其它民歌一样，是分节歌，共分八节。每节最后是无具体含意的副歌，以烘托音乐的气氛。

这八节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节：作者希望离开家园，到青山里去过活，以吃山葡萄、藤梨为生。

第二节：在深山中，听到群鸟的啼鸣，作者想起自己的处境，深感自己比群鸟更不如，于是也伤心痛哭（朝鲜语鸟之“啼”与人之“哭”是同一个词）。

第三节：群鸟飞去了。作者手执着钝旧农具，迷惘地望着远逝的群鸟，不禁茫然若失。

第四节：作者感到孤寂难熬。白天犹可，夜晚尤甚，既无来访者，也无可去处，实在寂寞。

第五节：不知道从何方飞来了石子，也不知道这石子是向何人投掷过来的。感到自己既无人恨，又无人爱。自己竟被石子打中，不禁悲从中来。

第六节：山里似乎也生活不下去了，就想去海边靠采海藻、捡牡蛎过活。

第七段：作者边向前走边倾听，仿佛听到了一头鹿爬到了桅杆上去弹琴。

第八段：发现了一个酒缸子，盛着酒，酒性虽烈，没奈何还是喝了。

以上就是《青山别曲》全歌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是有伤心事的。先去青山，后至海边，靠野生动植物为生，都是出于无奈。还可以看出，作者是愤懑不平的。所谓鹿爬到桅杆上去弹琴，似乎是讽刺那些不配居于高位的，不称职的庸人。而喝烈性酒一节，可能是受人惩罚，也可能是自我惩罚或借酒浇愁。总之，这是一首走投无路的落魄者的悲歌。

由于没有文献资料可以作确切的考证，对《青山别曲》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这是失恋者的悲歌，有的认为这是土地财产被剥夺、无以为生的流浪者之歌，有的则认为这是政治中的失败者或宦途中的失意者之歌。

如果不拘泥于这首歌的个别段落，或个别字句，而是着眼于歌的整个内容和风格及语言，可以说第三种意见较为接近事实。

整个的内容是：作者不仅被迫隐居青山，而且仇敌还在继续迫害他，往日来往的人也和他断绝了关系。歌中巧妙的比喻，讽刺的手法、语言的简洁、音节字数的严整、节奏的匀称、音韵的优美以及表达感情的细腻手法等等，都不是朴素、粗犷、直率的一般民歌所具有的。可以断定：作者是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在政争失败之后，为免遭敌手迫害而隐遁起来，采用民歌形式，作此歌以宣泄胸中的郁闷、不满和悲哀。

在国语民歌盛行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采取国语歌谣形式抒发感情是有先例的，如《郑瓜亭曲》及以后出现的《翰林别曲》。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另有专章叙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山别曲》未尝不可以列入“文人国语诗歌”中去论述。但由于毕竟其作者佚名，身份无法具体说明，而且此歌又长期流传于民间，一直被当作民歌来看待，就将它放在本节中叙述了。

以上介绍了高丽民歌中以汉文形式或以朝鲜文字记录保存下来的一些作品，但另有相当数量的民歌却只留下了歌名，国语记录和汉译文都没有。根据《高丽史·乐志》记载，歌词失传的民歌作者有船夫、军士，也有杨州、开京、长湍等地的普通百姓。为了使读者能对高丽民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里把《高丽史·乐志》中提到的歌词失传的民歌按原有的提法择列于下：

大同江：作者不明

杨州：杨州人民作

月精花：晋州人作

长湍：长湍人民作
定山：定山县人作
元兴：元兴县船人妻作
金刚城：开京人民作
长生浦：军士作
松山：作者不明
礼成江：礼成江船人妻作

这一统计并不完整，此外，连歌名也失传了的民歌可能为数相当可观。但仅仅从以上所介绍的民歌情况来看，可以大体上了解高丽民歌的内容、面目与风貌。高丽民歌，继承了新罗十句体定型诗的形式与传统，并对高丽本朝文人国语诗歌——时调和李朝时期歌辞产生了影响，在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是朝鲜古代文学史上最富民族特色的宝贵遗产之一。

第七章 高丽文人国语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当时还没有本民族语的文字，朝鲜古代文人只能利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所写诗歌主要是五、七言诗。但是朝鲜自古以来民间歌谣就较为发达，这些歌谣是以朝鲜民族语言创作的，它们靠口传流行于当时和传唱至后世。其中极少数被用乡扎标记法记录下来，或被译成汉文保存至今，而绝大部分则在口传过程中，因时过境迁，年代久远，而逐渐湮灭失传。这类情况，已在本书前部分中，有所叙述。

这些口传的朝鲜国语歌谣，对于一些上层人物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早在三国时代的新罗和统一后的新罗，就出现了若干花郎、僧人利用民间歌谣的形式所创作的一些诗歌（新罗乡歌）。在高丽初期，僧人均如（917—973）以同样的形式创作了十一首宣传佛教的诗歌。之后，睿宗（1106—1122在位）创作了《悼二将歌》和《伐谷鸟》；十二世纪士大夫郑叙创作了《郑瓜亭曲》。虽然由上层人物创作了这样一些朝鲜国语诗歌，但是以国语创作诗歌的风气还没有在文人士大夫中普遍形成。同时，除了十句体定型诗这种体裁以外，也还没有创造出其他固定的体裁来。

一直到十三世纪才开始出现较多的文人国语诗歌。

起初产生的是一种长歌体裁，即《翰林别曲》体，到了十四世纪，文人以朝鲜国语创作诗歌的风气更为盛行，产生了短歌的体裁，即时调，从而为李朝时期文人国语诗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以下把高丽时期文人国语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加以介

绍，即：

一、酝酿阶段

二、尝试阶段——《翰林别曲》体的产生

三、形成阶段

第一节　文人国语诗歌的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是从十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在这二百年左右期间，上层人物创作的国语诗歌本来就很少，流传下来的也只有寥寥十几首，即僧人均如的十一首《普贤十种愿王歌》、睿宗的《悼二将歌》、郑叙的《郑瓜亭曲》。

均如是十世纪人，出生于新罗第五十三代神德王六年（917年），是高丽王朝初期的名僧，被封为“大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地位很高。当时新罗灭亡不久，新罗盛行的十句体定型诗——乡歌体裁仍然是为人们习惯的一种体裁。为了更有效的普及、宣传佛教思想，均如以这种体裁创作了颂扬佛教思想的十一首歌，即《礼敬诸佛歌》、《称赞如来歌》、《广修供养歌》、《忏悔业障歌》、《随喜功德歌》、《请转法轮歌》、《请佛住世歌》，《常随佛学歌》，《恒顺众生歌》、《普皆迴向歌》、《总结无尽歌》，总称之为《普贤十种愿王歌》。这些诗歌以当时通用的汉字标记法——乡扎标记法，记入十一世纪赫连挺的《均如传》之中。关于作这些佛教歌的动机，均如在自序中说：

> 夫词脑者世人戏乐之具，愿行者菩萨修行之枢。故得涉浅归深，从近至远。不凭世道，无引劣根之由；非寄陋言，莫现普因之路。今托易知之近事，还会难思之远宗，依二五大愿之文，课十一荒歌之句。惭极于众人之眼，冀符于诸佛之心。

他这里所说的作佛教歌的动机并不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

把“词脑”，即以十句体定型诗为其体裁的乡歌称之为“世人戏乐之具”，并且认为用它来作佛教歌就可以“涉浅归深，从近至远”，“非寄陋言，莫现普因之路”。可见，当时十句体定型诗的体裁在社会上是为群众喜爱的并且也是普及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层人物对国语诗歌采取的卑视的态度：尽管均如认为必须利用这种国语歌谣的形式，但他还是把它称之为“陋言”。

均如的佛教歌和新罗时代的佛教歌（如《祭亡妹歌》、《盲儿得眼歌》）有所不同，它们不是祈求某一具体愿望的实现，而是就佛教的抽象哲理进行说教。例如在《随喜功德歌》中就着重说明了“一如”的思想，即所谓“生死一如”、“喜悲一如”、“善恶一如”等思想。

均如采用这种通俗形式宣传佛教思想的结果，是吸引了更多的善男信女来信佛、拜佛。据载，沙平郡某人，长期患病，三年不愈，求医无效，后向均如学习此种“愿王歌”，坚持诵读，感动神人，病果然痊愈。此事虽属虚妄，但当时均如此种乡歌普及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均如的乡歌由他同时代人崔行归译成汉文诗，如《忏悔业障歌》：

自从无始劫初中，三毒成来罪几重。
若此恶缘元有相，尽诸空界不能容。
思量业障堪惆怅，罄竭丹诚岂堕慵。
今愿忏除持净戒，永离尘染似青松。

从形式上看，均如的乡歌比其前一阶段——新罗的乡歌更为整齐、成熟，更多地使用了三音节和四音节。对研究古代朝鲜国语诗歌体裁发展中音节数的变化，是一种珍贵的资料。

在均如作乡歌之后约半个世纪，即在一一二〇年，高丽第十六代王睿宗用朝鲜国语作了两首诗，即《悼二将歌》和《伐谷鸟》。前者以“吏读”形式记入《壮节公遗事》之中，得以保存下来。后者只见于《高丽史》、《乐志》中的记载，原文失传。

《悼二将歌》是由睿宗作来用以悼念两位开国功臣的。新罗末期，王建（高丽太祖）和后百济的甄萱在大丘等地方打过仗。某次战斗中，王建失败，性命岌岌可危。此时，他部下的一名将军因长得和王建相象，就换穿王建的衣服，与另一位将军金乐一同向前冲杀，王建遂得以隐藏于丛林之中。二将战死，而王建得救。后来，睿宗在西京所举行的八关会上看到表演两位将军的事迹的假面剧（一说人形剧），大为感动，乃作此歌悼念之。

《高丽史》的《睿宗条》中附有此诗的汉译文：

见二功臣象，泛滥有所思。

公山纵寂寞，平壤事留遗。

忠义明千古，死生难一时。

为君跻白刃，从此保王基。

睿宗作此歌的目的是借表彰两位大臣鼓励臣下仿效他们，效忠于自己，以巩固王朝的统治。

从形式上看，《悼二将歌》既不属于十句体定型诗，也不是有副歌的分节歌。在断句和句数的计算上，存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是六句的，有人则认为是七句的，还有人认为是八句的，也有人认为是九句的，这里按八句来处理它。它可能是受十句定型诗的影响省去了感叹词“啊欧”后面的两句，但也可能是直接按照无分节、无副歌的高丽民歌形式而作的。

睿宗还作过一首国语歌谣《伐谷鸟》，《高丽史》的《乐志》上说到他作此歌的目的时，实际上也透露出了它的内容：

伐谷鸟之善鸣者也。睿宗欲闻已过，时政得失，广开言路，犹恐群下不言，作歌以讽喻之也。

由此看来，此歌比《悼二将歌》的内容要积极一些。此歌在歌人中传唱很久。死于高丽第十八代王毅宗时期（1151年）的金富轼曾有诗记叙他听歌人唱此诗的感想：“佳人犹唱旧歌词，布谷飞来枥树稀，还似霓裳羽衣曲，开元遗老泪沾衣”。可惜此歌失传。

大约在睿宗作这两首歌约半个世纪后，毅宗时的内侍郎中郑叙作了一首歌，名为《郑瓜亭曲》。郑叙为仁宗外戚，颇受仁宗宠爱。毅宗即位后，他失宠被遣送回故乡东莱。郑归故乡日久，不见召回的王命，遂作此曲以寄托愁绪：

思君念君，终日以泪洗面，

犹如杜鹃之悲啼。

谁伪谁真（啊欧）

惟有残月晓星能知！

我魂愿与君为伴（啊欧）

何人又曾为我所依？

既未得罪，又无过失，

却与我情断义绝。

伤心哪（啊欧）

君竟就此把我忘怀？

莫如此，望君顾念旧情，与我亲近！

这首歌受到高丽王朝统治层的重视，被称之为“忠臣恋君之词”，王朝要求每个臣子都学会唱它。从思想内容上看，这是一首对君王个人表示忠诚，抒发个人宦途失意心情要求重新起用的歌，思想上并无可取之处。但是，由于朝鲜语中的“yim”（或Nim）和中国的“君”词义相同，即既可指君王，也可用以作为妇女对心上人的称呼，而歌的词句与情调上又十分象弃妇思夫，所以它后来逐渐被当成情歌广泛流传，成了歌人爱唱之曲。

《郑瓜亭曲》共十一句。可以说是十句体定型诗的变种。十句体定型诗共分为两大部分，即以感叹词“啊欧”为分界线，以前八句为一大段，以后两句为一大段。这后一段意思上常有概括前部分的性质。这里的《郑瓜亭曲》最后两句“君竟就此把我忘怀？”及“莫如此，望君顾念旧情与我亲近！”含义上也有这种总括，如果把第九行的“伤心哪”合并到第八句中去，也并无不自然之处。这样一来，就完全是十句体诗了，和均如所继承的乡歌

形式基本相同。只是在《郑瓜亭曲》中前部分有两处加了感叹词“啊欧”，小段分法和音节数与均如乡歌有所差别。这表明它是十句体定型诗在高丽中期的一种发展，也说明朝鲜国语诗歌体裁，由于语言结构的特点和汉语结构不同，其音节不可能象汉文五、七言律诗绝句那样固定、严格。

国语诗歌有“通俗”的特点，易于为民间所接受，又可以传唱，因此，均如、睿宗、郑叙这样的上层人物尽管作歌的动机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国语歌谣体裁。虽然在从均如乡歌到《郑瓜亭曲》的约二百年期间，在上层中也只出现寥寥数首国语诗歌，但说明它已为以汉文为正统文字的上层人物所注意了。

从文人国语诗歌的长远的发展过程看来，这二百年实质上是一个酝酿阶段。

第二节 尝试阶段——《翰林别曲》体的产生

高丽高宗(1214—1259)时，朝鲜国语诗歌的创作进入了尝试阶段。一次翰林院内的一些儒学者聚集在一起饮酒赋诗。他们虽然饱读汉文诗文，这一次吟的却不是五言、七言诗，而是夹杂着不少汉字的朝鲜国语歌谣体诗歌。因为没有朝鲜文字可以将它写出，就由每人口头各赋一段，合成为一首长达八段的长诗。因为作者多为翰林学士，这首长诗也就叫《翰林别曲》，其后用汉字记录下来，收于《乐章歌词》之中：

元淳文、仁老诗、公老四六，
李正言、陈翰林、双韵走笔，
冲基对策，光钧经义，良镜诗赋。
吁，此试场光景毕竟如何？
琴学士、玉笋门生，
琴学士、玉笋门生，

加上我自身，总共几位？[1]

这是第一段。其中提到的都是高丽有名的文人学者，如“元淳”指俞元淳（俞升旦），他是文章妙手。“仁老”指李仁老，他以诗著称。“公老”指李公老，他以善写四六文著名，都是有名望的文人学士。这是写科举场面。

再看第五段：

红牡丹、白牡丹、丁红牡丹，
红芍药、白芍药、丁红芍药，
御榴玉梅，黄紫蔷薇、芷芝冬柏。
吁，相间开放之景致毕竟如何？
夹竹桃花，艳丽的两盆，
吁，其相映成趣之景毕竟如何？

这一段是歌唱百花齐放时的优美景色，表现赏花之乐。

此外，第二段是写读书之乐的，其中提到《老子》，《庄子》、《李白集》等。第三段叙述欣赏书法和写字之乐，其中提到颜真卿等人的书法。第四段是描绘饮酒的场面，提到了不少名酒。第六段写欣赏音乐之乐。第七段写蓬莱、方丈、瀛州三山之景。第八段写女子打秋千。

每段诗中，第一、二、三行一般都是汉字，只有第四行和最后一行多半是朝鲜语。

即便诗中的大部分是汉字词，它的整个结构却是朝鲜国语歌谣式的。就现代朝鲜语而言，汉字词所占的分量也是很大的，有的文章中甚至可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汉字词在有的文章里已融合于朝语之中，所以，不能因为《翰林别曲》中汉字词特别多，就说它是汉文诗。

《翰林别曲》作于武臣当权时期，不少文人受排挤，牢骚满腹，郁郁不得志，在对政界绝望之余，就采取了逃避和超脱现

---

[1] 加重点的句子原为朝语，此处为汉文译文，未加重点的，本来就是汉文。

实，以饮酒宴乐、吟诗作赋、寄兴山水自娱。这是一种颓废消极的态度。《翰林别曲》中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人生观，思想内容并无可取之处。但是从文人国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上看，《翰林别曲》的创作表明文人在汉诗文以外另求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形式，并在这种探求过程中，将民间歌谣作为出路。《翰林别曲》的作者以他们的文字游戏为民间口头文学——国语诗歌和文人的书面的汉文文学相结合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在《翰林别曲》以后，一些文人模仿它写了一些类似的作品，形成了被称之为“翰林别曲体”的新的诗歌体裁。由于它每段末尾都有“景几如何”（即“其景毕竟如何”的意思），它亦被称为“景几如何体”。

《翰林别曲》在形式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比以前的一些国语民歌如《井邑词》、《西京别曲》、《思母曲》、《动动》等，它有着更加严格整齐的音节数，如第一段开始部的音节数为：3、3、4／3、3、4／4、4、4；

结尾部的音节数为4、4／4、4；

第三段开始部的音节数为3、3、4／3、3、4／3、3、4；

结尾部的音节数为4、4

各段基本上都是这样排列的。这种“3、4”调，也是民歌的惯用音节调，只是翰林别曲更加严格而已。

二、它和多数民歌如《西京别曲》、《动动》等一样是分节歌，每节尾部为副歌。但它的副歌并不是没有具体意思的声音，而是表示“……毕竟如何？”等。

三、诗中的汉字非常多，表明身为士大夫阶层的作者所受的汉语熏陶之深，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汉诗的影响，却有意无意地开始试着摆脱它了。

《翰林别曲》在文人士大夫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忠肃王十七年（1330年）时出现了安轴（1248—1348）所写的《关东别曲》和《竹溪别曲》，主要写景，如《竹溪别曲》的第二段：

宿水楼，福田台，僧林亭子。
草庵洞，郁锦溪，聚远楼上。
半醉半醒，红白花开，山雨里良。
为，游兴，景几何如？
高阳酒徒，珠履三千，
为，携手相从，景几何如？

以上是其原文，收录于安轴的《谨斋集》中，当时还没有朝鲜文字，诗中的一些本系朝鲜语的部分，被译成汉文表达出来了。“良”是表示“在”的意思，“为”是表示感叹“吁”，“儿”表示“这个”或“它”的意思。

竹溪是顺兴的一条溪流，安轴的祖先曾住于此，安轴作此诗描写该溪流的景致。

另一首诗《关东别曲》是安轴任江陵道存抚使期间在关东各地巡游时所作，写的是关东一带的胜景。

由《翰林别曲》到《关东》、《竹溪》两个别曲经历了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说明“翰林别曲体”是有一定生命力的。这一阶段标志着高丽文人在尝试中已探索出了一种文人国语歌谣体裁，直到高丽末和李朝初，都有人以《翰林别曲》体创作诗歌，如权近（1352—1409）的《霜台别曲》、卞季良（1369—1430）的《华山别曲》、《乐章歌词》所载的作者不明的《儒林歌》、《五伦歌》、《宴兄弟曲》等等。

尽管翰林别曲体这种体裁仍有很重的汉文诗痕迹，但由于它是民间口头国语文学和文人书面汉文文学结合的产物，它为不久以后的“时调”体裁的产生作了准备。

第三节　形成阶段——时调的产生

在《翰林别曲》以后，大约在十四世纪末，也就是高丽末期，

文人国语诗歌中出现了一种短歌体裁——时调。

由于当时还没有朝鲜文字把时调记录下来，第一首时调的内容及最早的时调形态究竟怎样，已难以确考了。《东国通鉴》提到在高丽忠烈王二十二年（1296年）秋金元祥作时调《太平曲》，但在《高丽史》等书中则称《太平曲》为“新调”，可见当时金元祥所作的还不一定就是后来盛行的那种时调体裁。

一般认为，时调作为文人国语诗歌的一种固定的短歌体裁，出现于十四世纪。由于当时的时调只能靠口传或用汉文记录下来，所以失传的不少，原国语形态也难以完整地再现出来。目前所看到的高丽末期的时调，保存在李朝金天泽于一七二七年所编的《青丘永言》及金寿长于一七六三年所编的《海东歌谣》等书中。

时调形式一出现，就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虽然文人士大夫仍然以汉文诗的写作为正统，并且视时调为“余技”，但还是有一批人创作了时调，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内心的感情。

时调和《翰林别曲》大不一样，它是短歌，汉字词一般比《翰林别曲》中的少。它和民歌也不同，不分节，无副歌，音节数比起不分节的民歌来也整齐严格些，当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时调分为三个诗行，分别叫“初章”、“中章”、“终章”。每“章”又可分两“句”（小段），其音节数为：

初章： 3、4 3（4）、4

中章： 3、4 4（3）、4

终章： 3、5 4、3

三“章”的内容大体上依次起到“起”、“承”、“结”的作用。“结”（终章）开头有时带有呼唤或感叹性的词。

时调形式的产生是高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汉文诗的写作在朝鲜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高丽文人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它可咏而不可歌，只能有书面形式，而不能口头传诵，

要作到可以结合朝鲜民族声乐歌唱，就只能向民间歌谣学习，创作出象《西京别曲》这样的歌诗体裁来。《翰林别曲》的创作就是一种尝试。

但是《翰林别曲》太长，形式太呆板，且所用的汉字太多，不能满足要求，因此，一种灵活的形式——时调便应时而生了。时调的产生是为了“作诗能唱”。关于这点，大时调家李滉(1501—1570）说得很明确：“凡有感于性情者，每发于诗。然今之诗异于古之诗，可咏而不可歌也。如欲歌之，必缀以俚俗之语，盖因俗音节所不得不然也”。所谓俚俗之语，是当时封建文人对朝鲜国语的叫法。李滉的这一段话，最明确不过地指出国语进入诗歌领域的必然性。时调具有汉诗五、七言绝句的简短的特点，同时它使用国语，具有民歌的长处——可以歌唱，可以靠听觉理解意思，因此，它特别适合高丽文人的需要，从而成为了抒情短诗的一种新型体裁而为若干文人所利用。时调体裁产生后，得到不少文人的喜爱，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偶然的。

高丽末期的时调属于第一批时调，其内容多与时政有关。高丽末期社会和政局的动荡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上引起很大的波动和苦恼。他们创作了一些时调，抒发胸中的苦闷，唱出心头的忧愁和感慨。此外，也有一些是即兴所作，是向对方表示某种意愿的。

高丽末期的时调没有标题，这里为了方便起见，以该作品的首句第一个词为其题目，先看李存吾的时调《乌云》：

乌云所乘马，实在太荒唐。

飘浮天际，胡冲乱撞。

黑压压地遮挡住阳光；究竟打算怎样？

李存吾为高丽忠惠王时人，生性刚直，反对受到忠惠王宠爱器重的僧人辛旽。辛旽出身平民，虽然在受国王的重用后推行过一些改良的方针，但本人不久就腐化骄横，无人敢言。李存吾此时调把他比作乌云，把君王比作阳光，谴责他一手蔽天。

李穑的《白雪》：

白雪皑皑的山谷，笼罩着乌云。

可爱的片片梅花，你在哪儿开放？

暮色苍茫，我独自徘徊，该去向何方？

作者李穑（1328—1396）为高丽末期的名儒，忠于高丽王朝。后因大势所趋不得不屈从于李朝统治者，但仍然一心不忘旧王朝。这首时调就表现出他的这种政治态度。"乌云"指的是作者心目中的叛逆者李成桂之流，"梅花"指和自己志同道合者。在李成桂一派的压制下，所有的同道者或亡或散，作者缅怀他们，还希望与他们共襄义举。但在旧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李穑自己也感到他的希望难以实现。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他独自徘徊，却不知出路何在。

李成桂之子李芳远（李朝建立后，称太宗）为了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竭力拉拢当时的高丽的大儒郑梦周。高丽末代恭让王四年（1392年）他在为郑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唱出了一首时调：

此亦如何？彼亦如何？

万寿山上藤萝缠绕交错又如何？

你我缠绕交错，共享百年之乐如何？

意思是说：为王氏王朝（高丽）服务也罢，为李氏（李成桂一派）服务也罢，不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让我们彼此紧密合作，共享荣华富贵吧！这种比拟十分生动，全诗的音韵亦佳。李芳远企图以这样的时调打动郑梦周的心。

但是，对旧王朝忠心耿耿的郑梦周却毫不为之所动，他即席作时调《此身》答复李芳远：

此身可一死再死，死去百番千次。

纵令我骨化为泥，魂飞入九霄，

为君一片丹心，长在永不移！

李芳远听到这首时调，懂得郑梦周是在坚决拒绝他。此后不

久，就派人将郑梦周杀死在开城善竹桥。这首时调因而也就成为尽人皆知的名篇。由于他在诗中用了“君”（Nim）这个语义双关的词，这首时调也被人们用以表示女子对男子的忠贞的爱情，成了一首情歌。

元天锡的《兴亡》和吉再的《五百年都城》都是对旧王朝的挽歌：

兴亡为天数，秋草萋萋满月台。

五百年王业，化为牧笛声声哀。

夕阳下，唯我泪水盈眶一过客！

作者元天锡为李芳远的老师。但他对旧王朝的覆灭感到悲哀，隐居于雉岳山。李芳远曾派人去寻找他，他避而不见。这是他途经高丽的故都开京时吊古时所作，表现出他感慨万千，无限惆怅。

在高丽末期的时调中，调子较为高亢的作品有崔莹的《騄駬霜蹄》：

洗刷好健壮的騄駬霜蹄千里驹，

身佩锋利的龙泉雪锷剑。

大丈夫壮志凌云，为国尽忠节！

崔莹是一位积极反对外族侵略并屡建战功的名将。这首时调以豪迈的语言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热情。高丽末期的时调一般都流露出较多的灰色情调，萎靡暗淡，而崔莹的这篇作品则一反时尚，风格明快，气魄雄伟，这类时调在以后李朝时期的一些反对女真和倭寇侵略的时调作品中，可以找到它的继承者。

以咏物见志的时调作品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于乱世中坚守忠节的情操。成汝完的以菊为题材的《早种晚开》、吉再的《雨摧竹枝垂》以及徐甄的《岩畔雨中孤竹》都属于这一类。

早种晚开，君子之德。

不屈于风霜，烈士之志操气概！

陶渊明已不能复生，我为你悲哀！

作者成汝完是十四世纪下半期的人，这首时调以陶渊明爱菊的典故来暗示出当时坚守气节之士屈指可数，手法巧妙。

总的看来，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作品，思想内容具有积极意义的不多。但是，它的出现反映了高丽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中，开始在汉诗文以外，谋求建立民族语言诗歌文学的积极倾向。在一两千年的朝鲜文学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有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有国外文学的影响。

高丽时期，尤其是其后半期，是朝鲜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外族的侵扰，尤其是蒙古族（元朝）对高丽的压迫和束缚，中国宋朝因遭到辽、金的多次进犯而日趋衰弱，促使高丽重视本国的力量，珍视本民族的文化，并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这种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因素，使得高丽的民间歌谣得以"悄悄地"进入上层人物的视野，使文人士大夫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发展民族语言文学的必要性。虽然他们在创作本民族语言的诗歌时，并没有废弃以汉文文学为正统的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朦胧地意识到朝鲜国语文学有存在和使用的必要了。

联系到汉文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如李奎报、李齐贤的爱国诗篇的出现，金富轼对总结本国历史的重视，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社会政治和历史因素对朝鲜国语文学体裁——时调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了。

从朝鲜诗歌文学发展的自身的要求来看，汉诗文难以完全满足高丽人民的需要，它基本上只是一种书面文学。这种只有上层人物可以创作与理解的贵族文学，不易上口，即便唱出来，也难以为人们理解，难以流传。而诗歌则要求可唱、易于理解和便于普及。高丽民歌则具有此特色，加上它的音乐美和通俗易懂，就更使它能在新的文人诗歌体裁的探索中成为一种可借鉴和可吸收的材料，使得时调能够出现。时调就是诗歌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产物。

高丽时调开始产生，正是在中国宋词极盛以后。由于朝鲜文人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极富于音乐性的可唱易懂的宋词不可能不对高丽文人产生某种印象和具有一定影响。一些宋词如柳永的《雨霖铃》等已传入高丽，被吸收为高丽宫中乐曲。此外，曾久居中国的李齐贤也填了不少词。后来高丽文人就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词"，这是时调产生的原因之一。

另外，元曲的盛行，对朝鲜时调的产生，也是另一个外部的诱导因素。

综上所述，十四世纪末时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在以后数百年的发展情况令人感到：时调的产生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调是源远流长的。

第八章　传记文学

高丽时期散文方面最重要的文学遗产之一是一系列的人物传记。其中，古代（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主要是金富轼编写的，高丽时期人物传记的作者主要是李奎报、李齐贤。

第一节　金富轼及《三国史记》中的传记

金富轼（1075—1151）于高丽第十一代文宗二十九年出生在开京的一个官僚家庭中，自幼学习诗文。宋朝苏东坡的文章受到高丽文人广泛喜爱，他与兄弟的名字中借用了苏轼、苏辙的名字（其兄弟名为“富辙”）。他青年时期就进入仕途。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时著名文人。金富轼生于高丽政局稳定、文化繁荣时期，死于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加剧、动乱屡生（如李资谦乱、妙清乱）的衰微时期。受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金富轼一生矢忠于高丽王朝。

在《进三国史表》中，他谈到了自己编写《三国史记》的思想动机：

> 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

为此，他发愿编写《三国史记》，记录“君臣之善恶、臣子之忠奸、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

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儒学者，金富轼当然不可能正确评价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他十分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

爱国思想。三国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就理所当然地为他所推崇，而人民的良好品德，也能在他书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和肯定。《三国史记》中的一些传记至今仍为朝鲜人所重视、喜爱，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国史记》中的传记是他根据古代史书上的资料进行整理、编写而成的。虽然其中的基本情节并非他虚构出来的，但传记的结构、人物描写、语言，凝聚着他的辛勤劳动。作为书面文学，它基本上属于高丽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的文学史书将这些作品列入高丽以前时期的文学之中，是不恰当的。

《三国史记》采取了年代记和纪传的形式，全书有本纪二十八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其中具有文学价值的是列传部分。列传中记叙了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著名将领、政治家、文人学士、艺术家、民族英雄、平民百姓等五十人的故事。

第一类传记是讲政治或军事方面的人物经历的，有《金庾信传》、《乙支文德》、《朴堤上传》、《官昌传》、《阶伯传》、《温达传》、《竹竹传》、《奚论传》、《匹夫传》等。

《金庾信传》最长，共三卷，记叙了在统一三国的事业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新罗赫赫名将金庾信的一生事迹，是根据金庾信的玄孙金长清的十卷本《金庾信行录》及其他资料加以改写而成的。整个传记形象十分生动。

金庾信是大梁都督舒玄将军之子，是新罗太宗武烈王金春秋的妻舅。金庾信青年时期就心怀壮志，要为捍卫新罗和实现三国统一的事业而献身。十七岁时，他眼见高句丽、百济，靺鞨常侵犯新罗边疆，遂“慷慨有平寇贼之志”。他独自进入深山斋戒并向上苍祈祷：“敌国无道，为豺虎以扰我封场，略无宁岁。仆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祸乱。惟天降监，假手于我”。他在深山幽谷苦苦等了四天四夜，终于见到了一位异人，学到了实现其宏图雄志的妙方秘法。

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金庾信坚定地为事业而献身的崇高

精神。他经常公而忘私，临阵总是身先士卒，鼓励士兵奋勇杀敌。他随父亲舒玄出征，在激战中表现出了英勇无比的胆略：真平王建福五十一年（629），舒玄奉命率大军攻打高句丽娘臂城，久攻不下，失利甚多，士气低落。金庾信当时是中幢幢主，他挺身而出，向父亲请战，得到允许之后，跃马扬鞭，冲入敌阵，手提敌将首级回阵。新罗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志气大振，一致奋勇向前，歼灭了敌军一千五百人，使守敌震慑，纷纷投降。

金庾信领受王命之后，没有来得及向妻子告别，立即启程。他还多次经家门而不入。最动人的是金庾信某次路过家门时，家人和他久未见面，全都站在门口等候。他却马不停蹄地走过。等走过家门五十步左右，他才勒马，要士兵为他到家里取水喝。边喝边说："我家的水味道还和往日一样！"可见他并非无思家之情，而是感到肩负重任，不能儿女情长，必须公而忘私才能鼓励士兵。

士兵见到金庾信如此，果然十分感动，说："身为大将军能这样，我们又怎能为骨肉分离而抱怨？"

新罗文武王二年（662年）金庾信率兵攻高句丽，到七重河边，部下都不敢登船。金庾信只是说了一句："大家如怕死，又何必到这里来？"立即带头上船。在他鼓舞下，部下纷纷上船，渡河杀敌。

在向平壤进军途中，到一险塞，天酷寒，人马疲惫，不时有人冻死。金庾信眼见士卒畏寒，自己卷起袖子，直至露出肩臂，手执马鞭策马前行。众将士见到大将军尚不畏寒，全都忘却寒冷，奋力前进，走出了险境。

金庾信智勇双全，一次大军屯子萨道城，有水鸟向东飞去，将士见此以为是不祥之兆。金庾信却丝毫没有这种世俗的迷信观念，认定这可能是敌方派间谍到了这里。于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敌人果然中计大败。

真德王元年（647年），新罗大臣毗昙与廉宗二人叛变，率叛

兵屯于明活城猛攻王所在地月城。激战十天，胜负未决。夜间忽有一颗大星落于月城方向。毗昙趁机散布这是女主必败的征兆。叛军士卒大声欢呼，声震天地，新罗真德王听到后，十分惊恐。金庾信引证历史事实，劝国王不要迷信，并随即命士兵制造一木头人，木人怀中插上火把，夜间用大风筝把它带上天空，并说这是落星重上天空。敌军转喜为疑，失去斗志。金庾信趁机率将士奋战，一举消灭了叛军。

作品突出地描写了金庾信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民族观念。新罗联合唐朝消灭百济之后，唐皇为了笼络人心，扩展其势力，就赐金庾信以食邑。金庾信毅然拒绝了这种"赏赐"。唐阴谋侵略新罗，新罗王犹豫不定，不敢与唐军作战。金庾信说服了国王，对唐的野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全了新罗的独立。

《金庾信传》不仅使人看到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传奇式的大将，而且热情歌颂了金庾信的事迹，这部作品向读者表明：金庾信为之奋斗的统一三国的事业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

《乙支文德传》写的是为反抗隋朝侵略建立不朽功勋的乙支文德将军。作品虽不长，但这位爱国英雄亲至敌营的勇敢、诱敌深入的智谋、用兵如神的才能，跃然纸上。

《朴堤上传》写的是新罗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朴堤上。朴曾奉命出使高句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又奉命去日本。他在日本以种种妙计，使得被扣留于日本的新罗王弟最终逃出日本回国，而他自己则牺牲在日本统治者的酷刑之下。

《三国史记》中的第二类传记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人公的。其中都弥妻、薛氏、知恩等是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妇女，她们的传记尤其可贵。《都弥传》虽以都弥命名，但着重描写的却是其妻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

都弥是"编户小民"，其妻子貌美，百济国王盖娄企图霸占。一天，盖娄王把都弥召来，对他说："女子虽讲贞操，但如

在幽暗之处以花言巧语引诱，她必然动心”。都弥表示：自己妻子性格坚强，守身如玉，绝不会上钩。盖娄王不信，就故意交给都弥一些事情，使他不能回家。与此同时，派另一臣子伪装成国王去都弥家中，把他妻子诱骗出来。

都弥的妻子深感其中有诈，就让一婢女代替自己，跟随那个臣子去王宫。盖娄王发觉自己受骗，大怒，命剜去都弥的双眼，派人把其妻强行接到宫中，欲行非礼。都弥妻借口自己正值身体不洁之时，要求稍等几天，洗浴后再来。王无奈，暂且放走了她。

她趁机逃到江口，呼天抢地。忽有一孤舟顺流而下，她就上船，漂流到泉城岛，遇到瞎了双眼的丈夫都弥。两人掘草根充饥，一同乘船漂流到高句丽蒜山之下，得到了高句丽百姓的深切同情，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

金富轼所写的人物传记中，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莫过于这篇《都弥传》了。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暴虐无道，他可以滥用王权害夫谋妻而不受任何指责。盖娄王的形象事实上是一切封建王朝暴君的代表。作品以简朴的笔法写出了都弥夫妻相互无限信任的深挚爱情；写出了都弥妻不畏强暴、蔑视权势，不慕荣华富贵、不因丈夫残废而变心的可贵道德品质。这个“编户小民”之妻正是平民百姓高尚思想的代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精神，在一个处于封建暴政下的普通妇女身上得到了十分完美的体现！

作品的可贵还在于没有人物传记中常出现的神鬼。在都弥妻逃出王宫，奔至江口、走投无路时，突然有一孤舟顺流而下。作者并没有说这是上苍对不幸者的哀怜，却在暗示着“孤舟”的主人，一个未出场的人物对这位惨遭迫害的无辜者的同情和援助。在当时，帮助一个得罪了国王、逃出王宫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品中之所以未出现这位善良而又不畏死的同情者，显然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人们为了不使这个同情者遭殃而有意隐去的结果。这表示：孤舟主人的正义行为是得到人们

支持的，反映出人民憎恶强暴、同情受难者的感情和心愿。最后，都弥夫妻漂流至高句丽，“丽人哀之”，给他们提供衣食，使他们安居到老，也说明了高句丽人民对于百济受难人民的同情。

整个《都弥传》中没有作者一句褒贬，而是在简洁的叙述和朴素的描写中，流露出人民对暴君的强烈憎恨和对平民坚贞爱情的热情歌颂！

《薛氏传》也是以民妇为主人公的。年轻女子与代她父亲从军的青年嘉实订婚，信守婚约，嘉实逾期三年不归，她依然等候，不愿嫁与他人。最后终于盼来了嘉实，结成夫妻。表现出薛氏不嫌贫爱富、受恩必报、忠于爱情的思想道德品质。

《知恩传》写一位坚强的贫穷妇女。她为奉养寡母，直至三十二岁尚未嫁人，她甚至卖身为奴，以维持她母女二人的生活。

《三国史记》中还有一些关于文人学者的传记，如《崔致远传》、《强首传》、《百结先生传》、《金生传》等等，但其人物形象流于一般化，只能提供若干历史资料而文学价值不大。

此外，还有《剑君传》写一位舍人在“春夏大饥，民卖子而食”的情况下，坚守廉洁的美德，拒收别人偷来的粮食，后蒙冤屈却不去辩明，明知别人有害己之意却喝下毒酒死去。金富轼借“君子”之口谴责此人是“死非其所，可谓轻于鸿毛”。表明这位封建学者对拘泥于形式、平白送命的“道德”并不欣赏。

金富轼所写的人物传记在朝鲜古代传记文学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所赞扬的爱国思想，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及统治者的罪行，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金富轼的局限性，他往往从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出发来解释一些现象和进行说教。即便他对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纯真爱情和深挚的母女之爱表示了肯定和赞许的态度，也还是把它们纳入封建道德的框框之内。这显然和我们今天赞美人民的这类高尚德操的出发点是迥然不同的。

第二节 其他传记作品

高丽时期的传记文学除《三国史记》中的一系列作品以外，还散见于其他书籍。如一然的《三国遗事》中就有带传记性质的作品。

一然（1206—1289）高丽著名僧人，曾被元宗忠烈王册封为"国尊"。他所著的《三国遗事》中具有文学价值的大多为三国时期民间传说的记录。有些作品从名称上看也似乎象是传记，如《延乌郎与细乌女》、《薯童》、《居陀知》。但就其内容上看，只是一种民间传说的书面化，不能作为传记文学看待。可以列入传记的作品中，《金堤上》是最重要的一篇。

金堤上即《三国史记》为之立传的朴堤上。在新罗，朴、昔、金是三个大姓，必须是王公贵族才能"享有"这三个姓。堤上由于为新罗王朝立了大功，所以姓王公贵族的姓。朴堤上所以又被称为金堤上，可能就是由于上述原因。两本书的基本情节大同小异，无疑这是同一个人。

堤上在日本的爱国行为在《三国遗事》中被描述得更为生动、具体、感人。

堤上为了让被日本扣押的新罗王子返回祖国，便诈降日本。他取得日本国王的信任之后，偷偷放走王子，然后泰然自若地回房等待倭人。倭人来查看时，他佯称王子因打猎疲倦尚未起床，使倭人错过了追回王子的时机。

堤上在被执以后英勇不屈。在倭王严厉质问下，堤上坚定地回答："臣是鸡林（即新罗）之臣，非倭国之臣！"倭王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堤上自豪地回答："宁为鸡林之犬豚，不为倭国之臣子。宁受鸡林之棰楚，不受倭国之爵禄！"

倭王见利诱达不到目的，恼羞成怒，命剥去堤上脚掌的皮，强迫他在尖尖的芦苇茬上行走，问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臣子。堤

上再次回答：“鸡林之臣也！”他至死不屈，在酷刑下就义。

堤上到日本的主要任务是争取被扣押在日本的新罗王子归国，光就这一点看来，似乎是对于新罗国王个人的忠诚。但是作为新罗的使臣、祖国的代表，他在日本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不畏强暴、不贪富贵的英雄气概反映出朝鲜人民对祖国的高度热爱和无限自豪。朴（金）堤上，至今还是朝鲜人民崇敬的古代英雄人物之一。高丽僧人一然为后代读者留下了这样一篇英雄传记，是对朝鲜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外思想内容较好的传记作品有李奎报的《卢克清传》、《赵冲传》、李齐贤的《金公行军记》等。

《卢克清传》附于《明宗实录》中，叙述官卑职微的卢克清清正廉洁的故事。他生计困难，打算把自己的住房卖掉。在他因事外出的时候，妻子自作主张以白银十二斤的价格把住房卖给了另一小官玄德秀。卢克清回来后得知此事，感到作价太高，就从十二斤的银中取出三斤去找玄德秀，说自己买此屋时只花了九斤白银，住了几年并未修缮，反而多收三斤，理应退还。玄德秀也是一个正直人，不愿收下。卢克清执意要退还给他，最后说如果玄不收下三斤白银，那么房子就不卖给他了。玄不得已，才收下。

李奎报写此传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可激贪竞”，就是借这种清廉之士以鞭鞑那些贪赃枉法者。象卢克清这种两袖清风的官员在贪污成风的高丽官场政界是很难得的，可贵的。

李奎报的《赵冲传》写的是高丽高宗时（十三世纪）一位文武全才的宰相赵冲与外敌周旋取得胜利的动人故事。

李齐贤的《金公行军记》也是类似的一篇传记。这篇作品原名《门下传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赠谥威烈公金公行军记》，记叙了金就励五年率兵抗击外敌侵略的英雄事迹。这是高丽将帅传记中相当长的一篇，作者充分表达了对抗敌有功将领的崇敬和民族自豪感。

《裴烈妇传》和《烈妇崔氏传》是两篇歌颂爱国妇女的传

记。前者所写的裴氏，是一位抗倭战士的妻子。高丽忠定王三年（1351）倭寇侵袭庆尚地方。裴氏的丈夫自愿去前线杀敌，留下裴氏及其年幼的孩子。倭寇进入村庄以后，裴氏背着孩子正打算逃走，被敌人发现。敌人拉满弓威胁裴氏，不准她逃走。裴氏宁死不屈，跃身投入江中。敌人赶来，射死了她和孩子。

《烈妇崔氏传》所写的也是一位牺牲于倭寇屠刀下的妇女。

这两篇传记歌颂了高丽妇女不向外敌屈膝的高尚行为，和上述两位将帅的传记一样，反映了高丽人民的爱国精神。

第九章　传　　说

在高丽被记录于书面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中，首推一然的《三国遗事》中的作品。

一然出生于庆州章山郡，九岁时在海阳无量寺出家为僧。曾应元宗之召去过开京。

一然生活在高丽迭受契丹、蒙古等外族侵略时期，祖国遭受侵略者蹂躏，激起了他的爱国思想。在《三国遗事》中，他收录了好多古代的建国神话，表现出他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感。《三国遗事》中所录的民间传说、朝鲜某些风俗的由来等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三国遗事》共分五卷。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有关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历史；二是有关佛教的传入、流传的记叙及佛灵异的传说。

《三国遗事》中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传说有：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传说《檀君》及《延乌郎与细乌女》、《脱解王》、《薯童》、《射琴匣》、《九层塔》、《万波息笛》、《居陀知》、《金现感虎》、《调信一生》、《善律还生》等等。

这些传说的书面化过程中，虽然包含有一然的劳动在内，但它主要是属于三国及新罗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所以已放在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中叙述了。

高丽时期的民间传说有《朴渊瀑布》、《役夫之妻》、《龟报恩》、《兄弟之义》和《书生与姑娘》等。

《朴渊瀑布》的传说载于《东国舆地胜览》，讲的是该瀑布名称的由来。是一篇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优美故事。

朴渊瀑布位于天磨山与圣居山之间，长千丈，宛若一条白练，声震天地。古时，曾有一进士姓朴，来到瀑布下的渊旁吹笛。笛声悠扬优美，传入渊下龙王的女儿耳中，使她心荡神移，出渊向他表露爱慕之情，后来与他结合，朴进士的母亲见儿不归，找到瀑布下，却不见儿子，痛哭失声，坠入绝壁下的潭中而死。于是该瀑布遂以朴渊命名，而潭也被称为姑母潭。

李奎报的诗中曾提到过这一民间传说："龙娘感笛嫁先生，百载同欢适性情"。可见这一民间传说早在十三世纪以前，就已产生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

《朴渊瀑布》的传说犹如一首美丽的爱情颂歌。龙女虽然身份高贵，但她被优美笛声触发起的爱情却战胜了地位的差异，她突破龙宫的清规戒律下嫁一位儒生，表现出了处于封建束缚下的人民对自由爱情的热烈向往与追求。老母盼子归来，坠崖而死的母爱悲剧，使这一爱情故事更为动人心弦。

《役夫之妻》载于《高丽史》卷十八，说的是被强征服劳役者的悲惨生活：

毅宗（1147—1170在位）为恣意玩乐，大兴土木，在开城以北的牛峰县的大山清宁斋南麓修一"丁"字形的亭阁，命名为"众美亭"。亭南筑土石蓄水，造成一人工湖。工程的夫役都是被强征来的劳动人民。他们劳动繁重，疲惫不堪，还要自掏腰包花钱买粮。有一夫役太穷，无钱买粮，众夫役同情他，每人分一匙饭给他充饥。有一天，他妻子做了饭菜送来，并要求丈夫和大家分食。丈夫认为这些饭菜来路不明，怀疑妻子不是与人私通，便是偷了东西。妻子回答说："我貌丑，无人与我私通；人笨，也不会偷窃。饭菜是卖了我的头发换来的。"说罢去掉头巾让丈夫看。丈夫一见呜咽泪下。

这一传说以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夫役的贫困无依相对照，勾画出一幅悲惨的画面，是劳动人民对残酷剥削者的强烈控诉。

《兄弟之义》原载《东国舆地胜览》的《孔岩津》中。传说

高丽恭愍王时期，有兄弟两人同行。弟弟得到黄金两锭，给了哥哥一锭。后来两人乘船，船到中流，弟弟忽然把自己的一锭黄金投入水中。哥哥很奇怪，就问弟为何如此。弟弟说："我平素与哥哥情谊深厚，但今天分黄金的时候，我心里顿然有厌恶哥哥的意思。可见这黄金是不祥之物，不如扔掉、忘却！"哥哥对弟弟的话十分赞许，自己也立即掏出黄金扔到水中去了。

黄金宝贵，但手足之情更加宝贵。这一传说的中心思想正是这一点。它不仅歌颂了动人的兄弟情谊，也从侧面指出，正是财产的争夺，造成许多家庭悲剧。在盛行拜金主义的旧时代，传说作者能宣传蔑视黄金的思想，确实难能可贵。

《书生与姑娘》原名《溟州》，载于《高丽史》卷七十一。传说有位书生游学至溟州，看见一位姑娘容貌端庄秀丽，知书达理，便作诗倾吐爱慕之情。姑娘答应待书生中举以后与他结合。书生欣然返回京城，刻苦读书。姑娘父母不知此事，为她招婿。姑娘不愿违约，就走往她平贵常去喂鱼的池边，对鱼说："我养你已久，望你懂得我的意思。"就把一封写在布上的信投入池中。一条大鱼跳跃接信，摇尾而去。书生在京城，一心要给父母买点好吃的，去市场买回了一条大鱼。剖开鱼腹，见到姑娘所写的信，于是手持书信及父母的亲笔信，找到姑娘家。这时姑娘家所招女婿刚进门。书生拿出两封信给姑娘的父母看。姑娘父母大为惊异，认为这是姑娘与书生的精诚所感，就送走了刚进门的女婿，让姑娘与书生成就了美满姻缘。

这一传说十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是高丽民间传说中最为优美动人的作品之一。这一篇关于封建时代追求爱情自由的传说，不以悲剧告终，却以喜剧收尾。而这喜剧的结局又不是男子做了大官，"衣锦荣归"，而是以其真挚的爱情感动了自然界而喜结良缘。传说摆脱了世俗之见，感情纯洁，婿新喜人。

《高丽史》中还载有一篇高丽的建国神话，即关于高丽太祖王建的祖先及其本人的故事。和早期的建国神话不同，它的民间

色彩较为淡薄。神话虽长，有些地方是抄袭以往的神话传说（如关于金庾信、居陀知的传说）拼凑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美化高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文学值价不高。

第十章　小品文的出现与发展

在高丽统治者以汉文开科取士、汉文在文人士大夫中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文人写汉文诗，同时也出现了写作汉文散文的热潮。不少汉文诗人同时也是汉文散文能手，如李奎报、金富轼、李齐贤等人。除缺乏文学意义的政治公告、外交文件、奏折等公文体政论体及散见于史书和其他书籍（如《东国舆地胜览》）的传记、传说作品以外，小品文也是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文体之一。

小品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出现于高丽时期不是偶然的。它既不象政论体文章那样呆板严肃、妨碍感情的表达，也不象五、七言诗那样短小和受格律的限制，文人可用它自由表达感受、描述所见，是一种灵活、活泼、富有生气的文体。

另一方面，中国唐宋散文、小品文的发展对高丽小品文的产生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高丽时期的小品文大体可分为人物小品与事理小品。

第一节　人　物　小　品

人物小品的描写中心——人物，往往是虚构的，它的题目虽总是带“传”字，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传”，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说明作者的某种主题思想的。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带有若干典型意义。这类作品甚至可以看作是小说的萌芽。

人物小品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林椿的《麴醇传》、《孔方传》，李奎报的《无肠公子传》、《麹先生传》，李穀的《竹夫人传》等。

《麴醇传》作者是诗人林椿。作品总共约九百多字，以中国

为背景，主人公是陇西人麴醇。麴醇祖先以“清德”闻名于世并封为侯。到了麴醇父亲麴酎一代，也还能避乱世，与刘伶、阮籍优游于竹林，过着隐遁生活。到麴醇本人时，家道已衰。但他却靠着能言善道得到君王的重用。君王自用他之后，就终日酗酒，致使朝政荒废。群臣都很厌恶他，他却一手遮天，得到君王的信任和庇护。

麴醇爱财如命，名声很不好。他仗着君王恩宠渐渐得意忘形，甚至在君王面前，不知羞耻地说自己有“钱癖”。最后因被君王以其有口臭为由，罢去官职，得暴病而亡。

《麴醇传》所写的麴醇正是美酒的象征，酗酒误事，犹如奸臣弄权导致王朝衰败。作者林椿生逢武臣郑仲夫大杀文臣、废毅宗之乱。他不满朝政，与李仁老、吴世才等人结伴同游，号称海左七贤。这篇作品的锋芒直指当时的昏君毅宗。毅宗沉缅酒色，腐败无能，朝中文臣不但不积极进谏，以振纲纪，反而巧言令色，阿谀奉承，遂导致武臣之乱。林椿在这篇作品中也抨击了这些佞臣。

林椿的《孔方传》也是一篇以物喻人的讽刺小品。古代的钱币中有方孔，“孔方”就是钱的隐语。

《孔方传》通过金钱的化身——孔方，集中地揭露了那些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地捞取钱财大伤国家元气的贪官污吏的罪行。作品向人表明，“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在当时腐化成风的朝廷和官场，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对于统治阶级的这种种黑幕，作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其描写富于形象性，讽刺尖锐，笔调幽默。

《孔方传》除揭露上述消极现象外，客观上还反映出：在封建社会内部，商业资本经济的势力已有相当的发展。金钱作用逐渐增长，将导致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使封建社会本身解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林椿以后六百年，封建末期的朴燕岩所写的《两班传》等小说中，就能清楚地看到在商业资本的冲

击下，封建阶级走向没落破产。在林椿写《孔方传》时，社会还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的历史意义，作者林椿当时还是无法认识的。

李奎报的《麴先生传》和林椿的《麴醇传》相似。两者的主题思想都是讽刺持宠骄横、为害国政的朝臣。其情节乃至文句也有类似之处。故事背景都设在中国，主人公都姓酒的象征“麴”（林文为“麴醇”，李文为“麴圣”），两人都因有一定的才能自幼受到夸赞，长大受到国王恩宠。两人同样都因骄横而招其他朝臣厌恶，并因而遭国王贬斥。

《麴先生传》与《麴醇传》所不同的只在某些细节。如麴醇爱财，而麴圣则无此癖。麴醇遭国王贬斥的直接原因是“口臭”，而麴圣则因中书令毛颖上疏皇帝弹劾他而被免官。麴醇无子女，麴圣则有三个儿子，因恃父宠而遭诛。至于结局，麴醇被废以后，他的弟弟麴清仍然为官，子孙又昌盛起来；而麴圣则在被免官之后改过自新，终于被重新起用并立了大功。

和林椿的《麴醇传》一样，李奎报的《麴先生传》也是对当时武臣专权的不满，表现出希望朝政椿明，国家的秩序得以恢复，以实现“国泰民安”的思想。

李奎报的《清江使者玄传》和《无肠公子传》也是两篇寓言人物小品。前者写乌龟，后者喻螃蟹，也是一种讽世之作，内容在于劝诫世人，扬善惩恶。

释影息庵的《丁侍者传》是关于丁字形手杖的寓言小品。李縠的《竹夫人传》则用寓言形式写夏天床席间取凉的用具“竹夫人”。

《竹夫人传》借竹竿的挺直和有节而歌颂了竹夫人的坚守节操的品格，并以她丈夫“松大夫”（青松的象征）衬托出她的坚贞和清高不凡。丈夫死后，竹夫人虽寡居痛苦，但“晚节益坚”。作者最后以“史氏”的名义赞扬她的贤惠，为她无子而叹息，认为“天道无知”的说法，确非虚语。作者为行善不能得善报而鸣不

平，反映出他对当时世道的看法。

此外，李詹所作《楮生传》以纸为其主人公，谴责当时权臣李仁任等人不施仁政。

高丽的人物小品还不能直接虚构人物，而是以比拟的方法写出寓言式的故事。其情节极简单，其格式则模仿传记体，往往从其祖辈出身写起，写到主人公，最后以“史氏”的名义加以议论。语言不生动，性格描写也较呆板，用词遣句还没有摆脱史书传记的笔法。尽管有以上缺点，但它已多少具备了小说的某些特征，可以看成是小说的一种雏形或萌芽。

这种寓言式的人物小品对李朝时期的寓言小说产生了影响。林悌的《花史》、《鼠狱说》其实就是这类寓言人物小品的发展，李朝后期的《兔子传》、《野公鸡传》等国语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述寓言人物小品的痕迹。高丽时期的这类小品文数量虽不甚多，但是，它在朝鲜小说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第二节　事理小品

人物小品是以人物为中心，虚构出一定情节写成的讽刺文，它的题目往往离不开“传”字。另一种专门以事物为中心，专门说明某种见解或道理的小品文，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事理小品”。它的题目往往带有一个“说”字。高丽时期事理小品的主要作者为李奎报，著名作品有《舟赂说》、《理屋说》、《忌名说》、《慵讽》、《镜说》、《碗击贪臣说》等。

《慵讽》嘲笑酗酒和好色两种恶习，是一篇辛辣的小品文。文中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写一个患了懒病的人。此人“有宅一区，草秽而慵莫理。有书千卷，蠹虫而慵莫披”，甚至“头蓬慵扫，体疥慵医，慵与人嬉笑，慵与人趋驰”。终至于发展到了“口慵语，足慵步，目慵顾，——踏地触事，无一不慵”的地步，真可谓一个十足的无可救药的懒汉了。有位客人，见此懒病而无法治，

回家想了十来天，来见这位懒病的患者。他告诉这位“病人”说，他家里有香气扑鼻的上等美酒，又有女侍，歌喉婉转动人，能自奏自唱。此懒病患者一听此话，顿时霍然而愈，随即立起身来，“束腰以带，犹恐其晚。纳踵于履，犹恐其迟”，忙着准备去纵情享受美酒与女色。这一表现，引起了客人的一番冷嘲热讽，使得这位懒汉羞愧得无地自容，最后表示“吾将移此之心，入于仁义之庐，去其慵而务其劬”。

《讽慵》全文六百余字，是李奎报事理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镜说》全文不到二百字，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小品。说的是作者故意把一面镜子弄得病是尘埃，昏暗不清，然后又借答复客人疑问的机会，说出貌丑者不爱镜，而丑者多于美者，故有意把它弄成这样以免镜子被丑者毁坏。文章末尾，作者叹息到：“噫，古人对镜所以取其清，吾之对镜，所以取其昏。子何怪哉？”对无德无才而又怕人们指出的一类人，作了巧妙的讽刺。

《舟赂说》尤其简短：

> 李子南渡一江，有与方舟而济者。两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马之众寡几相类。而俄见其舟离去如飞，已泊彼岸！予舟犹邅回不进。问其所以，则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饮榜人，榜人极力荡桨故尔”。予不能无愧色，因叹息曰：“嗟乎，此区区一苇所如之间，犹如赂之有无，其进也有疾徐先后。况宦海竞渡中，顾吾手无金，宜乎至今未沾一命也。”书以为异日观。

总共一百五十字左右，揭露了官场贪污行贿，买卖官职的恶劣风气。舟人因有酒犒劳而出力撑船，这是常见的事，本不足怪，却引起作者对宦海风波的联想。从区区小事，总结出深邃的道理，这确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优秀小品文。

《理屋说》讲的是两种修理家屋的情况：一种是久已漏雨，长年失修的房屋；一种是刚发现雨水侵蚀立即加以修缮的房屋。《理屋说》也不过二百字，也是一篇以生活琐事而喻国政的说理

小品。

此外，《忌名说》为怀才不遇的著名诗人吴德全的思想性格作了辩解，对世所传闻的吴一向“恃才傲物”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见解精辟独到。《毓击贪臣说》记叙了一位“志尚刚正”的清官崔洪烈与贪财受贿者作斗争的事迹，形象生动，文笔风趣，亦是佳作。

第十一章　杂录与诗话

高丽时期出现了一种历来被文学史家称之为“稗说体”的文学。这种文学起初主要是围绕着诗句，叙述有关诗人的传闻逸事和诗句的来历等，也有一些对诗的评论。其后，它发展到杂录文人感兴趣的一切琐事、传闻、故事，甚至还有小品文，成了一种“杂录”文学。有点象中国古代的稗官野史。

中国《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朝鲜的“稗说”与此类似，但其范围更广。举凡正史、政论及应用文所包括不进去的东西，差不多都可包括在“稗说体”之内。在它产生的初期，诗话是它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和中国的稗官野史有所不同。

“稗说体”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不科学的概念。本书在这里基本上不用这个旧概念，而把它原来所包括的各类作品，分别纳入传说、人物小品、事理小品之中，放在另外的章节中叙述。剩下的，就是杂录（杂记）和诗话了，其实诗话本身大多数也具有杂录诗人及其作品的轶闻琐事的内容，而作为文学评论的诗评，相对地少一些。就这个意义而言，诗话也可以纳入杂录范畴。只不过因为它所占比例甚大，就把它单独归为“诗话”，以和其他与诗无关的琐闻杂录相区别。所谓“稗说”的“稗”字如果还带有“杂”的意思的话，那么，这里的“杂录与诗话”，倒也正和“稗说体文学”的字面含义相符。所以，本书有时也借用这个概念。

高丽时期出现的被称之为稗说文学的是：李仁老（1152—1230）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李齐贤的《栎翁稗说》。

第一节 杂 录

杂录内容很杂，有关于山水和山水诗画的，有关于历史名人轶事的，还有关于下层人物生活的。现举出若干较为重要者介绍如下：

关于名画《天寿寺南门图》的一篇传闻，见于《破闲集》卷中，全文如下：

> 京城东天寿寺，去都门一百步，连峰起于后，平川泻于前，野桂数百株，夹道成荫。自江南赴皇都者，必憩于其下。轮蹄阗咽，渔歌樵笛之声不绝。而丹楼碧阁半出松杉烟霭之间。王孙公子携珠翠引笙歌，迎饯必寄于寺门。昔睿王时，画局李宁尤工山水，为其图附宋商久之。上求名画于宋商，以其图献焉。上召众史示之。李宁曰："此臣所画天寿寺南门图也"。折背观之，题志甚详，然后知其为名笔。

这项杂录说明高丽画家艺术成就之高，也反映出中国宋朝和高丽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

关于智异山青鹤洞的一篇文章，也是《破闲集》中一篇杰作。文中记叙智异山有青鹤洞，其中"四隅皆良田沃壤，宜播植"。作者表示愿去该洞隐居，一次寻访，见一路"所过无非仙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竹篱茅舍，桃杏掩映"。但未能找到青鹤洞，于是题诗一首于岩石上。这首诗反映出武臣之乱后，文人不堪暴政，不满现实，力求避乱世、隐遁山林的思想。

《破闲集》中关于金庾信轶事的记载，以生活琐事显示出了这个人物的英雄本色：

> 金庾信……为儿时，母夫人日加严训，不妄交游。一日偶宿女隶家。其母面数之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长，立功名，为君亲荣，今乃尔与屠沽小儿，游戏淫房酒肆耶？"号泣不已。即于母前自誓不复过其门。一日被酒还家，马遂

旧路，误至娼家……公既悟，斩所乘马，弃鞍而返。

《破闲集》中关于崔致远的传闻记载，反映出这位新罗诗人与中国唐代诗人的友谊，也披露了崔致远的结局。对研究这位重要诗人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文昌公崔致远字孤云，以宾贡入中朝擢第，游高燕骈府。时天下云扰，筒檄皆出其手。及还乡，同年顾云赋《孤云篇》以送之云："因风离海上，伴月到人间。徘徊不可住，漠漠又东还"。公亦自叙云："巫峡重峰之岁，丝入中华。银河列宿之年，锦还故国"。豫知我太祖龙兴，献书自达。然灰心仕宦，卜隐伽倻山。一旦早起出户，莫知所归，遗冠屦于林间……

《栎翁稗说》前集二之中，记叙了郑仲夫、李义方等依靠残酷屠杀文臣起家的武人，为安定人心，与文臣联姻。所记述的拉拢文臣之事，可以补充正史中有关武臣之乱记载的不足，对了解当时武臣的处境、心理及其所用的策略很有帮助。

《破闲集》中还记载了一个妓女惨遭摧残的故事：

南州一妓貌美，有一郡守常召她侍候。郡守任满将离南州，唯恐该女将为他人占有，就命人用蜡烛烧灼她的双颊，毁坏了她的姿容。后来，诗人郑袭明路过此地，见到她的模样，甚为怅快，就作一首诗给她，嘱她但凡有官路过此地，就出示这首诗。此后，凡看到这首诗的人，都出钱周济她，她才能赖以度日。

这一短文表现出了一个封建官僚的残忍、卑鄙。文中所提郑袭明的诗，虽对该郡守的残暴持否定的态度，却没有任何谴责，而对受害女子的同情，也不过是如同对一件被损毁了的美好物品的惋惜。诗末"五陵公子恨无穷"一句，则为玩弄者叫苦，而不是为受害者鸣冤，反映出郑袭明封建士大夫的阶级立场与感情。

有些因不满朝政而不愿为统治者效力的人和事，也得到一些反映。《补闲集》卷下就记载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说高丽王朝初期，有一不知名的读书人隐居于智异山，操行高洁，不愿意

过问世事。国王闻说这位隐士，就请他出来做官。他闭门不出。来人在门外久等，不见人出来，打开门进屋一看，人已无踪影，惟独墙壁上留有两句诗："一片丝纶来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间"。说明此人是真正的隐士，而不是故作清高，沽名钓誉求官的人。

另一件是说高丽毅宗沉溺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当时忠肃公文克谦上疏劝谏，毅宗不听。后来武臣作乱时，他乘舆南迁。三年之后的癸巳年（1173），定山县维鸠驿新修公馆落成，请画工绘壁画。画工画了一个人身穿白衣头戴斗笠，骑马沿山路徐行，气氛凄凉。人们都不明白此图的含意。后来有个过客看见此图，叹息良久，说："这是谏臣去国图"。于是提诗于壁上：

壁上何人画此图，谏臣去国事几乎。

山僧一见尚惆怅，何况当途士大夫？

这一杂录以画、诗表现了正直的士大夫对朝政不满和反对武臣之乱而隐居的情况。

《破闲集》中还记录了制墨的艰苦劳动。作者写承办造墨的官员驱使百姓上山制造大批松烟，经过两个月才把墨造成。造墨的工人，"面目衣裳皆有烟煤之色，移就他所，洗浴良苦然后还城"。作者目睹这种情形，想到墨虽只一寸，但包含着劳动者的汗水，"重若千金不敢忽也"。作者还由此想到世人所穿所用的普通物品莫不如此。作者还引用了古人所作的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这一观点。

除此以外，稗说体作品集中还收录了一些民间传说。如《补闲集》卷下叙述司天监李寅甫因公事途中夜宿浮石寺时，与一女相通，后发现女为神物所变。同书又记录了一人日暮投宿，误入化成人形的虎所居洞窟的故事。

《栎翁稗说》前集中有徐神逸救活被猎人射中的鹿，因而得到好报的故事。

以上情况说明，杂录对保存民间传说是有贡献的。

第二节 诗　　话

“稗说体”作品中，还有不少诗话。其中有的记叙诗作的来历，有的叙述诗人的逸事，有的是诗评。上一节中所提到的“杂录”，其中也有的是带有诗话性质的，如关于青鹤洞的传说，也可看作是有关头留山一诗来历的叙述。崔致远与中国友人顾云的唱和诗句，也是这样。可以说稗说作品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既是杂录，也是诗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文人是把作诗当成他们最主要的文学创作活动，他们最关心诗，也对一切有关诗的事情感兴趣。因此在他们的杂录中，必然记录有关诗的一些传闻、逸事等等。

这里把诗话同杂录分开单另叙述，是因为有一部分短文带有诗评的性质，对诗作的褒贬有时就寓于有关的逸事、传闻的叙述之中。诗话也可以看作中古时期一种原始的、特殊的文艺批评或文艺理论。

如评郑知常，《破闲集》作者李仁老引用了这位名诗人一些诗句，最后评价郑诗为：

> 语韵清华，句格豪迈，读之使烦襟昏眼洒然醒悟，但雄深巨作乏耳。

又如关于李奎报，《补闲集》作者崔滋引用了诗人“臂筐桑女盛春色，顶笠簑翁戴雨声”的诗句，认为它“气与语俱生，为时俗所尚”。又引用了诗人“触石树腰成磊碨，入地泉脚失潺湲”的诗句，认为它“气虽生语犹熟，虽诗老亦惊”。

诗话不仅涉及朝鲜诗人，还有不少谈到中国诗人的，如《破闲集》中对中国杜甫作这样评价：

> 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也。

也有诗话把本国诗人的作品和中国的作品比较，如《补闲集》

卷中写道：

今观眉叟（李仁老）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中来。观文顺公（李奎报）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

通过诗话，今人可以了解到某些诗的来源和它当时的地位，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诗风和诗评论观点及其美学思想。诗话作品虽结构较为松散、内容驳杂，但它不失为研究古诗的珍贵材料。

第四编 李朝时期的文学

（公元十五世纪—十九世纪末）

概　说

李成桂一派推翻高丽王朝，建立了国号为“朝鲜”的李氏王朝以后，实行了以科田制为中心的若干社会改革，消除了大土地集中和农民受重剥削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是，十五世纪中叶，即从世祖篡位以后，再次出现土地兼并现象。开国初期实行科田制本来只不过是为巩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而进行的一种土地调整。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科田领受者——官僚的数目不断增加，加上在科田以外还有别赐田（受赐者在当代或永世享有收租权）、功臣田（享有永世受租权）的存在，农民遭受的剥削加重了。不少农民丧失了土地，土地兼并的现象日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一四六七年在咸镜道爆发了李施爱领导的农民战争，并迅速波及全国，虽说斗争对象只局限于贪官污吏，而不是针对封建制度本身，还是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农民所受剥削并没有减轻。土豪和政府实行的“还谷制度”（高利贷的一种）使得更多的农民破产、丧失土地，沦为地主土豪的奴隶。十五世纪后半期，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之间互相倾轧。在暴君燕山君当政以后，发生了几起大屠杀士林的事件。与此同时，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以黄海道、江原道一带为中心的由林巨正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五九二年，日本乘朝鲜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

军备时侵入朝鲜，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壬辰战争。和腐败无能的政府相反，朝鲜人民在各地组织义兵打击敌人。爱国将领李舜臣在海战中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明朝援军到达朝鲜支援抗倭，使敌军遭严重挫折。一五九七年，日本再度侵犯，次年，以失败告终。

壬辰战争中，人民损失惨重，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然而，李朝统治者想不到让人民休养生息，只顾征徭役、修宫殿、造王陵，加重了在战乱中已伤元气的人民的负担。王朝内部，党派之争更趋白热化，甚至导致了李适的武装叛乱。先称金（后金），后改称清国的满人于一六二七年、一六三六年，先后两度侵犯朝鲜。爱国群众进行了抵抗。因第二次侵犯是在丙子年（1636），史称丙子战争。最后李朝屈服于清。

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乱以后，朝鲜人民处境十分艰难。十七世纪初，废除了贡物制度，实施了大同法，多少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并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及商品生产、货币流通起了促进作用，十七世纪后半期农业才有所恢复。但这也刺激了封建剥削者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同时高利贷资本也在发展。十七世纪以后，掌权的两班① 仗势进行土地兼并，农民大众又渐趋破产。

十八世纪，农民大批流亡，人民起义迭起，党争激烈。十八世纪中叶，英祖采取了减少税贡、整理财政、废除酷刑及缓和党争等办法，暂时缓和了人民的不满，使走向衰弱的封建统治得到了喘息机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李朝政府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民间手业和矿业也都在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有所发展，和清朝的贸易也颇有增加。

但是，在货币流通、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些许改良措施，只能暂时缓和矛盾。十九世纪初年，正祖死，十

---

① 两班：原指高丽与李朝时期朝廷中的文臣武臣（或称"文武两班"），后以此两字泛指为官者以及官僚家庭出身、具有参加科举资格的人。属于"两班"的人，不论有否官职，均享有一定特权，其生活方式也和一般百姓有所不同。

一岁的纯祖即位，国舅金祖淳专权，政治趋向腐败，官衙贪污成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民受到两班、官吏、地主、高利贷的二重甚至三重剥削，民不聊生。一八一一年发生了洪景来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遭到了残酷镇压。此后，连年兵乱、饥馑、传染病、征收田税和库债等天灾人祸，使农业荒废，工商业萧条。一八六二年，晋州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封建制度至此已无可救药，李朝统治摇摇欲坠。

同前一个王朝相比，李朝统治阶级更加重视作为统治工具的儒家思想。传入的朱熹的学说这时十分盛行，出现了不少儒学大家如李滉、李珥等。一四四六年，李朝发布了由成三问、申叔舟、朴彭年、郑麟趾等人历时三年多创造出的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从此，朝鲜语能用自己的文字来记录，能够成为书面语言了。这是这一时期文化上的重大事件，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汉文仍为一般文人士大夫视为“正统”文字，仍被用以编书、作诗、写文章。编纂了大部头的历史书《高丽史》和《东国舆地胜览》、《八道地理志》等地理书。十二世纪发明的金属活字，此时期被广泛使用。创造和改良了宫廷与民间音乐的新乐器，把音乐艺术推向高峰。与中国国画风格颇为类似的朝鲜画，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十七世纪，由于朝鲜社会内部发展的需要和欧洲先进科学的传入，产生了一批实学派思想家，他们反对一些崇奉朱熹学说的儒学者们的空谈“性理”之风，主张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祖国的富强。十七世纪的李晬光、柳馨远，十八世纪的李瀷、洪大容，特别是朴趾源和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丁茶山，都是实学派的杰出代表。其中朴趾源的短篇小说对李朝封建社会消极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批判，在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

李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也很高。文人国语诗歌时调继续发展，

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长歌体裁——歌辞。时调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滉、李珥、尹善道，歌辞方面则是郑澈、朴仁老。他们的作品是这一时期国语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前几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李朝晚期金天泽编成的时调集《青丘永言》，金寿长编成的《海东歌谣》，是这一时期两部最著名的国语诗歌集。民间的歌辞如闺房歌辞、纪行歌辞也很流行。这些歌辞及杂歌的发展，为说唱文学和唱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李朝是小说空前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国语小说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学史划时期的事件。在壬辰战争以前，就出现了象金时习的《金鳌新话》这样的优秀传奇作品集，之后又出现了批判统治阶级的寓言小说：林悌的《鼠狱说》和《花史》。壬辰战争以后，出现了以爱国小说《壬辰录》为首的一批朝鲜国语小说如《朴氏夫人传》、《林敬业传》、《洪吉童传》以及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等。这些小说，或反倭、反清，或揭露统治者的腐朽黑暗，或表现了争取自由的精神。

在国语小说及国语诗歌如时调、歌辞、杂歌的影响推动下，出现了说唱文学，以说唱脚本为基础的著名小说《春香传》、《沈清传》等相继出现。

朝鲜国语小说的大量涌现，表现出朝鲜民族意识的增强，而朴趾源的一系列汉文文言小说的出现，则反映出封建末期一批先进学者迫切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强烈愿望，从体裁上看，这种小说也是高丽时期人物小品的一种发展。

为了突出李朝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本编分上、中、下三部分叙述李朝前期、中期及后期文学的发展情况。

上编　前期（十五—十六世纪）

第一章　国语诗歌的发展

第一节　有关李朝建国的颂歌

李朝建立以后，除了在经济上实施了一些新政策以巩固其政权以外，还在文化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它的统治地位。大力推广儒家思想就是其重要措施之一。

李朝统治者鼓励与提倡文人士大夫创作颂歌，目的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收买民心。此类颂歌充满了封建的忠君思想。为了便于理解、普及，它采用朝鲜国语。一些颂歌逐渐成为“宫中乐歌”。

这类颂歌多载于《乐学规范》和《乐章歌词》。主要的是郑道传的《纳氏歌》、《新都歌》、《文德曲》、《靖东方曲》，权近的《霜台别曲》，卞季良的《华山别曲》等。后两者是以“翰林别曲体”（即“景几加何体”）写成的。

以郑道传的《文德曲》中的《开言路章》为例：

法官有严深九重，一日万机纷其丛。
君王要得民情通，大开言路达四聪。
开言路。君不见：
我后之德与舜同，
我后之德与舜同！

以上是译文。其实，也就是从原文中除去朝鲜字后所剩下的汉字，可见汉字占绝大部分。它类似《翰林别曲》，是由汉文诗歌向朝鲜国语诗歌的一种过渡形式。

颂歌中篇幅最长的，可说是集各种颂歌之“大成”的，是《龙飞御天歌》。

《龙飞御天歌》是朝鲜文字创制后的第一篇国语诗歌，由训民正音的创造者之一郑麟趾和一些人奉世宗之命创作的。它歌颂了直到太宗（李芳远）为止的李氏六代的“丰功伟绩”，叙述李朝建国过程的艰难，颂祝李氏王朝基业千秋万代。

全歌分一百二十五章，除第一章和第一百二十五章以外，每章都具有两首诗，大体上，第一首是吟咏中国古代帝王的业绩，第二首歌颂李朝的业绩。每首诗都是朝汉对照的，先出现朝文，后面附有该诗的汉译文。汉译文一般是四言诗，试以第六章为例：

商德之衰，将受九围。西水之浒，如市之从。

丽运之衰，将受大东。东海之滨，如市之从。

《龙飞御天歌》是一首最典型的献给封建君王的颂歌，它把封建统治者加以神化，“证明”他们是天生的超人，王朝也将万世永存。在思想内容上，这首歌除有助于了解李朝初期的一些政治思想和当时人对中国、朝鲜的历史事件所持的态度以外，并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它是朝鲜文字创制以后文人士大夫以朝鲜文写成的第一首长诗，对语言研究具有很大价值。《龙飞御天歌》并未在民间流传开来，它只是作为一种宫廷诗歌，在宫中举行庆典时演唱，可以把它比做李朝封建统治者的“国歌”。

继《龙飞御天歌》后，又出现了一首形式上与它类似的宗教歌《月印千江之曲》。世宗为追荐超度昭宪王后，命世祖首阳大君撰写《释谱详节》，经他披阅之后，创作了这首歌，是一种寺庙诗歌。全篇已失传，只残存一部分。《月印千江之曲》的创作，和《龙飞御天歌》同样地说明，一向以汉文为正统而把朝鲜语视之为俚词鄙语的统治阶层，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已感到有必要对本国语言给予一定的重视了。这说明朝鲜国语文学的兴起，已逐渐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

第二节　时调的盛行

在高丽民歌的深远影响下，高丽末期的一些文人在传统国语歌谣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了时调体裁。到了李朝时期，这一体裁已有很大发展。在李朝前期，它仍限于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虽然也有些下层人物创作的时调，但这些时调的意图也是迎合文人士大夫趣味，基本内容和情调还不是反映下层的。尽管如此，它已多少表露出时调创作向下层发展的端倪。

李朝文人士大夫仍以汉文创作为主。但此时朝鲜文字已出现，李朝统治者还利用它创作了宫中大典或宗教仪式上的诗歌，这对文人士大夫创作国语诗歌多少是一种推动。一些文人士大夫在创作汉文诗之余所创作的时调，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高丽时期，可以说，进入李朝以后，时调的创作有了飞跃的发展。

高丽灭亡，李朝新建。王朝的更迭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他们对旧王朝怀有一片忠心，当日趋没落的高丽王朝大势已去时，这种忠心就化成为了"惜旧"和"怀旧"的心情。高丽遗臣的这类怀旧时调，有的作于李朝刚刚建立的时期，其内容和高丽末期的惜旧时调毫无二致，已把它归纳在高丽末期的文学中加以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要介绍的是歌颂新王朝的时调、赞扬扩大北方疆土的时调及忠君、道学和描写隐遁生活的时调等。

李朝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内，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得到了调整，社会出现了稳定的时期，即所谓"太平岁月"。一些享受高官厚禄的士大夫，怀着感恩戴德之情，把它归功于君王，如孟思诚（1360—1438）就是这样。

孟思诚作过李朝的宰相，告老还乡以后，尽情欢度他的晚年，他所作的时调《江湖四时歌》是他的贵族式的田园情趣的表现，也是他对君王的颂歌。按春夏秋冬分为四首，仅选春天一

首：

满江春色满湖春，狂兴不觉起。

手擎酒杯坐溪边，下酒肴有锦鳞鱼。

此身悠闲自在，

全赖君王恩赐与！

总共四首，末尾一句全是"全赖君王恩赐与！"对君王感恩戴德，表现得十分露骨。

卞季良（1369—1430）的《治理天下》更直接地歌颂了李朝初期的德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事如何，

亿兆苍生心悦诚服否？

康衢闻童谣，

方知太平岁月乐悠悠。

李王朝的建立，暂时减轻了人民的痛苦，带来了较为安定的局面。但是，这里对于李王朝的歌颂只是因为它为统治阶级带来了富贵荣华，悠闲安适。这种诗歌的作用只不过是让人们了解封建社会稳定期的贵族生活情趣而已。

朝鲜认为对国家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扩大北方疆土的斗争，在士大夫的时调中有所反映。李王朝建立以后，自女真人手中夺到了若干土地，从而把朝鲜的疆土扩充到图们江沿岸。同时在东南边，进行了对马岛的征伐，从而保障了李朝国土的安全，也造成了约二百年间不受外族侵扰的安定、和平局面。

在扩大北方疆土的斗争中，金宗瑞是一位骁将。一四三四年他任咸镜道都节制使时，在进击女真的行军途中，他作了时调《朔风》：

朔风吹树梢，寒月照雪海。

手执长宝剑，屹立在万里边塞。

一声呼啸脱口出，何物敢当我气概？

简短的诗句表现出了这位武将叱咤风云的豪迈气概。

另一位将军南怡（1441—1468）所作时调《拔出长剑》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英雄气概。

拔出长剑提在手，登上白头山巅。

唯见朝鲜一叶，胡越困周边。

何时方能一扫南北风尘？

第二行原文所用汉字为“一叶鳀岭”，鳀岭为朝鲜的别名，朝鲜半岛地形如一树叶，故有“一叶鳀岭”的说法。“胡”、“越”是借用中国对北胡、南越的提法，用以象征当时朝鲜北边的女真和南边倭人。这首时调意境虽不如金宗瑞的《朔风》，但气势雄壮，表现出作者的意志与决心。

李朝前半期统治阶层人物的时调中，有相当一批作品是表现“忠节”思想的，作者主要是反对首阳大君（后为世祖）篡端宗王位的一些大臣。其中有人罹难，有人幸免，分别被称为“死六臣”、“生六臣”，如成三问、朴彭年、俞应孚、元昊等都属于此类人物。他们拥戴端宗，坚决反对世祖篡位。幸存者，也拒绝在世祖手下做官，隐居山林，以示抗拒。其实这些忠臣不过是从封建的正统观念出发，表示了对旧主子的留恋而已。但是，这些人不顾个人安危荣辱的气概和时调中丰富的形象和生动的比喻，则得到后世人的喜爱，并被读者借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如成三问的《此身》就属于这类作品：

此身逝去化何物？

化为长松一株，挺立蓬莱山顶。

白雪满乾坤，惟见长松独青青！

时调中表现出了“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的思想，境界甚高，是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歌颂。成三问的另一首时调《首阳山》，虽然也有这种精神，但形象较差，并不感人。

世祖为了夺取王位，在篡位以前，就开始诛戮异己。名将金宗端和皇甫仁因此一起被害。“死六臣”之一的武将俞应孚作了

《昨夜》来悼念死者。作品中，俞应孚以狂风和霜雪象征首阳大君一派邪恶势力，为被害的年轻人而感到痛惜和愤懑。

王邦衍的时调《遥遥千万里》也是写世祖篡位事件的。世祖篡位后，王邦衍任禁府都事。奉世祖之命，他到宁越把世祖所赐的毒药给已被废黜的端宗，端宗饮药而亡。他是被迫做这件事的，当然是违心的。归途中，他行至江边，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内心感到痛苦，写下了这首时调：

遥遥千万里，美人已逝去。

我心魂难定，独坐在江边。

江水呜咽夜不停，有如我心情！

后来，世祖势力衰微时，王邦衍的子孙靠这首时调而得以免遭株连。

以上有关世祖篡位的时调说明，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所激起的波澜中，时调被士大夫用作为抒发内心感情的工具，当时时调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了。

李朝前半期的时调中还有一批以宣扬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作品，它一般是罗列儒家经典中的句子进行说教，如周世鹏(1495—1554）的《五伦歌》、《君子歌》等。但也有一些时调包含着某种积极的思想观念。如杨士彦（1517—1584）的《泰山》就是其中之一：

泰山虽高，毕竟处于天幕下。

攀登再攀登，岂能上不去？

懒于攀登者，徒唤山高可奈何？

这首时调讲的是做学问不应当在困难前望而却步，只要不断努力奋斗，坚持不懈，总可以登上成功的高峰。它迄今广泛流传，被用以激励人民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永攀高峰的精神。

郑澈（1536—1593）的《老者》写的是怜老、敬老的思想，感情敦厚，语言质朴，整个时调用朝鲜国语写成，没有使用汉字词。

头顶重物、背负行李的老者，把它放下交给我！

我们年轻人，石头不嫌沉。

暮年已足悲，怎能身负重物这般累？

时调日益在两班贵族中流行的同时，也开始引起了社会下层人的兴趣。首先创作时调的下层人是娼妓与艺人。他们本以歌唱为职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迎合上层人物的趣味。贵族士大夫对时调的喜爱不能不影响到这些人。于是，以能歌善诗名噪一时的名妓黄真伊（本名黄真，1516—？），也作了些表现恋情的时调，寄托自己的感情。如《我何曾》、《青山》、《冬至月》、《青山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我何曾不守信义把君欺？

夜已三更月西沉，苦等不见郎君归！

秋风树叶籁籁响，心中一片愁绪！

这是殷切期待情郎的一首哀婉动人的时调。深夜怀人，秋风更添愁绪。首句的质问，完全是一个痴情女子的口吻，带有谴责"负心汉"的意思。

此外，黄真伊的《冬至月》也是一篇佳作。在这篇时调里，作者描叙了没有情人陪伴的冬至月之夜是如何寂寞。她希望把这漫长而寂寞的夜截成两半，把其中的一半盘绕起来深深藏好，等到心上人到来的夜晚，再把它打开，使得欢聚的夜晚能显得长些。

黄真伊的爱情时调中总是蒙上一层难以排解的哀愁，这和她的处境有关。这样一些时调是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为自己不幸命运发出的叹息，反映出封建社会中一些不幸女子的痛苦。就这点来说，黄真伊的爱情时调也是对封建社会罪恶的一种委婉的控诉。虽然不是大声疾呼，但它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李朝前半期的时调中还有一些表现失意的士大夫的出世思想和隐逸生活的作品。

李朝建国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宗时期，科田制实际上已经废

止，土地关系又趋紊乱，同时还发生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士祸”、“党争”。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彼此倾轧争斗。一场场内讧造成了一批批政治上失势和官场上的失意文人学士。他们之中，有些人怀着怨气写了一些发牢骚的时调，非难朝政，宣泄不满。如李恒福（1556—1618）就属于这个类型。

时节如彼，人事如此。

既如彼，又岂能不如此？

是是非非，终化为声声叹息。

李恒福的这首时调，话虽然说得不明不白，吞吞吐吐，但是可以看出作者满腹牢骚，无非是慨叹时局之紊乱，吐露胸中的愤懑罢了。

党争中失败的另一些人则为逃避掌权的政敌的迫害，或遁入深山幽林，或索居于江畔湖岸，度过他们那种无所事事的寂寞岁月。由于远离朝政与官场，生活在比较容易接触到平民的地方，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民间流行的口语文学的影响，于是就用朝鲜国语创作时调，抒发他们的心怀。

这些时调之中，有些是不满意和抱怨朝政的，而大部分则是寄沉痛于悠闲，标榜洒脱清高、孤芳自赏的。有的吟咏山川草木、风花雪月，有的甚至以渔夫自居，表示安于清贫闲适的生活，永不参与朝政。这类时调在朝鲜文学史上一般被称为“江湖时调”，是一种朝鲜中古式的山林文学或田园文学，其情趣仍然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只不过反映了他们生活中的另一面——政治失意时寄情于山水的情形。

李朝前半期这类时调的作者为李贤辅（1467—1555）、宋纯（1493—1582）、李滉（1501—1570）、李珥（1536—1584）等人。

李贤辅还将当时传唱于乡里巷间的时调《渔父词》（作者不明）加以增删修改。这些作品也包含和表现了他自己的田园山川情趣。举其中的一首为例：

山头闲云起，水上白鸥飞。

无心无情者，唯有此二类。

平生忧烦皆摆脱，悠游萧散随尔类。

另一位山林隐逸时调作者为宋纯。他号企村，晚年辞官隐居于潭阳，在霁月峰下构筑"俯仰亭"，徜徉逍遥于山川美景之间，以书、酒消磨岁月，过着悠闲的日子。他所作的《俯仰亭歌》描摹歌吟山川林壑之美，很富有意境，但可惜原文不传，收于他的文集《企村集》中的只是其汉译文。《俯仰亭歌》被一些论诗者誉为写景寄兴的绝妙佳作。洪万宗的《旬五志》说："《俯仰亭歌》，宋二相纯所制，说尽山水之胜，铺张游赏之乐，胸中有浩然之趣。"

《遣闲杂录》则说："《俯仰亭歌》则铺叙山川田野幽夐旷阔之状，序台蹊径高低回曲之形，四时朝暮之景，无不备录，杂以文字，极其宛转，真可观而可听也。宋公平生善作歌，此乃其中之最也。"

从宋纯下面一首时调中，可以看出他隐居山林、寄兴江湖的思想出发点和人生态度。

所听立即忘，所看装未见。

人事已如此，他人是非何相干？

座上客已满，且高举酒盏！

清高出世的时调之中，相当一部分生动地描写了朝鲜的锦绣山河。时调的作者，在隐居湖岸、避难山林的悠悠岁月中，体会到了自然风光的美丽，为它所陶醉，以对景色的歌颂来弥补心灵上的空虚，并以清风明月花鸟林泉为伴，表示对当朝者的不满与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抵触情绪。但他们巧妙地运用了朝鲜民间的语言，借助于汉文富于艺术形象的优美辞藻，细腻地描绘了朝鲜的山川并体现出朝鲜的语言美。因此，在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上起了一定作用。可以说，比起"翰林别曲体"的国语诗歌，它在摆脱汉字的束缚而又巧妙地利用汉字词汇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作

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作家的历史局限性在于：由于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士大夫高雅萧散的思想情绪，以及他们所受的汉文经典的教育和汉文文学对他们的深远影响，他们还不可能充分摆脱汉诗词的影响，作品中还有汉诗词的痕迹，也没有能充分发挥朝鲜本民族的语言美。故一般汉文修养不太高的现代朝鲜人很难欣赏这些时调。尽管如此，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这以后，以时调歌吟自然美的诗风，逐渐兴盛，直至产生了象李滉、李珥、尹善道这样的山川田园时调作者和大量优秀作品。除政治原因外，可以说，这也是李贤辅、宋纯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

李朝前半期的文人国语山林文学之一——江湖时调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滉和李珥。

李滉号退溪，仁宗时官至赞成，理学造诣很深，被公认为是朝鲜理学的最高权威，有“东方夫子”之称。其有关性理的论文和诗歌被人奉为儒家文学的楷模。比他晚生三十五年的李珥号栗谷，也是儒学界中的著名人物。他们都被卷进党争，并曾一度成为党争中的主角。隐遁之后，都作过一些时调。由于他们的汉文修养和在儒学界的地位，他们的时调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陶山十二曲》是李滉的代表作，《高山九曲歌》则是李珥的名篇。前者以“言志”为其特色，后者以写景引人入胜。

《陶山十二曲》中有着重于“言志”的，也有偏重于“言学”的。所谓“言志”，就是借景抒怀，吐露他隐遁于山水的心情；所谓“言学”，就是宣扬儒家思想。全曲由十二首时调构成，结构上属于“连时调”：

此亦如何？彼亦如何？

吾等草野愚人，又将如何？

更何况，泉石症已入膏肓，何必改弦更张？

这是全曲的第一首。话虽然说得吞吞吐吐，但意思还是清楚的：今生今世已安心过田园生活，不愿再入世为官了。字里行间隐含

着他的满腹牢骚和失意的心情。

但这位头脑里浸透了儒学思想的学者，对最高层的统治者——君王依然是旧情难忘，在第四首中，他又情不自禁地怀念起"美人"——君王来了：

深谷幽兰，馨香四散。

白云在水，美妙悠然。

彼美一人，更令我幽思难忘！

"幽兰"、"白云"比拟他自己，而"彼美一人"则指的是君王。身在山水之间，而心存魏阙之下。

李珥的《高山九曲歌》也是一种连时调。连序曲在内，全曲由十首时调组成。从序曲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环境和思想：

高山九曲潭，世人虽罕知。

诛茅卜居后，常有人来访。

吁，且将此处当武夷，以朱熹夫子为榜样。

武夷指福建，是朱熹的住地。隐居深山幽谷，学习朱熹的学说，讲论经学，闲来吟风咏月，这就是作者的生活。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情趣正是失意的儒生所共有的。全曲尽情地歌颂了自然景物。

第三节　高丽乐歌的整理

高丽末期，人民在反对高丽王朝的封建压迫的斗争中，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高丽民歌的发达及其对文人士大夫文学的影响，部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李朝建国以后，一面从经济上巩固它刚建立起来的统治，一面在思想上、文化上加强儒家思想的传播。李朝统治者提倡儒家的所谓"人伦"思想，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民背离封建观念。为此，他们对民间文学"乐歌"进行了"整理"来对付人民摆脱儒家藩篱的趋势。与此同时，还网罗一批御用文人炮制"颂歌"之类的东西。

李王朝统治者"整理乐歌"的办法是：

一、把不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带有追求爱情自由的乐歌，一概称之为"妄诞之词"或"淫词"，加以排斥。

二、尽量排斥以国语为主而不是以汉文为主的乐歌，把它们称之为"鄙词俚语"。

他们或者是把曲子连同歌词一齐砍掉，或者单单删去歌词，而保留原曲，代之以适合他们需要的新词。

李朝世宗时，为了制订本朝的乐歌，收集了高丽时期遗留下的各种民歌，朴堧（1378—1458）参加了高丽乐歌的收集工作。他收集的主要是有所谓"君臣道合"、"父子恩深"、"夫妇节义"、"兄弟友爱"、"朋友诸信"、"宾主同欢"等内容的乐歌，把它们作为"人伦世教"的"正风"。对于大胆歌颂爱情的歌谣，则斥之为"变风"，贬之为"淫邪"、"逞欲"之词。

李朝的《成宗实录》二百一十五卷表明了当时对一些乐歌的态度："宗庙乐，如保太平，定大业则善矣。其余俗乐，如《西京别曲》，男女相悦之词，甚不可。乐谱则不可卒改，依曲调别制词何如？"这就是李朝统治者在乐歌整理中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由成俔（1439—1530）于成宗二十四年（公元1493年）编成的《乐学规范》中，就排斥了大量的民歌。其中的《井邑词》、《动动》，只不过是为了说明曲谱的来源偶然在夹注中保留下来的。十六世纪，朴浚于宣祖三年（1570）编成了《乐章歌词》，思想似稍有松动，保留了较多的民间歌谣，如《别离》、《西京别曲》、《青山别曲》、《思母曲》等，但是可以肯定，仍有不少好的民歌被统治者摈弃而永远失传了。尤其是那些直接讽刺统治阶级的民谣之类，如今只能在汉文的野史、杂著中偶有发现，其原文面貌也无从了解了。

李朝对乐歌的"整理"，不但造成许多有价值的乐歌失传，而且使得李朝前半期的诗歌中也难以出现充分表达人民意志和思想感情的作品，使国语文学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统天下，造成歌功颂德的、道学的和隐逸的时调霸占国语诗坛的局面。个别作者

如黄真伊的恋情时调，只是由于适合上层人物的趣味和享乐需要才能传世。至于以政治为内容的时调，则往往和忠君思想相结合。爱国时调是其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但可惜在这一时期中，它的数量太少了。

第二章　歌辞的出现与优秀的歌辞家郑澈

如果说，时调是国语文学中的短歌形式中的一种，那么歌辞则是国语文学中的长歌形式之一。它以四音节为主，夹以3·4或4·5音节排列，比时调长得多，长度不拘，无分节或分段。

歌辞这种体裁产生于十五世纪中叶，也就是在时调产生不久并正在发展的时期。歌辞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与时调相似，即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歌的影响下产生的。所不同的是，时调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歌辞的出现，而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则为它提供了一个时调萌芽时还没有具备的文字条件。可以说，歌辞是在比时调更为良好的文学环境和较优越的条件下产生的。

一般认为，第一首歌辞是丁克仁(1401—1481)的《赏春曲》。丁克仁在世宗时代当过"生员"，后历经文宗、端宗、世祖，一直做官，宦途顺利，后年高退归故乡泰仁，教书、作诗自娱。成宗因他告老还乡后仍然"诲人不倦"，加赐为"三品教官"。

丁克仁号"不忧轩"，著作有《不忧轩文集》，以上所提到的《赏春曲》就收集在这部集中。和时调的作者孟思诚一样，丁克仁的歌辞《赏春曲》，也是歌唱自己的"荣华安乐"，主张"百年行乐"的作品，充满了贵族式的闲情逸致。试举其中一段：

身居山林，　　其乐难言。
茅屋数间，　　前有碧溪。
松多竹密，　　郁郁葱葱。

其中有我，　　风月主人。
昨日冬去，　　今朝春回。
桃花杏花，　　灿然怒放。
细雨之中，　　绿树成荫。
芳草遍地，　　竞发嫩青。
虚掩柴扉，　　小坐亭中。
山日寂寂，　　逍遥吟咏。
闲中真味，　　何人能知？

这种歌辞的思想内容平淡无奇，但是，作为国语文学中新出现的第一首长歌，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有一定意义。如上所引，它已完全摆脱了“翰林别曲体”那种死板陈旧、限制极严的旧形式，也不象《翰林别曲》一类诗歌那样几乎完全靠汉字来表达意思了。

《赏春曲》中仍然使用了不少汉字词，但朝鲜国语已不是无足轻重，而是全篇每句中所不可缺少的了。如果说，《翰林别曲》一类诗歌几乎只是在体裁、形式上接受了朝鲜民歌影响的话，那么，歌辞《赏春曲》则是在形式（3·4调或4·4调）上和词汇上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尽管内容和用词都仍带有较浓厚的贵族气味，但一种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人国语文学体裁——长歌的形式已由它奠定了。

《翰林别曲》体太死板，时调又太短，于是歌辞就应运而生了。歌辞后来发展到长达数十行，自然内容比时调丰富多了。这种体裁在十六、十七世纪时相当盛行，之后，它又超出文人圈子，转向民间，对李朝后半期的说唱文学及韵文小说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歌辞的主要作者，在十六世纪有郑澈，在十六、十七世纪之间有朴仁老。

郑澈（1536—1593）号松江，出生于汉城，二十八岁时中举，后任北关御史等官职，在四十岁时卷入党争，为“西人”一派的

中心人物。随着党争中的胜负，他在宦海中几度沉浮。壬辰战争的第二年，即公元一五九三年，他死于江华，时年五十八岁。汉诗文与朝鲜国语诗歌均擅长，著有《松江集》、《松江歌辞》。他的汉诗风格豪放，不受腐儒思想的束缚，被誉之为“清新警拔”。

郑澈歌辞值得肯定的主要方面是对朝鲜锦绣山河的热情讴歌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

他总共写了五篇歌辞，即《关东别曲》、《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星山别曲》、《将进酒》。其中前三篇最著名，为世人传诵吟哦。

《关东别曲》是他四十五岁时在江原道作观察使时所作的。在这首长诗中，他描写了朝鲜著名的风景区——金刚山的奇妙景致。他以对祖国锦绣河山的高度自豪感，歌颂了金刚山的万瀑洞、金刚台、丛石亭、毗庐峰等名胜，笔墨酣畅，文字清丽，使读者在领略歌辞音韵美的同时，宛如身临其境，感受到朝鲜山川美妙多姿、无限壮丽。

这篇作品由李植（1584—1647）译成汉诗。译者用的是七言古诗的形式，未能把原诗的 3 · 4 调和 4 · 4 调节奏体现出来，不过传达出了原意。试看其中描写万瀑洞的一段：

百川洞边万瀑洞，俯瞰飞流千叠层。

银虹之脚玉龙尾，喷薄声转十里外。

入耳初讶殷雷迅，举目还疑飞雪洒。

此外，如描写金刚台的“万二千峰数历历，峰峰郁结气磅礴，”描写瀑布的“千寻壁瀑青空挂，一半银河素机开”等句，都是简洁生动，用词不多而引人入胜的。这首歌辞奇丽豪放，颇为人们所称道。金尚宪（1570—1652）把郑澈比作李太白，他这样地评价了这首歌辞：

关东歌曲最清新，东府流传五十春。

文采风流今寂寞，世间谁见谪仙人？

著名诗人权韠（1572—1612）在《赠杨理一》的七言绝句中

也高度赞扬了这首满含奇情异采的歌辞：

我逐浮名落世间，仙坛有约几时还？

逢君听唱关东曲，领略金刚万叠山。

金尚宪歌颂了郑澈本人，而权韠则写出了《关东别曲》中对金刚山的描写所给予他的美的享受。从这两位文人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历来被士大夫贬为非正统的“俚言”诗歌，已受到了重视。借助于郑澈这样爱国作者的佳作，国语文学在文人文学中的地位提高了。它虽然还没有取得和汉文文学同样高的地位，并依旧被视为文人“余技”，但已得到了民族意识较浓的文人的热情关注了。

郑澈的前后《思美人曲》是他被弹劾回故乡昌平后作的，表达了他郁郁不得志的心情。郑澈的歌辞《思美人曲》和一般的怀念君王或思念丈夫（或情人）的国语诗歌相同，使用了朝语发音为“nim”的这个词，既能指君王，也能指郎君。这首歌辞尽管是朝鲜国语的，郑澈自己却给它起了一个纯粹是汉文的题目叫《思美人曲》，其实，亦可叫《思君曲》。

郑澈是以一个失恋的女子的口吻写这首歌辞的，其目的虽是怀念君王，希望有朝一日重新被起用，但由于对男女恋情写得十分细腻入微，反而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目的，被人们当作“情诗”传诵开了。后人李安讷所作七绝《闻歌》就反映了这一点：

江头谁唱美人词？正是孤舟落月时。

惆怅恋君无限意，世间惟有女娘知。

《思美人曲》的内容是这样的：主人公（女子）和她的情郎彼此海誓山盟，永不分离。但不久因故分开。女子昼夜思念。春天，她看到了梅花，想折下送给郎君。夏天，她独坐香闺，想着做一件衣服给郎君送去。秋天，她仰望星星与月亮，希望它们的光辉能照耀自己的意中人。冬天，她祈祷阳光温暖情人的身子。由于昼夜相思，她卧病在床。病中她仍梦想自己死后化为蝴蝶，飞到郎君身边，停在他衣服上，与他永远在一起。

金相肃用屈原的《离骚》所用的体裁即骚体把它译出。这种体裁虽无法表现原文的四音节之美，却是大有深意，也是符合作者郑澈作此篇的原意的。

著名国语小说《谢氏南征记》的译者金春泽(1670—1717)在他的《北轩集》中对这两篇歌辞所作的评价，是具有代表性的。

> 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于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上，庶几遣屈平之《离骚》。

郑澈在故乡昌平所作的歌辞还有《星山别曲》，其中描绘了星山的秀丽景致和自己的闲适的隐居生活，抒发了他寂寞、凄凉、官场失意的忧郁心情。

郑澈还写了八十余首短歌——时调。他的时调的最大特点是尽量使用民间口语——朝鲜国语，而极少用汉字词，汉字词所占的比例同现代朝鲜诗歌和小说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可以说郑澈的八十余首时调把民间语言潜在的表现能力极大地发挥出来了。在当时的文人时调和歌辞中，不少富于形象性、艺术性的修辞与丰富生动的描写，往往借助于汉字词乃至汉文的部分诗句。即便如郑澈以后的时调大家尹善道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点，可是郑澈却作到了尽量少用汉文词、最大限度地使用朝鲜国语。

郑澈歌辞的三首代表作之中，都多少带有热爱祖国和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如前所述，《关东别曲》带有对祖国山川土地的自豪感。至于两首《思美人曲》，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表现了郑澈对于君王的怀念，对于自己宦途挫折的一种叹息。不过由于当时朝政腐败，郑澈的这种“忧时恋君”的歌辞中实际上还包含着他为当时国势的日趋衰微、险象丛生，以及种种黑暗现象猖獗而担心之意。怀有“尊主佑民”思想的郑澈，不可能将国家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完全置之度外。

国政紊乱终于招来了倭寇的入侵。他写于壬辰战争时期的汉文诗《新年祝》和《金沙寺》就说明了这一点：

十日金沙寺，三秋故国心。
夜潮分爽气，归雁有哀音。
虏在频看剑，人亡欲断琴。
平生出师表，临乱更长吟。（《金沙寺》）

忠诚爱国之心，真挚感人。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郑澈，虽具有封建正统思想体系中的最核心的思想——忠君，但他对侵略者倭人的憎恨和为驱逐倭人而奋然求战的心情也是不可忽略的。李朝政治的黑暗混乱给了外敌以入侵之机，郑澈为此深表忧虑，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从风格上看，郑澈前期歌辞豪放、明朗，后期阴郁悲凉，这和他个人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

郑澈在朝鲜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国语诗歌大大推进了一步。他歌辞中的优美诗句向人们证明：朝鲜语有完美的表现力，国语诗歌文学有广阔的前途。他是鼓舞后代文人创作国语文学的榜样。李朝后半期以朝鲜国语写成了《谢氏南征记》等煌煌巨著的金万重就认为《关东别曲》、前后思美人曲这三篇歌辞是"我东之离骚，自古海左之真文章"。实际上金万重以国语创作小说，也是受郑澈优秀歌辞影响和启发的结果。

后人李选把郑澈三篇代表作誉为"虽屈平之楚骚，子瞻之词赋，殆无以过之"，并对郑澈的遭遇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当时，除郑澈以外，还有一些人作歌辞，歌辞文学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车天辂作《江村别曲》，陈复昌作《历代歌》，林亨秀作《鳌山歌》，白光弘作《关西别曲》，曹植作《南冥歌》、《王乔歌》，宋寅作《水月亭歌》等。此外，还有些无名氏作的歌辞。这说明，歌辞已逐渐成为文人创作国语诗歌的一种爱用的体裁了。

第三章　李朝前期的汉文诗

李朝时期，汉文诗作者和作品数量都有了很大增长。由李朝末年的学者张志渊所编的《大东诗选》，选辑了由古朝鲜直到李朝末期的历代两千余家的各体诗，共十二卷。其中李朝以前即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和高丽时期，即公元一——十四世纪的汉文诗总共只占一卷，其余十一卷基本上是李朝时期的作品，可见李朝汉文诗数量之多。

李朝统治者采取了崇儒抑佛的方针，提倡朱熹的理学，称之为“朱子学”。由此产生了一批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被称之为道学派。道学派以赵光祖（1482—1519）为代表。他受中宗的宠遇，以理学为治学的根本和治政的指导思想。他反对讲究言辞文采的文学，斥之为“浮华轻薄”。他的这种主张受到了以南衮为代表的词章派的反驳。可以说，李朝前期的汉文诗是在和道学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这一时期的汉文诗虽然大多数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歌功颂德、吟风弄月、应酬交际与炫耀才华、博取官职的工具，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一些诗人如李石亨、南怡、徐居正等仍然继承了高丽时期李奎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写了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和爱国情绪的诗篇。还出现了一些富有民间气息的诗歌和闺情诗、田园诗、写景诗。有些人则为改变诗风提倡向唐诗学习，如被称为“三唐”诗人的崔庆昌（1539—1583）、白光勋（1537—1582）、李达（1561—1618）三人。还出现几位女诗人，创作成就超过了李朝以前的女诗人。

李朝的汉文诗作品虽然繁多，但是由于朝鲜文字的产生，一些文人学者多少也使用朝鲜国语创作文学作品。时调盛行，歌辞

创作成就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汉文诗歌在朝鲜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渐让给了朝鲜国语文学。但就作品的思想意义及其深度和艺术技巧上的成熟程度来看，汉文诗仍比朝鲜国语诗歌高出一筹，同时一般文人也仍然以写汉文作品为主，其数量仍远远超过国语诗歌。因此，在大力肯定朝鲜国语诗歌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这里也对汉文诗进行重点介绍。

李朝初建，王室就为自己大造宫殿，劳动人民被迫从事繁重劳役。他们的怨声在民谣《南山伐石去》之中已有所反映。李石亨（1415—1477）的汉文诗《呼耶歌》则更形象地反映出采石工人的痛苦。

诗的一开头就有声有色地把采石伐木的场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呼耶呼耶在南北，呼耶之声何时息？

千人输一木，万人输一石。

宫殿的建造必需粗大的木材和大石头。这些笨重的建筑材料在当时是靠手工劳动来采伐搬运的。"呼耶"这一感叹词一开头就反复出现三次，喊出了劳动者的疲劳和痛苦，声声充满血和泪。

华山之石拔几尽，白云之木斫几秃！

石尽山秃宁可虞，填坑仆谷民可惜！

山石都被采完了，高耸入云的树木也快要被伐尽了。可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但更可怜的是人！多少役夫、多少壮丁被这艰苦的采石伐木劳动耗尽了体力，在山谷、深坑里倒下死去。

劳动那么艰苦，监工的——吏卒却是那么凶狠、残酷："吏卒捶督如电击"，使得那些"朝未食、夕未餐"、"可怜腰间空垂橐，口燥喉哑声难作"的饥渴难忍的役夫一个个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声衰力竭一僵仆，尘飞溅血万人足"。诗人最后点出：造成这种残酷现象的正是君王的穷奢极侈。他含蓄地唱道：

我愿天公生大材，不置山林置君侧，

——作我堂堂大厦之柱石 。

语调并不激烈，但包含着辛辣的讽刺。诗人接下去就点出了他为什么有这种只有在神话中才能实现的幻想：

不劳万民力，不怕百姓瘼，

莫使呼耶在山谷！

诗的结尾一句又提到了“呼邪”，和开头的“呼耶”遥遥呼应，表现出作者对在重活下呻吟和倒毙的劳动者所抱的哀怜之情、同情之意。使全诗具有更大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李詹（十五世纪初时人）的七绝《太平村》，是作者途经庆尚道星州的太平村时，目睹村民被强征服役的凄凉情景写下的诗：

谁云此地太平村，役重居民半不存。

唯有数家能馆客，食松疑是赤松孙。

村中一半人都被强征走了，仅仅有数户人家能招待客人。剩下的村民也就只能靠吃松树叶度日，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古代神仙赤松子的后代呢？村名为“太平”，实际生活却是苦难的。诗人以诗名与现实相对照。短短的四句诗中，充满了讽刺意味，表现出诗人对统治者滥征徭役的强烈不满。

卞季良（1369—1430）虽然写了《华山别曲》之类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他的七言诗《巨蠹》却是一曲讽刺和诅咒贪官污吏的好诗。他在诗中把这些民贼比作大蛀虫——巨蠹，为老百姓受侵害而感到难过，“安得壮士一去之，再使国中多良材”，希望出现正直的贤能之士，除尽这些坑害百姓的民贼。

卞季良的《苦热行》则叙述了酷暑骄阳下挥汗如雨的庄稼人的艰难困苦，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

成侃（1427—1456）是位有才华的诗人，其诗雄健多姿，曾风靡一时，被著名的诗评论家徐居正称赞为东方的天才。但因读书过于勤奋，身体孱弱，竟在三十岁的盛年不幸早逝。他的一些同情人民和描写少男少女恋情的诗歌尤其动人。如七古《老人行》描写了一个七旬老人的悲惨一生：

垄草萋萋雉双飞，垄边老人长叹息。

自道余生今七十，手脚冻皴面黧黑。

一下笔就勾画出了老者的令人怜悯的形象。他穿不暖："短衣褴衫才过膝"；他年近七十时还曾被征召去沙漠打仗："前年召募度黄沙"，几经险地，勉强回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了，"万死归来鬓如雪"；独自去驾牛耕田，地面坑坑洼洼不平，牛蹄陷进地里，使他无可奈何，只得"独坐怆然心断绝"，不禁为生活的艰难困苦感到悲哀。

他的《木棉词》描写了丈夫被强征去边塞服兵役的女子的悲惨处境与心情。她在严冬酷寒的季节，整天坐在织布机前，辛勤织布直到夜深人静。织成的布一半打算给孩子做衣裳，另一半准备送往边塞给丈夫。"心酸意苦眠不得，孤灯闪闪明帏帏"就这样，孤独地打发她凄凉而艰难的日子。

他在五古《怨诗》中进一步写出了贫苦人民的不幸遭遇是由谁造成的。诗的一开头叙述了老农在地里劳累一天之后，带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惨状：

蓐食向东阡，暮返荒村哭。

衣裂露两肘，瓶空无储粟。

稚子牵衣啼，安得馇与粥！

雪上加霜，这时却来了如狼似虎的恶吏。拿不出钱来，妻子被捆绑起来抓走了："里胥来索钱，老妻遭缚束"。老农一见这种情形，翻身跳墙便逃。逃到荒山躲藏在荆棘丛中，十天之内不敢出来。

潜身草间行，日落山谷昱。

魑魅凭岸啸，凄风振林木。

凛然魂魄褫，一步三四息。

荒山笼罩在黑暗中，野兽号叫，凄风吹动着林木，使这位逃避官吏暴行、惊魂未定的老农更觉得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可怖了。最后，成侃指出：使这贫穷的老农陷入此种境地的，正是那些心狠手毒的官吏：

嗟嗟黠吏徒，诛求一何速？

公门非不仁，汝辈心甚毒！

成伣所说的“公门”指政府。他认为并非政府本身不好，坏就坏在狡猾的官吏身上。这种看法虽不全面，但这些诗句充分表现出了官吏对待人民的残酷性。

《怨诗》抓住官吏凶残，贫民遭难的这一事件，加以典型化，为人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断面，艺术手法较高。

《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1420—1488）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的《苦雨叹》、《老牛叹》、《东家叹》表现出他对农事的关心，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富人穷奢极侈的反感。

苦雨生白发，一滴生一白。

半为忧民生，半为破茅屋。

破屋尚可补，民死那可赎？

朝来捻青镜，搔白增太息。

为忧念贫民苦雨，他头发都变白了：“一滴生一白”，是何等深挚的感情。在另一首较长的《苦雨叹》中，他写出了大雨给农民造成的灾难：

平田渺渺禾稼多，祗今露骨为白沙。

死者相枕生者泣，今年害稼一至此！

他描绘出一幅涝灾的悲惨图画，表现出对农民的深挚同情。

《东家叹》以东西两家贫富对比的手法，为埋头读书却一生清贫的人抱不平，对“金屋贮姬娥，歌舞事燕乐”的西家表示鄙夷，慨叹“两家邻咫尺，贫富迥相隔”。

徐居正的这些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手法上都与高丽诗人李奎报很相似，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李朝一些诗人所受到的这位高丽诗人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

俞好仁（1445—？）的七绝《梳》咏物抒怀，对贪官污吏表示深恶痛绝，希望除恶务尽以解人民之忧：

木梳梳了竹梳梳，乱发初分虱自除。

安得大梳千万尺，尽梳黔首虱无余。

李荇（1478—1534）也是对贫苦人民深表同情的诗人。他宦途历经波折，为人刚正不阿，在燕山君的暴政下曾流配十余次，九死一生。他的五言古诗《旱》、《夏雨叹》流露出对农事的关心。他的五古《记事》，则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一对年老夫妇在暴政下儿女离散、无法终其天年的苦况。这对年老夫妇的儿子被征去服徭役，还不得不把牛犊卖掉缴税。女儿本来留在家里侍奉老人，结果也被梨园拉走，被强迫当了艺妓。已经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官吏们还挥舞着鞭子来强迫老夫妇为女儿送去新衣服。这种黑暗世道使人感到“生男不如女，生女不如独”，最后诗人叹息道：

去者当日远，存者谁抚育？

拊膺呼苍天，死亡在今日！

鱼无迹（十六世纪中叶人）曾以其揭露李朝官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斫梅赋》而闻名。他的《流民叹》描写了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讽刺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虚伪“关怀”：

小民有语君不知，今世苍生皆失所。

北阙虽下忧民诏，州县传看一纸虚。

国王下《忧民诏》，只不过是平息一下灾民的愤怒，以免事情闹大不可收拾，诗人讽刺它不过是一纸空文，无补于事。

为了进一步防止可能发生的动乱，朝廷派了京官来安抚人民，但是，贫穷饥饿濒于绝境的老百姓，如何能出远门去面见京官？

吾民无力出门限，何暇面陈心内事？

纵使一郡一京官，京官无耳民无口！

“京官无耳民无口”，这是多么沉痛的一句话！京官根本不愿了解真正的民情，而老百姓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短短七个字，揭露了京官假惺惺“慰问”的丑态，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内心痛苦。

十六世纪中叶另一名诗人安璐的《疲兵行》是一首揭露李朝

军队种种腐败现象的优秀诗。全诗二百七十九个字，可是说字字血泪，把将军虐待、剥削军士的恶劣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看到了李朝的军队内部的黑暗，这是在任何史书中都见不到的。

作品一开头描绘出士兵所处的艰难、惨烈的环境：

关云漠漠关雪堆，北风惨惨山木摧。

长河冰滑马蹄滑，沙塞日夜胡笳哀。

朔风凛冽，天寒地冻，沙漠里胡笳声哀怨凄切，这就是士兵军旅生活的环境。

再看对他们苦难生活的具体描绘：

兜鍪零落铁衣寒，击柝中宵十指直。

他们头上所戴、身上所穿，全部破旧不堪，无法御寒，深夜击柝，指头全部冻僵了。"枵腹不得一饱饭，垢面常常三年土。"不但身上寒冷，而且肚子也吃不饱，更谈不上保持清洁了。破衣烂衫，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这就是"自言少年系军籍，伤心几度关山苦"的士兵形象及其遭遇。

但是，"关山之苦"他们并不怨尤，最使他们感到痛苦的，是他们的上级——将军对他们的残酷榨取。

将军好拥黑貂裘，一貂皮当金十斤。

将军好食大牢味，一日军中九牛死。

再看这样的控诉：

鼎中粒，机中布，一一输入将军库！

将军日肥士日瘠，欲往诉之逢彼怒。

将军身上穿的昂贵的水獭皮衣，价值黄金十斤！将军吃的黄牛肉，是军队中本应供应给士兵的。然而钱、粮、肉，全部化为将军的裘衣、美餐！"山无余貂野无牛"，要从士兵的身上榨取这些东西，只能靠镇压，"诛敛无穷捶楚至"。他们靠鞭子、棍子来迫使士兵就范。不仅士兵受将军们的压榨，他们的家属也因人祸天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虫蝗水旱无岁无，不闻赈恤闻催租。

一家丁壮十余口，过半相携逃入胡。

士兵们自己在疆场和敌人拼命，家里人遭灾不但得不到赈济反而被逼逃往国外。纵然他乡异域生活艰难，但也比自己在军队中受将军的压榨要好些："胡中艰苦不可说，犹胜将军浚膏血"。诗人喊出了士兵内心的疑声："将军将军胡不去，去为公卿军则悦"。但是朝廷又怎样呢？它能不能体恤下情把瘟神将军撤掉呢？作者的回答是："君门杳杳但回首，御史纷纷犹闭舌"。

朝廷也罢，理应弹劾不称职官吏的御史也罢，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而士兵的悲哀与怨恨，也终究没有消除的可能。最后，作者无限感慨地写道："廉颇李牧难再见，激烈中宵肠内热"。

诗人安瑺在这首长诗中，不仅仅是把锋芒指向靠士兵血肉自肥的将军们，还进一步揭示出了一种更严重的现象：封建统治者上上下下，从政治到军事、从后方到疆场、从兵营到农村，全都是一团糟。在他们黑暗统治下黎民百姓遭受涂炭，呻吟于水火之中。

与崔庆昌、白光勋享有"三唐诗人"之称的李达(1561—1618)也写了一些关心贫苦人民的诗，多为七绝，如《移家怨》、《刈麦词》、《拾穗谣》、《扑枣谣》等。他还写了六言诗《无题》，讽嘲了达官贵人。

《移家怨》写的是一对年迈夫妇的艰难处境：儿子从军六载不还，生活迫使他们离开故乡投奔他地，老翁背着锅向林间走去，老妇带着年幼孩子落在后面跟不上："老翁负鼎林间去，老妇携儿不得随。逢人都说移家苦，六载从军父子离"。

他的《刈麦谣》写的是孤独无依却有儿女牵累的可怜少妇：

田家少妇无夜食，雨中刈麦林中归。

生薪带湿烟不起，入门儿女牵衣啼。

《拾穗谣》写的是村童的对话：

田间拾穗村童语，尽日东西不满筐。

今岁刈禾人亦巧，尽收遗穗上官仓。

以上，不论是写老翁、老妪，还是写少妇、孩童，诗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贫苦人的困苦艰难。诗人虽没有直接指责统治阶级的词句，但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得出结论：百姓困苦正是强迫征兵、重税盘剥造成的。每首诗虽然着墨不多，但人物音容面貌宛然如在眼前，凄苦艰辛之态跃然纸上。诗中哀怨深沉，但语调含蓄，耐人回味，颇具唐诗风格。

以传奇而在文学史占有特殊地位的金时习（1435—1493）和林悌也写了些同情人民的作品。金时习的七绝《渔父》写大同江渔民的生活。

去年官家渔税讨，挈家远入碧海岛。

今年里胥来催科，卖家买艇倚寒藻。

寥寥数语写出了官家逼税，渔民被迫逃亡的惨状。

金时习的《记农夫语》和《咏山家苦》都是记述了贫苦人生活状况的好诗；他的《啄木》一诗是对贪官污吏的强烈谴责。贪官污吏有如危害树木的害虫，他希望啄木鸟能把这些害虫啄光。但又叹息：

世上蠹物害民者，千百其数无人攻。

纵汝利觜除木灾，人间蠹灾讵能空？

可见李朝当时官场的黑暗腐朽、贪污成风的情形。

讽刺寓言《鼠狱说》的作者林悌（1549—1587）也写下了象《远戍》这样的诗，描写征人饥无所食、寒不能衣的苦况：

闺人秋早寄寒衣，雪满交河乡信稀。

纵有囊资可买褐，岂将身暖救肠饥？

他的《峡民》揭露官府对离群索居深山中的山民也不放过的凶残。“穷山莫道少征徭，青鼠乌貂入官府”。猎取来的兽皮、兽毛都得交纳官家，自己不能享受劳动成果。

他的《马牛歌》沉痛地揭露了昏庸的官吏滥用权力，埋没、摧残人才的恶劣现象。

女诗人许兰雪轩（1537—1563）是著名小说《洪吉童传》的作者许筠之姊。她的《贫女吟》对辛苦织布直至深夜未能稍事休息的贫女，寄予深挚的同情，对坐享其成的富人妇女隐隐表示反感：

夜久织未休，轧轧鸣寒机。

机中一匹练，终作阿谁衣？

她的《筑城怨》两首描写了筑城的艰苦。但劳动人民以血汗建造起来的城墙，是否能有效地防止外敌侵略呢？诗人在第二首中作了答复：

筑城复筑城，城高遮得贼。

但恐贼来多，有城遮未得。

城筑得再高再厚，没有公而忘私的好将领，仍挡不住外敌。

李朝前半期常有异族来犯，其中以倭寇侵扰为最。热中于党争的朝臣，不以改革政治加强国防为念。倭寇势力日趋猖狂，后来终于发展到壬辰年（1592年）的大举入侵。在此以前，即李朝前期，就已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为抵击外敌献计献策。这种情况在汉文诗中反映比较突出，那就是一些以仇恨侵略者、热爱祖国为基本内容的诗歌。此类汉文诗，或写入侵者的凶残，或叙述百姓的苦难，或借咏史抒发爱国衷肠，或表示与敌人战斗的决心。

赵浚（1346—1405）的七绝《次尚州客舍诗韵》、《安州怀古》就属于这类诗。赵浚生于高丽时期，支持李成桂，是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次尚州客舍诗韵》作于公元一三八二年高丽王朝末期。当时倭寇入侵庆尚道，赵受命赴前线督军，此诗为他于赴前线途中所作，诗中有"灭贼朝天知有日，闻鸡起读出师表"之句。此诗虽作于高丽时期，但其时高丽王朝行将为李氏王朝所代替，赵浚又系李朝的重臣，故将它归入这一时期。

《安州怀古》是咏史诗，歌颂了高句丽反击隋朝侵略在清川江大获全胜的事迹。借古喻今，表达的是击退入侵者的意志与信

心。

权近（1352—1409）生于高丽末期，也是李朝功臣。他的《宿岛上村家闻邻妇夜哭》一诗，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丈夫被倭寇杀害后的悲哀，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海贼侵孤岛，空村气惨然。

可怜夫损命，唯有妇呼天。

清血沾两袖，哀声彻九泉。

夜深闻愈切，远客为无眠。

他的《贺崔元帅茂宣破镇浦倭船》是为朝鲜军队战胜倭军而唱的一首凯歌。崔茂宣从来到朝鲜礼成江的外国商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火药的技术。他在部下中设"火桶都监"一职，专造火药武器。一三八〇年倭寇以五百余艘战船侵入朝鲜的全罗道镇浦，崔茂宣率战船一百余只奇袭敌人，发射火炮，痛击登陆掠夺百姓粮谷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权近作此诗祝捷，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崔茂宣的这一功绩。

权近的五古长诗《录翊卫军语》描写了士兵在昏慵自私的将军手下遭受的苦难。这些士兵远别家乡来保卫京城，可是自己家乡却备受倭人蹂躏。"家乡是海畔，弃为盗贼场"，"近闻寇又逼，不知存与亡"。他们虽手执武器，却不能回去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免遭蹂躏。人民遭难，长官们却忙着贪污中饱，使士兵挨饿。长官们还上山打猎作乐，士兵则被迫为他们效劳。这首长达二百六十个字的五言古诗，充分揭露了当时身负卫国重任的高级将领的腐化堕落。作者对国家前途满怀忧虑，是一首忧国忧民、鞭挞统治者的优秀作品。

在论述时调时，本书曾言及年轻的爱国将军南怡（1447—1468）。他所写的汉文诗也充满了英雄气概：

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水饮马无。

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

李荇（1478—1534）的《初五日闻倭寇沿海我城失守》、《又

闻熊川城陷》、《累累吟》也都描写了人民在倭寇铁蹄下的悲惨遭遇。

洪春卿（1497—1548）的《落花岩》回顾了百济宫女在唐军入侵，国家危亡时投江自尽的史事。目的也在于鼓舞斗志，与赵浚的《安州怀古》属于同一类型。

女诗人李玉峰为郡守之女，善作诗，她的七律《夫因戎事在京》于怀念丈夫的诗句中流露出关心国事的心情。

干戈纵异书生事，忧国惟应鬓发苍。
制敌此时思去病，运筹今日忆张良。
边城流血山河赤，阿堡迷气日月昏。
京洛音徽常不达，沧湖春色亦凄凉。

沉郁苍凉，颇有大家风度。

林悌的《蚕岭闽亭》、《驿楼》也是有感于当时的外患而写的两首爱国诗篇。在《蚕岭闽亭》中，他以"东溟有长鲸，西塞有封豕"比喻朝鲜的东、西两边都有虎视眈眈的觊觎者。但是，"江障哭残兵，海徼无坚垒"，统治阶级完全忽视边防的重要性，造成了军事上涣散的状态。接着，诗人又慨叹有才能之士不能受当权者的重用，他们虽然有救国、卫国之热忱，却报国无门。

在七绝《驿楼》中，林悌带着满腔的热情歌颂了南怡将军把女真赶出慈江道的功绩。

李朝前期的汉文诗中有不少以爱情为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多写女性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有的表达了封建社会中女子担心被遗弃的心情，有的描写了她们对心上人的脉脉深情。有些诗写得清新可喜，有民歌风格。有些诗则写得端庄凝重，有贵族风格。

成侃《啰唝曲》两首，就属于前者。

郎如车下谷，妾似路中尘。
相近仍相近，看看不得亲。

写的是想与所爱男子长久相亲而不可能，可望却不可即的惆怅心

绪。

绿竹条条动，浮萍个个轻。

愿郎如绿竹，不愿似浮萍。

表达的是愿郎君永不变心的愿望。以绿竹喻坚定不移的爱情，以浮萍喻轻浮的态度，完全是少女口吻，声情摇曳，情意感人。

金克俭（十五世纪中叶）的《闺情》写的是一位妇女怀念征人的苦闷心理。“银缸还似妾，泪尽又烧心”，真实地传达出女子独守空房，一心挂念征人的关切心情。

黄真伊（1516—？）的汉文情诗也和她的抒发情思的时调一样，写得典雅有致。七律《送别苏判书世让》是她情诗中的代表作。

苏世让（1486—1562）是位擅长诗文与书法的才子，仁祖时官至大提学。但性萧疏洒脱，爱吟风咏月，与黄真伊相亲。此诗是黄真伊为送别他所作：

月下庭梧尽，霜中野菊黄。

楼高天一尺，人醉酒千觞。

流水和琴冷，梅花入笛香。

明朝相别后，情与碧波长。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酬答之作。感情虽不够真挚深刻，仍以辞藻文采见长，为人传诵，成为名篇。

另一位女诗人李玉峰的五绝《闺情》，虽亦有贵族气味，但感情比上述黄真伊的诗要真切一些：

有约来何晚，庭梅欲谢时。

忽闻枝上鹊，虚画镜中眉。

含蓄、蕴籍，完全把一个女子久等意中人的着急失望心情，和忽得知他来时慌忙梳妆的情态写活了。

林悌所引的五绝《无语别》写一少女怀春而又不能如愿的失望心情：

十五越溪女，羞人无语别。

归来掩重门，泣向梨花月。

天真纯洁、脉脉含情而又不敢表露的少女娇态，宛然如画。

他的《秋千曲》三首描写一女子打秋千时，发现堤边一青年注视自己，于是春心荡漾，误落金钗，两人开始认识时的情形。对女子的表情、仪态和感情及心理状态都有很形象的描写，诗句简炼，人物生动。如第三首：

误落云鬟金凤钗，游郎拾取笑相夸。

含羞暗问郎君住，绿柳竹帘第几家？

仿佛是一个爱情故事刚开头，却又戛然而止，引人遐想。

林悌还有长短句《代箕城娼赠王孙》一首，代遭受玩弄、遗弃的可怜女子倾诉，客观上也是对当时王孙公子浪荡生活的揭露。“郎君还似浿江水，不为芳华住少时”，这种“哀而不怨”的表现手法，更勾起人们对妓女不幸命运的同情。

李达的《关山月》也是写爱情的，写多情女子对远方的心上人的思念，情深意长而又含蓄凝炼：

关山月，　　　　　月出关山照秦京。

郎君远向秦京道，何处登楼见月明？

郎有心，　　　　　妾有情，

独自随君千里行。长相思，泪纵横。

李朝前期汉文诗中的一些描写朝鲜风土人情的诗，也很值得一提。这些诗有如一幅幅风俗画，描绘出了当时民间的习俗或城乡社会的情形。如南孝温（1454—1492）的《西江寒食》和姜希孟的《田家》都属于这一类。

徐居正的《洗姑滩》是根据民间故事写的一篇叙事诗，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语言朴实平易，笔调流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是一首十分清新可喜的风土人情诗。

金宗直（1422—1483）是一位和徐居正齐名的诗人。他有不少诗取材于《三国史记》或《三国遗事》所载的民间传说，如《会苏曲》、《忧息曲》、《鵄述岭》、《怛忉歌》、《阳山歌》、

《碓乐》、《黄昌郎》等。如《鵄述岭》：

鵄述岭头望日本，粘天鲸海无涯岸。
良人去时但摇手，生欤死欤音耗断。
长别离，　　　死生宁有相见时？
呼天便化武昌石，烈气千载干空碧。

这首诗取诗于关于朴堤上的传说：朴堤上东渡日本时，未向妻子辞行，其妻闻讯赶至海岸哭送夫君离去，后因久望夫不归，化为石。诗中既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也有浓厚的民族和民间的色彩，是一首富有乡土气息的诗歌。

金宗直的《寒食村舍》也是一首写清明的诗。南孝温的《西江寒食》写的是商贾，而金此诗则写农家，比前者更多地表现出朝鲜清明节的景色：

禁火之辰春事多，芳菲点检在农家。
鸠鸣谷谷棣棠叶，蝶气款款芜菁花。
带樵垄上乌犍返，挑菜篱边丫髻歌。
有田不去恋五斗，天亮人笑将奈何。

写出了一派田园风光。末两句表现出诗人对这种恬静生活的无限歆羡之情。

一些借景抒情、托物咏怀的诗也是李朝前期汉文文学中的精华。权近的《咏金刚山》、姜希孟的《归来亭》、安应世的《秋晚》、金净的《题路旁松》、奇遵的《日暮登城》、徐敬德的《溪声》、黄真伊的《咏半月》与《朴渊》、李玉峰的《宁越途中》、申师任堂的《思亲》与《逾大关岭望亲庭》、杨士彦的《万景台》、白光勋的《弘庆寺》与《广汉楼》、崔庆昌的《大隐岩》、《题高峰郡山亭》、《阊阳驿》与《次大同江韵》、朴淳的《自龙山归汉江舟中作》、李达的《松京》、林悌的《苦寒》等都属佳作。

如权近的《咏金刚山》：

雪立亭亭千万峰，海云开出玉芙蓉。

神光荡漾沧溟阔，淑气蜿蜒造化钟。

突兀冈峦临鸟道，清幽洞壑秘仙踪。

东游便欲凌高顶，俯仰鸿蒙一荡胸。

境界开阔，气势雄伟，全诗显现出金刚山奇峰秀峦、壮丽多姿的面貌。音韵铿锵有力，更增加了诗的气势。

姜希孟的《归来亭》四首充满了陶渊明式隐居田园的思想，写景则不同于陶的田园诗，有自己的特点，它没有陶诗的恬淡韵味，却在描绘自然景色方面色彩更加绚丽。如果说陶诗是黑白的水墨画，姜希孟诗则是彩色的山水图。

金净（1485—1520）的《题路旁松》不但以简炼的笔法勾出了古松的苍劲姿影，而且以含蓄的笔法点出了松树不畏霜雪的本色。写景咏物，书里行间自有深意：

海风吹去悲声壮，山月高来瘦影疏。

赖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标格全未除。

奇遵（1492—1521）的五律《日暮登城》意境深远，苍凉沉郁，透出忧念时事之意：

残营收夕雨，孤堞属春晴。

落日长江远，颓云古塞平。

野深天气黑，峰迥戍烟青。

漠漠三城北，惟闻边笛声。

徐敬德（1489—1546）的《溪声》借潺潺的溪水声诉说人间的不平，借景寄情，简洁平易。

女诗人黄真伊也写过《咏半月》、《朴渊》，都是脍炙人口的写景诗：

谁断昆山玉，裁成织女梳。

牵牛离别后，谩掷碧空虚。（《咏半月》）

以梳比半月，十足的女性口吻。而且联想到织女与牛郎，仍然离不开男女之情。但内心的寂寞，隐隐地从色调凄清的诗中流露出来，透露作者身陷风尘的悲哀。

另一女诗人申师任堂（1504—1551）所写七律《思亲》一首情景交融，表现了她对父母的深挚的怀念：

千里家山万叠峰，归心常在梦魂间。
寒松亭畔双轮月，镜浦台前一阵风。
沙上白鸥恒聚散，波头渔艇每西东。
何时重踏临瀛路，采舞斑衣膝上缝。

诗中的寒松亭为江原道江陵的风景胜地，镜浦台亦在江陵。诗人的父母住于江陵，诗中一再提及江陵名胜地，表现出思亲情绪萦绕于怀，不能自已。

前面已介绍过的另一女诗人李玉峰，在她的《宁越途中》一诗中，怀念了被世祖篡位并遭害的君王端宗。写景不多，但抒情深沉，凄楚动人。

杨士彦（1517—1584）的《万景台》以活泼洒脱的诗句歌颂了这个胜地的自然美景。

三唐诗人之一白光勋所写五律《悬津夜泊》语言洗炼，意境苍凉幽远，有唐诗风格：

旅泊依山口，重游属暮年。
钟声隔岸寺，人语渡湖船。
月上蒹葭远，烟沉岛屿连。
更深风更急，落雁不成联。

另一位三唐诗人崔庆昌的五绝《题高峰郡山亭》、七绝《边思》充分体现出他对唐诗的仿效，写得含蓄、凝练、颇有意境：

古郡无城郭，山斋有树林。
萧条人吏散，隔水捣寒砧。（《题高峰郡山亭》）
幼少离家音信稀，秋来犹着战时衣。
城头画角吹霜急，一夜黄榆叶尽飞。（《边思》）

三唐诗人中的李达比他们小二十多岁，他的《松京》写高丽的故都开城，是一篇怀古佳作，《山寺》、《回丹》、《步虚词》等诗也具有唐诗风格。

林悌的《苦寒》描引山村寒冬雪后情景：

山下孤村深闭门，石泉冻合无人踪。

溪桥日晚青烟起，知有山妻炊雪水。

音韵并不讲究，但画面逼真，不提“寒”字，而寒冷景状毕现，读之如身临其境。就意境和艺术效果而言，此诗可与李齐贤的《山中雪夜》媲美。

朴淳（1523—1598）的《自龙山归汉江舟中作》于飘逸萧洒之中带有悲凉的意味。他笔下的汉江“霞带夕晖红片片，雨增秋浪碧漫漫”，“江蓠叶悴骚人怨，水蓼花残宿鹭寒”，景中寓情，堪称佳句。

李朝前期的汉文诗中，歌颂祖国山川与写景抒怀的作品极多，其中佳作也远不止这些。上面只是择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略作介绍。有的文学史认为，汉诗进入李朝以后，只剩下一些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消极东西，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消极的作品并非没有，但积极的作品还是不少的，这一点不可忽视。

三国时期开始有人写作汉文诗，至新罗崔致远而大有成就，高丽的李奎报、李齐贤等名家笔下，出现过思想和艺术上都很优秀的汉文诗。但统观三国、统一新罗及高丽这一千四百年间，汉文诗的作品还不算很多。到了李朝，汉文诗在以前一千几百年的成就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数量惊人，而且佳作纷呈，为数不少于以前的一千几百年，称得上是汉文诗歌的全盛时期。但由于李朝中期和后期国语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汉文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为朝鲜国语文学所取代，作品虽多，却无需过多地介绍了。当然，那些思想意义重大，充分反映社会现实、富于时代精神的汉文诗，仍应在文学史上给予一定的地位。

第四章 "稗说体"文学的发展与盛行

产生于高丽时期的所谓"稗说体"文学到了李朝，大有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稗说体"作品集。如十五世纪时徐居正(1420—1488)的《太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姜希孟的《村谈解颐》，南孝温（1454—1492）的《秋江冷话》，成伣（1439—1504）的《慵斋丛话》，李陆（1438—1498）的《青坡剧谈》，姜希颜（1417—1464）的《养花小录》等等，十六世纪或十六、十七世纪之间的鱼叔权的《稗官杂记》、曹伸的《謏闻琐话》、权应仁的《松溪漫录》、柳梦寅（1558—1628）的《於于野谈》、李德馨（1561—1613）的《竹窗闲语》等等。

由于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在文学上有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国语诗和汉文诗的大量创作及题材的多样化就是这种要求的必然结果。当时文人的主要写作工具依然是汉文，于是带有杂记性质的"稗说体"便成了他们最方便最爱用的一种流行体裁了。

李朝时期的"稗说体"作品不但数量众多，而且题材和包括的内容也比高丽时期丰富得多。

高丽时期的稗说作品较为偏重于诗话，被称为杂记、琐闻之类的小故事、逸话、传说、议论也往往是因为同诗或诗人有关而被记录下来，作为对诗的说明，带有附录性质。如《破闲集》、《补闲集》就是这样的。

李朝的"稗说体"虽也包含着诗话，但更多是和诗无关的东西，如人物外貌、名人逸事、野史、游记、日记、随笔、志怪、寓言、笑话、典故，乃至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可以说包罗万象，驳杂庞大。比起正史、地理志、寓言集等专著，它似乎是很

不"正规"，有些芜杂凌乱，但也显得灵活、丰富，弥补了专著的不足。不少地方对研究朝鲜的封建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典籍等等，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保留了一些专著所缺或不能保留的资料。大量的"稗说体"作品是朝鲜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首先介绍其中思想内容积极因素较多的一些作品。

《慵斋丛话》卷三中的关于判中枢河复敬杀虎和御敌的记载：河复敬年轻时骁勇有力，一次在深山打猎，突然遇到猛虎。他赤手空拳与虎相斗，用手紧紧抓住虎头，一步步把虎推至山崖下一池塘边，把虎头按入水中，河复敬乃捡起木棍和石头猛击虎身，把它打死。

还有一次他在前线与敌人作战，敌方人多马众，飞矢如雨，河复敬抽身疾走，行至一小片树林里，利用这一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

《慵斋丛话》卷三中还记载了一个勇敢杀倭寇的故事：

李沃为父亲侍中李春富守丧期间，正值倭寇侵入朝鲜东海岸，烧杀抢掠，百姓纷纷逃避。李家屋前有不少大树，李沃当夜令手下人取箭数百支插在树上，次日，脱去丧服，策马到海口，发箭射敌，并佯作败退，奔入树丛。倭寇蜂拥而来，李沃拔树上的箭一一射向众贼。自朝至暮，苦战一日，终于迫使敌人后退，不再敢来侵扰。

《稗官杂记》中记录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敢于讽刺县令的故事：中宗时的三嘉县令是一个贪污的酷吏，病死入殓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棺材头上有诗一首：

冥间五鬼虐烝民，帝使天罗杀毒身。
从此闾阎愁怨绝，尧天舜日太平春。

上司派人捕捉贴诗的人，一直未能抓到。稗说作品集中常有封建统治者的一些丑闻。如《慵斋丛话》卷三中就记载了高丽恭闵王时的政治暴发户辛旽的丑事。辛旽执掌国政以后，常仗势任意玩弄妇女。"若闻士大夫妻妾有姿色者，每以微谴囚其夫于

巡军狱”。迫使被囚者的妻子亲身去向辛肫求情，因而遭奸污，以至出现妇女闻其夫被囚，“则必靓粉先就肫门，殆无虚日”这样的现象。

《竹窗闲话》中收录了一个蔑视菩萨嘲弄财主的故事。宁边某乡吏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无儿子继承家产。于是大设无遮会[①]，祈求菩萨赐予儿子。地方上的僧人、尼姑，邻邑的善男信女，闻风而至。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打算在次日清晨举行仪式。有一青年名景清，勇敢强悍，趁更深夜静无人时，持刀潜入寺庙，把泥菩萨的整个面庞剥掉，眼睛挖去，然后悄悄逃走。次日凌晨，施主及众僧沐浴更衣，敲响铜钟，大诵佛经。庙内外灯烛辉煌，大放光明，这才发现佛像已无面庞，耳目口鼻都成了窟窿。众僧人惊异，以为菩萨已化身而去。施主夫妻则失声痛哭，不知所措。寺庙老僧无法，只得另换一尊佛像把无遮会办完。

《於于野谈》中收录了一个野鼠求婚的寓言。讲的是有对野鼠夫妇，酷爱其子小鼠，要为他求偶。他们认为必须选择世上无双的巨族才能配得上小鼠。天最大，于是野鼠去求天与其子婚配。天说：“我能复盖万物，但云却能遮住我，我不如云，请去求云”。野鼠于是去求云。云说：“我能充塞宇宙，遮蔽日月，但风却可把我吹散，我不如风，请去求风”。野鼠去求风。风说：“我能吹折大树，刮倒高楼大厦，却刮不倒石弥勒佛，请去求石弥勒”。野鼠于是去求石弥勒。石弥勒说：“我能屹立中野，经千百世而不倒，但野鼠如果将我脚趾下面的土挖掉，我就得倒下了。我不如野鼠”。野鼠一听此言，大为醒悟，于是他为爱子找了另一个小野鼠作配偶。

这寓言含意深刻，能发人深省，对那些“这山望着那山高”，好高骛远，不注重实际的人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它教育人们：勿妄自菲薄，要有自信，力量在自身。全篇文章行文畅达，语言朴

---

① 无遮会：一名无遮大会。佛教的一种仪式。不论圣凡、僧俗、贵贱、上下的区别，均得受请参加此一斋会以受惠。起源于印度，高丽时期朝鲜也开始实行。

素，相类似的字句回环反复，一再出现，颇有民歌风格。

"稗说体"作品中，最带有中古神怪小说色彩的，是志怪。例如《慵斋丛话》卷四中有这样一篇故事：

洪宰枢在未曾为官时，曾因途中避雨进入一小舍中，遇一姿色美丽的年轻尼姑，与她媾欢，事后信誓旦旦，要在某年某月把她接到家里。日期已过，洪某却杳无音信，失信于尼姑。尼姑因思念成疾而死。洪某后来官至南方节度使。一天有小虫如蜥蜴爬上洪的床褥，洪某命人将它除去。次日有小蛇入房，洪又命令将它杀死。第三天，蛇复来，这时洪某才想到这是尼姑所化。但他不但无悔罪的表示，反而恃其淫威，欲把蛇消灭。从此，蛇无日不至，并日渐长大，终成巨蟒。军士用刀砍，用火烧，竟无法将它消灭。洪某毫无办法。日子长了，洪某终于精神耗尽，颜色憔悴，一病而亡。

这一志怪故事的主题思想是负心汉理应受到报复。对于玩弄女性的官僚贵族，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加以惩罚，喊出了封建社会中遭受权贵践踏的弃妇们的愤怒心声。

"稗说体"作品中还有些是描写朝鲜锦绣河山的，如《青坡剧谈》的《朴渊瀑布》。

"稗说体"文集中，还有当时风俗民情的记载，如《慵斋丛话》卷八中慨叹了当时风俗的日渐浇薄，赞美了乡里风俗的淳厚。卷九中有中国民情和朝鲜的民情的对比，卷十中记载了日本及女真的风俗。

对朝鲜民族文化表现出珍视和自豪的作品，在"稗说体"作品集中也常有所见。如《稗官杂记》卷二中就记录了关于新罗圣德女王的诗和高丽人所写《人参赞》，以及高丽的李奎报、金克己、金坵、李齐贤、朴仁范、李穀，李朝的申叔舟、成三问、徐居正等人的诗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甚至记载了关于李奎报诗的传说：

本国之朝京者，求买东坡诗。中国人曰："何不读贵邦李相国集乎？"

结论是朝鲜的人才，中国也予重视。借中国人的口，说明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可贵。

此外，还有关于朝鲜著名音乐家、画师、石工、书法家的记载。如《慵斋丛话》中的《朴堧》、《龙泉谈寂记》中的《琴师李马智》、《笔苑杂记》卷一中关于新罗金生高超书法的记载等等，都表现出对祖国文化成就的自豪感。

稗说作品集中还有关于中朝文人关系的记载。如《笔苑杂记》卷一中关于崔致远在唐朝、李齐贤在元朝的事迹，对研究中朝文化交流史是很重要的资料。

李朝时期的"稗说体"文学虽所有发展，但比之于"经"、"史"一类被统治者视为传统教科书的典籍，稗说体作品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就很不够了。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儒家著作是求学必读的经典，为官必经的阶梯，而稗说作品则不过被者成为一种消遣与表现闲情逸致的东西。"稗说体"作品集的种种名称，如所谓"杂记"、"漫录"、"琐话"、"闲话"、"解颐"等，也正反映出他们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以及这些作品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稗说体"文学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指出，其作品中也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对鬼神的迷信，对生活中某些琐事的低级庸俗趣味、封建道德观念等等。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现象。

"稗说体"作品中有些志怪、传说，其故事性较强，勾勒人物也较为生动逼真，因此它对此后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影响，在朝鲜散文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李朝时期，逐渐出现大量小说，取得了文学史上的优势地位。"稗说体"作品虽继续涌现，但其地位则已今非昔比，不必再细分详论了，为了照顾到传统提法和论述上的方便，这里沿用了"稗说"这一名称。

第五章　金时习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

金时习（1435—1493）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短篇小说因素并具一定规模的传奇集。

金时习号“梅月堂”，又号东峰，生于士族家庭，自幼就聪明过人，能诗善文，得到国王世宗的喜爱，并受到赏赐。二十一岁那年，正当他苦读于三角山中等待封官，忽听闻世祖篡夺了侄儿端宗的王位，极为愤慨。他坚决反对世祖篡位，成为著名的“生六臣”之一。为抗议世祖的倒行逆施，他放弃作官的打算，焚烧所读的书籍，撕毁儒服，削发出入于寺院。他又以狂客自处，实行消极反抗，过着放浪形骸的流浪生活。他到过关西、关东、岭南等地。直至三十岁时，入庆州金鳌山。三十七岁时，成宗即位，他虽应国王之召去京城，但仍无意于宦途，又重返金鳌山。四十三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妻子就亡故了。他曾躬耕于襄阳、江陵等地，遍历山川名胜，最后在忠清道鸿山无量寺定居，五十九岁时去世。

金时习一生写的汉文诗约有万余首，是朝鲜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但大多已散佚不存。《记农夫语》、《咏山家苦》等诗饱含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啄木》一诗充满了对贪官污吏的憎恨。除五·七言诗以外，金时习还作过一些词如《念奴娇·山中看月》、《满江红·春天》、《菩萨蛮·秋江》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是继高丽李齐贤之后的另一位长短句的爱好者和作者。其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梅月堂文集》共十七卷。其传奇集《金鳌新话》原已在朝鲜失传，后发现于日本。

《金鳌新话》作于金鳌山，在全文后面，作者题有《书甲集后》一诗：

矮屋青毡暖有余，满窗梅影月明初。
挑灯永夜焚香坐，闲著人间不见书。
玉堂挥翰已无心，端坐松窗夜正深。
香罐铜瓶乌几净，风流奇话细搜寻。

从中可以看出金时习写作《金鳌新话》时的环境与心情。诗名《书甲集后》，可见还会有乙集甚至丙集、丁集，可惜已散失。

《金鳌新话》是仿照明朝瞿佑（1341—1427）的《剪灯新话》作的。瞿佑承袭了唐朝传奇的传统，金时习的传奇中同样也受了这种影响。但如前面所引的《书甲集后》一诗所表明的，金时习写此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是在搜集朝鲜的传说故事基础上写作的，作品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

《金鳌新话》中共有五篇传奇小说，即《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醉游浮碧楼记》、《南炎浮州志》、《龙宫赴宴录》，五篇总共约三万多字，其中头两篇以爱情为主题，后两篇是写神佛界的最高层的，第三篇即《醉游浮碧楼记》则是介乎以上二者之间的。五篇之中，篇篇不离鬼神。作者假托鬼神以抒发自己的悒郁心情。

《万福寺樗蒲记》写一个青年男子和女鬼恋爱的故事。南原书生梁某，独居万福寺东房，一日吟诗抒发情怀，忽听空中有声音劝他勿为没有配偶发愁。梁生甚喜，于是次日去佛前与佛像斗蒲戏。梁生胜，要求佛赐他美女为伴。不久有一位少女也来佛前求配偶，两人遂一见钟情，并在寺廊尽处板房内媾欢。临别前，女设宴邀请四邻郑氏、吴氏等四位贵族小姐，与梁生在宴席上唱和诗歌。宴毕将别，女拿出一个银碗赠梁生，告诉他明天父母将在宝莲寺为自己送饭，请梁生执银碗在路旁等候。翌日该女的父母果然来到，见梁生手中银碗为女儿殉葬之物，才知梁生已与死于倭寇之乱的女儿相好并相约于今日见面。后来女子果然来到，与梁生亲切交谈并同桌吃饭。她的父母虽听到语声与匙箸声，却看不见女儿。梁生循前路寻至草丛间，果然发现一个坟墓，于是

祭奠，哀恸凄伤。梁生还将女子父母所赠田舍全部出卖，花银请僧人追荐女子亡魂。女子从空中告诉梁生，蒙梁生荐拔，已投生他国为男子。梁生此后不再娶亲，入智异山采药，不知所终。

《万福寺樗蒲记》与《李生窥墙传》同以爱情为内容，都是与鬼交往，但是后者比前者多一些人间的生活气息。前者中的梁生一开始就是和鬼魂热恋，但后者中的李生却是和一个活生生的少女崔氏秘密恋爱。他们最终得到家长的赞助，结成佳偶，过了一个时期的幸福生活。只是在崔氏遇害以后，李生才与崔氏的亡魂继续他们的夫妇生活。《万福寺樗蒲记》是新罗的《仙女红袋》式的传奇，而《李生窥墙传》则有一半以上是描写两个真人的爱情生活，更富于生活气息。

《金鳌新话》的第三篇《醉游浮碧楼记》写的是天仙与人间才子交往的故事：

松京某富室子弟洪生，年少美貌。中秋之夜，醉游浮碧楼，吟诗取乐，至深夜三更，忽有一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在丫环簇拥下来到。洪生与她相互赠诗，女子自称是殷王后裔，箕氏之女，因卫满窃位，朝鲜衰败，欲尽节死，为朝鲜国鼻祖神人所救，服神人所赐仙药，长生不老，遂逍遥地周游于天上地下，今宵因思念故乡，故回来拜祭祖墓，游览胜景。洪生听后惊喜交集，请仙子以江亭秋夜玩月为题赋诗。仙子答应赋诗，不久，凌空消逝。随即大风卷地，将所写的诗吹去。后来，洪生思念仙子，得了不治之症。梦见仙子丫环传言：玉皇大帝听得仙子所奏洪生的事，惜洪生之才，任命他为牵牛星的从事。九月望日，洪生奄然而逝。

这篇传奇和《万福寺樗蒲记》、《李生窥墙传》大不相同。其中仙子仅仅与洪生以诗歌唱和。洪生虽因单相思得病，但后被荐入神仙界为吏。就整个故事来看，并非悲剧。通观全篇，作者作此传奇的用意在于追忆朝鲜悠久历史并和当时现实对比，借以抒发今不如昔的满腹牢骚。死后被神仙界录用为吏，也是慨叹他在现实世界中怀才不遇，无有知音之意。

然而，集中地表现金时习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问题看法的，当推他的《南炎浮州志》。

《南炎浮州志》情节简单：有儒生朴某，以儒业自勉，但未能中举为官。他一向怀疑神佛之说，一夜，忽梦见自己到了阴曹地府，受到阎罗王的款待。朴生和阎罗王谈论了有关宗教哲理、鬼神迷信和政治等问题。阎罗王敬佩朴生的才学，表示要让位给他。朴生梦醒后，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数月以后，他得病不起，死后继承了阎罗王位。

作品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宗教与哲理等问题的阐述或谈话。从故事情节和艺术创作方面看来，并不精彩动人。但是它表现了金时习对一些哲理和当时世俗人情、政治问题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的有关见解的直接表达。这些见解颇具有进步意义，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品中通过阎罗王之口所说的对儒家与佛教的看法，表现出了金时习崇儒鄙佛的态度。他认为周公孔子是中华界圣人，面释迦牟尼则为西域恶人中的圣人。周公孔子之教，以正去邪，释迦牟尼则是设邪去邪。以正去邪则言论正直，君子易从；以邪去邪则其言论荒诞，小人易信。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君子和小人归于正理，但金时习明显地认为儒高于佛。而且，按他的这种见解，佛教只不过是一种教化手段，佛教所说的天堂地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金时习多以鬼神为其作品主人公，这是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写作手法。实际上是假托鬼神的活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篇《南炎浮州志》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金鳌新话》的最后一篇《龙宫赴宴录》情节也比较简单：高丽时期有位著名文士韩生，一天晚上忽有青衫幞头郎官二人从天而降，俯伏于庭，说奉松都天磨山朴渊龙王的命令来邀请他。韩生应邀骑神马到了龙宫。龙王热情欢迎，请求他为女儿的新房写

《上梁文》。韩生一挥而就，龙王极为满意，于是设润笔宴表示谢意，并邀请了祖江、洛河、碧澜三江的神王来作陪，尽欢而散。韩生返回原住处后，探怀中，龙王所赠的珠绡还在。从此以后，韩生不再以名利为念、入名山，不知所终。

《金鳌新话》中的五篇传奇，虽情节各异，人物不同，但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作品的男主人公，或称儒生，或名文士，没有一个不是读书人。但和“学而优则仕”的必由之路相反，梁生、李生、洪生、朴生、韩生，虽才学过人，却无有一人当官。而金时习本人也是才学出众，深通儒家经典，能诗善文，却一辈子未当过大官。之所以如此，是他不满当时朝政，有空怀才学，生不逢时之感。这使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人间社会以外，和善良的鬼魂倾心相爱，与绰约的仙子相互交往，他把希望幻想化、诗意化和理想化了。而最能赏识他的才学并授以官爵和盛情款待的，则是神仙中的当权者，不论是已成仙的古国公主，还是阎罗王、龙王爷，都能慧眼识英雄。他们都是金时习因对现实的当权者不满所塑造的理想的当权人物，即他愿意服务的对象。

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一种表现。《金鳌新话》篇篇都具有极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它正是作者在失意时对理想的美好事物的追求。

二、五篇传奇，篇篇带有政治色彩。后两篇直接和神界统治阶级人物——阴曹地府阎罗王及水中龙王打交道，尤其是《南炎浮州志》中有些话简直就是政论。

即便三篇与女鬼、女仙交往的故事，也明确提到时局、社会或历史现象。

《万福寺樗蒲记》中描述了倭寇入侵造成的惨状：“边方失御，倭寇来侵，干戈满目，烽燧连年，焚荡室庐，虏掠生成”。而女子的早逝，则是这一战祸造成的。

《李生窥墙传》中描述了破坏李生夫妻幸福生活的红巾军入

侵："红贼据京城，王移福州"。

《醉游浮碧楼记》中提到了朝鲜由来已久的关于殷商的箕子到朝鲜的传说，仙子自称为箕子后裔：

> 先祖实封于此。祝乐典刑，悉遵汤训。以八条教民，文物鲜华，千有余年。一旦天步艰难，灾患奄至，先考败绩匹夫之手，遂失宗社。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

作者利用这一传说来表示对李朝政治的不满。所有这些有关国事与时局的文字，说明金时习虽不在朝为官，身居山野，但他总以国事为念，思考政治问题。对内，他希望朝政清明；对外，他仇恨入侵者。神奇的故事中，流露出他的爱国思想。

三、《金鳌新话》虽受了中国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但它总是以朝鲜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和历史事件为其故事展开的契机、背景和舞台，体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

四、五篇作品中，虽有爱情的欢乐、绮丽的诗文和犀利的谈锋，但总带有某种凄苦味道。热恋之后的男女，最后总是离别。失去所恋女子（鬼或仙）的男子永远也没有和她继续相爱的可能，而且都是以青壮年之身"不复婚嫁"，不是"入山采药"、"不知所终"，就是"得病而卒"、"奄然而逝"，即便是死后得到了神界的某种官职，也看不见有什么欢乐和事业成就的描写。篇篇故事都笼罩着阴暗、苍凉的气氛，带有浓厚的凄苦情绪，这和金时习本身的落落寡合、一生孤独及心情抑郁、愤世嫉俗有密切关系。他晚年自画象题词说"腾名谩誉，于尔孰逢？尔形至藐，尔言大侗。宜尔置之丘壑之中"。这种情绪当然不会给他的作品带来欢快明朗的气氛与色调。

金时习的世界观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忠实于自己的信念而不以个人荣辱名位利禄为念。《南炎浮州志》阎罗王对朴生的夸赞，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思想性格的写照：

> ……子正直抗志，在世不屈，真达人也，而不得一奋其志于当世，使荆璞弃于尘野，明月沉于重渊，不遇良匠，

谁知至宝，岂不惜哉？

同那些沽名钓誉、谄上压下、才浅德薄却官迷心窍的腐儒相比，金时习在人格上无疑是高尚的。他之所以在后世为历代儒生乃至僧人所尊敬，原因就在于此。

金时习在《金鳌新话》中表现出来的贬抑佛教、反对迷信陋习、鄙弃贪污、念及百姓、憎恨侵略者、热爱祖国以及忠实于王朝正统君主、强调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等思想，虽都是来源于他的正统儒家观念，却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此外，他的传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是富室子女，就是商人，或是书香门第的儒生，而没有一个属于被剥削阶级。可见金时习所关注的主要还是封建社会中的中上层人物，这就是他的阶级局限性之所在。

最后再谈谈有关艺术手法上的问题。《金鳌新话》中诗歌较多，它们和情节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这正是当时文人传奇中常出现的现象，作为根据当时的美学观点塑造人物、设置背景、渲染气氛的一个手段，无可厚非。

《金鳌新话》是一部成熟的、具有很高思想与艺术水平的文人短篇小说集。它上承《新罗殊异传》中的《崔致远》（《仙女红袋》）等前期的简单传奇故事的传统，下开金万重的《九云梦》等浪漫主义小说的先河，在朝鲜古代中古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

第六章　林悌的讽刺作品
《花史》、《鼠狱说》及其他

林悌（1549—1587）为李朝节度使林晋之子，生于罗州，字子顺，号白湖。他才识过人，性格豪放不羁，对政治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林悌于二十八岁中进士。此时，李朝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已渐趋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展开了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斗争，所谓"党争"现象就是这种斗争在政治上的反映。党争使得国势大为削弱，社会紊乱，劳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青年时期的林悌面对这些不合理的现实和王朝中的丑恶现象，甚为愤慨。他不屑于卷入这些相互倾轧的派系斗争。林悌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儒家传统思想的藩篱，对人民寄于同情，对统治阶级中的肮脏现象表示愤恨。

这种态度决定了他的文艺思想。他写了不少优秀的汉文诗篇，本书在前面谈到李朝前期汉文诗中已有所涉及。表现他爱国感情的诗篇有《元帅台（摩天岭）》、《蚕岭闽亭》，表现他对人民遭受剥削同情的有《峡民》，描写民间妇女相思之苦及少女怀春的有《远戍》、《无语别》等等。

林悌在二十岁的青年时代就已用汉文写过一篇短篇幻想小说《元生梦游录》，此后他又写了《愁城志》、《花史》、《鼠狱说》等短篇寓言小说。他的小说的特点是讽刺辛辣。上述四篇小说，篇篇都是表现对现实政治不满的。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正在于这些讽刺小说。

林悌反对当时一般文人士大夫一味崇拜和模仿中国而抹煞或轻视本民族文化的作法，他对祖国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相传他去

就任平安道都事的途中，曾特意到以写作爱情时调闻名的女诗人黄真伊墓上祭奠。他悼念黄真伊的时调收入时调集《青丘永言》中，流传至今。黄真伊是备遭贱视、受人玩弄的妓女。林悌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他的这一举动，曾遭到一些贵族道学夫子的非议。

林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坚决反对把朝鲜称为“小中华”。他性格耿介磊落，思想与当时封建腐儒和一般士大夫格格不入，因而一生不被统治者重用，未作过高官。

《元生梦游录》以端宗被谋害以及忠臣遭杀戮为题材，抒发了他对十六世纪李朝政治的不满。作品中的主人公元子虚“气宇磊落，不容于世，屡抱罗隐之冤，难堪原宪之贫。朝出而耕，暮归读古人书。穿壁囊萤，无所不至”，是一位富有才学、刻苦努力却又不得志的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其实也就是林悌的自我写照。

“尝阅史至历代危亡、运移势去处，则未尝不掩卷流涕，若其时，汲汲焉见其垂亡而力不能扶者。”这里也有林悌思想的影子。林悌身处朝鲜国势渐趋衰落，壬辰战争发生前不久的时期。所谓“汲汲焉见其垂亡而力不能扶”虽说的是元子虚读史的感想，但实际上是林悌为当时（十六世纪后半期）的朝鲜政局和国势而焦虑的一种表露。

作品写元子虚在仲秋之夜，读史书时进入梦乡，梦见了一位贤君和六个忠臣。这贤君正是被世祖篡位并害死的端宗，六个忠臣则是朴彭年、成三问、河纬池、李垲、柳诚源、南孝温，即因忠于端宗而被害的“死六臣”。南孝温指责尧舜汤武为千古罪人，原因是常有人盗用他们四人的名义，为“以臣代君”者打掩护，而端宗则批驳了这种说法，指出这四位君王无辜，借他们之名干坏事的人才是罪人。六人又各自赋诗，抒发忠直而蒙冤、正义不得伸张的抑郁心情。最后，一位象征俞应孚而出现的轩昂武士，拔剑起舞，责备这几名文臣“腐儒不足与成大事也！”并慷

慨悲歌。元子虚被惊醒了。

《元生梦游录》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主贤臣忠，固守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林悌的这篇早期作品虽表明他寄希望于君王的圣明，但也表现了他敢于借历史事件讽喻当时朝政的斗争精神。

《愁城志》属于一种特殊的寓言小说，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材不能见用，忠臣遭贬的故事。林悌把当事者冤屈无法昭雪，忧郁难以排解的情绪集中地表现在"愁城"之中。愁城有四个门，即忠义门、壮烈门、无辜门、别离门，用以象征各种愁苦悲戚。最后作者以"三州大都督驱愁大将军"为醇酒的象征率军攻克愁城，事实上就是借酒浇愁的意思。

《愁城志》是借古讽今之作，对当时正直多才之士报效无门的现象表示愤慨。当然也流露他自己不被重用的感慨。最后的结局只不过说明他在现实中难寻出路，不得不倘佯闲散，自我排解。

林悌的作品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是两部寓言小说《花史》和《鼠狱说》。

《花史》取材于中国的历史，借花草的形象，以编年体的形式写成一部"花之王国的兴亡史"。以此揭露和暗喻当时统治阶级中种种腐败丑恶现象。

如关于党争，《花史》中这样写道：

> 三年，流海棠于长沙：初东陶之世，武陵之桃为国大阀，门栏烨赫……以外戚争事奢侈。有名碧者，性独高洁…英王爱甚，共置一堂。又有名柳者，渭城之外裔也……乃以分党……朝廷上色目纷然，英王不能禁……而白党犹盛，海棠不能出气讥刺朝廷，金带围白上流之。是时黄党亦有见黜城外者。

作者又借"史臣"之口指责了这种现象，并且批评那种认为党争无法消除的意见："谓之党祸酷于逆乱则可，谓之破党难于制贼，岂其可也？"

又如对君王的穷奢极侈，糜费民财以及喜爱小人阿谀谄媚等等，作品也作了揭露：国王不听忠臣金带围的劝告，重用风伯，并纳风伯之女为才人（女官）。从此懒理政事，懒于上朝，挥霍无度，求天下怪石作假山，广植奇木异草，作"四香阁"，"百宝栏"，并购置大批沉香、翠珠作为装饰品。作者通过"史臣"之口指出这些现象是"穷奢纵欲之心"、"怠惰燕安之习"、"贪财虐民之政"、"好谄恶直之意"，表现出对此种现象疾首痛心。

《花史》还讽刺和嘲笑了国王的迷信行为：他耗费亿万资财大设水陆道场，超度鬼众。最可笑的是国王竟然听信方士的妖言，饮白露以求长生，反而因此得病。王急呼左右，没想到他们也因学王饮白露，得了哑症。国王虽非常气愤，但无法骂人，只得张着嘴"喘喘"喘气，结果死去。

比《花史》讽刺得更辛辣的是《鼠狱说》，讽刺对象是贪官污吏和昏庸的官僚。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一只老奸巨猾的大老鼠带领着一群小老鼠钻进国家粮仓中，长期隐蔽，偷吃了国家的大批粮食，直至情况十分严重时，管理和看守仓库的司库神才发觉，于是将老鼠拘来审问。狡猾的老鼠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株连大量无辜者，说受他们唆使和怂恿，自己才偷吃粮食的。虽蠢的仓库神竟然听信老鼠的假口供，把一个个无辜者拘捕审问，把他们囚禁起来。这些无辜者中有桃花、柳树，有猫、狗、牛、马、螳螂、乌鸦、喜鹊、老虎、狮子，甚至还有龙、麒麟等。最后，老鼠终于无可抵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鼠狱说》中的一群老鼠无疑是指大肆贪污的官吏，而司库神则是不尽职守、昏庸无能的官僚的象征。不仅如此，作者还借老鼠之口说出：

> 天之神，地之祇、野之魍魉、山之夔魖、苍苍之松、郁郁之柏……皎皎之日月皆承上帝之命使我恣食仓中之粟矣！老身抑何罪焉？

暗示造成老鼠偷吃粮食事件的罪责，最终应归到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很明显，作者林悌是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叹的，然而他不敢正面写出，只能借罪犯老鼠之口隐晦地加以暗示，最终又以司库神对它的斥责和处刑来掩盖这一思想。

《鼠狱说》的最后以“太史氏”的名义发表了作者的感想：

> 火不扑则延，狱不断则蔓。向使库神案其罪而即磔，则其祸不必炽也，噫，戾气所种，岂独穴仓一虫也哉？吁，可畏也！

这段话和前面所提的鼠的最后供词相呼应，表现出写此寓言的中心思想：整个李王朝的统治阶级中都存在问题，不是处罚鼠窃狗偷之辈可以解决的！

《鼠狱说》就各种动植物的特征创造出各种“人物”的性格和特征，这些人物的举止言谈既不失原动植物的形象特点，也十分切合某种“人物”的性格。这种艺术手法在《花史》中已有所见，也是一般寓言常用的方法，但林悌在《鼠狱说》中的手法越发细腻，形象也更加生动。此外，辛辣的讽刺、夸张的写法、幽默的笔调，都是《鼠狱说》的重要特色。

以上林悌的四篇作品，比讽刺小品复杂，比小说又简单一些。它们情节太简单，各种人物的言行有过多的重复雷同。

就情节、结构及艺术技巧和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它虽不如前一个世纪出现的《金鳌新话》，但它的强烈而大胆的讽刺使它在李朝文学史上占有一特殊地位。

中编　中期（十七世纪前后）

1592年开始的壬辰战争，使李朝封建社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加之后来的1626年和1636年清兵两次入侵，使得李朝社会逐渐趋向没落与崩溃。一方面，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战争给李朝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战后剥削的残酷和党争造成的混乱又阻碍和推迟了经济的恢复，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面，战时和战后爱国主义思想的昂扬、人民反对封建贵族浪潮迭起和力求改革现状的实学派思想的兴起，则是这一时期的积极因素。

从李朝社会五百年的发展全过程上看，十七世纪带有李朝社会前后两期的过渡性质。因此，把这一百年左右的时期划出来，称为李朝中期。壬辰战争虽发生于十六世纪末，也划入这个时期。爱国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国语小说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上的主要特征。

第一章　爱国爱民的歌辞大家朴仁老

李朝中期，歌辞最著名的作者是杰出的爱国、爱民诗人朴仁老。他是继郑澈之后的又一位歌辞大家。

朴仁老（1561—1642）号芦溪，又叫无何翁。一五六一年，即李朝明宗十六年夏历六月二十一日，朴仁老生于庆尚北道永川的一个仕宦家庭中。他父亲曾任承议副尉（正八品），性格刚直，清廉洁白，因此家境清寒。朴仁老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少年时节，他不但学习诗文，还学习武艺，从事一些农劳动。

壬辰战争发生时，朴仁老三十一岁。他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投笔从戎，战争中屡建奇功。三十七岁时，江左节度使成允文慕朴之名，聘请他当幕僚。他为成允文制定作战方案，出谋献策，颇受器重。

朴仁老中武举后，先任水门将官职，后来又去罗浦任万户之职。他为官清正，忠于职守，离任时，兵卒为他立清德善政碑。三十五岁时，他去成允文麾下当统舟师。

壬辰战后，百姓所受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李朝官僚却又热中起党争来。“尚文鄙武”之风也很盛行。朴仁老不愿在官场上随波逐流，不屑于和可鄙的两班为伍，辞官归田。

一六二六年，朴仁老六十七岁，后金侵略朝鲜。李王朝为了安定民心，派了一些按察使去各地限制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岭南的按察使李谨元在战祸最重、盘剥最深的地方限制苛敛诛求，整顿混乱局面，使人民生活渐趋安定，深得百姓赞扬。朴仁老作歌辞《岭南歌》歌颂他。

一六三六年，清兵再次入侵，腐朽无能的李朝统治者却和清廷妥协，订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朴仁老为此忧郁不安，作汉文诗《述怀》抒发自己的忧国心情：

报国初心久未成，孤眠长夜恼愁情。

梦中驰入辽阳路，射杀单于奏凯声。

一六四二年，朴仁老八十二岁，怀着忧时伤世的心情离开了人世。

朴仁老一生诗文充满了爱国思想，李溟曾这样评价他的诗：

所著诗文歌辞字字句句皆出于思亲忧国之情。

朴仁老长期生活在农村，他的歌辞也部分地反映了他艰苦的劳动生活。

朴仁老一生著述甚多，但有不少已散失，现存者有《芦溪先生文集》，其中收入了他的歌辞八首、时调六十首及汉文诗。

朴仁老的突出成就在于歌辞。这八首歌辞就是《太平词》、《沙堤曲》、《船上叹》、《陋巷词》、《独乐堂》、《岭南歌》、《芦溪歌》、《陶山歌》。

最能表现他爱国思想的是《太平词》与《船上叹》。

《太平词》作于朴仁老三十八岁。一五九八年冬，朴仁老作为江左节度使成允文的幕僚，前往倭寇在朝鲜的最后一个据点釜山，此时倭寇已经一败涂地，从釜山仓皇撤退，逃回本国。朴仁老在釜山停留了十余日之后回归本营后，作《太平词》以慰劳士兵。

《太平词》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凯歌。它充分表现了以斗争求和平的战斗精神和朝鲜人民英勇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和热爱和平的思想。

《太平词》的开始部分自豪地叙述了朝鲜悠久的历史、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热爱和平的思想，接着就以愤怒的笔调回忆了倭寇的入侵及其在朝鲜土地上的暴行：

岛夷百万，一朝入侵。

亿万惊魂，刀锋所逼。

平原积尸，可与山齐。

雄都巨邑，成豺狼窟。

残暴的敌人屠杀了大量无辜的朝鲜人民，田野上尸骨如山！侵略军有如豺狼，盘踞在朝鲜人民辛勤建成的大小城镇中，直闹得“烟尘弥漫，日色昏暗”。

朴仁老接着叙述明朝军队的援助以及敌人被撵出平壤，逃往东南沿海去的情形。与此同时，朴仁老歌颂了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将军的功绩，赞扬他在敌人受挫以后仍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李舜臣善于选用人才，严格训练士兵。因此，能够在倭寇再次进攻时，打退敌人，取得胜利。

朴仁老以胜利者的豪迈气概，描绘了朝鲜与明朝军队联合作战，打垮倭寇的场面：

猛将如龙，勇士如云。

旌旗蔽空，逶迤万里。

兵声大振，震撼山岳。

御营大将，率先冲锋。

如风之狂，如雷之迅。

清正贼魁，已陷网中。

敌人被打垮了。朴仁老又意气奋发地描绘出朝鲜人民取得胜利时的欢乐场面：

五色祥云，片片腾空。

扬弓举矢，高唱凯歌。

人人欢呼，声震云霄。

在《太平词》的末尾，诗人唱出了：“亿万斯年，兵戈永息，耕田凿井，击壤而歌。”希望百姓永享太平岁月。

作者的这种思想，反映出封建时期小生产者农民对理想社会的设想。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对作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贵的

是，这一切是作者代表百姓的利益和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另一首以爱国和国防事业为主题的歌辞是《船上叹》。

这首歌辞的创作年代不详，从歌辞的开头说自己“老而多病”来看，似乎作于他的晚年。也可能是一六〇五年（乙巳年）即他去海军将领成允文麾下当“统舟师”的时候。但也有人推断此诗作于壬辰战争发生后的次年，即一五九三年（朝鲜教育图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朝鲜文学史年表》）。

作品一开头，叙述了作为统舟师登上战船前往釜山赴防时的感想：

身老而多病，今日任舟师。
乙巳炎夏日，来镇东营地。
病魔虽缠身，安能坐养息？

接着作者满怀豪情，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愤恨和蔑视。对海上风云的描绘，把朴仁老的豪情衬托得鲜明强烈：

腰间插长剑，慷慨登兵船。
满怀愤恨意，圆睁怒双眼。
遥望对马岛，风卷残云漫。
浮云天边积，苍波浩水远。
天际与海波，有如一色连。

作者怒视对马岛，思如潮涌。他埋怨神话传说中的发明制造舟船的轩辕氏，因为船可渡海，才导致了倭寇乘船入侵朝鲜。接着作者对于秦始皇表示了不满。因为据传说，日本人是由秦始皇派去寻不死药的童男童女繁衍的后代。但作者接着谴责自己的这些想法和埋怨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卫祖国的安全。他谴责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破坏百姓的安宁生活。他为祖国的悠久历史而自豪，为祖国大地遭受海贼蹂躏而感到羞耻：

吾东方文物，可比汉唐宋。
国运多不幸，海丑任逞凶。

蒙万世之羞，未能雪国耻！

憎恨敌人的心情，激发了朴仁老的斗志。他要“老当益壮”，要效仿那“缺脚孙膑胜庞涓”，英勇奋斗，打败敌人：

我尚存一命，手足亦齐全。

对此鼠狗贼，岂能怀畏惧？

飞身上战船，率先冲向前。

横扫入侵敌，如风卷落叶！

《船上叹》虽以国防为主题，却不是叙事诗，而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抒情诗。作者如实写出矛盾的心理和起伏的感情。词句虽不华丽，但情感朴实，真切动人。在朝鲜国语爱国诗篇之中，是难得的佳作。

《岭南歌》则是一首颂歌，在这首歌辞中，作者对李谨元的歌颂虽然有些过分，但表现了朴仁老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作者在这里揭露了壬辰战乱之苦及酷吏豪绅对百姓的残酷剥削。

《陋巷词》作于朴仁老五十岁左右时。朴仁老辞官归田以后，他的歌友李德馨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写信问候，他就写了歌辞作为答复。

在这首歌辞中他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的艰苦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

陋巷深处，茅草为屋。

风朝雨夕，艰难度日。

腐草烂秸，当作柴火。

三合糙米，煮成粗饭。

五合粗粮，做成稀粥。

烟雾腾腾，弥漫茅屋。

锅巴汤水，半冷半热。

饥肠辘辘，聊以充腹。

生涯如此，别无他策。

丈夫之志，岂能改移？

生活虽艰难，他宁愿忍饥受寒，而决不改变初衷：

饥无可食，寒无可衣。

一片丹心，岂能改移？

可见，朴仁老并非缺乏致富之道，而是不屑与官场奸佞之辈为伍。他宁愿依靠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生活，且看他的劳动条件多么艰苦：

旱既太甚，节气又迟。

微雨初晴，道上水积。

各取一半，灌浇百田。

朴仁老靠耕田度日，自己竟连耕牛也没有，而不得不向地主去借。他在歌辞中这样写他借牛的过程：

月黑之夜，喘喘走去。

大门紧闭，门外且待。

黯然伫立，故作咳声。

良久之后，

"门外何人？"

"我不知羞，冒昧来此。"

"初更已近，来此为何？"

"穷家无牛，为此而来。

年年如此，有烦尊驾，

虽感不安，实出无奈。"

这一问一答中，表现出了朴仁老所处的困境和富人的傲慢态度。尽管借牛的人如此恭谨多礼，地主却不屑一顾，他说他已吃过对面人家的酒肉，答应次日把牛借给他们了，没法再借给别人。朴仁老无可奈何，带着失望的心情，拖着一双后跟已破的鞋子，步履艰难地离开了地主的家门。衣着褴褛，心情沮丧，连狗也看不起他，朝他直吠。回到茅屋里，又难过又烦恼，彻夜难眠。天亮了，听着人们热热闹闹下地耕田的话语声，他更是愁苦难言。

朴仁老在这里虽然描写的是自身的遭遇，伍实际上反映了整

个农村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

朝鲜文学史上很早就有来自农本主义的对农民和农耕生活的尊重态度。“我敬农夫如敬佛”的李奎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那些尊重农民的诗人，本人并不从事农业劳动。朴仁老不仅尊重庄稼汉，而且把农活看得比作官还要高尚：“莫言干禄胜于耕，干禄焉能及此耕？”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耕田、下种、浇水、收割样样都干。种粮食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悠然自得的享受，也不是隐士生活中的一种田园情趣，而是和普通的贫苦庄稼汉一样，以此谋生。

当然，朴仁老也不能完全摆脱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一种“安于天命”的宿命论思想和儒家的忠孝信义思想。如《陋巷词》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人间万事，命中注定。
贫而无怨，虽难做到，
我命如此，全无悲哀！
箪食瓢饮，我愿已足；
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太平天下，唯念忠孝。
兄弟有义，朋友有信，
谁人能够，以此为非？
舍此之外，听天安排！

朴仁老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使他无法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他在对腐朽的统治者产生失望与反感之余，只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退出官场，以务农的办法来求得他个人以为是最高尚的出路，并且只能从“安天命”、“存忠义”中去找精神支柱。

歌辞《独乐堂》是他四十岁时所作。独乐堂在庆州玉山，是李彦迪（1491——1553）的故居，李彦迪与徐花潭是李朝前期的两大名儒，李滉、李珥就是他们学说的继承人。这首歌辞是朴

仁老访问这个地方时的述怀之作，表现他对先贤的追怀与钦慕、对秀丽自然景物喜爱和自己的高洁的志操。

《沙堤曲》为朴仁老五十一岁时所作。其挚友李德馨筑亭于龙津江岸沙堤，晚年为避党争而由官场隐退，在此生活。此歌辞为描写该处自然景物之作，也表达了李德馨的心情。

《陶山曲》为朴仁老寻访李滉在礼安的书院后所作，与《独乐堂》性质类似。

《芦溪歌》也是朴仁老晚年所作。芦溪为他的隐居之处，他在那里寄情山水，完全断念于功名富贵，来实行他“安贫乐道”的人生哲学。

朴仁老的诗歌有自己的特点。《行状》的作者郑葵阳说他“胸次爽旷，意思水涌，即大篇文章，把笔便成。叙事讽物，蓄得无限意趣，使人听之不觉手舞足蹈，虽顽夫亦洒如也。”说明了他才思的敏捷、诗歌的丰富内涵以及语言的平易质朴。他的歌辞吸收了民间的口语，显得浅淡自然。其问答式的表现手法，上承李奎报的一些汉文诗的笔法，并对以后的辞说时调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他的歌辞对说唱文学也是有影响的。

第二章　平时调的繁荣与尹善道

李朝中期，时调比前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者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时调作者，虽然仍以汉文诗为正宗，但更加不满足于汉文诗歌的可咏而不可唱的局限。壬辰战争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长，和多年来中国宋词、元曲盛行对他们所产生的刺激和影响，使更多的文人感到必须吸收本国的口语，创作出可以歌唱的作品来。时调创作者的队伍扩大了。其中最卓越的作者是尹善道。他以自己描写山水的时调作品把朝鲜国语的表现能力和潜在的美进一步发挥出来了。

从体裁上看，时调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在原有格式基础上稍有破格的"於时调"和破格较多的"辞说时调"。而旧有的时调格式，则被称为"平时调"了。

第一节　爱国时调及其他

李朝中期开始于十六世纪末的壬辰战争，又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清廷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丙子战争）。两次战争激发了一些人的爱国情绪，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时调之中，出现了一些洋溢着英雄气概的作品。

李舜臣将军的《闲山岛》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闲山岛上明月夜，独自坐岗楼。
朔风吹万里，长剑佩腰间。
一声胡笳飘耳边，伤时忧国愁无限！

忧国之情，溢于言词，境界苍凉，情绪悲壮，风格豪迈。

金德龄（1568——1596）是壬辰战争中的一位义兵将领，他

勇力绝伦，武艺高强，时人将他比作《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壬辰年倭寇入侵时，正值他守母丧，但他脱下丧服带领义兵五千去抗敌，威名震撼敌营。传说倭将领加藤清正曾经把金德龄的画像挂在墙壁上，叹为神将。可惜由于金德龄被怀疑和李梦鹤叛乱有牵连而蒙冤死于狱中。他的时调《春山》含意虽较为隐晦，但可以看出这位爱国名将的抑郁心情。在政治腐败党争激烈的复杂情况下，忠心卫国的人也难免受株连。联系金德龄的一生遭遇，可以说，这是一首反对摧残人材的党争，誓死反对外敌侵略的时调。

金尚宪的时调《南八》，则另是一种风格：

"南八，男儿死矣，不可以不义屈！"
笑而答曰："公有言，敢不死？"
岁月悠悠，多少英雄为此泪满襟！

这里借用了中国唐朝至德二十年的典故，即睢阳城守将张巡及其部将南霁云就义的英勇气概。第一、二两段是张与南的对话，最后一段是作者金尚宪的感想，这是借历史人物以表现作者自己为国牺牲的决心。无伤感之意，有悲壮之风。

李明汉(1953—1645）因反对议和而被捕，他的《楚江渔夫》和《梦中路》也是感人的爱国作品：

楚江渔夫，切莫煮钩上之鱼！
忠魂屈三闾，就在鱼腹里！
锅水沸腾千万次，岂能把鱼煮熟？

这是借用屈原投汨罗江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反对妥协、不愿降清的意志。借劝说楚江（指汨罗江）渔夫，来表达自己对忠直之士的尊敬与钦慕，立意新奇。同样是引用中国典故，而此首表达方法较金尚宪的《南八》用意更深刻含蓄。

《梦中路》类似郑澈《思美人曲》。从作者反侵略反妥协的态度来看，这首以思念君王为内容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实际上是爱国之情：

梦中所行路，如有迹可寻，
君家窗外石板路，亦将被我鞋磨尽。
梦中之路无痕迹，惆怅忧伤难禁！

另一位作者李廷焕（1633—1673）在他的文集《松岩遗稿》中收入了他为丙子之乱而作的十首时调，他以“题罢十歌后，谁怜未死臣？自吟还自和，不觉泪沾巾”四句诗总括了他十首时调中的沉痛心情。

除以爱国为主题的时调以外，还有大量时调反对党争，歌颂爱情、颂扬孝道等等。文人之中的申钦（1566—1628）、赵存性（1554—1628）、金光煜（1579—1656）都热心于时调创作。一些平民妇女、名妓如李梅窗、松伊、求之、明玉等人，也有一些时调为人所传诵。正如金寿长在《海东歌谣》的序文中所指出的，歌者、渔者、吏胥、名妓等人都作了不少时调，可惜的是，其中大部分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因此作品年代也不能确切断定。

申钦（1566——1628）号象村，是数得上的一位知名诗人。壬辰战争时，他参加过救国斗争，因不满光海君暴政，辞官隐居于春川昭阳江畔。仁祖反正时，又出来作官，官至领议政。隐居时，曾写时调二十余首。《酒》、《山村雪》就是其中的两首：

酒分几种？惟有清与浊！
饮后皆醉，清浊何相干？
月明清风之夜，醉而不醒又怎样？

时调中分明流露出不满。清浊不分，暗示出是非难别之意。“醉而不醒”，以酒麻醉自己，免惹烦恼。这是对光海君暴政的一种消极的抗议。

山村雪飞埋石路。
柴扉莫开无客来。
深夜一片月，聊充我友来作客。

这首时调描写他远离官场的隐居生活，风格清新，超凡脱俗。

因作诗遭害的大诗人权韠（1569—1612）也作过时调。《此身》，表现出他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精神：

此身欲归去，当化为何物？
化为昆仑山岭一青松。
大雪满群山，唯我独挺立！

党争削弱了国势。李德一（1561—1622）在他写的时调中为此表示了愤慨与不满。李本系武人出身，壬辰卫国战争中，他英勇善战，深得李舜臣夸奖。战后，他升为折冲阶三品职，因见光海君政治上的昏庸腐败及党争的激烈，辞官归乡，盖茅屋一间，命名为“漆室”。他的文集《漆室遗稿》中收有他的时调二十八首。现举其二：

拚死相斗，岂是为了国家？
温衣饱食，无所事事，埋头倾轧。
你争我斗无了时，奈何奈何？

功名我不爱，富贵我不贪。
一间茅屋我独坐，
日日夜夜，伤时忧国我心酸！

李德一谴责党争的时调所受到的评价较高。林象德说他的“伤朋党”的时调“反复伤恳，直而不迫，宜使朝之士大夫听之而瞿然”。

歌辞大家朴仁老也写了一些时调。《盘中》、《王祥》表现了他对父母的一片孝心：

盘中早红柿虽美，却无可用处。
纵然非柚子，亦可揣怀中。
揣怀中，献何人？反复思之心中悲！

这里引用中国三国时期陆绩怀桔的故事，表达了他追念父母的深情。有一种“儿欲报恩已不能”的悲哀。

林庆业的时调《力拔山》则表现了这位义州府尹立志为国雪

耻的决心，其中引用了中国楚霸王、伍子胥和关羽的故事，作品风格雄浑、豪迈。林庆业联明抗清的意愿虽未实现，但这首时调却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为人传诵。

这一时期的爱情时调多数是妓女写的。对这些封建时代备受压迫和蹂躏的女性来说，唱歌供人取乐是她们的职业。从前一时期的黄真伊到此一时期的一批歌唱爱情时调的女子，基本上都是因职业关系进入了时调作者的行列。尽管如此，她们也为自己悲惨身世发出了感叹，流露出真情。如英祖时千锦的《山村夜》：

山村夜已深，远处频传犬吠声。

打开柴扉苦张望，寒天惟月明。

狗呵，空山月正眠，何苦徒然吠声声？

写的是女子翘首望意中人归来的焦灼心情，感情真挚，语言质朴，没有珠光宝气的描写，也没有锦罗绣帐的刻画。作者虽为妓女，表达的感情和心理活动，有如普通一村妇。

松伊的《松》表现出这个身心备受侮辱与损害的妇女，性格坚强，有强烈的自尊心，向往纯洁坚贞的爱情：

松，松，所指毕竟是何松？

绝壁松一棵，青翠自伫立。

山路采樵童，镰刀休想将我侵！

这一时期名气更大一些的汉文诗女诗人是李梅窗。她是宣祖时扶安的妓女，艺名葵娘，和诗人刘希景（1545——1636）相好。这里所引的时调《夜已深》是她为刘而作的：

夜已深，人已眠，独我为何不能寐？

郎已入梦乡，帷深垂，惟我念他在玉帐。

千里外，孤梦中，悠忽飘渺何所向？

第二节　卓越的山水时调作者尹善道

如果说郑澈与朴仁老是李朝歌辞大家，那么李朝时调大家就是尹善道了。

尹善道（1587—1671）字约而，号孤山，于宣祖二十年出生于汉城。壬辰卫国战争胜利时，他才十岁。他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壬辰卫国战争以后，是李朝中期的一位文学家。他博览群书，二十六时为国子进士。光海乱政之时，他三十一岁。作为一名普通的儒生，他敢于上疏直言，得罪专横的掌权者李尔瞻，被流放到庆源。后来仁祖反正，他被释放，被任命为金吾郎。但他无意作官，辞官重返故乡海南。后来又被拜为凤林、麟坪两大君的师傅，随后又辞官归乡。一六三九年清兵入侵朝鲜，国势危急，他激励舟师向李朝统治者所避居的江华岛进发。但此时江华岛已陷于敌手。尹善道正欲往国王仁祖所在地南汉山城，国王却已向清军投降，并接受了对方的种种屈辱条件。他气愤已极，船都未下，决心改道到济州岛隐居。途中见甫吉岛风景如画，就停下来，筑“乐书斋”，打算在此度过余生。

但这以后，尹善道又因种种原因得罪了掌权人物，先后被流配至庆北、盈德，光阳等地。他在政治派别上属于南人系统，因而既遭北人派李尔瞻的排斥，又受西人派宋时烈的排挤，一生很不得意，十分厌恶党争。加之他本来对作官就兴趣不大，以上种种遭遇更使他立意隐居，遨游山水，享钓水耕山、弹琴击缶之乐。他的时调能以优美的韵律描绘出朝鲜的山川美景，也正是和他的遭遇有关。他的时调在朝鲜文学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尹善道的文集有《孤山遗稿》，其中收时调《山中新曲》十八首，《续山中新曲》两首，《古琴咏》一首，《赠伴琴》一首，《初宴曲》、《罢宴曲》各两首，《梦天谣》两首，《遣怀谣》五首，《而后谣》一首，和《渔夫四时词》四十章。最能代

表他的创作风格的是《山中新曲》和《渔夫四时词》。

《山中新曲》中包括《朝雾谣》、《夏雨谣》、《夜深谣》及《五友歌》。

我友几？水、石、松、竹。
东山月升起，更令我心怡。
且问五者外，更有何深意？

诗人最喜欢的是清风明月、泉石松竹，以大自然为友，表现出诗人超然世外，清高自适的思想和幽冷恬淡的性格。《五友歌》中，分别对这五种东西进行了吟咏。如对水，诗人歌唱出云色虽佳，但会变黑；风声虽妙，但会停息；只有水永远清亮明澈，常流不息。对石，他这样写道：

花，为何盛开而又凋谢？
草，缘何青翠却又枯萎？
永恒不变者，舍石而外又有谁？

对松，诗人歌颂他的坚硬与永恒，不随势转移：

花天暖而开，叶天寒则落。
独尔劲松，不畏惧严霜冰雪。
根深入九泉，方能如此坚定不移！

对竹，诗人歌颂它的四时常青。

以上尹善道所歌颂的水、石、松、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永恒与不变，这反映出诗人所遵循和信仰的朱子学说的“气节”思想，也表示出他不愿随风转舵，投机取巧钻营的思想。

对五友中最后一友——月亮的歌颂，表现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品行，以沉默蔑视官场一切是非纷扰的态度：

体积虽小，高升天际将万物普照。
黑夜茫茫，尔独光明，舍此之外，何处可找？
洞悉一切，默默不语，与尔为友，令我自豪！

尹善道在抒写他流放的心情时，曾有“不如无目兼无耳，归卧林泉毕此生”这样的诗句。意思和这首时调是一致的。

《五友歌》所歌颂的自然界，正是诗人尹善道自己思想性格的写照：耿直孤高、憎恶黑暗、喜爱光明而有气节。在欣赏他的缺乏人间烟火气的山水明月之作时，我们不能忽略他思想上的积极一面。

尹善道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以时调描绘了朝鲜美丽的大自然。在他借用汉文语汇绘景抒情的同时，朝鲜语中蕴藏的无限表现力，在他的时调中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挥。《渔父四时词》可以说是尹善道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词共分四十章，每十章描绘一个季节，对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自然景物作了十分细致动人的描绘。

尹善道描写自然景物的时调使他赢得了高度的赞赏，有人把他比作歌辞中的郑澈，是不过分的。

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尹善道的景物诗中流露出的基本上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他的《渔父四时词》中出现的渔夫并不是劳动人民的形象，更没有反映出真正渔民的生活处境。尹善道笔下的渔翁实际上是扮成渔夫模样的文人，和力求摆脱尘世是非喧嚣，萧散优游于山林江湖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艰苦劳动的体验，更没有尝过遭受残酷剥削的滋味，只是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流连忘返于花草林木之间，白云明月之下，享受隐居生活的静谧与安闲。

尽管如此，尹善道的爱国热忱，不愿走阿谀奉承的升官捷径及捷受排挤与流放的经历，加上他对创作朝鲜国语诗歌的重视和努力，使他的时调具有一种清捷明澈的色调和高雅脱俗的风格。他对朝鲜山川的描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描写自然美及表现山林江湖情趣的时调，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认为是绝妙佳作，集时调精华之大成者。《海东歌谣》的编者金寿长说："此翁歌法，脱垢清高，吾观此，则难登万丈之峰。"尹善道诗歌是朝鲜国语诗歌的珍品，给后人以高度的美的享受。

第三章　於时调、辞说时调及杂歌的出现

由于十七世纪下半期城市商业的发展，货币流通的扩大，朝鲜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若干变动，人们对文学的要求也有所变化发展，反映在国语诗歌上，就是新的内容的出现和新的体裁的产生。

新的内容是表现城市市民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描写商业活动和平民的爱情，以及他们对自然景物的欣赏。这一点，和十七世纪前半期反映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的诗歌有所不同。封建士大夫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及隐居生活的悠然自得，纤细的感情以及忠孝等儒教思想的说教等，在新的国语诗歌中都较难以找到了。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新的国语诗歌体裁是"於时调"、"辞说时调"和杂歌。

早在十六世纪，产生过郑澈的《将进酒词》一类的作品，它比一般时调长，带有辞说时调的性质。但是，辞说时调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体裁，是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出现。它是在於时调的形成之后而产生的。

所谓於时调，就是在旧有时调（即平时调）原有格律的基础上，稍有突破，即在初章或中章加一两句。

所谓辞说时调，就是初章、中章、终章的音节和诗句数量都可以突破平时调原有的格律。一般是在中章突破，它增加的不只是一两句，而是更多的句子，甚至已具有了散文化的倾向。此外，也有在初章突破，也有初、中两章皆有所突破的，甚至有三章全都突破的。比较常见的是终章保留原有格式，而头两章则延长

了。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是由于表现的内容和美学趣味都有了变化，原有的三章六句的平时调形式已不能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于是产生了这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字句越多，就越带散文化的趋势，而诗味也就越加淡薄了。因此，一般说来辞说时调的艺术性不如平时调。

於时调举例：

前塘中的鱼啊，谁把你
走进这池塘？
你远离北海到了这里，
进得来，出不去——这愁情，你我都一样！

辞说时调举例：

各道各船齐集时，商人船夫也来聚。
祖江良港停舟处，
帐篷中卖酒的娼女们，纷纷找到船上来。
只见那：
龙山三浦的巨船、平安道的独大船，
加上那康津、海南的竹船，
还有那灵山、三嘉的地上船，
再加上：满载海带的济州船、贩运海盐的瓮津船，
一个个，轻轻滑过来。
这时刻，
穷酸的傻汉们，
各码头渡船的艄公们，
别想挤进去，没你们的位子啦！

从平时调中派生出“於时调”和“辞说时调”，而从歌辞中，则派生出了“杂歌”体裁。

十七世纪的歌辞除朴仁老所作的系列歌辞以外，还有李睟光

等人作的一些歌辞（已失传）。在歌辞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一些时民间的艺人如唱曲家也模仿歌辞的形式作歌以满足城镇市民的要求。由于其内容和唱法都与原有歌辞不同，这类诗歌，就被当文人称为"杂歌"。

同歌辞相比，杂歌的格律松散，细节的描写过多，有些脱离主题。由于是口头创作，作者姓名往往失传。杂歌的内容与辞说时调有共同的倾向，只不过题材比辞说时调更为广泛，表现也更为自由一些。可以说，杂歌是歌辞在走向平民化过程中的一个变种。

杂歌作品的确切的创作年代往往不详。据推断，"十二歌词"中的一部分作品如《白鸥词》、《相思别曲》、《春眠曲》等，是十七世纪后半期的产物。

这是《白鸥词》中的一部分：

白鸥白鸥，莫要惊飞。
我来此地，非为抓你。
君王弃我，遂来寻你。
五柳春光，景色美丽。
白马金鞭，前去赏花。
云深溪碧，花红柳绿。
万壑千峰，飞泉直泻。
壶中天地，别有乾坤。
高峰万丈，青盖葱郁。
绿竹苍松，争高斗胜。
鸣沙十里，海棠花红。

这首时调写的是失去君宠，宦途失意的文人到林间溪边歌心时所见的景物。

十七世纪由歌辞中派生出的杂歌，以及由时调派生出的辞说时词，为十八世纪国语诗歌的发展开了一个头。它是此后国语诗歌和韵文小说洪流的滥觞。

第四章　李朝中期的汉文诗

第一节　爱国汉文诗及其他

李朝中期民族矛盾尖锐，党争继续，文人士大夫饱经外族侵凌和派系斗争之苦，所写汉文诗中也有所反映。

壬辰卫国战争中名将李舜臣，除用时调形式外，更多地是用汉文诗来抒发他的忧国忠忱。

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
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诗以《闲山岛》为题，这里正是李舜臣痛击倭寇的地方。这是在战斗间隙写的一首抒情短诗，并没有直接写与顽寇激烈战斗的场面，但把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南部海面上的萧瑟悲凉气氛描绘出来了。这种气氛不仅是大自然景物变化所造成，也是祖国的受难、艰苦的战争、复杂的政治环境等在作者心中的反响。为国担忧辗转不眠，只见残月映照弓与刀，诗的境界悲壮深沉，和他的时调《闲山岛月明之夜》风格与内容相似，实为异曲同工。

他的五言排律《无题六韵》写出了在当政者腐败无能、国防薄弱的特定情况下祖国备受敌人欺凌的悲愤的心情：

萧萧风雨夜，耿耿不眠时。
怀痛如摧胆，伤心似割肌。
山河犹带惨，鱼鸟亦吟悲。
国有苍黄势，人无任转危。
恢复思诸葛，长驱慕子仪。
经年防备策，今作圣君欺。

《文心雕龙》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舜臣此诗中的山河带惨、鱼鸟亦悲两句正表现了这种意境。全诗除对外敌的憎恨以外，还表现出他对内政问题的疾首痛心。

此外，五律《阵中吟》两首中的"仇夷如尽灭，虽死不为辞"和"虏命其能久？军情亦可知"，则表现出这位名将的誓死灭敌的决心和胜利在望的信心。

《赠别宣水使居怡》中表现出李舜臣和他的战友的感情。居怡曾和李一起为驱逐入侵的女真族而战，大败敌军，立下汗马功劳。壬辰卫国战争中又和李共同战斗于南海，重创入侵的倭寇，在陆地上也屡打胜仗，使倭寇惊叹"飞将军"再世。

北去同勤苦，南来共死生。

一杯今夜月，明日别离情。

诗中概括叙述了他们共同战斗的经历。

僧人泗溟堂（1544—1610）本名任应奎，又号惟政、松云，也是一位抗倭英雄。他是爱国僧人西山大师的弟子，壬辰战争时，率义兵与敌奋战，后去日本谈判，外交上也立过功。他的七绝《奉李统制使舜臣》歌颂李舜臣的卓著功勋，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豪与喜悦：

征南节度大将军，威振蛮荒静海氛。

节入生辰重九日，月明歌吹动辕门。

李舜臣在海战中牺牲后，许多人都怀念他。柳成龙（1542—1607）的诗《哀李统制》就是一例。诗人在此诗中高度评价了李的战功："当时百战李将军，只手亲扶天半壁"。诗人为李舜臣受奸臣迫害而愤慨："功高不免谗妒构，性命鸿毛安足惜？"这里表现出了李舜臣一心为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不畏惧小人构陷的高尚精神。诗的最后，柳成龙为李舜臣的功劳被统治者忘到脑后而不平，对他的祠堂失修感到愤慨，并表达了广大朝鲜人为这位爱国将军牺牲所感到的悲哀。

李睟光（1563—1628）的诗《题忠武祠》也是以歌颂李舜臣

为主题的。诗中赞扬了李的丰功伟绩，同时为当时朝政腐败不堪，缺乏李舜臣这样智勇双全的将军而感到忧虑：

第一中兴将，艰危活我东。
山河余怒气，宇宙有雄风。
对马春涛息，扶桑曙霭空。
至今沧海上，谁复嗣戎功？

此外，李得元（1600—1639）的七律《过忠武庙有感》也是追怀李舜臣的。

李植的五律《送松云使日本》对泗溟堂出使日本进行外交活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也反映出这位作为义兵将领的僧人所起的作用。

壬辰卫国战争是一场全民的抗敌战争，不仅僧人，就连妓女都参加了斗争。平壤妓女桂月香就是代表。李之衡在《悼节死妓》中对这位爱国女子作了热情的歌颂：

征西诸将总名卿，几个男儿拥重兵。
惟有女郎知死义，九重曾不荷恩荣。

诗中讽刺了那些贪生怕死的将官，并为桂月香牺牲得不到当权者的尊敬而忿忿不平。

十七世纪后半期吴道一（1645—1701）所作的《鸟岭》是一首回忆壬辰战争的咏史诗，指出当时官军战斗失利的教训，带有慨叹现实、伤时忧国之意。

借咏史而表现忧国之意者，还有沈光世（1577—1624）的《落花岩》。此诗写三国时期百济灭亡时大量宫女跳岩的历史事实，反映出壬辰战争以后民族意识的增长。

十七世纪所发生的丙子战争，也是当时诗人所常涉及的一件大事。金尚宪的七律《沈狱送秋日感怀》是他被囚期间所作：

匆匆殊方断送秋，一年光景水争流。
连天败草西风急，羁碛寒云落日愁。
苏武几时终返国，仲宣何处可登楼？

骚人烈士无穷恨，地下伤心亦白头。

当时，曾任领议政的金瑬（1571—1648）为怀念金尚宪，写了七绝《付书沈阳》。诗句本身虽只限于怀人，并无一语触及政事，但隐含着对忠贞爱国之士的尊敬：

高梧叶落雨凄凄，塞路三千梦亦迷。

欲向征人寄消息，一行书又万行啼。

诗的感情虽略嫌脆弱，气魄不如金尚宪，但也是真情流露，表现出一代正直文人在民族受屈辱时的哀伤与悲愁。

因反对和议而被逮捕的有一批人。其中如洪翼汉（1586—1637）和以“斥和”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的吴达济（1609—1637）、尹集（1606—1637）一同被处死于沈阳，被称为反和主战的“三学士”。三人皆有诗。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也表现出了忧念国事的心情，如洪宇远的《和洪评事宗之万朝》、朴世堂的《会宁路中》、《送吕圣济赴北幕》等等。

由于这一时期党争还很激烈，也出现了一些不满当权者的作品。反倭义兵将领金德龄所写《作诗见志》就是一个例子：

弦歌不是英雄事，剑舞须要玉帐游。

他日洗兵归去后，江湖渔钓更何求？

此诗表现了他不愿以抗敌的功劳换取高官厚禄，只望灭敌之后归故乡隐居江湖，借以表示他对党争的厌恶及力图避免受牵连的态度。后来他果然因莫须有的“叛逆”罪名冤死狱中，证明了他作此诗时的预感和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沈光世的《朝廷沉》借咏高丽武臣乱一事，表示了他对当世朝臣相互倾轧的不满。赵持谦的《登铁岭》写的是被放逐流配的臣子的悲哀，也是政界失败者的一种哀叹。

张维（1587—1638）的五古《放言》三首讽刺了当时官场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现象。他以“蛆虫生溷中，到死不曾离。岂知天壤内，更有清净地”几句话，对争名夺利、彼此攻讦的官

僚们，表示了极大的鄙视。

此时民族矛盾比阶级矛盾尖锐，因此，描绘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不很多。李民宬的《宿凤山东村》是其中之一，写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诗中所写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妪，她已失去丈夫，独子又于一年前被征兵入伍，死于疆场。自己孤身一人抱着年幼的孙子，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去冬官军数百骑经过本村，劫掠村庄，比外敌更加残暴。家里眼下米缸空空，只得靠橡栗和野菜充饥。

作者诗中还用与该老妪答话的方式写出了自己的困难处境，说自己家里也有人被征入伍，经常处于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最后作者叹息道："呜呼哀哉可奈何？普天之下奚独汝？"他希望"安得销兵息战斗？普天之下无寡女！"

这首长诗表明，外敌入侵造成的战乱固然是百姓受苦的原因之一，但内政的腐败，对军人家属的困难漠不关心度和官军的肆虐，也是百姓遭难的一个原因。

李基卨的（1558—1622）《征妇词》写征妇之苦，反映出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 碧窗纤手剪刀寒，裁得春衣送玉关。
> 玉关此去三千里，一夜残魂几往还。

此外，柳梦寅（1558—1628）的《襄阳途中》也写出了贫苦百姓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悲愤处境：

> 贫女鸣梭泪满腮，寒衣初欲为郎裁。
> 朝来裂与催租吏，一吏才归一吏来。

张维的《洗锄》及《翁刈稻》两诗也揭露出了统治者的残酷。《洗锄》中提到"去年吏到催租时，翁媪狂奔三日饥"。《翁刈稻》中提到催租吏在农民刚割下的稻子还未干的时候，就已来催租了，活画出官吏的虎狼嘴脸。

第二节　权韠的诗

李朝中期写汉文诗的诗人中，权韠（1569—1612）成就较为突出。权字汝章，号石洲。其父曾为江原道观察使，因为官清廉，家境并不宽裕。父兄均为当时的知名诗人。权韠自年少就同情劳动人民。年轻时参加过科举，随即看破科举的实质，认为它并非以德才取士，而只不过是派系和权势之争的一种卑鄙手段而已。于是他就断然不再参加科举。曾任"童蒙教官"的小官，过着清贫的生活。壬辰战争期间，他以一介书生赴抗战前线，与敌斗争，写下一些爱国诗篇。战后，党争仍然尖锐，为此他返归故里玄石江，决心以遁世终其余生。他刚直的性格、不信鬼神、主张平等的思想及对时政的抨击，招致了一般腐儒和御用文人的忌恨，触犯了光海君，因而被流放。在流配途中，他因壁上题诗而引起祸端。当时的外戚赵国弼曾劝他上书光海君认错，但他一笑置之，终于在光海君四年（1612年）被杀，死时正当壮年，年仅四十四岁。

权韠的诗和文章均享盛誉，他的挚友张维曾在《石洲集》序文中称赞说："石洲之诗，谈者谓百年来所未有，此只以诗论也。"还曾因作诗有名，被推荐任制述官。此外，他还能写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周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到朝鲜参加壬辰战争的中国文人，作品叙述了他的恋爱故事。情节曲折，文辞动人，诗文并茂。

权韠热爱祖国，他的《高判书敬命改葬挽章》是对壬辰卫国战争中爱国人民的一首热情颂歌。高敬命是壬辰卫国战争中的一位义兵将领。他曾率领义军转战忠清道、全罗道等地，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最后牺牲于锦山。他的两个儿子从厚、因原，也在对敌战斗中英勇献身。

诗中指出，在"岛夷肠肸窥东土"的情况下，朝鲜一时陷于

“重江失险两京墟，玉辇远驻西塞隅”的严重境地。这时朝廷的许多文官武将都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谋臣卷舌壮士泣，国事已去谁能扶？”疾风知劲草，就在国势危急时，高敬命以一山野百姓之身，奋然而起，登高一呼，激励人们去抗击敌人：

公时陆沉田野间，歘然奋起思捐躯。

登坛誓众天为悲，风云惨淡随旌旗。

孤军抗贼众知雄，为国一死心所安。

但高敬命过早地牺牲了。诗人哀叹道：“雄图未骋将星落，日明晦蒙神鬼哭。”诗人将那些在国势危急时畏缩不前的文武大臣和为国捐躯的高家父子作了对比，讽刺了前者，对后者给予高度赞扬：

公侯将相不可计，独使书生办此事。

男儿徇国古来有，父子三忠世无偶！

七绝《梦得一小册乃金德龄诗集也》一诗，表现了权韠对含冤受屈而死的爱国义兵将领金德龄的尊敬、怀念和惋惜：

将军昔日把金戈，壮志中摧奈命何？

地下英灵无限恨，分别一曲醉时歌！

和歌颂高敬命的诗一样，这首诗也谴责了朝政的腐败、黑暗。

除上面所列举的两首以外，权韠诗中提到壬辰战乱的地方是不少的。如七绝《宿大津院》就写了客舍厨工谈壬辰年的艰难情况，诗人对遭受战祸的人民表示了关心与同情。五律《马上口占》为朝中缺乏忠臣与骁将而叹息流泪。

七律《海村杂兴》也是一首类似的诗，但其中对当朝奸臣劣迹的谴责和对有功将领受排挤所表现的愤怒，则是前诗中所见不到的。

七律《贼退后入京》写出了经过倭寇蹂躏后家园的惨状：

故园荆棘没黄埃，归家空携一影来。

千里山河流几血，百年城阙有荒坛。

南天画角何时尽？西塞鸣銮几日回？

独向松郊寻归路，断云乔木有余哀。

他的四首五律《九日对酒作》、《有叹》、《南州留别》、《送宋通川》也都涉及壬辰战乱。情绪皆凄凉悲切，是侵略战争给朝鲜社会与人民带来惨祸的一种写照和哀叹，举《九日对酒作》为例：

丧乱看今日，凄凉异故园。

风尘桃竹杖，江海菊花樽。

古戍遥闻角，荒城早闭门。

兵戈满天地，漂转更堪论！

权韠也写过一些讽刺当时贵族官僚虚伪和党争丑恶的诗。如《忠州石》、《斗狗行》。

《忠州石》是一首含蓄、幽默的讽刺诗。一些贵族为祖先采石立碑，吹嘘祖先的"功德"。诗人用这七句话，把碑上的歌功颂德的内容作了一个绝妙的概括：

天资学业等起夷，

事君忠且直，居家孝且慈。

门前绝贿赂，库里无财资。

言能为世法，行为是人师。

不但文章才学超群出众，而且忠孝双全，廉洁奉公，言行皆能为人之楷模……真是一个完人！诗人这七句简短的概括，象漫画一样勾画出了那些官僚贵族自吹自擂的丑态。诗人接着幽默地问道："此语信不信？他人知不知？"诗的最后两句既含蓄又辛辣："天生顽物幸无口，使石有口应有词。"暗示出那一切吹嘘都是骗人的鬼话，表达手法巧妙、含蓄，令人深思回味。

《斗狗行》中把热衷于党争的官僚们比为群狗，把觊觎朝鲜领土的敌人比作强盗，而诗中的"主人"，则是一切有良心的善良正直的爱国者的象征，只有他们，才真正为国运而担忧：

谁投与狗骨，

群狗斗方狠！

有盗窥窬欲乘衅，小者必死大者伤。

主人抱膝中夜泣，天雨墙坏百忧集。

权韠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因父亲为官清廉，生活并不富裕。清贫的生活使他自幼就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亲近感。他少年时代所写的《驱车儿》就说明这一点。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赶大车的人。他因贫穷，三、四十岁还未能娶亲。由于“长安城中起楼阁”，王宫贵室要盖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他不得不在“官家催促无虚日”的情况下被迫年年去山上伐木，弄得他有屋不能住，有田不能耕。雨天运木材进京城。雨路上泥泞，行车艰难。而且牛的草料常常不够，赶车人也常缺足够的粮食充饥，就这样颠簸奔跑，一去就是十余年。结果，赶车人无法娶亲当然也没有孩子，甚至牛也没有下犊。诗人以“辘辘趵趵十余岁，儿身无子牛无犊。一朝牛毙儿亦死，官家何处施鞭扑？”四句话，画出了赶车人十多年的凄惨生活，并且对官家提出了质问。最后诗人希望王朝下令免除苦役，使赶车人都能务农营生，安居乐业。

在《送李安讷出守端川》一诗中，权韠要求他的这位挚友：做官要关心民间疾苦，为民请命。他这样地描写了当时百姓的痛苦：

国家新去乱，忧虞方未毕。

黎元困征赋，愁痛未忍说。

官吏恤供给，割剥到膏血。

向来百家村，所存无十室。

李安讷去端川为官，他的权限也只能在他管辖地段施行仁政，减轻或解救人民的痛苦。可是诗人在这里描写的不只是端川一地的情形，而是壬辰战争以后朝鲜各地的普遍状况。“向来百家村，所存无十室”，十室九空，可见当时农村萧条凄惨的程度。战乱已使民不聊生，官吏不但贪污赈济灾民的粮食，还进一步盘剥穷民。诗人在这里怀着对倭寇和黠吏的愤恨，描绘出了当时农村的惨状。

五言诗《切切何切切》中描写了丈夫服役远行的一位妇女的痛苦。官家本说是她的丈夫暂去即还，但一去三年，杳无信息。这个妇女上侍公婆，下养幼女，生计困难，只得去田野中拾穗充饥，时近岁暮，天寒衣薄，受尽饥寒之苦，却只能到道边上、茅檐下悲泣。

权韠的这类诗，明显地体现出高丽诗人李奎报的影响，不仅作品思想内容相似，而且文体也有类似之处。这首《切切何切切》就和李奎报的《孀妪叹》写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写可怜的妇女，又都是用作者提问引出作品主人公的回答来描写出她们的悲惨处境，这种让遭灾受难者直接倾诉手法，有较强的艺术效果。

和李奎报相似，权韠也写了因旱涝而念及农民的诗，如《春尽无雨四月初有作》。

权韠一生关心国事，但由于不满官场黑暗，放弃求官之意，其才能未得发挥，其生活处境也颇不顺利。这在他的一些抒怀诗中，有所流露。五律《偶题》、七律《夏日有怀》与《又用行字韵求和》都属此类。下面是他的《偶题》：

老去仍多病，生涯任陆沉。
云山千里梦，霜鬓百年心。
晓雨莺声滑，春江柳色新。
如何艳阳节，悄悄动悲吟。

他的七绝《赠天香女伴》是给一个妓女写的诗。该女有志气，权韠同情她的遭遇，为她缺乏知音而遗憾。在为她倾诉哀怨的字里行间，也隐含出自己志高寡合，怀才不遇的忧郁心情。

权韠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与热爱，他的《过郑松江墓》一诗，写出了他对于这位朝鲜国语诗歌大师的尊敬与怀念，和李安讷描述民间喜爱松江《思美人曲》的《闻歌》一起，为时人所称道。

空山木落雨潇潇，相国风流此寂寥。

惆怅一杯难更进，昔年歌曲即今朝。

权韠对中国文化也很喜爱。七律《读杜诗》写出了他对杜甫的敬重，用“神飙飒飒生阴壑，天乐嘈嘈发古钟”和“依然步入仙山路，领略千峰更万峰”等诗句来形容杜甫诗的境界、神韵和他的读诗感受。他的另一首七绝《别顾天使代作》写他对明朝使节顾天俊的感情，表现出明朝时期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深厚友谊。

第五章　国语小说《壬辰录》的出现及其他

李朝中期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外族侵略的战争，即十六世纪末的壬辰战争，和十七世纪上半期的丙子战争。前者反对日本的侵略，以光辉的胜利结束。后者反清以李朝统治者的妥协告终。两次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朝鲜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反映壬辰战争的小说有《壬辰录》，反映丙子战争的小说有《朴氏夫人传》及《林庆业传》。

第一节　爱国讲史小说《壬辰录》

《壬辰录》是历史小说。在它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许多记录战争情况的文献，如金良器的《少为浦倡义录》、柳成龙的《惩毖录》、李舜臣的《乱中日记》等等。小说《壬辰录》就是以这些记录和有关战争的大量民间传说为根据而写成的。

《壬辰录》有不少异本，大致可分为汉文本和朝鲜国语本两种。汉文本中，有的是历史记录，不是小说，有的包括虚构成分，有小说性质。朝鲜国语本则虚构成分较多。这里叙述的是作为小说的朝鲜国语本《壬辰录》。在各种国语版本的《壬辰录》中，以一九六四年平壤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的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附带参考一九五六年的平壤国立出版社的版本。

《壬辰录》全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遭难阶段：日本侵略军由朝鲜南部海面登陆，釜山陷落。侵略军长驱直入，攻陷汉城、开城，占领平壤。王子临海君、顺和君二人被俘，被迫迁都到义州。

第二阶段是反击阶段：李舜臣在海上痛歼侵略军，各地民间爱国者如郭再佑、郑文孚、惟政、金德龄、金应瑞等人或组织义兵，或深入敌营斗争，反击日军。明朝派兵进入朝鲜与朝鲜军队联合作战，收复平壤，局势转危为安。敌人的第二次进攻被打退，被迫撤出朝鲜。

第三阶段是受降。朝鲜派使臣惟政（泗溟堂）去日本受降。惟政以他的智谋挫败了日本统治者的种种阴谋诡计，迫使侵略者接受朝方的条件，向朝鲜正式投降。战争以朝鲜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壬辰录》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思想。作者怀着强烈憎恨侵略者的感情歌颂了李舜臣为首的爱国将领的英勇斗争和义兵的英雄事迹。此外，还对封建王朝的种种腐败现象作了揭露。这部小说还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作品着力刻画的人物是李舜臣，他是全罗道左水使。和一般的封建官僚不同，他是非常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军人。在文武百官普遍醉生梦死，把国家安危当儿戏的情况下，他密切注视敌人动态，预料到日本必将进攻朝鲜。为了加强海军的防卫能力，他设计出了一种新式战船——龟船。这种战船在与日本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李舜臣纪律严明，赏罚得当，对士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由于对敌情早有知察并认真备战，李舜臣所统率的海军舰队与敌人一交战就取得了主动权，屡战屡胜，重创入侵之敌。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爱国将领李舜臣智勇双全的形象。如当李舜臣得知同僚庆尚右水使元均遭受攻击处于困境时，他分析了所在水域的地理条件，认为敌船进出之处草石甚多，难以痛击敌人，就与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元均约好，诱使敌船离开原地到大海宜于水战之处。李舜臣亲自率领一百多艘战船，在玉浦海而上与敌人交战，并佯作败退到南海。同时元均与李亿祺所率领的

战船也假装败逃。愚蠢的倭寇自以为得逞，跟踪追来。看到敌船已到达预定地点时，李舜臣下令迅速调转船头向敌舰冲去。李亿祺在左，元均在右，对敌舰形成了一个三面包抄的形势。李舜臣的四十余艘战船突入敌阵之中发射火炮，敌舰起火。日军光是溺死水中的就有数万名之多！敌将马多时也在仓惶逃窜时被李舜臣发觉，结果毙命于炮火之中。李舜臣以智谋调动敌舰，重创日本海军，变不利形势为有利形势。

马多时死后，李舜臣又预见到其弟马适时会来报复，号令军士保持警惕，准备战斗。到了夜间，马适时果然率大批战舰袭来。由于朝军早有准备，李舜臣从容下令以猛烈炮火迎击。敌舰着火，士兵死伤无数，仅马适时所乘船只侥幸逃脱，狼狈退去。

李舜臣预料马适时遭此大败后决不会善罢甘休。他观测气象，见东南风大作，随即通知各将领，注意警惕敌人利用风势前来劫寨。同时命令在两百余艘战船上放置无数草人，在两处水草丛中布置伏兵。马适时率兵偷袭不成，只落得溃不成军。

李舜臣智胜强敌的事例，除以上所提到的三次痛击倭将马家兄弟而外，还可举出一件带有诙谐意味的轻胜敌军的事例。

一次激战后，李舜臣料敌人将在夜间泅水前来偷袭，就让士兵黑夜里座在船头轻松地“娱乐娱乐”：边唱歌谣边挥刀剁船舷。次日黎明，船上尽是被砍断的手指头。这正是敌军士兵的手指。倭兵见朝军士兵唱歌，自以为有机可趁，偷偷泅水而来，企图悄悄爬上朝鲜战船以偷袭取胜。但一扒上船舷，手指就被剁断，“啊唷”一声都不敢喊出来，一个个就带伤退去。就这样，不擂一声鼓，不发一声呐喊，无一次搏斗，无一兵一卒和一箭一矢的损耗，就轻而易举的粉碎了敌人的一次诡密的偷袭，使凶恶狡猾的敌人“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得自认晦气。

李舜臣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取得情报以便部署战斗。一次他看到五十名敌军俘虏，经过他细致观察，发觉其中有被日军威逼裹胁而来的朝鲜人，就释放了他们，说服他们讲出倭军的情况。他

根据获得的情况布置了战斗任务，取得了烧毁敌船百余艘，斩敌兵三百余名的大胜利。

一位指挥官除韬略外还必须具备身先士卒、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才能鼓舞部下去舍身战斗。李舜臣在激烈的战斗中，常把自已的生死置之度外。一次他被日军伏兵射中，血流如注，染红了甲胄，诸将大惊失色。他却泰然自若，命医生剖开肌肉，在皮下二寸深处取出弹丸。手术之后，立即率战船返回闲山岛，犒赏完将士之后，才回去养伤。

李舜臣在最后一次战斗之前，了解这将是十分激烈、艰难、危险的一次战斗，就对天盟誓，表示要决死灭贼。当战舰开抵露梁时，他屹立船头，手执大刀，在战鼓声中指挥军士勇敢向前冲杀。在朝军射杀一个头戴黄金盔的倭将时，李舜臣也倒在血泊之中。但他随即奋不顾身地站立起来，脱下自已的主帅衣服，交给侄儿李莞，嘱咐他换穿上这件衣服代替自已继续指挥作战，讲完就与世长辞了。

李舜臣将军智勇双全，屡建殊勋，但政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争权夺利、贪生怕死风气盛行的腐败的封建王朝时代，一个克已奉公，不屑于同流合污，不愿意为高官厚禄而钻营的人，即便是才能出众，功高盖世，也免不了受佞臣小人之忌，受他们的陷害。

李舜臣在战争一开始就给了敌军迎头痛击，大挫侵略者，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敌人利用李朝统治集团中嫉贤妒能的佞臣及国王的昏愦，终于给李舜臣扣上了里通敌国的莫须有罪名，罢官下狱，甚至几乎处死他。只是当日军数年后第二次大规模来犯而李朝统治者又感到束手无策时，李才被释放出狱，重新起用。

嫉妒李舜臣而又庸碌无能的元均在李舜臣下狱后接替了三道水军统制使的职务。他置军机要事于不顾，一味沉溺于酒色。手下许多将士愤然离去。可是当他们听说李舜臣恢复官职消息以后，

又自发地由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只此一点，就足以看出李舜臣在军中的威望多么高。

李朝统治阶级中固然有不少贪生怕死，放弃职守的官吏，但在祖国与人民惨遭敌人蹂躏的形势下，毕竟也出现了一些爱国将军。《壬辰录》除了以大量篇幅歌颂李舜臣以外，还描写了别的为抗战而牺牲的将领，如：多大镇佥使尹兴信以百余士兵与强大的敌人殊死奋战，直至最后牺牲。东莱府使宋象贤及其部将金相伊，年迈的别将刘克良，也都是英勇奋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反侵略的爱国者。

壬辰战争是朝鲜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从民间也涌现出了大量爱国志士。小说作者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史作者的阶级偏见，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些爱国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

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普通老百姓——两位无名的爱国英雄。在倭将加藤清正率领士卒向咸镜道前进的途中，碰到了这两个朝鲜百姓。清正派人向他们问路，他们面无惧色，坚定地回答这群凶恶的敌人："难道我们能给盗贼指路吗？你们爱往哪走就往哪走！"结果两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们的大无畏的气概代表了全朝鲜人民对残暴的侵略者同仇敌忾的精神。人民没有被敌人的长驱直入吓倒，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袭击敌人。

民间首先组织义兵抗击敌人的是郭再佑。他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敌人推进到离他家乡不远的鼎津时，他把村上的数百名壮丁组织起来，以寥寥几百人抵御敌军数万之众！敌将安国寺率领八万人马攻来，打算夜间渡过鼎津江，为此白天派人测量江流深浅，并在浅滩可以走人的地方立下了标木。郭再佑得知情况后，派人悄悄把标木移在深水处，并在附近设下伏兵。夜间，安国寺率兵循标木过江，结果踏入水深处，多被淹死。郭再佑趁敌人狼狈之际率伏兵冲杀过来，以少胜多，狠狠打击了敌军。他战斗时常身穿红衣，有"红衣将军"之称，多次率义兵痛击敌军，

使敌人闻风丧胆。

规模宏大的卫国战争还把出家的和尚与道士吸收了进来。不少爱国僧人如西山大师、惟政等，走出庙门参加了斗争。

金德龄本在山中学道，眼看倭寇入侵，百姓遭殃，他向老师要求下山去参加驱逐倭寇的斗争。金德龄下山后见到倭将正在调戏朝鲜妇女，民族的自尊心使他怒火中烧，他决心惩罚敌人。凭借各种道术，他隐身潜入敌阵。敌人的三万名士兵向他开枪射击，却不能损伤他半根毫毛。他用呼风唤雨的法术将十万倭兵头上所插的十万纸旗霎时间吹得无影无踪，吓得倭将加藤清正仓惶撤出驻地。

妇女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小说叙述了一个下层妇女——桂月香的感人事迹。桂月香是平壤的名妓，和营门将校金应瑞相好。平壤失陷，王室迁都到义州后，金应瑞受国王的召见并被任命为明朝援朝大军统帅李如松都督的先锋大将。他得知桂月香常被平壤守敌将领小西飞召去侍酒，便努力以爱国思想打动她，对胆小怕事不明道理的鸨母晓以大义，使桂月香协助自己。桂月香把她所探听到的有关小西飞的情况一一告诉金应瑞，并且向他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后来桂月香利用小西飞召她侍酒的机会，把他灌醉，把金应瑞悄悄引进军营。金应瑞终于杀死了小西飞，他想冒着风险把桂月香带出平壤。但这位妇女害怕成为累赘而误事，竟自刎而死，为反侵略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个在封建社会中备遭歧视的妇女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是朝鲜爱国妇女高贵品质的生动体现。

《壬辰录》还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中的一些腐败、黑暗现象，鞭挞了从国王到某些官僚、大臣的怯懦无耻和软弱无能。

平素只知道争名夺利、骄奢淫逸的军官们，在敌人突然袭击时，一个个逃的逃，散的散。庆尚道左兵马节度使李珏一见战局不利，首先把爱妾和私人家财送走，接着自己也逃之夭夭。左水军节度使朴弘在倭将平调益率大军向东莱推进时，在老百姓震天

的哭声中，竟然逃出营门，远走高飞。当侵略军占领釜山之后向金海推进时，分别负责守卫金海城南门与西门的金海府使徐礼元与草溪郡守李惟俭放弃职守，只顾逃命。

庆尚右水军节度使元均是一个胆小如鼠、庸碌无能而又嫉贤妒能的昏官。倭将马多时的八十万水兵企图由水路绕过南部海域进击义州和鸭绿江，途经巨济岛。负有御敌重任的元均得知这消息后，还未见敌舰，就如惊弓之鸟，把本国的渔船误认为是敌舰，仓惶退却到露梁。及至听闻得敌军连陷数地的消息之后，又急忙奔向加德（熊川以南的一个港口）。途中见到大队敌船，他吓得魂不附体，把百余只战船上的无数火炮、军旗统统抛入海中，带领裨将逃走。只是在玉浦万户李云龙的建议之下，他才未继续远逃，停在露梁一带坐等李舜臣的救援。

尽管元均依靠李舜臣的救援和指挥才得以免遭覆亡，他却嫉妒这位立下奇功的赫赫名将。李舜臣含冤入狱之后，他接替了李的官职，当上了三道水军统制使。就职之后，元均不思加强国防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利用职权，花天酒地，大肆挥霍，过不多久就把李舜臣所积蓄的军粮与器械消耗殆尽。士兵甚是不满，纷纷散去。他自己则在丁酉（1597年）正月的一战中被打死。

如果说《壬辰录》借表彰李舜臣的战功歌颂了朝鲜爱国军人的话，那么，对元均的刻画则是把危害祖国的蟊贼们拿来示众了。当时在李朝封建官僚统治阶级中，种种腐朽、黑暗的现象屡见不鲜，小说作者所刻画的元均这一丑恶形象是这些现象的集中反映。

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也是昏愦无能。他一向懒理朝政。当敌军已占领釜山、东莱，乘势越过密阳向前推进，并从水上侵犯全罗道一些岛屿的时候，他竟一无所知。及至侦探来报告，他才大吃一惊，慌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匆忙派出李镒为巡边使去前线拒敌。接到李镒节节败退的战报以后，这个废物只知道哭泣哀叹："国内无御敌之良将，如何是好？"声泪俱下，

束手无策。庸碌无能、卑怯懦弱的丑态暴露无遗。

书中不止一处描写国王这副狼狈相。如当他在随从的保护下逃至安州过清川江时，突遇风浪，这位堂堂国君竟吓得仰天大哭起来。平壤失守，国王逃到义州，倭将平行长发出最后通牒，要他无条件投降。这个一国之主竟被吓得六神无主。在敌军步步紧逼下，群臣中有的主张渡鸭绿江到中国避难，有的则主张坐等明兵来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坐卧不宁，心惊肉跳，竟把大风声误认为是敌兵的喊杀声，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国王竟然糊涂到单凭诬陷之词就把有战功的人处以重刑。副元帅申恪在对敌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国王竟然轻信右议政俞泓的不实之词，下令把申恪斩首，使得申恪手下士兵，自行走散。及至申恪战胜敌人的捷报传入朝廷，国王才后悔不迭。

李舜臣屡战屡胜，可是国王偏听偏信，不管他立下的功劳多大，先要处死他，后来把他罢官下狱。金德龄一片爱国心肠，只身赴敌营教训了敌酋，但也无端地被都承知（官名）徐云玉诬告为通敌。国王照样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把金德龄捉拿问罪，使这位一心报国、壮志未酬的壮士惨死于冤杖之下。

小说通过以上的描述，把国王怯懦无能、昏庸无道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当敌军逼近平壤，临都危在旦夕之际，国王不管百姓的安危，只顾带着后宫嫔妃逃窜义州。还未走出平壤城，就在普通门被百姓挡住。因极端愤慨而骚动起来的民众厉声呵斥护送国王出城的判府事卢稷，揭露他身为大臣而不思御敌之策，一味弃城逃亡的罪行。他们手起棒落，把他打下马来。《壬辰录》作者对此所作的绘声绘影的描写，使这部中古时期的爱国主义作品增加了一层浓厚的人民性色彩。

在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中国士兵们也洒下了鲜血。

明朝应朝鲜国王请求，先后派遣了不少军队去支援邻国进行的这场正义战争。小说《壬辰录》以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它以热情的笔调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侵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朝鲜大部分领土时，迁都到义州的朝鲜国王李昖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采纳了大臣柳成龙的建议，发出咨文把朝鲜的情况告诉明朝，请求派兵支援。明朝在本国遭受饥馑的困难条件下，仍慨然允诺派兵援朝抗倭。

小说作者以热烈、简洁的语言描述了明朝都督李如松率领援军过鸭绿江的盛况：

> 李如松等百万大军进入朝鲜。旌旗蔽空，剑戟如林，首尾百余里。前后历时三天，渡江方毕。（援军）屯兵于义州城。战马成群，伸展绵延达五、六十里之远。

书中还描写了大军入朝时，朝鲜国王亲率百姓在鸭绿江边热烈欢迎并以上宾之礼接待李如松等大将的情形。小说所写情况虽有夸张之处，和史书所载有出入，但反映出朝鲜人民期待明援军的热烈而急切的心情。

作品以不少篇幅描写了朝明双方将士彼此奋力支援以破强敌的场面。

倭主帅加藤清正是一员武艺高强的猛将，要战胜他是不容易的。明将韩泰益和朝将金应瑞共同对付他，虽使他无法逞凶，但也未能挫败他。朝明双方又各自增加了一员大将，总共四员虎将把加藤清正团团围住。他仰天痛哭，祈求上苍保全其性命，最后战败丧生。战斗结束后，朝鲜国王对李如松感激万分地说："托将军河海之恩，得以消灭强敌，令人至死难忘！"这热情的话语，肯定了明军在抗击倭军中的作用，赞扬了援军的功绩。

在一九五六年朝鲜国立出版社出版的《壬辰录》中，还借西山大师之口提到：明皇帝神宗和朝鲜国王宣祖是《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刘备与张飞；关云长虽未下凡，但曾出现于云端，暗中帮助朝鲜打败了日寇。这些民间神话传说表达了朝鲜人民对

中国援助的感激之情。

《壬辰录》是朝鲜文学出现后的第一批以朝鲜本民族语写成的长篇小说之一。书的后面大半部分由一篇篇英雄传记或战斗故事组成，战局的发展把它们连贯在一起。

《壬辰录》人物活动背景范围十分广阔：由陆地到海洋，由前线到后方，由朝鲜本土到日本，由王室到民间，由寺院道观到城市街头与乡村，由敌人驻地到李朝宫殿。这里既有英勇牺牲和懦怯逃跑的冲突，也有为国尽忠还是为母尽孝的彷徨与苦恼；还有爱情和爱国精神的巧妙结合；既有群众自发组织的斗争，也有国际的友谊援助；既有入侵者的凶狠残暴，也有内奸的恶毒阴谋……作为朝鲜文学史上早期的小说，《壬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轴丰富多彩的战争画卷。

《壬辰录》带有中古时期某些初期小说的一般特点，缺乏对人物个性的细致描写，人物缺乏个性特征，带有脸谱化的味道。心理活动的描写完全是粗线条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几乎完全依靠人物的具体行为来体现。作为历史传说故事，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简炼、紧凑，情节发展较快，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此外，描写各种场面的发展和人物行为动作的用语与修辞彼此常有雷同之外，带有公式化的倾向，但从另一方面看，有如古埃及早期的人物画，线条简单，手法古拙，倒也具有一种浑厚、质朴的风格。

《壬辰录》大量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以此来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对英雄人物的崇敬、热爱，以及对敌人的蔑视与憎恨。

在史书里，西山大师是僧人义兵队伍的组织者。但小说中对他组织义兵的事落墨不多，对他的个人本领则极力称道，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于观测天象而知道将星之所在，会作神法而使天兵天将出现在国王眼前。对于金德龄和僧人惟政的描写也是如此。

《壬辰录》对敌人的本领有时也作了夸张的描写。例如写小西飞的脑袋被金应瑞砍去掉落在床下之后，这个无头将军竟然还能够伸手到脚下去找匕首。找不着时，他还能从枕头下抽出青龙宝剑刺向已经躲藏到练光亭大梁上去的金应瑞，把金的军衣砍去一块，大梁也被砍成两截。

这种对反面人物本领的渲染，反衬出正面人物金应瑞的格外英勇、武艺高强，用“强中自有强中手”的写法把金应瑞写活了，避免了概念化的毛病。《壬辰录》中的金应瑞斗杀小西飞虽然神怪色彩较多，但这种写法还是较为吸引人的。

李舜臣在壬辰战争中是位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关于他的活动与功绩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小说《壬辰录》对他的描写很少采用神化的手法，但也作了一些夸张，把他描绘为全知全能的人物。根据民间传说而塑造的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朝鲜人民为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产生的高度民族自豪感。

《壬辰录》产生于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流露出了较为浓厚的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宿命论思想。

金德龄有强烈的抗倭救国思想，却不得不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国家大难临头，空怀着满腔义愤和一身本领，为了忧而闲居家中，坐视同胞被倭兵蹂躏，一筹莫展。后来，他被别人诬蔑为“通敌”，竟不作辩解；尽管武艺高强、道术精通，却一味恪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束手就擒。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押送的途中，他略施小伎，就把套在身上的铁枷弄得个粉碎，腾云驾雾直上高空，吓得押送他的官吏魂不附体。可是最后他还是驯服如绵羊，“顺从天命”，乖乖地被带到审判庭上。敌人的三万支火枪奈何不得他，一顿棍棒却把他打死了。特别使人气愤的是金德龄老师对他的爱国热忱总是大泼冷水，一味阻拦他的正义行为。及至金德龄含冤而死之后，这位老师不但不同情，反而认为他不顺天意，理应受诛。这种宿命论思想已发展到了反对参加抗敌斗争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全书中的糟粕，和整

个作品中燃烧着的炽热的爱国思想显得很不相称，很不协调。

唯一可以解释这种矛盾的是作者对于当时腐败朝政的强烈不满：无功者受禄，临阵脱逃者无罪，而英勇善战的有功者则含冤受屈。这种忠奸不分、黑白颠倒的现象，使人由不平到寒心、灰心，从而"看破红尘"，对世事采取"超脱"态度，成了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的、无声的反抗。

壬辰战争是朝鲜封建时期反侵略史上斗争规模很大、历尽艰辛而取得辉煌胜利的一次卫国战争。战争的爆发和朝鲜拒绝充当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有一定关系。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朝鲜领土的完整，也减轻了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并使得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在战后的二百多年间，不敢再觊觎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作为反映和歌颂此次正义战争的历史小说 《壬辰录》，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朝鲜的三十六年中，更为处于亡国悲惨境地的朝鲜人民所喜爱，使他们从中受到激励和鼓舞。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列为"禁书"以后，它仍秘密流传于爱国群众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政治意义和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其他爱国小说

以丙子战争为历史背景的《朴氏夫人传》是一部爱国小说，其虚构、幻想成分与传奇色彩比《壬辰录》更多。作者不详。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点上来推断，这部小说可能吸收了当时的一些民间传说。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主人公朴氏与李时白结婚的经过。朴氏夫人容貌丑陋，得不到丈夫与公婆的喜爱。但她才能非凡，精通道术。十分善于处理各种事情，是丈夫的贤内助。后来，她的父亲用道术将她变美，使她得到了丈夫的喜爱。

小说后半部写朴氏和"胡国"(满人)作斗争的情形。"胡国"曾派遣刺客到朝鲜，阴谋刺杀朝鲜的重要人物李时白和名将林庆

业，刺客就是“胡国”公主起容大。国难当头时，朴氏夫人在自己的家里掩护无辜。在战争中，她又使用道术打击敌人，最后，因为李朝国王妥协求和，战争结束。朴氏夫人认为天运所致，也就不复使用道术，放弃了斗争。

作品对一位巾帼英雄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挑战。在作品中，朴氏夫人比一般男子要高明得多。平时，她能帮助丈夫治家理财。她以三百两银子买来了生癞疮的病马，却用巧妙的方法和神奇的法术把马治好，以三万八千两的高价卖出。她变丑为美后，使本来嫌她丑陋而虐待她的丈夫赔罪求饶。这种对狂妄的大男子主义的嘲弄和对才能出众女子的赞美，是历来的小说中所少有的。这部小说深得当时妇女的喜爱。

《朴氏夫人传》的主要缺点在于它的“天命”思想。它把李朝统治者向侵略者的妥协投降看成天命所定，无可挽回。另外，小说中过多地描写了“道术”的作用，未免近于荒诞。至于对人民群众作用的忽视和对个别英雄人物作用的过份强调，则是中古时期一般战争小说的一种通病。

《林庆业传》也是一部以丙子战争为题材的朝鲜国语作品，属于历史传记小说。它描写了丙子战争中建立过大功的、智勇兼备的林庆业将军的英勇斗争。

作品中描写了林庆业对明朝的友好和对于朝鲜、明朝的共同敌人后金（清）的仇恨及斗争。

朝鲜人民在此以前不久，曾经历过壬辰战争，得到过明朝正义之师对朝鲜的援助。林庆业传中所描写的对明朝的友好感情，正是这种历史关系的一种表现。

此外，还有一些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民间传说，如《郭再佑和李氏夫人》记叙了壬辰战争时期抗敌名将郭再佑的妻子李氏如何帮助丈夫抗倭的故事。反映出妇女在这次全民的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第六章　具有社会改革倾向的小说《洪吉童传》及其他

李朝社会在经历了壬辰战争和丙子战争以后，田园荒芜，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民生凋敝。朝臣之间的党争在战争时期也未停息，战后则更趋于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更无意也更无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使社会趋于安定。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经历过两次反侵略战争洗礼的人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们奋起斗争，要求摆脱过于残酷的封建剥削，改善自己的处境。反映在文学上，就出现了具有反对封建倾向的小说《洪吉童传》及《田禹治传》。

《洪吉童传》的作者是许筠（1569—1618）。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二十五岁时及第，官至刑曹判书、参赞。他曾经随访问使节来过中国。他性格豪放，对儒家思想的束缚深为不满，因而不见容于当时的统治者。他对封建王朝的腐败政治特别反感，于是和当时庶出的朴应犀，徐羊甲等人一起组织秘密团体，打算推翻李朝，但事泄被捕，于一六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以谋反罪被处死。他的著作有《惺叟诗话》、《识小录》、《闲情录》、《屠门大嚼》及长篇小说《洪吉童传》，所作诗歌多已失传。使他能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后来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洪吉童传》。

洪吉童本来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李瀷的《星湖僿说》中提到“自古西道多剧贼，有洪吉童，世远不知几何”。许筠模仿《水浒传》写成了这部小说，表达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

《洪吉童传》的故事是这样的：朝鲜国王世宗（1419—1450）时，宰相洪某与妻刘氏生一子名仁衡，又与其侍婢春纤生子名吉

童。由于吉童不是嫡子，在家中备受歧视。吉童不堪忍受此种歧视，于是奋发图强，自学兵书、武术与法术，学到了多种本领。洪某的另一宠妾，妓女出身的初兰见吉童身怀绝技，胸怀大志，欲加害吉童母子。她煽动洪宰相夫人刘氏，派遣刺客谋害吉童。吉童发觉刺客来到，施展法术，把刺客及其两个帮凶杀死，然后告别母亲，离开家庭，远走他乡。途中他闯进了盗贼巢穴。群盗见他一表人材，力大过人，就拥戴他为首领。吉童率领这一批盗贼去抢劫寺院的财产，并用计打败前来追捕的官军。此后，洪吉童把自己所加入的这个集团叫作"济贫党"，活跃在朝鲜全国八道。官家发兵并悬赏捉拿洪吉童。洪吉童行法术，制作了七个草人，把它们都变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于是总共八个洪吉童，同时出没于全国八个道，使官军不辨真伪，无法征剿。洪吉童不但多次打败官军，有时还化装成朝廷御使乘官轿去各地巡视，专门惩处贪官污吏。有人把情况报告国王，国王大惊，不知所措，最后听取了大臣的意见，把洪吉童之父洪宰相及其兄仁衡抓起来，关入监牢，作为人质，并通告全国，企图逼使洪吉童投降。

结果，一时间，竟有八个洪吉童同时出现于官府，争相说自己是真吉童。国王亲自审讯，命真正的洪吉童自己出来承认，未得结果。洪宰相急得吐血，昏厥过去。八个洪吉童见此情形，全部流泪，并各自从囊中取出药来为父治病。洪宰相服药后苏醒。八个吉童于是一致向国王表明，自己在各地活动是为了惩罚贪官，今后为避免国家骚乱，愿离开朝鲜。说罢，八个吉童全都跌倒在地，化为八个草人。国王不甘心，照旧下令寻拿真的洪吉童。洪吉童只得出现于父兄面前，束手就缚于囚车。待囚车被推到京城，吉童作法粉碎了全身枷锁及囚车，腾入云霄。国王这时才知吉童不可拿获，于是心生一计，装作要授他兵曹判书官职，却埋伏下刀斧手，计划在洪吉童前来接受官职时，把他杀掉。洪吉童明知此事，却欣然进入王宫。一进大门，他就向国王表示自

己已蒙受王恩，不再滋扰闹事，从此永离朝鲜，说罢腾空而去。

经他在空中巡察，发现海中的济岛是一块方圆七百里，土质肥沃，富于耕作的地方。于是他向朝廷索取了千石粮食，率领群“盗”三千人来到此地，使各人成家立业。千余户人家边务农，边习武、造兵器。

在此期间，洪吉童去芒砀山采药途中，救出了被妖怪抢走的财主白龙和赵铁的两个女儿，娶她们二人为妻。后来，洪吉童父亲病故，洪吉童回朝鲜把父亲的灵柩运往济岛安葬。同时把母亲接来同住。

洪吉童为父守孝三年。之后，举兵征服了沃野数千里的碑岛国，自立为国王。洪吉童在位三十年，七十岁时，某天，五色祥云缭绕殿阁，一位仙翁自天而降，把国王洪吉童与两王妃带往天上，留下三位王子与两位公主。

《洪吉童传》中最主要的思想是反对封建的身份制——嫡庶差别，其次是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前者是上层社会内部的矛盾，后者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与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矛盾性质虽不一样，但是它们同时存在于党争激化、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汇合在一起，相互呼应，推波助澜，成了导致李朝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洪吉童传》这部篇幅不长而又充满神怪故事的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作品中反对封建剥削的思想也是鲜明的。洪吉童率领众人智取寺院财物，以法术劫取官府谷仓，抢夺地方富豪和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乃至化装成御史以惩处不法官吏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洪吉童早期活动的矛头是直指封建剥削者的。

他的中期和晚期的活动，是率领众人从事农耕，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被描写成摆脱了封建剥削的社会。

洪吉童率领农民攻打碑岛国时所写的檄文中，还表现出这种

小生产者民主思想倾向：

> 义兵将洪吉童致书硉岛国王：君王者非一人为之，普天之下，人人皆为君王。是故，汤伐桀而武王伐纣，……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也。

檄文中的这种思想与政治主张，固然是许筠对于李朝光海君暴政极为不满态度的一种表现，但也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一种政治思想。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导致了政治上要求平等。可是在国家问题上，他们仍然不能摆脱皇权主义，他们希望有一位"好皇帝"，认为只有出现圣主仁君，天下才能太平。洪吉童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君主。在农民眼中这位仁君应当享受一般农民所享受不到的特权。洪吉童为父亲所造的巨大陵墓，和他儿子继承王位的世袭制，便是这种特权的具体表现，而《洪吉童传》的作者，是肯定这点的。

《洪吉童传》中有一定的爱国思想。洪吉童被迫远离祖国，但他并未忘怀故土。他总想到自己是朝鲜人："寡人现居王位，但本为朝鲜国之人。"在成了海外的一国之主以后，他也没忘记朝鲜国王的援助。他认为"朝鲜圣上赐寡人"千石粮食，是"恩同海河，如何能忘？"他立国以后，派使臣回故国致谢，并偿还了千石粮食。

《洪吉童传》中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封建的正统和忠君思想。他数次讲起自己的活动是对李朝国王"不忠"，对父亲"不孝"，是犯上作乱，滋扰国家。另外，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一般的财主并不反对。他让洪吉童救出了两个财主的女儿并成了财主的女婿，继承了他们的万贯家财。此外，作者不但不反对封建社会中一般贵族官僚，而且让洪吉童也具备一个"宰相后裔"的身份，让他埋怨自己作官无门。得到国王所赐的"兵曹判书"职务以后，他就乖乖地停止活动离开朝鲜。凡此等等，都说明《洪吉童传》反对的只是封建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如嫡庶差别、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及其不法行为，并不反对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

本身。

《洪吉童传》全书虽然多次提到洪吉童去抢劫寺院、官仓以济贫，但未写出穷人的任何苦难生活。这和作者许筠的阶级地位有关。他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虽不满封建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但对下层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深切的感受；虽然同情贫穷者，但主要关心的还是士大夫阶层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庶出子弟。

《洪吉童传》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小生产者渴望摆脱黑暗现状的理想，和失意士人的不满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洪吉童传》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人民改革社会制度的愿望以及它所采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艺术手法，它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使得朝鲜人民有了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小说。这使它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这部以浪漫主义为形式，以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作品，对朝鲜后期的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它成了朝鲜小说发展史上表达黎民宿愿的一面旗帜。

和《洪吉童传》属于同一类型的小说有《田禹治传》。所谓"同一类型"是指作品中所共有的同情人民、借神道法术来和统治阶级人物斗争等因素。《田禹治传》虽然不象《洪吉童传》那样明确地提出一个理想国来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它所写的劫富济贫的故事，也隐隐流露出希望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

《田禹治传》的作者虽然赋予了作品的主人公以解救百姓痛苦的良好动机，却不能为他找着一个正确的途径和归宿，不得不在最后让田禹治去山中隐遁了事。这是《田禹治传》比不上《洪吉童传》的一点。但是作品通过田禹治之口说出的"国家之根本在于百姓"、"富人为穷人所造就"的思想，在社会观和认识论上具有更高的水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田禹治传》在艺术手法上不如《洪吉童传》，主要是它缺乏具体描写。另外结构也不紧凑，只是按时间先后，平铺直叙田禹治的事迹。由此可见它不过是把口头传说简单地加以书面化而已。

第七章　金万重及其长篇小说

金万重（1637—1692）字重叔，号西浦，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曾祖父金长生是名儒，父金益兼在满人入侵朝鲜时，投笔从戎，一六三七年牺牲于江华岛，时年仅二十三岁。金万重的堂叔金益熙是实学派①人物。

金万重出生时，他的父亲已去世了，由母亲尹氏抚育成人。父亲的爱国行为，叔父的进步思想，加上母亲对记录奇闻异事的稗官杂记和小说的浓厚兴趣，都对金万重的世界观和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金万重之所以后来能有如此卓越的成就，和他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金万重于二十八岁中进士，官至大提学。当时正当李朝肃宗在位，朝廷内党争十分激烈，有“老论”、“少论”两派。金万重属于“老论”派，而这一派在肃宗时期是受排斥的。他为此受到牵连，于一六八七年和一六八九两度被罢官流配到岭海和南海，最终死于谪所南海。

金万重是李朝著名文人，汉文文学的造诣很深，不仅对诗文一类，即便是对当时中国的所谓俗文学如小说《三国演义》之类，也很熟悉。当时，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李睟光、金堉把欧洲的地圆学说和地球图介绍到朝鲜。金万重深受其影响，经过多年辛勤努力，于三十七岁时编制成朝鲜地图。

他的著作有汉文诗集《西浦集》及文学评论集《西浦漫笔》。

① 十七至十九世纪间，朝鲜一部分学者不满于当时崇尚空谈的腐败学风，起而批判它的同时，提出讲求实际，研究与解决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他们的思想虽仍属于儒家思想范畴，但具有进步意义，被称之为“实学派”。

他还用朝鲜国语写了不少歌辞，如《采桑行》、《琵琶行》、《王昭君》、《杜鹃啼》等，可惜已失传。他以国语写过一些小说，其中享有盛名并流传下来的有《九云梦》、《谢氏南征记》，其余小说已散佚不存。金万重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正是他的这两部小说，其中《谢氏南征记》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较大。

金万重十分重视朝鲜国语文学作品。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崇尚汉文文学，少数文人虽用国语写点时调一类的国语诗歌，但不过是作为汉文诗歌创作的一种"余兴"而已。他们谋官职、求功名、写文章、论学问的主要语言工具仍然是汉文。虽然有郑澈等这样重视朝鲜国语文学的作者，但是就整个政界、学界和文坛来看，国语文学仍不受重视。金万重本人虽然迫于当时的现实，也不得不以汉文为主要写作工具，将它作为官场上应用的正式文字。但是他内心对这种状况是不满的。他甚至把朝鲜国语文学作品看得比汉文文学作品还要高，认为郑澈的朝鲜国语诗歌《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关东别曲》是"海左"（朝鲜）仅有的三篇"真文章"。针对当时的崇尚汉文、轻视朝鲜国语的风气，他在《西浦漫笔》中这样写道：

> 人心之发于口者为言。言之有节奏者，为诗歌文赋。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是以动天地、通鬼神，不独中华也。

这里，金万重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用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写出优秀作品，从根本认识上打破了那种认为只有汉文才能写出好文章的看法。他又说：

> 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而闾巷间樵童汲妇咿哑而相和者，虽曰"鄙俚"，若论真赝，则固不可与学士大夫所谓诗赋者同日而论。

金万重在这里严厉指责那种爱用汉文写作的人有如"鹦鹉学舌"，并热情称赞用民间语言的作品是"真品"，而不是"赝品"。

金万重还对士大夫所鄙夷的俗文学——小说十分重视。他引用了中国《东坡志林》中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影响远远大于陈寿《三国志》的影响的一段话，表明他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正确的看法。作为文人士大夫中的一员，他不但在理论上有这种认识，而且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他以朝文创作了长篇小说，为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万重所留下的两部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与《九云梦》，都由他的堂孙金春泽(1670—1717)译为汉文。两种文本并行于世。

第一节　《谢氏南征记》

《谢氏南征记》写的是一个贵族家庭内部嫡庶矛盾引起的纠纷。它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宫廷内部的的矛盾。李朝肃宗王将仁显王后闵氏废除，打算立张禧嫔。这一行动受到了金万重所属的西人派的反对。他为此被罢官流配。他在岭海的四年流配生活中，写成了这部小说，以姬妾勾结坏人迫害正妻的故事来讽谏肃宗。据说，肃宗看了此书以后，有所悔悟，废了张禧嫔，恢复了闵氏的王后地位。

小说以中国为其舞台背景，写的是发生在中国京城北京的事情。名门大家刘熙之子刘延寿娶妻谢玉，婚后十年无子。在谢氏的劝告下，刘娶妾乔氏。乔氏生性邪恶，用各种阴谋手段离间刘谢夫妻二人的关系，并与刘的书士董清私通，共同陷害谢氏。谢遂受到谢的怀疑，被逐出家门。乔氏为了斩草除根，进一步谋害谢氏。谢氏受刘家祖宗灵魂的启示，逃往南方（长沙）。几经波折，九死一生，栖身于尼姑庵中凄凉度日。

刘延寿因写诗嘲讽皇上西苑祈祷的铺张迷信行为而为乔氏及董清二人陷害，也被流配，几乎死于瘴疠之地。最终董清的靠山丞相严崇（严嵩）势衰，董清也因贪污渎职、残害百姓等行为被处死。刘延寿才官复原职。谢氏的沉冤也得到昭雪，与刘延寿破

镜重圆。刘延寿抓获乔氏并将她处死。

作品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揭露邪恶奸佞，给以严惩，以维护封建社会和王朝的正统秩序。作者所凭借的思想是佛儒相结合而又以儒教为主的思想。实际上，它在读者眼前具体生动地展示了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封建王朝及贵族家庭内部的种种丑恶现象：皇帝的昏庸无能，丞相严崇的奸佞贪婪，董清一类依附权奸的政治暴发户的贪赃枉法、敲剥人民，以及封建官僚贵族家庭内部的肮脏丑恶现象等等。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美化了正面人物谢氏等人，而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反面人物：乔氏、董清、冷振、腊梅、严崇，对乔氏和董清二人刻画得尤其细致、深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乔氏名彩鸾，作品写她“自谓与其为寒士之妻，宁为名宦家姬妾”，贪图荣华富贵。她嫁给刘延寿为妾以后，常心怀不轨，一次因独自唱情词艳曲，受到谢氏善意的婉言劝告。她表面对谢感激不尽，过后不久却利用刘延寿要求她唱曲的机会，反诬谢氏责骂她、威胁她，说谢氏对她讲“相公置汝只为嗣续，非是家内美色之不足也。今汝巧言令色，迷眩丈夫之心，又敢作淫乱之声，沉惑丈夫之意，酿乱于先小师清德之家，此固死罪而余姑警责矣！”她甚至编造谎言，说谢氏讲要用刀割掉她的舌头，用毒药把她弄成哑巴。

乔彩鸾为了害死谢氏，进行了一系列极为诡密周到的策划。为了寻找帮手，她密令其心腹丫环腊梅与刘延寿的书士董清私通，借此把腊梅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为了进一步要求董清模仿谢氏笔迹制造陷害谢氏的口实，她甚至不惜与董清通奸。

乔彩鸾为了陷害谢氏，叫董清仿效谢氏的笔迹写诅咒乔氏母子的咒文，把它藏在厨房角落里。乔氏儿子有病，乔氏也诡称有病，暗中让腊梅去厨房打扫。腊梅“发现”咒文后，把它连同干

骨头一包，当着刘延寿的面交给乔氏。乔氏故作吃惊，向刘延寿哭诉。为掩盖“家丑”，刘延寿主张把它烧去，不再追究，而乔氏也在故作沉思之后，同意烧去，以此在刘延寿面前表示自己的宽容与厚道。

接着，乔氏又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是趁刘延寿因公去外地的机会，设法制造谢氏偷汉子的假象。乔氏密令腊梅设法诱使谢氏的贴身丫环雪梅偷出谢氏的首饰，把它交与董清的心腹冷振，再叫冷振去找刘延寿，装出途中偶然与刘相遇，并佯装无意中露出首饰，引起刘延寿的疑心。

另一个步骤就是将亲子被害嫁祸于谢氏。董清和乔氏心腹腊梅杀死了乔氏的儿子掌珠，以此诬陷谢氏。乔氏按照他们的策划，密令腊梅去要挟雪梅诬赖谢氏是凶手。至此，乔氏和董清所精心炮制的所谓“证据”就起了作用。谢氏终于被刘延寿抛弃。

《谢氏南征记》作者通过一系列具体行动来塑造乔氏这个人物形象。书中对乔氏的心理活动描写虽很少，但是她的狡诈，阴险、狠毒的性格却跃然纸上，引起读者的极大憎恶。这个人物是《谢氏南征记》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

在正面人物之中，作者对谢氏善良、宽厚、谦逊、忍让的性格描写也花费了不少笔墨，但是由于作者力图按儒家思想塑造一个最合乎规范的高尚妇女，就把她写得过于理想化了。谢氏不但貌如天仙，而且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甚至博览经史，诗词文章也无一不精，成了一位才气过人的女才子。这种夸张未免缺乏真实感。她所受的冤屈虽足以使人们一洒同情之泪，但作者在她身上所赋予的过多的儒家忍让为怀，听天由命的思想，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

《谢氏南征记》正面人物中唯一能感人至深的是春芳。作为一个丫环，她在乔氏、腊梅、雪梅等人勾结起来陷害谢氏时，在死亡的威胁下，痛斥雪梅：“上卖夫人，下诬同伴，狗彘不如！”她坚贞不屈，直至被严刑拷打致死。但春芳在全书中只是一个很

次要的配角，只出场一次。因此还不能说作品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很大成就。

在这部以劝善惩恶为基本主题的作品中，恶人猖狂，形象突出，正面人物的形象却显得苍白无力。正面人物战胜恶势力，往往借助于神力。因此，他们的形象缺乏感人的力量。

总的看来，这部作品虽立意于“劝善惩恶”，其客观作用却是揭露了贵族家庭内部和朝政中的丑恶现象。这种揭露就其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成就来说，是朝鲜《春香传》、《兴夫传》等小说所不能企及的。它不但以丰满而又生动的形象、曲折而又合乎逻辑的情节把乔彩鸾、董清一类削削阶级中灵魂最肮脏的人物摆在读者眼前，而且还通过董清、严崇等人，把当时的奸臣如何狼狈为奸、结党营私、蛊惑君王、搜刮民脂民膏以及贪官污吏如何敲骨吸髓、为害乡里都点了出来。如讲董清与冷振之狼狈为奸：“冷振……依于董清。清甚喜，留为心腹，凡谋利肥己之事，皆与之相议。”如讲董清如何利用职权坑害人民谋财害命：“富贵之家，构罪而杀之，籍其产。往来之商，饮毒面害之，没其财。毒流一境，害及邻州，民视之如猛虎，而以其严崇表里，作威作福，势焰炽烁，莫能谁何。”

这些奸佞之辈，有共同利益时，则相互勾结，失去这种可能时，则损人利己，相互出卖。如冷振本是董清一手就培而发迹的，当他在京城打听得董清的后台严崇势衰被削职为民之后，他就暗自盘算：“今山水已消，社鼠何依？董清亦将不久矣，今不如从中用计，坐收渔人之功。”跑到皇帝那里告发董清。一箭双雕，既免受董清的连累，又立了揭露贪官的功劳，还能在董清被处决以后把垂涎已久的乔氏弄到手。

作品围绕着董清出卖故主，依附权奸，窃取官爵，劫掠商贾，坑害百姓种种劣迹揭露了当时豪门的丑恶行径。董清之流危害社会，道德上也败坏堕落。与其他古典小说相比，《谢氏南征记》对恶人灵魂与行为的揭露更为深刻，更有说服力。

在朝鲜古典小说中，《谢氏南征记》的结构是较为复杂的。它的人物众多，除去正反面人物以外，还有处于转化中的人物，如雪梅。最初她协助乔氏干坏事，但后来主动改悔，把乔氏阴谋一一向刘延寿告发。作品中提及的人物有二十个左右，其中上自皇帝、丞相、官僚、贵族，下至其夫人、姬妾、丫环、仆人、孩童，乃至书吏、无行文人、尼姑、菩萨、仙子、鬼魂等。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按照作者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各自得到应有的结果，以证明天理昭彰。除去谢、刘二人团圆的结局以外，乔氏在刘延寿历数其种种罪行后被处死；董清因贪污渎职，残害人民，被朝廷判决处斩；冷振穷愁潦倒以后因犯诈骗罪被责打一百棍，棒疮发作而死；帮乔氏干尽伤天害理坏事的丫环腊梅被乔氏闷死；雪梅虽改恶从善向刘延寿告发了乔氏，后因害怕遭罚自尽而亡；乔氏的儿子掌珠因她本人的邪念而被丫环与情夫杀死，其次子凤雏则因病夭折……至于谢氏的儿子麟儿，则虽历经磨难，最终与父母团圆，并有一个锦绣前程。不同人物的下场与结局不雷同，显得非常自然、合理。

作品结构也是严密的。各种事件依次展开之后，多头并行。如谢氏被逐以后去南方入尼姑庵；刘延寿被贬谪远方，麟儿丢失，乔氏失去奸夫董清以后的状况等等，事事造成悬念，最终都有着落，并无凌乱芜杂之感。表现出作者在小说结构上的缜密之处。

作为封建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谢氏南征记》的作者金万重必然要以当时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来作为他写作的出发点。不论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还是为了王朝的利益，他都必须以这种思想来整顿纲纪、惩治奸邪、表彰忠良，以达到维护封建王朝、社会与家庭秩序的目的。作者这样做是必然的，是时代、出身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但是，在作者力图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小说中去的时候，却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时涂上了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同时宣扬果报循环的宗教观念。作品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提出了问题

（恶人肆虐，坑害忠良，破坏和睦家庭，危害社会），却不能以现实主义精神解决问题。每当善良人受害遭难时，总是靠祖宗显灵、神仙和菩萨的保佑渡过难关：谢氏知道冷振要来强娶并去南方逃避，是靠祖宗的预告；她在穷途末路投江自尽时受到女英、娥皇两仙子的启示；刘延寿身处瘴疠之地染重病却能痊愈，靠的是观音菩萨的指点。总之，在关键时刻，绝处逢生，全靠神鬼之力。人力似乎毫无作用。这种严重的宿命论思想，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是作品最大的缺点。

这种缺点除作者个人的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和当时的李朝政治上社会上的严重弊端有关。作者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鬼神的多次出现并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力量，反映了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象无可奈何却又竭力寻求出路的愿望。

另外，《谢氏南征记》故事情节中的基本纠葛冲突产生于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妾矛盾。这种矛盾使刘延寿家庭崩溃、骨肉分离。但是作者不但不反对多妻制，反而为这种婚姻制度辨护。他主张妾要守本分，乔氏死后，作者最后仍然让年近五十的刘延寿再纳一个年轻姑娘为妾，而主张丈夫纳妾的竟然就是因为丈夫纳妾而吃尽苦头的谢氏自己。书中对谢氏赞扬备至，使她成为了刘延寿一家幸福的因素之一。可见作者是赞成一夫多妻制的。揭露封建官僚的罪恶而不反对封建官僚制度本身，揭露个别姬妾造成的危害而不反对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本身，这正是《谢氏南征记》一个带有阶级和时代特征的局限性。

最后谈一谈《谢氏南征记》的两种版本。朝汉两种文本都已流行了二三百年。但比较两种文本，可以发现：汉文本总的看来比朝文本艺术性更强一些。它不但修辞手段丰富，而且在细节上进行了若干加工与创造，比原文更能突出人物的性格。就拿章回的分法和题目来看，也可以看出汉文本的长处。朝文本每章题目极简单，第一章《成婚》，第二章《妖妾》，第三章《奸恶的门客》，第四章《家祸》，第五章《南征（一）》，第六章《南

征（二）》，第七章《家运恢复》。而汉文本则按各章不同段落，重新分成为十二回（章）。其题目对内容的概括也更完整、确切。如第三回的题目是“妾欺丈夫谗正室，多谋门客窃爱妾”，第五回是“宽耳君子信谗言，奸婢妖人戕爱子”，第八回是“妇人依止空门，群小构成诗案”，比朝文本分章合理详尽，标题醒目，内容突出。

由于汉文本的大力加工，不但使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自然，而且也把乔氏的狡猾、阴险表现得更加鲜明、生动。可以说，经过汉文本的加工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这部作品生色不少。

《谢氏南征记》的舞台是中国，其中涉及到大量中国地名、人物和历史典故，如北京、北京朝阳门、北京西郊、北京通县、广西、山东、武昌、鄂州、长沙、洞庭湖、洞庭君山、岳阳、汨罗江、九嶷山、湘江等，并对洞庭湖等地风景，作了动人的描写。

书中涉及的人物有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大奸臣严嵩（1480—1567）（书上写成严崇）、刚直不阿的海瑞（1514—1587），还有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刘延寿是刘基的后代）。此外还有历史上和传说中的人物，如舜的二妃女英、娥皇，楚国屈原，吴国伍子胥，汉高祖皇后吕雉，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和汉才子贾谊等等。

中国的这些地名、人物及历史典故出现得非常自然，毫无生搬硬套、故意炫耀作者才学之感，也不是单纯为使文辞华美而应用，而是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的需要。

作品中有关中国的地名、人物的出现，使我们中国读者倍感亲切。这也证明朝鲜文人如金万重、金春泽等一些优秀的文学家，对中国十分了解、熟悉，并且颇有感情。它是中朝之间悠久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一个明显例证。

《谢氏南征记》标志着朝鲜文学中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是朝鲜古典文学中一颗灿烂明珠，小说艺术中的瑰宝。

第二节 《九 云 梦》

金万重的另一部小说《九云梦》以中国唐朝为时代背景，写奇才卓艺的年轻书生杨少游的宦途得意，以及他先后与八个女子恋爱结合的经过。

杨少游前世是来中国传道的西域天竺国高僧六观大师的弟子性真。八个女子的前身则是神仙南岳卫真君娘娘的侍女。八仙女和性真因奉命办事而邂逅于途中，彼此倾慕。所谓是动了“邪念”，是对佛门神界清规戒律的背离。于是受罚，被谪降人间，投生于不同的家庭。性真投生为唐朝淮南道秀州县杨处士之子杨少游。八个女子各以不同的奇妙经历与杨少游巧遇、相识、定情。杨少游也在与她们先后相逢、交往的过程中，为国建立功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上得君心，下协人望”，位极人臣。八女子先后成为了他的妻妾，结成了一夫八妻的九个人的家庭。在充分享受了人间最美满幸福的贵族生活以后，感于世事的变化无常，富贵荣华无非是一场春梦，九人顿悟本性，看破红尘，痛悔前非，皈依佛门，大得“寂灭之道”，皆归于“极乐世界”。

《九云梦》以它故事情节的离奇，人物形象生动多姿和词藻丰美吸引了朝鲜广大读者，并对以后小说的发展，产生了甚至比《谢氏南征记》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么，这部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小说，主题究竟是什么，又应如何看待其思想内容呢？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中尽管有着大量的爱情情节的描绘，并且最后在荣华富贵只不过是“一场春梦”的论调中收场，但实际上它的中心思想，既不是对纯洁的爱情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也不是“悟道”和“四大皆空”的境界，而是为封建贵族眼中的最理想的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绘制一幅蓝图。

那么，它对爱情情节的大量描绘和最后对人间幸福的否定与主人公的悟道出家，又是为了什么呢？书中的佛道两种宗教观念，同儒家思想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正是分析《九云梦》的思想内容所必须提到的问题，可以将它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杨少游与八个女子的风流韵事与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关系。

二、杨少游等一男八女，为何看破红尘，放弃荣华富贵遁入空门？

三、儒、佛、道三种思想在小说中的关系。

以下就对这三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一、杨少游与八女子之间的风流韵事与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关系：

《九云梦》中，杨少游与八女子恋爱、结合的过程占了极大的篇幅。这位出身清寒文人家庭的书生，是怎么获得了八个绝色女子的爱慕，并且顺利地建立了一个封建贵族式的、理想的、和睦幸福的家庭的呢？

尽管八人与杨少游相逢、结识、定情的具体过程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都认定杨少游是当大官、享厚禄、前途无限的人物。

以杨少游所结识的第一个女子、秦御史的女儿秦彩凤而言，她对杨，初而“闻其诗而慕其才华”，继而想到：“女子从人，终生大事。一生荣辱，百年苦乐，皆系于丈夫。”

秦的乳娘深知彩凤心思，她向少游传达彩凤情意时也说：“小姐自幼时，心明性慧，大有知人之鉴，一见相公，便欲托身。”可见彩凤是因看出这位书生前程似锦可以因他而享受“荣”、“乐”，而托身于他的。

再如洛阳名妓桂蟾月与杨少游定情之夜，向少游说出了自己爱他的动机：

当今天下之才无出出于郎君之右者，新榜状元固不足论也，丞相印绶，大将节钺，非又当归于郎君手中？

桂蟾月一开始就不敢指望当少游的正妻。她的这番话，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出了她甘自当少游之妾“以奉大夫人后”的原因。此后其他六位女子之所以爱杨少游，也莫不是因为他中状元，当翰林，“建玉节，驰驷马”，任尚书，作御史大夫，为大元帅，“腰悬如斗大金印”，直升为宰相的缘故。桂蟾月紧接在上面所引用的话后面所说的“天下美女，孰不愿从于郎君乎？”代表了这些上自公主，下至婢女的一群“绝色佳人”爱杨少游的共同想法。

可见，杨少游的情场得意，正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结果，也正是他以文才武功竭力效忠于君王的报酬。

作品在性真（即杨少游的前身）萌动尘世之念时，这样写他的理想：

男儿在世，幼而读孔孟之书，壮而逢尧舜之君，出则作三军之帅，入则为百揆之长，着锦袍于身，结紫绶于腰………目见娇艳之色，耳听幻妙之音，荣辉极于当代。功名垂于后世……

杨少游的一生，正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他由一个“贫秀才”而位极人臣，享尽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所能享受的一切荣华富贵，正是有赖于他能“壮而建”到“尧舜之君”的幸运。

杨少游的寻求幸福的道路是为封建君王效命立功，而他的幸福生活的模式，也只能是在封建君主制下才能产生与存在的。

作者通过作品主人公的青云直上和由此带来的爱情上的一连串成功，来为他的理想的封建君主制描绘出一幅蓝图。

二、既然杨少游壮年时登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极高位置，又为何突然产生放弃荣华富贵，遁入空门的念头？考察一下作者金万重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李朝时期，朝官之间党争十分激烈。壬辰战争(1592—1598)

以前这种情况已经产生，它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使李朝几乎亡国。战后，虽又经过了反抗清兵入侵的丙子之战（1636），党争依然如故，形成李朝封建政治的"痼疾"。党争的结果，胜利者可爬上高位，失败者遭贬下狱。作者面对朝廷与官场风云变幻的现实，是不能不深思和警惕的。

作者对他所憧憬的"尧舜之君"治下的政治秩序的设计和描绘，多少是针对现实的种种不理想的状态而发的。

虽然如此，他仍不可避免地把他对党争灾难的担心和畏惧带进作品之中。惟恐"福尽祸来"，就预先为他的主人公设计了一条及早隐退的后路。杨少游在位极人臣之际，虽值壮年却坚决要求辞官下野，退居林泉，并最终皈依佛门，求"不生不灭之道"，以超脱"尘世苦海"，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李朝肃宗时期激烈、残酷、复杂的党争现象的一种曲折反映。朝臣中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的宗派斗争，对于从政者个人及其家庭来说，可以使他们从荣华富贵的幸福顶点于转瞬之间堕入家破人亡，乃至灭门绝族的地狱。作品中杨少游在享尽一切人间乐趣之后，说出这样的一番话："高台自倾，曲池且堙。今日歌殿舞榭，复作衰草寒烟"，并表露了这样一种"达观"态度：

缘尽而散，乃天理之常。

这正是他对变化难测的政治前途的疑虑，和无可奈何的内心写照。作品对此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建约可见。看一看李朝的党争史，令人感到作者有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

三、儒、佛、道，作为思想体系，是一定的阶级意识的反映。《九云梦》中出现的这三者，也不例外。在他们神秘、深奥的外衣下，包藏着对实际利害的考虑。

以上说明了《九云梦》中对封建君主制政治秩序的理想化和对党争的疑虑，由这一点来观察作品中的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相互关系，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九云梦》末回杨少游悟道时说："天下有三道：曰儒道、曰仙道、曰佛道。三道之中，唯佛最高。"话虽如此，作品主要的思想倾向并非佛教，而是儒道。

作者金万重本人是一位终其身于"明伦纪，贯事业"的士大夫。为了维护肃宗统治，他曾被贬，但对封建儒家思想仍坚决拥护。《九云梦》中，杨少游的前身性真在萌动凡念时，就曾"默然于心"地把"读孔孟之书"看成是他一生谋求功名利禄、金屋美女的资本。作品以极大篇幅写这个"贫秀才"怎样苦读孔孟经典，争取学而优则仕，好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这方面的描写与渲染非常充分，使得结尾"看破红尘"显得苍白无力。作品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并不是尘世富贵虚妄和佛门清净令人向往，而恰恰是封建文人在"学而优则仕"之后所能享受到的最大欢乐与幸福！有关佛教的叙述只不过是出现在作品头尾的小小的点缀而已。

总之，佛教思想在全书中只处于次要的、辅助性的地位，作用只限于提醒高官厚爵者注意盛极必衰、荣尽则枯、福竭祸来的"规律"。它本质上是为贵族福供的一种避祸趋福、免灾得安的手段。

《松泉漫笔》中指出："稗史有《九云梦》者，即西浦所作，大旨以功名富贵归之于一场春梦……盖以释家寓言而中楚辞遗意云。"

这段话，指出了佛家思想在《九云梦》中的作用与地位。所谓"楚辞遗意"，指的是屈原在《离骚》中表现的忠于君王和不满佞人当权的思想，而所谓"释家寓言而中楚辞遗意"则不过是以佛家故事的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和发牢骚。《松泉漫笔》中的这段话，道破了《九云梦》的主导思想，是颇有见地的。

将《九云梦》和它的姐妹篇《谢氏南征记》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部情节大异、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在思想倾向上却有共同点。

《谢氏南征记》以“劝善惩恶”的严肃说教为其要旨，《九云梦》则是以渲染才子风流、佳人多情的轻松欢快气氛为其特色。但是，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对封建朝政的消极现象有所不满，追求理想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这方面，《谢氏南征记》着力揭露与惩治恶人、奸臣，而《九云梦》则描绘了一个“理想国”，注重于宣扬圣王贤君为忠臣良相带来幸福。在拥护封建制度方面，两书是异曲同工的。

就神佛的地位与作用而言，两书也是基本相同的，即认为与儒家经国济世的事业相比，神佛的作用只占次要地位。《谢氏南征记》中的神佛，在好人受恶人迫害而临危难时显灵，搭救受难者，以维护儒家主张的封建的正统秩序和道德纲常。《九云梦》中的神佛信仰，则是逃避党争灾难的一种出路。两部作品神佛的活动也是有所差异的。在《谢氏南征记》中，神佛为名臣消灾，在《九云梦》中，神佛为良相防祸，都是为了消灾除难，逢凶化吉或避凶趋吉。这是两书的共同点，反映出作者金万重作为封建士大夫和儒门学士对宗教作用的看法。

《九云梦》在政治思想上拥戴封建君主制度，这是作者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部作品所受到的十七世纪下半期李朝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来源，一是“隐逸文学”，即以逃避党争、士祸为政治目的，以歌颂退居林泉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江湖文学”。这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九云梦》中杨少游的辞官下野，返归田园，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是受了这种文学的影响。

另一种影响，则是来自市民阶层文学中的爱情描写。

《九云梦》，在它的整个结构、情节的铺陈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大量男欢女爱的描写。因此，它十分自然地让读者产生“言情小说”的印象。

金万重为什么这样不惜笔墨大写爱铺呢？这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有密切关系。

金万重创作活动的时期是十七世期后半期，此时，李朝社商业经济已渐趋活跃，城市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城市经济上的作用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些表现市民爱情的朝鲜国语文学作品，产生了一些无名氏作者写男女爱情的时调和歌辞。

金万重尽管属于社会上层人物，但他一向重视本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市民的国语文学中开始出现的这些现象，当然不会对他毫无影响。《九云梦》中大量爱情故事的描写，就是这一影响的产物。

然而金万重毕竟属于封建士大夫行列，尽管市民的爱情趣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他并不熟悉市民阶层的男女爱情生活，加上他的美学趣味也使他不屑于用市民文学中的粗俗写法去描写两性关系。于是，他的写爱情的作品只能取材于上层社会的生活，以封建贵族为主人公。

因此，可以说，《九云梦》大量出现的爱情故事，是市民的放荡不羁的爱情及其文学思潮的间接的反映，曲折的表现，是封建贵族的与市民的两种爱情趣味相结合的产物。封建贵族的爱情生活成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市民阶层的爱情趣味处于很次要的地位。甚至也可以说，市民阶层的趣味，对此书的大量爱情描写只起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

《九云梦》对封建贵族的一夫多妻制进行了美化乃至歌颂。书中所流露的不少封建贵族式的爱情趣味是作者阶级立场与婚姻观的反映。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已在《谢氏南征记》中有所表现。而《九云梦》中的一夫多妻情况，则成了封建士大夫幸福观的图解和形象的说明。

一夫多妻制是极不合理的。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一文中说："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

《九云梦》所写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显贵人物"的特权。

只不过作者掩盖了这一制度的实质和它必然给妇女带来的痛苦，以及这种家庭难以避免的纠纷和矛盾。

众多女子嫁给同一个男子，一般来说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而只能是由于经济或权势等因素所迫。《九云梦》把一个个女子写成仿佛天生就心甘情愿和另一些女子共嫁一夫，这是违背常情的。桂蟾月主动向杨少游推荐狄惊鸿，甚至让她替自己去和久别重逢的丈夫同眠共枕，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一夫多妻制给妇女所造成的烦恼、不幸和痛苦是铁一般的事实，尽管作者力图掩盖、粉饰，却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了真实情况，使它透过色彩斑斓的幕帷，闪现在读者眼前。例如，最先与杨少游定情的秦彩凤，其后不得不屈居于小妾的地位。当杨少游向她表示愧疚不安时，她不无伤感地说出了"妾之薄命，妾亦自知"的话。尽管她表示要安于现状，但这寥寥数语，也表现了她强压在内心深处的幽怨。

另外，作品不把杨少游写成是降生于官宦世家、高门望族，而说他是出自竹篱茅屋的山乡隐者之家。这虽多少是出于作品传奇性的需要，却也是作者封建门阀观念较为薄弱的反映。

《九云梦》中出现了杨少游奉唐皇之命反击吐蕃入侵和远征吐蕃的情节。这似乎是为了表现杨少游出将入相，文武全才，却包含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内容。

由于反对日本侵略的壬辰卫国战争得到了明朝军队的大力援助，朝鲜方面对于中国的友好感情加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的感情主要表现为对汉族政权的感情。因此，当清军进攻明朝时，朝鲜的同情全在明朝一边，并派兵援明抗清。明朝覆亡以后，朝鲜统治者一直为清兵入关、满人统治全中国而愤懑不平。再加上它本身也受清廷压迫，当然更为怀念明朝。《九云梦》中的唐皇派兵击败异族吐蕃，就是一种影射，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意思。《九云梦》以后，朝鲜出现的大量以中国为背景、包含着对外征战情节的小说如《玉楼梦》等，都有汉族政权（或托之于

唐宋，或托之于明）反击、征伐并打败"胡人"、"蛮国"、"女真"、"匈奴"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朝鲜方面的这种思想倾向。在这方面《九云梦》是第一部影射小说。它的这种政治倾向及其在文学史上产生的影响，在《九云梦》研究中，是不应忽略的。

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只有《谢氏南征记》可以和《九云梦》的艺术成就媲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人公杨少游多情而不轻佻，风流倜傥而不乏真情实意。他的喜怒哀乐的交替以及聪明但又数次受愚弄的情形，也描写得合情合理，并无牵强和概念化的毛病。其他人物如秦彩凤悲惨的身世和内心的哀愁，贾春云的机智俏皮和郑琼贝的庄重与自尊，也都写得很有分寸。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和音容笑貌的致密描绘，都是金万重以前的任何朝鲜古典传奇故事作品所难以企及的。整个作品篇幅较大，结构宏伟，富于幻想，八个女子与杨少游结识、定情的过程互不雷同，不会使读者产生重复厌倦之感。作品富于传奇性，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和《谢氏南征记》一样，《九云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朝鲜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一，还在于它所使用的是朝鲜国语。由于朝鲜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千百年来以汉字为官方文字，一般文人用作文学创作工具的也主要是汉文。尽管在十五世纪中叶已创制出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但此后直到《九云梦》作者生活的二百多年间，用朝鲜文字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士大夫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仅局限于诗歌领域。壬辰战争以后，由于民族意识的抬头，以国语创作文学作品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要求。《壬辰录》和《朴氏夫人传》等作品的出现，也都是这种要求的反映。金万重以士大夫的身分，却用当时还被统治阶级视之为"鄙词俚语"的朝鲜国语写成了艺术上相当成熟的长篇小说，堪称国语小说的卓越先驱者。他为国语小说进入朝鲜文坛开了先河。《九云梦》正是他这方面突出的成就之一，也正因为这一点，这部作品具有重要价值。

在《九云梦》的创作中，作者参照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关于此书的创作目的，有传说是作者于受谪期间为慰释其寡母的忧思而于一夜之间写成的。还有的传说是他在出使中国的归国途中，为弥补他忘却母命，未从中国捎回小说的过失，在轿中构思而成的。因此，该书又有《轿中记》的别称。

《九云梦》对此后朝鲜小说的发展影响较大，它以后，出现了一些带有“梦”字的小说如《玉楼梦》、《玉麟梦》等。这类以传奇式的爱情和功名利禄为内容的小说丰富了李朝中后期的朝鲜文坛。

《九云梦》以后出现的传奇色彩较浓的小说，也大多是以中国为背景的。除政治、历史和密切的文化关系等原因以外，中国的幅员辽阔，战争连绵，朝代更迭频繁，奇闻异事众多等情况，也使朝鲜小说作者更有驰骋想象的余地。更何况写中国还可以避免因直接写本国而引起的麻烦。这些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使中国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分外觉得亲切。

下编　后期（十八—十九世纪）

第一章　国语诗歌的发展

李朝后半期是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由壬辰与丙子两次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已逐渐消失。经济上有了一定的恢复，城市商业有较大发展。前一时期反侵略战争带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李朝初期“训民正音”的创制和使用，再加上这一时期商业经济所造成的市民阶层的活跃，使得十八世纪以后，文学中平民的、民族的因素明显增多了。国语诗歌的发展，就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

本时期的封建贵族士大夫阶层，仍将汉文文学奉为正统。国语文学越来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时调、歌辞的感情色彩也越来越趋于平民化了。在一般士大夫眼中，这种情况是文学的俚俗化，粗野化。他们讲究高雅和文采，当然不屑于写这种文学作品。因此，本时期地位较高的士大夫中，没有产生出象尹善道、郑澈那样的国语诗歌作者。以下，就时调、歌辞、民谣与杂歌几个方面，分节叙述十八、十九世纪国语诗歌发展的情况。

第一节　时调的发展和时调集的编纂

在身居高位的文士和要员中，时调虽然不受重视，但是在官职不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中，却出现了一些时调的积极爱好

者。他们热情地参与了时调的搜集与创作。他们虽不属于从事农工商的下层人民，但因其社会地位不高，和社会下层的距离比高门贵族近得多，也就比较能体会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尽管他们自己所写的时调仍然带有不少文人腔调，但是他们的作品内容中已增加了生活气息，变得比较轻松些，通俗些了。尤其是他们在时调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时调集的编纂上，表现出对闾巷间、井台旁、市场上的所谓"俚俗"作品的看法相当开明。虽然他们的作品涉及社会政治的不多，但是他们在朝鲜国语诗歌的发展上是有功绩的，应在文学史上给予一定地位。

十八世纪的时调作者中，最著名的是"敬亭山歌坛"的核心人物金天泽与金寿长。

金天泽 李朝肃宗和英祖时代人，字伯涵或履叔，号南坡。早年曾任捕校之职，爱与歌客交游，从事国语诗歌创作。他精通声律，善写时调，与金寿长一同组织了"敬亭山歌坛"，其中包括当时有名的唱曲家和歌客，如金圣器、金裕器、金友奎等人。著名的时调集《青丘永言》就是由金天泽编辑的。

金天泽的时调流传下来的共有五十七首，收在《海东歌谣》中。他的知交，文人郑润卿认为金天泽的时调辞藻艳丽、清浊高低自然合乎音律，可以和郑澈的歌辞媲美。

金天泽作品多为放浪江湖、傲啸山林之作，说明他是承袭了隐逸时调的影响。从以下几首可以看出他的诗风和思想。

浮生如梦，功名何足重？
人离世间后，贵贱贤愚皆成空。
人生在世一杯酒，其乐陶陶难形容！

诗中表达了看破红尘、游离世外、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

金天泽对宦海沉浮十分厌恶，因此对待世事常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并且还有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

人间何事不在命？
吉凶祸福任天定！

命数以外事，任我自己行！

下面两首表现他希望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手扶青藜杖，步向南亩园。

稻花飘扬溪鱼肥。

远远近近，农歌欢欣声声传。

世事丢一旁，回还江湖上。

水光山色似旧日，

吁！平生梦想仅如是，至此亦心安！

敬亭山歌坛的另一重要人物为金寿长。金寿长字子平，号老歌斋，出生于肃宗十六年（1690），活了八十多岁，殁年不详。他较金天泽略小，两人被誉为“敬亭山两翁”。晚年在汉城花开洞经营老歌斋，与当时歌客过从甚密，是时调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时调留存下来的共一百七十首，收录于他自己所编纂的《海东歌谣》之中。他作品的内容与情绪与金天泽大致相同。

安贫勿怨，太平无事即是福。

无友勿恨，是非口舌有何益？

兴许是：安分守拙数第一。

他也是一个害怕官途风云的人。在时调《官欲》中，他把官迷们比作赤身嬉戏的小儿，警告他们：谨防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以后的寒气。

下面三首时调，是写他的闲适生活的：终日看舞听歌，品茶饮酒，依翠偎红。

春雨方晴，梦中醒来见晨曦。

花竞发，瓣半开，

春鸟难禁春兴意，歌舞向人来。

松林客已散，茶鼎烟尽歇。

游仙枕上梦初醒，

吁，重见羲皇上世人！

莫问饮不饮，莫使金樽空无酒。

莫管用不用，且让美人陪身边。

吁，人生如过客，以此慰我心。

金寿长有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辞说时调中，有色情描写，还有一些淫词艳调。在市民阶层强烈要求在文学上表现自己的时代潮流下，作为一个追求享乐的"歌客"，难免不受到一些影响。

金寿长对于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有所不满，下面这首诗流露出这种情绪：

指黑为白，指白为黑。

是黑是白，无一说中者。

毋宁塞耳闭目，不听亦不睬！

在前一时期的时调中，也有与此类似的作品表现了对党争的不满。金寿长的这首则反映出李朝后半期官场和朝政中的某些混乱现象。

敬亭山歌坛的另一些人物如金裕器、金圣器、金友奎、金斗性等人，虽不如金天泽、金寿长两人影响大，但作品内容和思想倾向与他二人类似。如金圣器的《红尘》：

摆脱红尘，竹杖芒鞋一身轻。

肩背玄琴，步入别有天地一洞天。

云深处，飞来阵阵鹤唳声。

李朝后半期的大量时调中除敬亭山歌坛诸人以外还有少数士大夫的作品。如曾任吏曹判书、礼曹判书及大提学之职的李鼎辅（1693—1766）和曾任都承旨、汉城府判尹的职之赵明履（1697—1756），就留有时调作品。李鼎辅较多，有平时调及辞说时调共八十一首，赵明履仅四首。下面是李的作品：

三月东风已逝去，

问菊花：为何落木寒天独怒放？

傲霜高节者，舍尔谁能当？（其一）

宦海洪波水，如今入林泉。

江山无价宝，高卧默无言。

白鸥亦知我心事，上下自翩翩。（其二）

歌颂菊之高节，抒写辞官后的闲逸，本是士大夫时调作品的陈词滥调，但他写得朴质自然，在为数不多的当时士大夫时调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十九世纪的李朝哲宗至高宗时期，时调的有名作家与唱曲家是朴孝宽及其门生安玫英。他们二人曾合编时调歌集《歌曲源流》（1876），其中朴的作品有十三首，安有二十六首。数量虽不多，但由于他们对时调活动热心，以及他们的作品受到李朝统治者兴宣大院君① 的喜爱，也被视为李朝末期时调界的名流。此处以朴、安的作品为例，说明时调创作中的主要风格，先看朴孝宽写的一首时调：

空山杜鹃何事啼？

尔我有何离别意？

空自啼不休，无人应答你！

朴孝宽以女子口吻写成的恋情时调，真切动人，颇具情致：

东君归，万物皆自乐。

草木昆虫年年皆复苏，

因何故，人儿却不归？

见景生情，含蓄、深挚。

念郎相思梦，化为蟋蟀魂。

秋夜长，入君房，

惊破郎君梦，莫再将奴忘！

开门见山，是深情女子坦率地责怪负心汉。

再看安玫英的一首委婉深刻、含而不露的佳作：

① 大院君为李朝封建朝廷中的一个称号。凡系王族的旁系而后继任王位者，其生身之父被称为大院君。

空山风雪夜归人，

可曾听见柴门犬吠声？

大雪满石径，但愿君放下驴缰绳！

安玫英写梅花的时调脍炙人口，深得读者喜爱：

不期幼嫩稀疏枝，

芽儿竟自不失约，微露二三颗。

秉烛来近时，暗香正浮动。

十八世纪敬亭山歌坛的主将金天泽与金寿长，十九世纪博得大院君喜爱的朴孝宽、安玫英，尽管有名气，有贡献，但他们被排斥在以汉诗文为正统的上层人物文坛以外，连他们的生卒年都不见经传。还有大量的时调作者甚至连姓名都未留下。可以说，那些无名作者更接近平民，有的本人就是平民。他们的作品带有更多的社会和时代气息。

这里，把无名作者的时调作品按内容大致分为六类加以介绍。这六类是闲情逸致、爱情、别离、农家乐、城市经济、伦理说教。

先看闲情逸致类：

窗外种菊花，菊花下酿酒。

酒熟，菊开，友人到，月儿浮上来。

孩儿呀，备好玄鹤琴，通宵玩个痛快。

一夜大风吹，满庭桃花落。

孩儿执帚欲扫尽，

莫扫呵，花虽落下地，依然是鲜花！

上面两首诗仍带有文人的雅兴。作者社会地位虽高却也属于有闲者。这两首时调明白如话，多少有别于那种超然出世、缺少烟火味儿的隐逸时调。

再看爱情类：

下面一首时调描写一个把情相思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天真少

女，盼望意中人来到，却又羞于表露自己的情思：

窗外影影绰绰一闪现，莫非心上人儿来？
急忙迎出去，却是浮云掩月把我欺！
多亏夜深沉，不是白天不会招人讥。

平民的爱情时调中的形象和比拟不同于士大夫爱情时调的。下面两首时调，把爱情比作米，比作鱼网、瓜蔓，带有很浓的劳动人民气息。感情之真挚，比拟之生动，是高雅文人的风流诗无法企及的：

相思如米粒，颗颗收拾起，藏在升斗袋子里。
选匹壮马，让它驮了去。
孩儿呵，快加鞭，送到我的心上人那儿去。

另一首是辞说时调：

爱呀，爱，系得紧紧的、难分难解的爱呀！
象海上撒的鱼网，结扎在一起的爱呀！
往十里，踏十里[1]，这两处的香瓜蔓呀！
两瓜蔓呀纠缠交结在一起，
我和心上人的爱呀，就和它一样，
没完没了没终结呀！

平民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见花垂泪，对月伤心、或慢悠悠地谈情说爱。他们只能借自己日常生活与劳动所接触的事物表达感情，直言不讳吐露自己的情怀。拿以上这两首诗中的形象来和高丽民歌《思母曲》对比，是很有趣的。那里面，把父母分别比拟为小锄与镰刀，而这里把缠绵不休的爱比拟为瓜蔓、鱼网和稻米。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也表现出下层人民歌诗的淳朴和率真。

平民时调中，有大量的爱情内容。除了上面所举的思想健康的作品以外，也有一些比较庸俗乃至色情的。

---

① 往十里，踏十里，皆为汉城附近地方的地名。

第三类是抒发离别之苦或怀人之情的作品。如：

大雁大雁请停下，夕阳已西沉，你把翅膀借我吧！

我心思归不能归，暂且去去就返回。

看看故人后，我即往回飞。

用词朴素自然，表现出游子思乡之情。

心近如咫尺，相距千里亦咫尺。

心远如千里，相处咫尺亦千里。

我们各在千里外，却如就在咫尺间。

同样是一首怀人的时调，但用词简单，反复出现的主要是“千里”、“咫尺”两个词，但流畅自然，情深意长。

第四类是咏农家田园乐的。

青草丛生处，放下犁，拴好牛。

路边有树如亭子，叠好蓑衣当枕头。

清风驱细雨，陪我入梦游。

（《南薰太平歌》）

此外，还有的时调是写下雨天，在家喂牛修农具，准备天晴好耕田的；有的时调是耕田，除草，田头休息抽烟，大人歌舞小孩乐的，是描绘农村风光的一幅幅图画：

雨天不下地，篱笆门里喂黄牛。

整理农具备好耕，

休息好，待到天晴日，长垄里地好耕田！

耕罢田地锄完草，烟杆一根嘴边衔。

哼起歌儿扬起肩，舞姿自翩翩。

孩儿唱又跳，欢声笑语响田边。

这是劳动者的生活与乐趣，是农民眼中的田园情趣。这些洋溢着泥土芳香的诗句，和那些隐逸避世于乡间的士大夫诗歌迥然不同。

第五类反映出城镇商业贸易发展的情形。

"卖胭脂粉咧！"

"你的胭脂粉好，我就买"。

"好虽不算好，搽上它，就更娇艳，男人看了一定爱。"

"真是这样，就买它五斗吧！"

这是卖胭脂的货郎和一个姑娘之间的问答，反映出货郎走街串巷推销小商品的情形。

平常的'常'字，平坦的'平'字，

通达的'通'字，宝贝的'宝'字，

洞是四方形，四周围圆光光，滚到那儿那儿爱。

不过是个小铁块，老家伙也来抢，

看起来真恶心！

这是写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在社会上的作用。当时通行的货币是圆形金属币。中间有方孔，币面上刻"常平通宝"四个字。这首时调通过对这种货币的描写，反映了商业发展带来的拜金主义。

这类反映城镇经济的时调多为叙事性的，篇幅较长，不少是辞说时调。由于它很少抒情，味同嚼蜡。虽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活和市民的生活，但其艺术水平甚低。

第六类是伦理说教的时调。在此以前，这种时调就已产生。这一时期有的作品因袭旧的内容，大都思想陈腐。宣传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的儒教思想，以及宿命论和宗教迷信思想。

此外，还有一些时调的内容与中国有关，或以中国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为题材，其中包括帝王、后妃、名臣、武将，文学家等；或涉及中国古代典籍、名胜古迹；或取材于中国诗歌，实际上是以时调的形式来注释有关诗歌的内容。这些时调仅仅有助于说明朝鲜文人对中国文化熟悉的程度，和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

和高丽末期李朝初期的时调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品较少涉及政治内容。

十八、十九世纪，辞说时调比前一时期增多了。这与时调的平民化有关。原有的时调形式，即平时调，除伦理说教者外，一般是用以抒情的，而辞说时调则着重于叙事。时调发展到辞说时调，也就随之失去了诗的性质，逐步带上了散文化的倾向。

李朝后半期时调兴盛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一批时调集的出现。著名的国语诗歌集如《青丘永言》、《海东歌谣》、《歌曲源流》、《古今歌谣》、《客乐谱》、《东歌选》、《南薰太平歌》、《女唱歌谣录》都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

《青丘永言》编成于一七二七年，编者为金天泽。他在该书《序》中这样说：

> 我东人所作歌曲，专用方言，间杂文字，率以谚书，传行于世。盖方言之用，在其国俗，不得不然也。其歌曲虽不能与中国乐谱比并，亦有可观而可听者。中国之所谓“歌”即古乐府，暨新声被之管弦者，俱是也。我国则发之藩音，协以文语，此虽与中国异，而若其情境，咸载宫商谐和，使人咏叹淫泆，手舞足蹈，则其归一也。

这里，他说清楚了几个问题，即：本民族语诗歌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时调与朝鲜民族语言习俗的关系，时调在朝鲜民族歌舞艺术中的地位、艺术价值与作用。他还说明了时调的语言特点：“发之藩音，协以文语”，就是说立足于民族语言，又吸收汉文诗中的词语。所有这些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在“序”中他说到他收集时调的范围是“自丽季至国朝以来，名公、硕士及闾井、闺秀、无名氏之作”，表现出他对平民的作品是持公正态度的。

《青丘永言》收集的作品中，知名的作者达一百四十个，共有时调九百九十八首，另有《将进酒》、《相思曲》、《春眠曲》等国语长歌——歌辞十七首，作为卷末附录。

《海东歌谣》编者为敬亭山歌坛的另一核心人物金寿长，编成于一七六三年。全书共收八百八十三首，其中有作者姓名的为五百六十八首，无名氏作品为三百一十五首。

《歌曲源流》的编者为朴孝宽与安玫英，编成于一八七六年。由于它成书较前两书晚一个世纪，它收集了前两书所无法包括的时调，总共收有作品八百几十首，按曲调进行分类，可以说是集李朝时调作品之大成。以上是李朝三部最主要的时调集。此外，还有松桂烟月翁编的《古今歌谣》，共收长短时调二百九十四首，歌辞十一篇。又有无名氏编成的《东歌选》，共收作品二百三十五首。

一批时调集的出现更促进了时调的繁荣发展。在金天泽、金寿长以后，时调的无名作者日益增多。当时辞说时调的发展，是说唱文学兴起的条件之一。

第二节　歌　　辞

在李朝后半期歌辞的发展方向和时调十分类似。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它和时调的地位相同，但在平民阶层中则受到重视。歌辞的作者范围扩大了，在下级官吏、粗通文墨者和平民中，尤其是在属于普通市民阶层的妇女中，都有人参与歌辞的写作、歌唱及传播。题材范围的扩大尤其明显。它由前一时期的以风景、忠君、颂德、田园生活等题材扩大到旅行见闻、爱情、闺房生活、农业生产、伦理说教、思乡怀人等各个方面。

此外，由于李朝后半期民间对发展国语文学的要求更为强烈，出现了国语散文——小说文学——兴起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歌辞也逐渐带有散文化的倾向。相当一批作品抒情的因素已减少到了最小限度，几乎完全成了叙事的作品。这一点，在纪行歌辞、农业生产歌辞和部分闺房歌辞中更为明显。

由于不少歌辞是口口相传，而无书面记录，又由于歌辞在文人士大夫文坛中没有足够的地位，一些作品已经失传。这里仅就保存下的歌辞作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歌辞，按其内容来分，大体可分为纪行歌

辞、闺房歌辞、爱情歌辞、农业生产歌辞几类。

纪行歌辞之中，最著名的是《日东壮游歌》、《燕行歌》、《漂海歌》、《汉阳歌》、《北迁歌》等。

金仁谦的《日东壮游歌》长达八千余句，约五六万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金仁谦进士及第后任书记职。英祖三十九年(1763)他作为王朝派往日本的正使赵曮的随行人员去日本。回到朝鲜后，根据目睹的日本文物制度、人情风俗，写下了这部宏伟的叙事诗。

这部作品里写的虽然是日本的情况，但表现出了朝鲜李朝后半期的时代精神。当时，朝鲜一些爱国志士迫切希望振兴祖国。金仁谦把这种思想贯穿到《日东壮游歌》中去了。例如，他在日本看到了他们用机械把江水抽入城中供百姓饮用，就非常感兴趣：

水车开动，的溜溜转。
空桶下去，盛水上来。
循环反复，昼夜不息。
不用人工，不费气力。
源源流水，升达城郭。
城中居民，饮用方便。
永无匮乏，奇妙难言。
此处地名，称河内州。

《日东壮游歌》中还流露出一种向海外扩张的思想。作者看到日本"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山形雄伟"、"水势浩荡"之后，希望把那"四千里、六十州"全都变为朝鲜的土地，使日本能"沐浴王化"，成为"礼仪国"。朝鲜人民吃够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苦头，对日本统治者是憎恨的。这种憎恨在《壬辰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另外，他们对自己国家不强，受人欺凌也感到愤慨，力图振兴国势，发扬国威。金仁谦所流露的思想，正是在上述客观环境中产生的。当然，他那鄙视他邦之人，称之为狗并要

吞并别国领土的想法与主张是错误的。

《燕行歌》也是一首长篇纪行歌辞，全诗三万字左右，作者为洪淳学。高宗三年（1886）高宗与闵妃结婚。为奏请清帝光绪的册封，李朝派出了赴北京的嘉礼册封奏请使，正使为柳厚祚，洪淳学被任命为书状官随行。当时他二十五岁。他以青年人的敏锐和好学的精神观察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新鲜事物，以歌辞的形式记录下来，便成了这里所说的《燕行歌》。

中国和朝鲜接壤，两国使臣往来频繁，朝鲜使臣来中国后，有人用汉文写成《燕行录》或《燕行记》、《燕行日课》，但用朝语诗体写成的纪行只此一种。

《燕行歌》写的是一个朝鲜学者对中国的观察，中国读者当然倍感亲切。在歌辞的一开头，这位官职不高的作者就极其兴奋地写他到中国的欢快心情：

快哉，　　天地之间。
得为男子，　　实在不易。
我生东方，　　愿睹中国。
丙寅三年，　　春三月间，
欣逢大典，　　嘉礼册封。
国家庆事，　　臣民之福。
委为使臣，　　去往清朝。
钦命派遣，　　使臣三人。

洪淳学一行于四月出发，八月返朝复命，总共四个半月。他描写和叙述了这段时间中他所经历的一切，如他在中朝边境上，见到过当时边陲地带的荒凉，见到过繁华的辽东城，还见到该地的关帝庙等等。

中国人一见到作者等一行朝鲜人来到，就热情地拥上来。作者这样写道：

人人如此，　　个个这样。
千人万人，　　同样颜色。

见我一行，　　连呼“高丽”，
喊喊喳喳，　　拥来观看。
我不懂话，　　无法招呼。

传神地表现出两国人在一起的友好气氛。

作者描写了一些名胜地，其中之一是山海关：

向前走去，　　是山海关，
五层城门，　　处处炮楼。
三层四层，　　巍然壮观。
高悬匾额：　　“天下第一关”。
……　　……
吴三桂者，　　万古逆臣，
竟然打开，　　城门一半。
引入汗夷，　　明朝灭亡。

在这里，作者对明朝的叛臣吴三桂表示了鄙薄。由于两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友谊和朝鲜对汉文化的尊重与喜爱，作者对于曾经侵犯过朝鲜的清王朝，是反感的。这里对吴三桂的诅咒，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情绪。

作者身在异国，却不忘故土，山海关东边的渤海波涛，勾起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数万余里，　　无边大海。
浩浩淼淼，　　水天一色。
风浪袭来，　　冲击城堞。
海雾参天，　　莫辨方向。
顺风之帆，　　去向何方？
登上此船，　　向东行去，
我国仁川…　　瞬时可达。
千里咫尺，　　归国渺然。

他在和清朝文士的接触中，记录下了他见到身穿满人服装的汉人时的感想：

太常少卿，　　郑公秀者。
骨格清秀。　　兵府郎中，
黄文谷者，　　气宇轩昂。
翰林学士，　　董文焕者，
才高行正，　　享有名望。
…………
人人皆是，　　大明后代，
名门子孙，　　臣族后裔。
削去头发，　　万不得已。
含垢忍辱，　　当胡人官。
羞此装束，　　心中愤懑。
朝鲜之人，　　礼仪衣冠。
一见及此，　　不禁欣然。
亲如兄弟，　　相庆相欢。

清室统治全国之后，作官的汉人不得不穿上满人的官服。当时来自邻国的朝鲜使者却穿着受唐宋影响与汉装相仿的衣裳，使清朝的汉人官员不禁感到亲切、高兴和感慨。这一细节的描述，表现出当时汉人官员和这位朝鲜作者之间的友好感情，也反映了两国的传统友谊。

《汉阳歌》是对当时李朝首都汉阳（汉城）的颂歌，长达一千六百多句，约一万字，作于一八四四年，作者汉山居士。作者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歌颂朝鲜的优秀文化传统表达了当时朝鲜人民反对外敌侵略和保卫朝鲜独立的决心。作品对汉城的地形、宫殿建筑、名胜古迹、科举制度、政治机构，乃至于各类游戏及文物制度、风俗习惯都作了描写。下面一段是作者对地形的描写：

……

白头山始，　　奇峰突起。
越咸镜道，　　抵江原道。
逶迤曲折，　　绕过京畿。

如托北极，　　如削芙蓉。
止于道峰，　　层峦叠嶂。
气势磅礴，　　有如群仙。
众神聚会，　　各伸牙笏。
三角山起，　　更觉势奇。
千年建树，　　万年经营。
虎踞龙盘，　　气象万年。

《北迁歌》作者有为弘文馆校理金镇衡。他因上疏弹劾吏曹判书徐箕淳，被流配到咸镜道明川，十个月后得赦。这首歌辞描写了他的这次经历。全歌辞长达一千零四十句，约七千多字。诗的语言技巧极为纯熟，艺术成就在同类的歌辞中是最高的。

万户人家，　　黄昏炊烟。
秋江如画，　　西山夕阳。
远客悲怀，　　何以能平？
手执酒盏，　　登上楼头。
抚剑高歌，　　感慨无限。
浮云无心，　　飘往故乡。
羌笛有意，　　更增乡愁。
思乡之泪，　　洒入长江。
离百尺楼，　　宿于城内。
此去京城，　　已八百里。
此去明川，　　尚余九百。

此外，安祚焕的《万言词》也是叙述流配经历之作。作者不明的《关东壮游歌》是描写游览关东八景之作。李邦翼的《漂海歌》则是作者在海上遇风暴漂流到中国福建之后又由陆地返回朝鲜的记录。都是纪行歌辞中的名篇。

闺房歌辞也是十八、十九世纪十分盛行的一种以口头文学为基础的作品，作者多为妇女。在封建时代，妇女地位低下，她们深锁闺房无法自由地参与社交活动。她们不但婚姻不能自主，出嫁

以后还要受婆家人的虐待。在歌辞逐步向民间普及的同时，她们也用这种形式来抒发长期积压于心中的感情。这种情形在岭南一带地方特别普遍。一些妇女平素足不出户，逢年过节，却可以相互交往，举行歌会，朗诵自己所作的歌辞。在金达莱花节里，她们还可以上山赏花，作歌娱乐。她们把唱过的歌辞记录下来，彼此传抄，珍藏在箱底，出嫁时带到婆家，如果生了女儿，还要传给女儿。这成了她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安慰。因此，这类作品带有十分浓厚的民间色彩，朴素真实，无文人作品的那种刻意雕琢的毛病，读来真切感人。其内容范围虽离不开妇女感情以及生活琐事，却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以及遭遇、心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闺房歌辞作品很多。由于大量作品只是口传或个人珍藏，未能公开出版，失传者甚多。流传至今的有《惜别歌》、《感母词》、《戒女词》、《女子叹息歌》、《寡妇歌》、《妇女歌》、《闺中女子歌》、《怨歌》、《老处女歌》、《闺中行实歌》、《春游歌》等等。现略举数首简述如下：

《惜别歌》唱的是女子出嫁离别生身父母时的悲伤、惜别、忧愁。表现了一个新嫁娘对丈夫和公婆的畏惧心理，委婉地透露出封建家庭中妇女提心吊胆，低声下气，不得自由的情况：

费神操心，　　亦颇难处。
要给补袜，　　不知脚寸。
要给缝衣，　　不知胸围。
这些补了，　　怕不合式，
那样缝上，　　怕弄糟了。
人家心思，　　我怎能知？
盛门高眼，　　总爱嗤笑。

女儿向父母告别的场面，写得也很真实动人：

怎么是好？　　怎么好哟？
离别父母，　　怎么好哟？

几十年来，　　父养母育，
恩深如海，　　怎生报答？
严父生性，　　稳重沉默。
母亲性情，　　心软脆弱。
无言慰我，　　一味只说：
“女子出嫁，　本是常事。
莫要悲伤，　　勿要难过！
…………
把你送走，　　膝下无女，
我怎么办？　　怎么才好？”
听说此言，　　我心伤悲。
五内如焚，　　肝肠寸断！

《老处女歌》也是一首写妇女命运的歌辞，近四千字，作者不详。它以诙谐的笔致描写了一个老处女的苦闷、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和幸福的结局。这个老处女身有残疾，长时间嫁不出去，她对一些新嫁娘十分歆羡，同时感到苦恼。但她坚信自己能找到生活伴侣，终能如愿以偿。这首歌辞语言通俗，汉字词很少，从头至尾充满了乐观情绪。和文人士大夫的以贵族妇女为主人公的歌辞，如郑澈的《思美人曲》相比，不论是在修辞上还在是感情上，都判然不同，充分显示出它的民间特色。下面这段，是写这位老处女在芳华已逝，尚未能觅得良人时的悲愁：

我心悲伤，　　又能怎样？
两耳边上，　　鬓角已白。
头额上面，　　皱纹已生。
云鬓红颜，　　早已消失。
长吁短叹，　　徒唤奈何。
食而无味，　　穿着无心。

此外，还有《诫女歌》，它是母亲对即将出嫁的女儿所作的告诫。虽然其中带有封建的说教意味，但也足以使我们对当时妇

女的不幸处境有所了解，从而对受压迫的妇女产生同情。

尽管在前一时期的时调中，有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是歌辞中却见不到。郑澈的《思美人曲》虽表面上写爱情，并被当作情歌传唱，但实际上是失宠臣子怀念君王之作。真正写爱情的歌辞，到了这个时期才涌现出来。这反映出市民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文诗和时调中反映爱情的作品，已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了。这时期著名的爱情歌辞有《秋风感别曲》、《相思曲》、《相思别曲》、《春眠曲》、《良辰和答》、《惜春词》、《闺秀相思曲》、《陇西别曲》、《断肠别离曲》等等。其中《秋风感别曲》最有代表性。

《秋风感别曲》大约作于十九世纪初，据崔永祥的《海东竹枝》载，该歌辞作者为妍妍红。妍妍红是平壤名妓，与某观察使相好，但此人后来一去杳无音讯，妍妍红作此歌抒发情怀，并为这位观察使守节，终身未嫁。作品有各种异本，流传较广。

昨夜晚，
秋风阵阵，　金声宛然。
孤枕单衾，　相思梦破。
半开竹窗，　寂寞枯坐。
万里长空，　夏云已散。
千载江山，　凉意袭人。
心思怅然，　物色有感。
庭树风声，　如怨如诉。
离情别恨，　绵绵难断。
秋菊晨露，　似含泪水。
残柳南郊，　春莺早归。
月升东岭，　秋猿哀鸣。
郎君已去，　肝摧肠断。

歌辞一开头，就由秋天的景色写起，引出了自己的孤单和悲凉心情。接着，她又回忆与所爱者相处时的欢乐：

相思情意，　　岂能中断？
阳春三月，　　嬉戏游乐。
往事已矣，　　犹如梦中。
细雨纱窗，　　寂寞宁静。
情投意合，　　深挚缠绵。
夜月三更，　　喁喁私语。
百年偕老，　　海誓山盟。
牡丹峰尖，　　高高耸立。
大同江水，　　深可万丈。
山岂能颓，　　水岂能断？

拿昔日的欢乐来和眼前的孤寂对比，更觉凄凉。

良辰多魔，　　自古已然。
地近人远，　　造物安排。
秋风乍起，　　花枝摇曳。
雄峰雌蝶，　　凄凄相离。

用昆虫的被迫分离来比喻自己的命运，益见其心情之悲凉。

《秋风感别曲》抒情深切，笔法简炼，其中引用了秋日的梧桐、大雁、菊花、凄风、月色等来衬托、渲染，比喻自己的处境与心情，更深化了相思女子的哀愁，表现了一个被官僚遗弃的痴情女子的悲惨遭遇。作品的感情比较纤细，也常借用汉诗文的词语，和市井小民的粗放率真的情歌有所不同，和文人歌辞比较接近。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作者的身份是高贵的，而只能说明她和黄真伊类似，为了满足上层人物的需要，她把自己变成懂得点辞章的高级玩物。当然，她也可能是出身于书香门弟而流落风尘的落魄女子。

在实学派思想盛行的时期，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也进入了歌辞领域。《农家月令歌》就是一例。

关于这首歌辞的创作年代和作者，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庆尚道高尚颜于一六一九年所作；一说是实学派著名人物丁茶山(1762—1836)的次子丁学游所作；也有认为是丁茶山之兄丁若铨作

的。从歌辞内容看来，后二说较为可靠，因此把它纳入这一时期的歌辞文学中。

这首歌辞的主要思想是“国以农为本”，它给农民讲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强调使用新的耕作方法，以增加作物产量。歌辞按月分段，叙述了该月的气候条件，以及副业生产等农民必做的事情。作者特别强调了一年的丰歉，取决于农民自己的努力。作者还写出了农民的淳厚性格、互助精神和农村风俗，同时也揭露了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形。但由于作者的忠君观念和儒家思想，作品也暴露出反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错误态度。

《农家月令歌》中虽然没有人物形象的描绘和个人感情的抒发，但是它的出现，是歌辞在人民中广泛流行的标志。同时，由于它的语言平易浅近，讲求格律，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因此，它在文学史上也受到人们的重视。

正月孟春，立春雨水。
山中洞壑，犹带冰雪。
平原广野，景物已变。
山田水畓，各占一半。
奋力勤耕，不懈不怠。
一年丰凶，无法估量。
苟尽人力，可免灾难。
彼此劝勉，幸勿偷懒。
一年之计，在于春天。
凡百诸事，宜早抢先。
春如失时，年终必艰。

此外还有以伦理说教为主题的歌辞，如《警心歌》、《白发歌》、《道德歌》、《劝善指路歌》等；有以思乡怀人为主题的歌辞，如《思亲歌》、《思弟歌》、《朋友春怀歌》等；有抒发隐逸闲情的歌辞，如《草堂曲》、《沧浪曲》、《隐士歌》等；有写景的歌辞，如朴履和（1739—1783）的《朗湖新词》、闵胄

显（1808—1882）的《完山歌》等。这些都说明，李朝后半期是歌辞广泛流行的时期。由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朴仁老的歌辞算起，直到李朝末年为止，作者知名的歌辞已超过一百篇，佚名者的歌辞则更多。由于歌辞很大程度上带有口头文学的性质，李朝时代的作品到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李朝后半期歌辞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几种趋势和特点：从内容上来看，它的题材扩大了，特别是出现了纪行歌辞、闺房歌辞、爱情歌辞。从作者的队伍来看，向下层发展了，胥吏、中人①乃至平民妇女都参加了歌辞的创作。从歌辞的作用来看，它由侧重抒情而发展到着重叙事了。从形式上看，它以前主要是三·四调，之后逐步向四·四调发展，最终成了四音节占绝对优势的一种诗歌体裁。最后从语言上看，它在相当一部分的歌辞中，有了更多的朝鲜语言特色，汉文的影响相对地减少了。

第三节　国语诗歌的大众化：杂歌与说唱文学

在李朝后半期，时调、歌辞都有着向下层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使时调和歌辞演变成了“杂歌”。

本来，辞说时调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格律，但由于它着重罗列各种事物，缺乏诗味和艺术形象，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以至后来每况愈下，逐渐无人问津了。歌辞的形式为“四·四调”。它可长可短，不拘一格，再加上出现了一些足以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若干侧面的较好的作品，使这种体裁受到了欢迎，也受到了民间歌手、说唱艺人的重视。他们以四音节为基础，创作和演唱了大量的作品。由于它内容庞杂，而且形式上已突破四音节，出现了二音节、三音节乃至五音节，形成了二·三

① 中人，指地位上处于贵族和百姓之间的人物，如译员、画师、天文历法工作人员、书吏等人。

调，三·四调，四·三调，五·四调及五·五调等多种音节相互交错、配合的体裁，它就被称之为"杂歌"，以便和歌辞相区别。

杂歌的作者主要是城镇居民和说唱艺人。尤其是说唱艺人，他们既是杂歌的创作者，也是演唱者。在杂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所唱的"唱曲"中，还包括民谣、歌辞、时调，甚至还有汉文诗，杂歌只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比较流行的杂歌有《高皋天边》、《竹杖芒鞋》、《父母生育我》、《农夫歌》、《愁心歌》、《游山歌》、《四时风景歌》、《祭奠》、《梅花歌》、《二八青春歌》、《十杖歌》、《兔子打令》等。其中如《十杖歌》、《兔子打令》本来分别是《春香歌》和《兔子传》两种说唱故事中的一小段，由于有时只演唱这一小段，也就成了杂歌中的一项。

杂歌发展于李朝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社会萌芽的时期，它较多地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具有自由、奔放、乐天的内容和不拘一格的轻松、流畅的旋律。但大多缺乏刻深的社会意义，思想境界也不高。

有些杂歌表面上具有以往"江湖文学"的形式，却没有士大夫的那种"安贫乐道"的清高出世的内容，而是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带有享乐主义情调的作品，反映出在李朝末期混乱状态下产生的缺乏事业心，追求享乐逃避现实的市民思想。可以说，它是以市民的生活观对江湖文学加以改造的结果。以《竹杖芒鞋》为例：

竹杖芒鞋，携箪瓢子，
千里江山，且去游历。
层峦叠嶂，千峰耸立。
水势浩荡，百湖汇集。
绝壁之中，奇岩重重，
瀑布清波，飞流而下。
山间云深，空谷寂寂。

野鹰家鹰，还有云雀，
冲破黑云，展翅碧空，
翱翔盘旋，盘旋翱翔，
…………
此处何地？名胜之地！

一首以《农夫歌》为题的杂歌，歌唱的并不是农业生产和庄稼汉的辛苦与艰难，而是农家的田园生活。但它反映的不是农民自身的体会，而是市民眼中的农家“乐趣”：

四海苍生，庄稼汉们。
一生辛苦，且莫怨恨。
士农工商，产生之后，
贵者重者，唯有农夫。
万民之事，天下之本。
…………
农事以外，别无其他。
…………
前面溪边，菖蒲叶子，
郁郁葱葱，生长旺盛。
布谷鸟声，处处可闻。
催来此地，一片春色。
…………

以爱情为主题的杂歌中，比较典型的是《愁心歌》。这首歌大约为三十小段，每小段都有一个中心意思，大多数小段的尾句则是“我不活啦！”，用以表示相思的苦闷、焦急和悲伤。歌的音节数有三·四调，五·五调，五·四调，二·五调……等，十分活泼自由，感情奔放，富有旋律美，读来流畅悦耳。以其中两段为例：

郎君之家，隔墙相望。
可就是呀，看你不见。

心魂不定，想通通话，
却办不到，我不活啦！
郎君走时，分明说好：
一定回来，一定回来。
这一去呀，有如永诀，
等呀等呀，不见音信！
千真万确，我不活啦！

杂歌中的《二八青春歌》是一首情调积极奋发的歌，劝人们要爱惜青春，努力学习，不要虚度年华。它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全部为三音节，有如中国的《三字经》：

到二八　　长成了　　少年身，
要学习　　要钻研　　那文化。

岁月飞　　有如那　　东流水，
人变老　　有如那　　风儿吹。

难道说　　我们能　　活百岁？
活着时　　就应该　　成事业！

要振作　　要磨炼　　下决心，
莫虚度　　那二八　　好青春！

杂歌的繁荣，音乐的发展，为一种新的民间文学体裁，即说唱文学的诞生，起了催化作用。

辞说时调、歌辞，尤其是杂歌中，已经显露出国语诗歌叙事性加强的趋势。以四音节为主的歌辞和多种音节的杂歌这两种形式都十分便于叙述事件或故事。说唱文学的产生，实际上也就是歌辞、杂歌内容的故事化。演唱者不仅仅是用音乐和情感的抒发来感染听众，他们还用故事的情节来打动听众。此时的说唱，虽然还只是由一位说唱者讲述故事中各种人物的话语和行为，没

有角色的分工，不化装也没有动作，但已多少看出一些戏剧的萌芽了。唱剧便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李朝后半期，说唱的脚本大量出现，作者都是无名氏。因为它开始是口头创作，后来由说唱艺人在演唱过程中不断增删修改，事实上成为集体创作了，很难说第一个作者是谁。由此也出现一种现象，即同一个说唱故事，有多种脚本。以《春香歌》而言，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了二十多种脚本。

说唱的整理、改编者中，知名的人物是申在孝(1812—1884)。申在孝字为源，号桐里，为全罗北道高敞人，父经营官家药铺。他学过汉文，做过下级官吏。在高宗登基（1864年）兴建景福宫时，他曾捐献大量金钱，于宫殿落成时作庆祝歌数章献给朝廷，深受高宗的喜爱，授予他折冲将军。

申在孝精通音律，喜爱国语诗歌唱曲，中年时，全力从事唱曲的研究和对说唱艺人的指导，整理了不少说唱脚本。经他整理成为定本的说唱脚本有六部，即《春香歌》、《沈清歌》、《兴夫歌》、《兔子歌》、《横负歌》、《赤壁歌》。由于他的努力，说唱艺术大有进步，演唱由即兴演唱发展为按一定脚本和唱法演唱，从而使说唱艺术朝着音乐、舞蹈、表演结合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为此后唱剧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朝鲜民族的歌剧——唱剧，其前身就是说唱表演。唱剧就是以“说唱”为基础，再按说唱故事中的人物来配备演员、设计动作、设置布景、配置道具的。

申在孝在说唱艺术方面所做的工作，不仅为朝鲜国语诗歌向戏剧化方面发展作出了贡献，还使得一批民间故事形成韵文小说广泛流传。朝鲜国语小说《春香传》就是这样形成和流传开来的。关于春香的故事有多种版本，目前最为流行的版本——全州出版的《烈女春香守节歌》，就和申在孝《春香歌》的体裁与内容基本相同。

在歌曲文学兴盛的十九世纪，出现申在孝这样为民族诗歌、戏剧发展作出贡献的文人，不是偶然的。

第二章　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朝鲜国语小说

朝鲜自古以来民间传说数量较多，但由于长期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多湮灭失传，少数以汉文形式保存下来，如保存于《三国遗事》及《新罗殊异传》等书中的故事、传说、传奇，皆属此类。李朝时期，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字，及由此而带来的国语诗歌的繁荣和说唱文学的兴起，不少民间传说就以说唱形式被民间艺人传播开来，并整理成书面形式。

写成为定本的说唱脚本，形式上具有韵文的节律，有如长诗，能在舞台上说唱或表演，又带有若干戏剧特色。作为书面文学，又可看作是小说。这一章里所谈的，就是这类以民间传说为基础，以说唱形式进行传播，最后形成书面文学的小说。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春香传》。此外还有以家庭伦理道德为主题的小说如《沈清传》及寓言小说。

第一节　《春香传》

《春香传》是朝鲜最有名的说唱脚本体小说。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春香传》就以说唱的形式在朝鲜民间演出过。它以民间传谈为基础，经过民间许多说唱者的不断丰富，最后经过申在孝的整理，成了较为完善的说唱脚本，广泛流传，从而，春香也就成为朝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她的故事也深为人们所喜爱，历久不衰。

《春香传》的版本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朝鲜国语本的《谚文春香传》、伦理小说《广寒楼记》、《烈女春香守节歌》（全

州土版）《狱中花》（李海朝）等。汉文本的有《水山广寒楼记》、《汉文春香传》等等。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大约于十九世纪初叶出版的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是最好的，故事原貌在这本书中保留的最为完整。我国一九五六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春香传》，就是根据此版本翻译的。

关于《春香传》的产生时期和来源，有种种说法，《水山广寒楼记》中甚至提到它早在十四世纪高丽恭愍王时就产生了。关于它的来源，以纯祖时期赵在三（1801—1834）的说法较为可靠。据他在《松南杂识》中记载：

> 南原府史李道会眄童妓春阳，后为李道令守节，新使卓宗立杀之。好事者哀之，演其义为打令，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

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妓女不过是权贵们的玩物，官吏残酷迫害妓女致死的事，屡见不鲜。高丽诗人郑袭明的《怜妓诗》中就反映了一郡守为不让他人嫖某妓女，用火烧伤该女面部的事实。这和上述春阳被害事件一样，只不过是许多类似事例之一而已。在李朝封建社会崩溃的征兆日益明显，新兴的市民阶层反封建势力的意识逐渐增涨的情况下，春阳受迫害这样的事实激起了人民的愤慨。《春香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广为流传开来的。①

春阳的命运实际是一个悲剧。但是人民让春阳得到了幸福的结局，并使残忍的贪官受到了惩罚。情节上的根本变动，正反映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斗争意志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香传》是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在文学上的产物。

《春香传》分上下两卷。上卷写朝鲜全罗道南原府已改籍的艺妓月梅之女春香在荡秋千时，被游览广寒楼的南原府史李翰林之子李梦龙看到。李对她一见倾心，热情地向春香求婚。春香

①朝鲜语"春阳"、"春香"两者发音极近，以后传说中遂将"春阳"改为"春香"。

同意与他订下百年之约，瞒过李的父母，结成夫妻。不久，李翰林升迁，离开南原，李梦龙迫于门第关系，无法带走她，二人只得洒泪而别。

下卷写南原府使的继任者卞学道点传艺妓，强令春香当他的侍妾。春香誓死不从，被严刑拷打、下狱。李梦龙在京城中了文科状元，被钦点为全罗御史。他化装为乞丐，暗行察访民情，进入南原境内，惩办了卞学道，救出春香，与她团圆，一同进京，共享荣华富贵。

在描写爱情的小说戏剧或传说故事中，那些能提出一定的社会问题的作品最有价值。《春香传》也不例外。这部来自人民、又为人民群众广泛传播、喜爱的作品，通过对春香的坚贞不渝爱情的热情歌颂，揭露了封建官僚的黑暗统治，抨击了他们的暴虐无道及对无辜人民的酷残蹂躏，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

小说中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春香和卞学道之间。站在春香这一边的有李梦龙及同情春香的人民群众，属于卞学道一边的，是少数地方官吏。

春香是一个思想纯洁，感情真挚，忠于爱情，勇于反抗恶势力的妇女形象。和原有传说不同，作者把她说成洛神投胎、贵族的后裔。她“知书达礼”，“谙晓音律”，仪态大方，“容颜出众”。但因母亲是“退妓”，而受到贵族官僚社会的歧视。她地位卑下，但人品高尚，希望觅得佳偶，却不愿阿谀奉承权贵们。作品通过官厅首奴之口，侧面揭示了春香的这一心愿：

> 许多权门世族，两班才子及闲良，来到此地，都欲登门求见春香母女，却一概不理不睬。①

但是，当她意识到李梦龙对她的真挚感情时，就不顾她和这位翰林公子之间的身分悬殊，满怀纯真的情感投入他的怀抱。在被迫和李梦龙离别的时候，她说过：“京师两班，个个狠毒！恨哉！

---

① 引自冰蔚等译的《春香传》，1956，下同。

恨哉！尊卑贵贱，委实可恨！”这不仅是她伤于别离，而且表示了她对贵族阶级的丑恶面目和他们的门阀之见，原本就有一定认识。

最能说明她不以身分贵贱取人的高尚思想品质的，是她在李梦龙处于“逆境”时的态度。李梦龙化装为乞丐来狱中看望她时，她没有因梦龙已成了乞丐而影响对他的爱情。她既不嫌弃他，也没有因为他已失去贵族的身分而后悔和他的结合。她不顾自己已面临死亡的危险，一再嘱咐母亲不要因李梦龙沦为乞丐而歧视和嫌弃他。她这样地嘱咐母亲：

> 母亲哪！我死之后，母亲要好好看待于他，免得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雕风衣柜内，我有一件绸子长衫，可将去变卖，给他卖件细些新衫。再将我那些白纺丝的裙子也一齐卖去，与他添置些新帽、新鞋……那龙凤衣橱，也变卖了吧，卖了龙凤衣橱，做几味合口的珍馐小菜，为我款待郎君。母亲！我死之后，休因我不在，生疏了他！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春香对李梦龙的爱是极为深挚的，她和那些嫌贫爱富的女子截然不同。尽管作者最后将富贵荣华的结局给予了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子，但春香对梦龙的爱情中，并没有任何攀龙附凤的念头。她爱梦龙、是爱他的人品，爱他“少年英俊”，“文雅风流”，“聪敏绝顶，文章满腹”，爱他是一位“人世奇男”，前途无量，更爱他一片真挚情意。

春香最动人的地方，是她面对卞学道残酷的迫害敢于坚决反抗，对狗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卞学道诬她“辱骂长官，叛逆不道”并说她犯下“万剐凌迟之罪”的时候，春香理直气壮地答道：“那劫夺有夫之妇的人，为何无罪？”她责备卞学道“不知四十八方南原百姓的苦，但知枉法去徇私。”她质问卞学道：“你是临此治民还是专用酷刑来把人折磨？”她呼道：“愿得七尺剑，刺杀贼谗奸！”

春香这个年轻女子，面对卞学道那样一个八面威风的酷吏，受着严刑，敢于勇敢地唱出《十杖歌》揭露卞的罪恶和坚定地表

示自己的反抗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这里，《春香传》的作者把主人公提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她不仅仅是一个为自己的幸福和爱情而奋斗的妇女，而且还成了一个为百姓大声疾呼的勇敢的群众代言人。

李梦龙却和一般的贵族子弟不同。他不顾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怀着真挚的感情去热爱艺妓之女，并在他做了大官之后，仍能不变初衷，对春香矢志不移。更有意义的是，李梦龙对于人民的疾苦是同情的，对于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作为御史乔扮成乞丐进行私访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劳动人民，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奸官卞学道的罪恶。在卞学道的生日宴会上，他用一首短诗集中概括了贪官污吏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种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批判，不但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愤怒，而且也表明这个贵族子弟和劳动人民接触后，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

李梦龙在性格上有一定的弱点。他虽然爱春香，但有一个短时期的动摇。当他母亲责备他娶春香为妻是"败坏门庭"，威胁他"如被朝廷知晓，一定断送前程，一世不能为官"时，他甚至对春香说："我二人不得不离别了。"后来他虽然克服了这种动摇，但也说明为了摆脱其贵族出身所带给他的弱点，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这一过程。

作品中冲突的另一方是以卞学道为代表的贪官污吏。这个人物一出场，作者就对他做了一番描绘，说他是"文采有余而道德不足，刁钻古怪、阴险刻毒"。说他"原是个失德的小人，常断些无情的冤案"。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点传艺妓，而春香就因此遭到了不幸。他对春香的迫害是十分残忍毒辣的：由威吓、严刑拷打，直至最后判处死刑。

这个贪官在百姓面前大耍威风，在上司面前，却胆小如鼠。他趾高气扬地坐在寿宴前，一听到御史来到，顿时吓得屁滚尿

流，丑态百出。作品描绘了他的走狗们狼狈不堪的场面：

> 公兄胆战心惊，在府内出出入入，不知所措；六房骇得魂飞魄散，连说："不好！"呼唤公房，声声不绝。公房手提宝典，好似热锅上的蚂蚁，摇晃不定，直叫："今番休矣！"座首别监、吏房、户长、莫不惊惶失色，三色邏卒，四下奔走。使令等人，逃窜无门，踩得鼓破琴碎。慌乱之间，有的丢下印匣拿起果盒，有的丢下兵符携走松糕……还有的竟拿刀套当溺器……

这些描写，组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表达出作者对这个酷吏及其狐群狗党丑态的鄙夷。

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封建社会的下层人物——街头巷尾的百姓、农民、民间妇女、房子（李梦龙的书童）等人。作品通过这些不同身分的人物的不同表现，揭示出人民群众对于官僚暴虐统治的愤恨、不满和蔑视。

卞学道拷打春香的消息传出，南原府的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纷纷前来观看，无不一洒同情之泪。他们边看边议论这场暴行：

> 南原府使怎地用此重刑打一弱女？大家且记住那执杖的使令，除非他里在府中不出，只要他走出三门，定要他的狗命。

奉命拷打春香的执杖者，十分同情春香无端受刑。卞学道严令他毒打春香，并警告他，"如若行私徇情，虚杖卖法，被我察知，就一齐处死！"执杖者表面上回禀卞学道决不徇情，要痛打春香，转过身来，却对春香悄悄说道：

> 你那身子怎禁得住两三下刑杖！我实出无奈，不得不打。我打左腿时，你往右边躲；我打右腿时，你就向左闪。千万记住，不要忘了。

地里的农民对化装成乞丐的李梦龙讲述卞学道的罪行，表示痛恨他。李梦龙的书僮——房子，对于他的主人有时也采取戏谑嘲笑的态度。作品对于房子的这种描写方法，除了喜剧性的需要

以外，还反映了一般市民阶层蔑视权贵人物“尊严”的思想倾向。在李朝封建社会趋向没落的情况下，贵族的地位也逐渐受到了新兴商业资本势力的冲击，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朴燕岩就以《两班传》、《虎叱》等作品嘲笑了道貌岸然的封建贵族。《春香传》中出现的房子对李梦龙的态度也多少有类似的倾向。

《春香传》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描写，使这些下层人物在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提高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使得这部作品能够较为广阔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各种下层人物的思想动向。

在力图摆脱封建等级制度束缚方面，《春香传》也表现出市民阶层的思想倾向。在封建制度下，一个处于象春香这种社会地位的女子，即使得到了显贵人物的青睐，也只能作为他的侍女、姬妾。甚至在他尚未娶正妻的情况下，她也只能如此。身分低微的人是不可以成为贵夫人的。早于《春香传》出现的朝鲜十七世纪文人小说《九云梦》就是如此处理问题的。但是春香却以堂堂正妻的资格与李梦龙结合，与他白首偕老。从这里可以看出市民阶层冲破封建门阀观念束缚的要求，更趋向于强烈了。

《春香传》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春香、李梦龙、卞学道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把他们分别描写成其同类型人物中的代表形象，即：反对封建官僚暴政争取爱情自由的妇女、具一定进步倾向的开明士大夫和封建社会末期的贪官污吏。

此外，作品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描述及自然景物的描绘方面，也比较鲜明，生动。例如写李梦龙见了春香之后，回到书房，一心只想春香，精神恍惚，仿佛春香无处不在。打开《诗经》，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句子，就更添愁绪，越发念念不忘春香，简直读不下去了。及至读《大学》，一念起来，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春香”；读《周易》，又是“元，为亨，为贞，为春香”，改

读《滕王阁序》，读出来的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春香……"；读《孟子》，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见春香。'" 把一个多情公子的单相思心情，极生动地展中在读者面前。

作品写景也很真切，并且能结合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的心情，以景衬托，为事情的发生和进行，渲染浓厚的气氛，作到情景交融。如写李梦龙初见春香，产生了爱慕之心的时候，在房子的指引下，辨认和观察春香住处时所见的景物：

郁郁东山之前，一泓明镜莲塘，水清鉴人，游鱼可数。其间奇花异草，万紫千红。庭院之内，大树千章。门前有柳，垂丝万缕。庭前有竹、有柏、有枞，老松夭矫拿云，古杏枝生南北。草堂前还有深山楮树，葡萄藤蔓绕盘树上，伸出墙来。就在那松庭竹林之间，隐约可见的，便是春香的家了。

此景借房子的口来叙述，是作者对春香住处景致的着力描绘。

又如春香被捕下狱，面临死亡威胁时，李梦龙重返春香住处，只见：

行廊塌倒，老树无皮，只剩下苍碧梧桐，还在迎风矗立。阴森无光的短墙之下，突地跳出了一只脱毛的老狗，一瘸一跛，汪汪乱叫……

又看卧龙幛子的春联，被那东南风吹得沙沙作响。

同样的处所，由于心情不同，主仆二人所看到的景物也是不一样的。

《春香传》的戏剧特点也很明显。情节进展迅速，矛盾冲突尖锐，人物语言和动作的描写鲜明，扼要。尤其是在主人公感情达到高潮时，往往使她用唱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出现了象《爱歌》和《十杖歌》这样风靡一时的宣叙调式的杂歌名篇。有的地方，还用唱词形式描写人物外貌与行动举止。如李梦龙见到春香进入广寒楼时，作品写他眼中的春香：

仪态贞静，举止端庄……唇红，红比牡丹；齿白，白似

编贝。神清若水，肤凝如脂。紫霞裳是夕阳含雾，翡翠裙乃银汉横波。莲步姗姗，屏营悄立。

作品写春香母亲责备梦龙要抛弃春香时，也有一段唱词：

春风杨柳千条线，姹紫嫣红处处开，待得花残叶落后，不见翩翩蛱蝶来。春香我爱女，冰清玉洁才，容貌将随日月老，红颜倏作白头哀。老大谁相顾？光阴去不回。年华虚度了，柔情寸寸灰。道令自享荣华乐，却教我女受殃灾！

这种风格与文体是它作为说唱脚本所决定的，也是它作为唱剧的雏型必然具有的特点。

《春香传》出现于封建末期。尽管它在思想内容上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但仍受时代的局限，跳不出封建思想的藩篱。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李朝封建社会的美化上。它把"肃宗大王登基以来"的社会情况，描述为"国泰民安"。在《农夫歌》中，以"天下太平日，圣君盛德高"对封建朝政大唱颂歌。

这些局限性主要由于作者虽反对封建暴虐的官僚，却不反对封建政治制度本身。作者把消除黑暗现象的美好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圣明和将相的贤能上。

作品在艺术上的缺点是不顾人物性格塑造需要与否，使用了离开了情节发展的、过分的夸张手法。例如把与情节进展无关的民间的几位洗衣女子形容为和《九云梦》中的八仙女一样，还遗憾她们没有一个"杨少游"来与之婚配等情节，就显得蛇足。

另外，作品在某些地方跳动太大，理应展开和渲染的地方却过于简略了。例如在作品的结尾，当春香得知御史就是李梦龙，并因此绝处逢生，被救出火坑的情景，作品只是写春香"一抬头，不觉楞住"，接着写了她"大喜过望"的一些胡思乱想。跟着就是香母"步履如飞，兴高采烈"地进来。

其实，按剧情发展来说，此处正是矛盾冲突意外地得到突然解决，最富于戏剧性的时候。春香此时不仅得免一死，而且还见到心上人已衣锦荣归，和她团圆。命运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时，两人相见的场面，应当是极为动人，足以催人泪下的。但作品在此处竟简单地一笔带过，无一语涉及两人团圆时的悲喜交加的情形。似乎收得太草率、太简单了。拿前面出现的两人新婚时的欢爱、离别的愁苦等描写来比较，就更显得"得救"和"团圆"处写得单薄了。这种单薄甚至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李梦龙因为身居高官，对春香已不再那么一往情深了。似乎他只是一个惩办坏官、救人一命的堂堂御史，而不是一个情深意长的郎君了。这是艺术手法上的欠缺给读者造成错误的印象！

《春香传》引用了中国的一些著名诗句和典故，说明作者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这也是说唱者为了迎合听众的趣味，加强演出的效果。这显示了作品具有说唱脚本的特色。但作为小说来看，过多的典故和诗句的引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显得累赘，甚至让读者觉得牵强附会，影响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的真实感。

《春香传》富于乡土气息，具有较浓厚的民族特色。它大量引入了民间歌辞、杂歌及歌谣，其人物对话和对某些事件、场面的叙述，接近民间口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即韵文与散文、唱与说相交织的文体。《春香传》极大地发挥了民间诗歌的长处，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二节　家庭伦理小说

《沈清传》及其他

家庭伦理问题也是李朝后半期小说所注意的一个问题。父子之情、兄弟之义、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关系等有关人伦道德的问题，本是儒家思想所重视并早已有既定道德规范的问题，即所谓孝悌仁爱之类。这些规范准绳对统治者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所不可少的思想工具。在民间也存在着对这些伦理关系的看法，在这些方面他们所表现出的美德往往是统治阶级的虚伪说教望尘莫及的。这一时期以传说为基础的文学作品有《沈清传》、《兴夫传》、

《蔷花红莲传》等。这些作品既有对于种种美德的赞扬，也有对道德败坏者的揭露与谴责。

《沈清传》写的是一位孝女的故事，情节和古代文学中的《知恩传》很为相似，但比《知恩传》多了一层幻想的、传奇的色彩。

关于沈清的传说，早就流行于民间，它成书于十八世纪，在十九世纪改编成唱剧上演，是经申在孝整理、改编的作品之一。由于传说的长期流传和说唱、唱剧的公开演出，沈清已成为了朝鲜家喻户晓的名字，成了“孝女”的一个代名词。沈清这一形象得到朝鲜人民的普遍尊敬与喜爱，这也表现了朝鲜民族敬老的悠久优良传统。《沈清传》又名《沈清王后传》、《江上莲》。

盲人沈鹤圭在其独生女沈清出世之后七天，就遭到了丧妻之哀。他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将沈清抚养成人。父女两人相依为命，靠乞讨及给人做工勉强度日。沈清目睹老父双目失明，一心想治好他的眼疾。由于为父治眼心切，她轻信了梦云寺僧人的话，愿意捐献该寺供养米三百石以求盲父重见光明。但贫穷的沈清求告无门，只得卖身给水上商贾——船主，以换取供养米。米虽送入僧人手中，老父的瞎眼却依然未愈。沈清被船主当作祭海的供品，抛入大海。沈清一片至孝感动了神明，入海后，化为莲花亭亭玉立于水面。船人将莲花摘下献给国王，沈清又自莲花中复出，受到国王的宠爱，成为王后。为了寻找盲父，她在宫中设宴邀请所有的盲人赴宴，终于和盲父重逢。老父在大喜之下睁开双眼，重见光明。

作品指出沈清之父沈鹤圭是一位没落的两班贵族，但所描写的他的家境却和穷人一样贫寒。沈清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妇女，她给人当雇工，能做很多活儿，做针线、洗衣、漂染、做饭、酿酒、制糕，及为主人家婚丧喜庆做准备等等，一年忙到头。沈清衣衫褴褛，上衣烂得只剩下衣领是完整的。她穿不起袜子，光脚穿着没有后跟的草鞋。

沈清十一岁时，就知道为父分忧。她眼见盲父每日为生计外出乞讨，于心不忍，主动代父亲外出乞讨。天寒地冻，人们给她热饭，她一口也舍不得吃，想到的是“老父在冰冷的家里等着我，我怎能一人先吃？”

尤其可贵的是沈清对待舒适和荣华富贵的态度：当她穷迫得走投无路，意外地得到张丞相夫人的赏识和怜惜时，竟谢绝了张夫人收她为义女的要求，不愿独自享受锦衣美食，甘愿和盲父在一起过贫困的生活。这充分体现出了劳动者的人穷志不短，甘愿为亲人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作品歌颂了邻里劳动人民对于沈清的同情、关心和帮助。沈清母亲郭氏去世之后，善良的邻居无不悲哀，主动提出大伙凑钱安葬郭氏。邻里贵德娘还为沈鹤圭照顾女婴，好让他去送葬。附近所有的有奶水的妇女，都轮流给沈清喂奶。在沈清卖身商人离开家乡以后，桃花洞的人又千方百计照顾沈鹤圭，使他衣食周全，温饱度日。凡此等等，既从旁衬托出了沈清的孝心感人至深，也表现出了劳动人民中的那种相互关心，救人危难的高尚品德。

作品对沈清父母的夫妻感情也写得很生动。沈清的母亲郭氏病时，丈夫沈鹤圭精心照料她。尽管他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还坚持为她煎药。及至郭氏断气，沈鹤圭还不知道，一面把药递给她，一面还劝慰她。知道妻子已死，他痛哭欲绝，呼喊着妻子，愿意自己替她死去，好使女儿得到母亲的抚养照顾。作品在郭氏卧病与死去的描写上，写出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情景。

作品对一些反面人物进行谴责。梦云寺的僧人，骗取了贫女沈清卖身所得的三百石米。商贾为了赚钱得利，竟不惜把沈清当祭品，逼她跳海。这些情节揭露了当时佛门中的一些腐败和丑恶现象，也反映出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残忍。

作品鞭挞的另一个反面人物是沈鹤圭的后妻。这是一个心狠手毒的妇人。她见到沈鹤圭手头上有些钱的时候，就主动以身相

许，把这个可怜的盲人的钱花光用尽。当他看到沈鹤圭已身无分文，就在陪同他去京城途中和另一男人黄奉事私通，把旅费全部偷到手，逃走了。作品通过这个人物，一方面揭露可恶的后妻人品低下，另一方面也借此把沈鹤圭的忠厚老实、郭氏的善良，衬托得更为鲜明突出，更能唤起人们的同情。

《沈清传》中的一些思想表面上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它既揭露了僧人的欺骗行径，又表现了神、佛的灵验；它既明确而热情地歌颂了穷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又对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表示出称赞乃至美化的态度。这些矛盾该怎样看待？《沈清传》的主导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还是相反？

要说明这一矛盾，就必须看到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及其整理改编者是谁。

作品产生于李朝。李朝统治者虽因其政治上的需要采取“斥佛崇儒”的政策。但佛教思想在民间和社会上，还是流行的。他们不能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作品虽然揭露了僧人的欺骗行为，但只是把它看作佛门个别败类的罪行，矛头并不指向佛教本身。

这一点，正如《春香传》对于卞学道的揭露一样。《春香传》不反对官僚制度本身，还通过李梦龙这种理想化的清官形象来肯定封建官僚制度。《沈清传》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如此。沈清理想的实现，最后还是不得不靠神佛之力。

作品虽然写出了丞相夫人的善行，并对国王同情沈清，答应为她摆盲人宴等等表示赞赏，但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表现他们的德行。在作品中，他们的善行是沈清高尚行为的后果，他们的活动是围绕沈清转的。由于中古时期人们世界观的局限性，作者无法为沈清这样一个令人起敬的平民女子找到另外一种幸福的结局，只能让她获得当时女子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地位，即受到国王的恩宠，成为王后。

作品赋予沈清一个高贵的出身，说瞎子沈鹤圭本是世代“簪

缨之家”，说沈清本是天上女神西王母之女。这种把一个高贵出身加在一个贫贱女子身上的做法，其出发点是善意的。在一部富于神话色彩的作品中，以这种办法来美化它所歌颂的主人公，是可以理解的。

劳动人民子女对父母的爱，和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制度而宣传的“孝道”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劳动人民的爱国观念与封建统治者的“忠君”思想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沈清传》的作者分不清这一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劳动者的纯真亲子之爱和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孝道”。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通观《沈清传》，它歌颂的重点对象是贫苦人民。它和《三国史记》中的《知恩传》具有相同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珍视的一份文学遗产。

《沈清传》具有和《春香传》类似的缺点，即引用了过多的典故，形成一种不必要的辞藻和汉诗文的堆砌，这不但是全书情节发展所不需要的，也不利于表现人物性格。例如沈清在投水前在船头向天祷告之时，竟然把许多与舟船有关的典故尽数加以罗列：从轩辕氏造舟，夏禹治水，孔明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曹营的赤壁大战，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的“舟摇摇以轻扬”、苏东坡的《赤壁赋》中的“纵一苇之所如”、佛经中的“满船空载月明归”、乐府《采莲曲》中的“吴姬越女采莲舟”等等都引了进去，显得累赘。

这种典故的堆砌，不过是说唱演员炫耀“文才”的一种表现，也是民间说唱文学脚本所具有的一种特色。

如果说《沈清传》是以家庭中的亲子（女）之间的伦理道德为主题的话，那么另一个著名的小说《兴夫传》就是以家庭中的兄弟之间的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作品了。

《兴夫传》同样是来自民间传说，之后形成为说唱脚本的作品。与之相类似的民间传说在日本、蒙古也曾产生过。它不外是

通过兄弟之间的善恶矛盾，来扬善抑恶，希望兄友弟恭。《兴夫传》的传说，在朝鲜民间经过长期的流传过程，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间写成书。版本较多，书名除《兴夫传》而外，还有《兴夫与乐夫》、《燕之脚》等。其主要情节如下：

有兄弟二人，哥名乐夫，弟名兴夫。乐夫吝啬、贪婪，性格残忍，专门损人利己，侵害邻里，为富不仁。兴夫夫妇很贫苦，但勤劳善良，助人为乐。乐夫夫妇嫌弃兴夫，把他们夫妇赶出家门。兴夫被逐后，生活越发艰难。一天，兴夫偶然看到一乳燕腿部被长虫咬伤，落在地上挣扎。心地宽厚的兴夫可怜这只燕子，为它治疗伤口。燕子伤愈飞去。第二年，这只燕子衔来了一粒葫芦种子。兴夫把它种在地里，结出了一个大葫芦，葫芦里装着金银财宝、粮食、布匹和牲畜，甚至还出现了一所精美的房舍，兴夫从此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乐夫听说此事，满心嫉妒，就去询问兴夫致富之由，于是也抓来一只燕子，折断了它的脚，然后在创口上敷上药放掉。次年，这燕子也衔来葫芦种子。乐夫种下它以后，也结了葫芦。但其中出现的却是两班、巫婆等作恶多端的歹徒。这些人痛打了乐夫，还将他的财产掠劫一空。乐夫倾家荡产了后出于无奈，只得投奔兴夫。兴夫不念前嫌收留了他，共同过着幸福生活。

作品通过兄弟二人的形象，揭露并否定了懒惰、残暴、无情无义的恶人，赞美了勤劳、善良、仁厚的好人。

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劳动者与剥削者，穷人与富人，受压迫者与压迫者，勤劳人与懒汉。前者一般是劳动农民的形象，后者一般是各类恶霸流氓的形象。《兴夫传》中所写的兄弟两人的不同性格，实际上是两个阶级的两种思想的表现。

作品中的兴夫终日勤劳善良，助人为乐。他按季节进行耕种，从不误农时。天气不好不能下田时，还编席子。他还去帮助邻人编织草帘、翻修屋顶、挑水、打扫院子，只收很少的报酬。他的妻子和他同样勤劳。她受雇于人，舂米、酿酒、做祭服、洗锅

刷碗整天不闲。

兴夫夫妇虽然如此勤劳，日子却过得很苦。他们住的是由高粱杆和矮蒿搭成的窝棚，穿不起衣服，就用席子遮体。当狠心的乐夫老婆用饭勺打他们耳光时，他们也顾不上叫疼，只管把粘在他们两颊上的饭粒吃掉。兴夫夫妇这样勤劳终日，却仍免不了饥寒交迫和遭受侮辱。这正是当时贫苦农民悲惨生活的一种写照。

作品中的乐夫，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作者挖苦乐夫说："人人皆有五脏，唯独乐夫则有五脏七腑"，说他"多一个心术腑，附在肝边上。这个心术腑一翻动，就闹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他"酗酒打架……好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别家死了人，他幸灾乐祸，高兴得手舞足蹈；人家失火，他用扇子去煽；邻居生孩子，他就宰狗。他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无故地打老实人，踢孕妇的肚子。借讨债抢走人家的老婆。故意在井边拉屎尿，在农民成熟待收的稻田里灌水，在人家煮成的米饭中洒进泥巴。"人家的夫妇关系和睦，他偏去挑拨离间；人家的船要远行江海，他却在船底钻窟窿。人家在洗澡，他却扔去土疙瘩；人家害眼病，他却在人眼里洒辣椒面。"

作品对这两种人的态度是鲜明的。它借两人对燕子的不同作法，让好人得善报，让恶人遭到恶报。

燕子是许多民族喜爱的候鸟。蛇，一般的则是被视为邪恶者的象征。乳燕为蛇所咬伤，兴夫救了它，表现出他的善良。乐夫却故意折断燕子的脚，和蛇的作用一样，虽将它的伤治好，其出发点纯粹是为了得利，充分暴露出他的虚伪和残忍。燕子为兴夫带来了幸福，令人欣慰，为乐夫带来惩罚，大快人心。

这部以民间传说为基础改编成的作品，就这样是非分明而又诙谐、幽默，充满了对丑恶事物的讽刺和对美好心灵的赞美。

作品不仅讽刺和惩罚了乐夫，还巧妙讽刺了两班和巫婆这两种人。前者对人民作威作福，后者则以欺骗人民为业，都是社会的寄生虫。作品并没有直接揭露他们，却把他们说成不幸和灾祸

的制造者、恶运与坏事的化身。反映出了这类寄生虫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如同许多传说一样，妖魔鬼怪的出现是对恶人的惩罚。《兴夫传》作者让两班惩治恶人，解了人民心头之恨。同时把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两班比作魔鬼，对他们进行了巧妙的嘲弄和挖苦。

《兴夫传》的作者虽属平民阶层，但也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表现在对兴夫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的结局上。兴夫是一个逆来顺受、对哥哥的无理一味忍让的软弱者。作恶多端的乐夫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兴夫对乐夫无一句责备，而且无条件地接济他。这无疑不是受尽压迫与欺凌的劳动农民的性格。作品中反映的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却以矛盾的调和收场。兴夫"忍为高"的性格和"和为贵"的精神，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其目的是软化、麻痹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

从《兴夫传》中的这种缺点，可以看出作者虽对封建剥削阶级有所不满，但对其本质缺乏认识。因此他对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采取一种妥协的、调和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改良的态度。说唱文学中有名的三大传的另外两部，即《春香传》、《沈清传》也都有同样的情况。联系到《兴夫传》中的情况，可以说这种对封建制度的不彻底的态度，是带有普遍性的，是时代局限性的一种反映。

《兴夫传》的艺术特点是应用讽刺夸张手法、鲜明的对比以及现象的大量罗列。就艺术效果而言，这些都是适合说唱者需要的手法。

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关系也是李朝后半期小说中着意表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孔菊与潘菊》、《蔷花红莲传》。

《孔菊与潘菊》是讲继母及其亲生女合谋虐待前妻之女因而遭到报应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在西欧、日本、俄国及中国也有，《孔菊与潘菊》则纯系朝鲜民间文学，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也是先口传于民间而后成为书面作品的。

故事是这样的：孔菊是心地善良、勤劳的女子，早年丧母，备受继母虐待。继母要她做一些人力办不到的事，来刁难她。但是动物和仙女都来帮助她。后来，监司（官）也爱上了她。然而继母却把亲生女潘菊假装成孔菊，嫁给监司，并把孔菊推入池中淹死。孔菊死后化为莲花，随后化为珍珠，又还原为孔菊而向监司揭发了潘菊母女的罪行。于是真相大白，潘菊母女均被治罪，孔菊成了监司的夫人。

这个反对继母虐待前妻子女的故事，表达了人民大众的一个朴素善良的意愿：勤劳善良却受压迫的人一定会得到好报，而懒惰贪婪、邪恶的压迫者肯定得到恶报。

作品刻画了继母穷凶极恶的嘴脸，她强迫孔菊用木锄锄石子，又让她挑水装满一个漏缸，还让她一夜舂一石米等等。

作品以童话般的幻想让孔菊渡过难关：一只母牛出现了，给孔菊一把铁锄，好让她锄石子；一个癞蛤蟆出现了，用身体堵住了缸的漏洞，好装满水缸；仙女突然出现了，帮助孔菊舂好了一石米……

作者又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这位备受继母虐待的勤劳少女，使她化为莲花，化为珍珠，以艳丽的莲花和晶莹的珍珠来象征孔菊的高贵品质、善良的心地和美丽的容貌。

表现继母虐待前妻子女而遭恶报的小说还有《蔷花红莲传》、《杨丰云传》、《鱼龙传》、《郑乙善传》等。其中《杨丰云传》、《鱼龙传》的背景是中国。《郑乙善传》虽不以继母虐待子女为主题，但其中含有这种情节。

这些小说，有的不过象传记一类平铺直叙，其思想性、艺术性不高，故不在此详为介绍了。下面只介绍一下《蔷花红莲传》。

《蔷花红莲传》的情节是这样的：蔷花与红莲两姐妹被继母许氏视作眼中钉。许氏为除去她们，便把一只老鼠的皮剥去，偷偷塞进两姐妹的被窝中，借此在丈夫裴座首面前诬告蔷花，说这是她有奸情怀孕小产的证明。在把蔷花遣送到姥姥家去的途中，

把她推入水中淹死。迫使蔷花投水的许氏亲生子，亦遭到报应：被猛虎咬去两耳一臂一腿。红莲得知其姐姐无故被害之后，痛不欲生，在青鸟的引导下，找到姐姐淹死的池塘，也跳入水中自尽。姐妹两人阴魂不散，去找郡守要求伸冤。郡守见阴魂，立即仆地而亡。此后，该地数任郡守皆因见两阴魂而亡。事情终为朝廷所知，特派一胆大精明的郡守受理此案。该郡守接受两冤魂的申诉后，弄清真相，将凶犯许氏凌迟处死，并树碑以慰二冤魂。裴座首深自悔咎。他后来娶继室尹氏。蔷花红莲二魂依天帝旨意，投胎于尹氏之腹，作为双胞胎同时出生。长大后，两人各嫁与富翁李廉孝的两个儿子。她们的丈夫皆中状元，齐为翰林。两对夫妇享尽荣华富贵。

《蔷花红莲传》来自孝宗年间铁山府使金东屹的治冤故事。大约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由朴庆寿以汉文写成，其中稍有虚构成分。之后，几经若干无名作者口头和书面的补充润色，形成为国语本小说。可以说，它是一部有一定事实根据，又经民间艺术加工而成的传奇故事。

《蔷花红莲传》篇幅不长，它所写的人物形象却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继母许氏的奸恶，其儿子的愚蠢，裴座首的软弱无能，蔷花与红莲的善良，都具有很鲜明的个性。

从小处看，《蔷花红莲传》反映出了家庭内部的纠纷，对继母虐待前妻子女的现象作了谴责。但从大处看，它又反映出了这种纠纷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财产问题。作者通过红莲之口揭露：许氏起歹意下毒手是为了霸占财产。蔷花红莲的亲母给她们留下了大量遗产，继母唯恐她们出嫁时带走，就起意谋害她们，以便把财产留给她的亲生子。象这样明确地指出经济关系对事件的发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作品，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这是《蔷花红莲传》的一个突出的优点。

此外，这部带有“劝善惩恶”性质的作品中，受害者以不倦的斗争才争取到美满结局的。这一点是比《谢氏南征记》高明之

处，而足以和《春香传》媲美。当然，犹如一般中古小说主人公的幸福结局大多离不开上帝、神灵和封建统治者的帮助一样，这部作品中的受害者蔷花与红莲，也是由于朝廷的关心、郡守的精明善断而冤情得以昭雪，由于玉皇大帝的恩典而得以重新投生为裴座首之女并找到了好丈夫的。同春香相比，蔷花、红莲还多了一个靠山，即天神。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春香未死，固然可以不和天神打交道，蔷花红莲已死，要得好报，除了成仙以外，只能重返人间，这当然都得求助于神灵。然而这些情节并没有削弱两个少女斗争精神的意义。很明显，料事如神的官吏、垂怜冤魂的神灵，正是在两女子的不妥协的斗争后，才给予帮助的。应该说，这正是这一小说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和《孔菊与潘菊》一样，《蔷花红莲传》也有一些童话式的手法。猛虎为同情蔷花冤死而怒咬许氏的儿子，青鸟出现枝头啼鸣启示红莲并为她引路，仙女赐尹氏以两朵荷花，荷花又化为孪生女儿出世……都是构思精巧、人们喜闻乐见的幻想手法，说明蔷花红莲的遭遇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

第三节　寓 言 小 说

借物寓意是朝鲜古代文学所常采用的手法。载于《三国史记》的《龟兔寓言》、薛聪的《花王戒》以及此后林悌的《花史》、《鼠狱说》、《愁城志》等，都是以此种手法编成的寓言。繁荣发展的李朝后半期小说之中，产生了一些继承此传统而作的寓言小说，也就是必然的了。

寓言小说中的代表作是《兔子传》。

《兔子传》来源于《三国史记》中的《龟兔寓言》。这个古老的寓言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大约到十八世纪被敷衍铺陈为小说，到十九世纪，出现了申在孝的说唱脚本《兔鳖歌》、李善友的《水宫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还产生了《兔鳖山

水录》、《兔生员传》、《兔之肝》、《鳖主薄传》等异本。

《兔子传》讲的是：东海龙王因生活放荡而得重病，百药无效。由名医诊断：必须取活兔子的肝才能治愈。海中无兔，龙王于是派遣他的臣子鳖去陆地上活捉一只兔子来。鳖上岸以后，见到兔子，就以甜言蜜语引诱兔子同意随他入龙宫。兔子坐在鳖背上，下海进入龙宫后，才知道龙王是要取他的肝治病。他急中生智，向龙王谎言自己的肝放在陆地上忘记带来，请求龙王同意他回岸上取肝。于是鳖又重新把他驮上岸。一上岸，兔子就逃脱了。鳖无奈，只得沮丧而归。后来一个道士赠了仙丹，龙王才将病治愈。

故事的基本情节与原有的寓言相同，但是在人物语言动作及背景的描写等细节上，比原有寓言复杂多了，因此，其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

从寓言小说《兔子传》中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个古老的寓言，而是加进了自己的种种思想。这些思想带有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出处于没落时期的李朝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统治阶层与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以寓言形式表达的这些看法，正是《兔子传》主要思想意义之所在。

作者在《兔子传》中所做的艺术加工，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借题发挥，二是增加情节以便展开故事。

由于李朝的党争现象，不少人"今为高官，明为谪囚"，宦海浮沉，变幻不定，使一些人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江湖时调和某些汉文诗中有不少的反映，也是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种潮流。《兔子传》作者借兔子贪恋功名利禄而几乎丧命，反映了这种不愿求官于乱世的思想。作品中写到龙王下令剖兔腹取肝时的情形：

> 此时，院中站列之军士齐拥上前，刀锋寒光闪闪，直指兔子胸腹。哀哉兔子，为虚欲所驱，随鳖而至龙宫，成为无辜冤魂一缕，实乃自取其祸，怨谁尤谁？警告世人无才无德

者，勿贪名利，以此为戒！

作品对鳖阴险诡诈、谄媚君王求升官的行径及其愚蠢无知，也作了嘲弄：

> 此时，鳖急往宫中……向王复命："臣奉王命，立即经三江，过五湖，达东海之滨。入深山，逢老兔，千方百计，将之欺骗，使其信服，由臣背来，现居于客馆。臣牵挂龙体未宁，不胜忧闷。"

鳖于是受到了龙王的称赞：

> 卿之忠诚与辩才，南海一国无二，天佑寡人，赐寡人以贤臣。

鳖越是自吹自擂，越显得它反被兔子欺骗之后的狼狈与愚蠢。骗兔子下水的是它，反被兔骗把兔子背上岸，到手的功劳化为泡影的也是它。兔子重新上岸后，这样嘲笑了鳖："你的龙王害病，与我何干？"又说："你们一国君臣，全都中我之妙计，真可谓国中无人！"

作者尽管批评了兔子的贪恋功名利禄的思想，但还是同情它并站在它一边的。这里，他称赞了兔子的机智，同时也借兔子之口，讥讽了统治阶级中的愚蠢官僚。这同人民群众对待腐败无能的官僚的态度是一致的。

《兔子传》对龙王的残暴与虚伪也进行了一定的暴露。在要对兔子剖腹取肝之前，龙王对兔子说，自己是"千乘之君"，而兔子只是小小兽类，自己有权取兔肝治疗，叫兔子不必怨恨。还表示要在兔子死后，赐它锦缎裹身，赐它白玉琥珀棺材，并为它建立祠堂。龙王安慰兔子说，这种结局要比兔子在山中为虎狼所食，为猎人捕获荣耀得多。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花言巧语榨取民脂民膏的实际情况。

《兔子传》中对于兔子的困难处境作了一些描写，说他寒冬无衣可穿，饥饿无粮可食，还经常受秃鹫、狼、虎的威胁，整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种描写在原有的龟兔寓言里是没有的，只

是为了突出说明兔子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原因，和出于铺陈故事的需要，而不是有意识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正象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兔子传》中也免不了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它一方面揭露出龙王的残暴，一方面还说他是“本性忠厚”，还说龙王与鳖臣之间存在着“君臣之义”。这部经多人加工而成的作品有一些相互矛盾的思想，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兔子传》比起其他说唱脚本，汉文的陈词滥调和典故较少，它使用了民间常用的口语和谚语，从而使其文体较为平易通俗。

另一寓言小说《野公鸡传》（作者不详）是说野公鸡不听信野母鸡的忠告，吃了红豆子，中毒身亡。野母鸡成了寡妇，公的乌鸦、大雁、鸭子……都来向她求婚，但她不同意，最后嫁给了另一个野公鸡。

这一篇幅不长的寓言小说具有浓郁的童话气息。它强调“男尊女卑”的思想必须纠正，女子的见解未必不如男子，野公鸡就是因为自以为是，轻视野母鸡忠告而中毒丧命的。其次，它包含着女子可以自己选择对象，寡妇可以再嫁的思想。这对封建的“烈女不事二夫”、“寡妇守节终身”的封建道德观念，是一种挑战，反映出人民在婚姻问题上要求摆脱封建桎梏的思想倾向。

寓言小说《鼠同知传》又名《鼠翁传》、《鼠勇传》、《鼠狱传》，大约作于李朝肃宗时，原文为汉文，后被译成朝文传布。它讲的是两个老鼠之间的故事。背景是中国。有鼠大智者，为唐太宗立过功，受封赏，得到“嘉善大夫行同知通政大夫”等官职。有一松鼠，性奸恶不仁，懒且贪婪。松鼠向鼠大智借粮。过了三年，当松鼠再次去借粮时，遭到了鼠大智的拒绝。松鼠怀恨在心，向白虎山君诬告鼠大智偷了它的粮食。白虎山君调查后，证实松鼠所言纯属诬陷，就要判它重刑。经鼠大智说情，松鼠才免于判刑。鼠大智同情松鼠，赠予它数十两黄金，从此相安

无事。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赞扬富人周济穷人，懒惰的穷人却忘恩负义。不过这个寓言中的松鼠形象，一点不像劳动者，因此，这里的穷者，不一定就理解成为劳动人民。可以说它讽刺了小人以德报怨的的行径，肯定了宽大为怀、不计前愆的仁厚品德。

还有一部寓言小说叫《鼠大智传》，角色与《鼠同知传》中的相同，而情节与是非观念却相反。小说中出现的鼠大智成了反面人物，而松鼠则成了作者同情的对象。鼠类头领鼠大智与群鼠商议怎样能弄到粮食，最后决定派出五十名强壮的老鼠，偷取了松鼠的栗仁五十石及其他东西。松鼠向官府告发。可是鼠大智却用行贿手段拉拢前来逮捕它的差役，并在官员面前反诬松鼠捏造事实，告假状。官员于是处松鼠笞刑，并将它流放。

《鼠大智传》中的鼠大智成了盗窃集团的头目，而松鼠则成了无辜遭受害者，和《鼠同知传》是针锋相对的。两部作品的作者均是无名氏，都是有的放矢，还是同一个关于鼠的寓言在流传过程中情节起了相反的变化，难以断定。但《鼠大智传》所反映的窃贼与贪官勾结共同陷害苦主，则是贿赂公行、是非不明、好人受冤受压的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鼠大智传》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讽喻，就这点来说，它的思想性比《鼠同知传》高出一筹。

另一部寓言小说《蟾同知传》也是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它亦名《蟾蜍传》、《蟾处士传》，作者姓名及作品年代均不详。情节是明朝嘉靖年间的獐先生为升官而摆宴庆贺，请了山君白虎以外的大批动物来参加，其中有鹿、兔、狼、狐、蟾蜍、刺猬、猴、田鼠等等。参加者对宴会上谁应坐首席的问题，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年最长的蟾蜍坐首席。狐狸为此不快，就与蟾蜍比知识和见闻。狐狸虚张声势自吹自擂一番，却一次次地被蟾蜍讥嘲，出了洋相，最后认输，还请求蟾蜍教给它用什么药才可以治好自己的病。最后，宴会尽欢而散。

小说以佛经中的故事为素材，以动物之间的争斗讽刺了人间社会中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无自知之明的现象。

第四节 讽刺小说《裴裨将传》

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走向崩溃，统治阶级中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这时期出现了讽刺和嘲弄官吏的作品。《裴裨将传》就是其中的一部作品。

《裴裨将传》也是一部口头传说故事经过说唱形成朝鲜国语小说的作品。它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十九世纪，小说的执笔者不详。

《裴裨将传》着重描写了李朝末期封建官僚在生活上的丑态。裴裨将作为两班阶层中的一分子，以"志高行洁"自诩，在他被任命济州岛官以后，声称决不与当时官场上流行的嫖妓行为同流合污。他目睹济州岛前任官在离济州岛时与相好的妓女爱娘难分难舍的种种场面，颇不以为然，向仆人房子表示自己今后决不如此。后来，上级官吏济州牧使与房子和妓女爱娘彼此串通，想法设法拉他下水。爱娘装作良家妇女，寻找机会引诱他，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央求房子帮他成其好事。房子故意设置了种种难关，使他丑态毕露，最后才让他与爱娘相见。正当他与爱娘打得火热时，房子装成爱娘的丈夫突然出现。他急忙钻入袋中躲藏，后来又躲进柜中。在一番折腾之后，柜子被抬到众人眼前。他不得不赤身裸体地钻出柜子，引起他的下属的讪笑。从此这个道貌岸然的官吏再也无面目在当地当官了。搞这种恶作剧的是济州牧使。他使裴裨将破了"不近妓女"的戒之后，又安排爱娘嫁与他为妾，并调裴往别处为官，让他享尽荣华富贵而终。作品的思想较复杂，对主人公裴裨将既有辛辣的讽刺挖苦，也给了他一个十分圆满的结局，肯定了他实行的"德政"。但从作品的总的倾向来看，它是以揭露和讽刺为主的。

作品揭露了济州牧使、郑裨将、裴裨将一类封建官僚丑恶虚伪的嘴脸。作为济州岛地方官的济州牧使，他想的不是解除民间疾苦，而是如何狎妓饮酒，并拉下属下水。郑裨将为了讨得他所宠爱的妓女的欢心，竟然赠给她牛黄十斤、獐皮四十张、鹿皮二十六张、红蛤、全鳆、海参百余个、骏马五匹、细布三匹、糯米十担等等。裨将的正常俸禄是难以置办这些东西，可见他平素搜刮民脂民膏有多狠。裴裨将身为官吏，表面道貌岸然，实则是个色鬼，处心积虑要勾引有夫之妇，还害了相思病，不惜低三下四央求仆人帮忙。

作品通过对这类人物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李朝末期的一幅官场群丑图。这些人领取凝结着百姓血汗的俸禄，却贪赃枉法。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沉醉于声色犬马中。所有这些，作品写得具体、鲜明、生动，其篇幅占全书的绝大部分，使读者在笑声中看到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政治的腐败、官场上的形形色色丑态。

在使裴裨将丢丑现形之后，作者给了他一个很体面的下场。这说明作者对裴裨将一类两班人物的认识还未到达应有的深度，即未认识到他们在本质上是吸吮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是应该遭到唾弃的。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批判矛头只限于他们的在寻花问柳方面的虚伪态度。在作者眼中，他们还是可以作封建王朝的栋梁之材，还可以为百姓实行"善政"的。

这部作品既在读者面前剥掉了两班的假面具后，又给他们贴金，让他们终得善报。除中古小说的"苦尽甘来"一套公式在起的作用外，还由于市民阶层本身世界观的局限性。作为封建社会崩溃时期刚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小市民，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的束缚。他们尽管对没落的封建人物是鄙视的，但还不得不把治理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原有的官僚身上。正如十八、十九世纪的某些平时调、辞说时调、歌辞所反映出的小市民趣味一样，《裴裨将传》所提出的两班在女色问题上的假正经，和在写作方法上的自

然主义倾向，以及它给予两班的体面结局，也都反映了这种小市民的庸俗低级趣味。

《裴裨将传》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富有喜剧性。有些场面出现了现实中不可能有的极度夸张的滑稽现象，它的对话也带有戏剧性。它最引人注意的一些地方更象滑稽剧剧本。例如对郑裨将与爱娘离别时，爱娘向他索取财物的描写，就采取了这种笔法。郑裨将为爱娘的眼泪打动了，给了她大量稀世珍宝贵重物品以后，爱娘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索取“纪念品”。起初她是这样说的：

> “所赠物品虽然宝贵，但你我白首偕老之约，如今已化为一场春梦……您能给我一件纪念品吗？”

郑裨将慨然应诺，于是爱娘就一件件地点名索取了，先是要他身上所穿的皮袍子，郑立即脱下给她；接着又要他头上戴的貂皮帽子，郑也摘了给她。如此接二连三，爱娘把郑裨将身上所佩的金饰宝刀、所穿的缎衣绸裤都要了去，但还不罢休，她这样说道：

> “老爷，与您离别，我朝思暮想，心中愁闷，如何能解？老爷，您把您穿着的衬衫也脱下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折叠好，每到想起老爷时，我就把它抱在我胸前，闻着您的扑鼻汗香，自然也就能暂时忘却千愁万恨，老爷，您看行吗？”

作品写这位郑老爷一听此言又骨软筋酥，恨不得把自己的皮都扒下给她。衬衫脱下之后，在犹带寒意的江上春风吹袭之下，裸露着上身的郑裨将狼狈不堪，只得披上孩子用的襁褓来御寒。最后不得不靠爱娘周济他的一身漂白布单衣遮身，双手空空地走了。

房子在裴裨将与爱娘春光正浓时，装作爱娘丈夫突然出现。这场面也写得极为风趣。裴裨将躲进了袋子，房子指着袋子问爱娘这是什么，爱娘告诉他这是玄鹤琴。作品写房子“奏琴”，拿起竹竿向口袋鼓出的部分打去。这时：

> 裴裨将一惊，疼痛异常，无可奈何，只得装成琴，从喉咙

里挤出叮咚的声音。

“这玄鹤琴声音可真铿锵动听哩！让我来敲一下大弦吧！”说完，房子就向着那额头下面靠近鼻子的部分敲去。

“叮咚，叮咚……”

“这玄鹤琴倒也怪。敲上面，上面响，敲下面，也是上面的响。真是个奇怪的玄鹤琴！”房子说。

这种场面，现实中根本不可能有的，和滑稽表演一模一样。尤其是躲在柜子中的裴裨将以为是柜子沉入了大海，闭着眼睛双手象划水的样子钻出柜子的丑态，更带有滑稽剧的性质。

《裴裨将传》对于两班人物的丑态所作的讽刺，其辛辣、尖锐的程度是同时代其他任何作品所没有的。不论是从作品反映的时代精神来看，还是从它的主题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上来看，都反映出在李朝封建社会趋向崩溃的过程中，两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已失去了地位，市民力量在日益兴起。房子、爱娘虽然只是官家的仆人和妓女，并不是手工业生产者或商贩，但他们在作品中对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官吏，进行了恶作剧式的作弄、嘲讽。他们实际所起的作用，正是反映和表达了市民阶层的思想倾向，乃至他们的思想感情与趣味。可以说，《裴裨将传》比同时期以口传为基础的其他国语小说，具有更多的萌芽中的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因素。

这些倾向反映在作品的语言上，是它的口语化的特点。和一般的具有韵文形式的说唱脚本不同，也和文人创作的汉文小说不同，《裴裨将传》比较熟练地使用了平易通俗的人民的口语，甚至把朝鲜语中的阶称①作用都用到人物关系的变化和性格的表现上去了。这是它在朝鲜国语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① 阶称：随着对话双方的年龄、地位的不同，双方所使用的谓词词尾也有变化，有尊敬、对等、对下等区别。这种区别，被称之为阶称。

第三章 文人小说

李朝后半期除以传说为基础形成的以说唱脚本形式为主的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由文人创作的小说，其数量达到三百部左右，实际上是此时期小说的主流。

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小说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卑俗、淫邪之作。写作者受到歧视、压制，作品也被禁止，因而无法流传。如十八世纪的著名儒学者李德懋（1741—1793）就说过：“演义小说，作奸诲淫，不可接目，切禁子弟，勿使看之。”其他儒学者也说过类似的话。总之，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写小说、看小说，都是背离“正道”的。

尽管如此，此时期内，由于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对小说的兴趣和要求日益增长，加之中国小说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大量传入朝鲜，文人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风气也就逐步形成了。前一时期的传奇、寓言如《金鳌新话》、《鼠狱说》的出现，尤其是《壬辰录》、《洪吉童传》和《谢氏南征记》、《九云梦》小说的创作和流行，也对十八、十九世纪小说的盛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期的文人小说，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很多，大约占三分之二，如《玉楼梦》、《淑香传》、《赵雄传》等等。以朝鲜为背景的有《淑英娘子传》、《玉丹春传》、《彩凤感别曲》等等，数量相对少些。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不外是由于中国小说在朝鲜的流行，中国幅员辽阔，战乱频仍，易于取材，小说作者有驰骋想象力的广阔天地等。按时代来看，以唐至明代的背景为多，其中明代又占绝大多数。壬辰战争以后，朝鲜人民对明朝怀有深情厚谊，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以朝鲜为背景的作品，数量虽较少，但它更直接地反映朝鲜社会的情况，所以具有更大的意义。这种作品绝大多数以李朝时期为背景，极少取材于三国时期或高丽时期。

这个时期的小说既有用国语写成的，也有用汉文写成的。有的作品两种文本都有，甚至哪是原本都难以区别了。还有一种叫做"汉文悬吐"文本，即基本上为汉文，其中夹进朝鲜语的虚词（或词尾），用以表明各个词在句法上和词义上的功能，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文本的多样化，反映出读者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的种种差异及读者范围之广。

由于当时小说受到道学家的蔑视，又产生了两种情况，即：一、小说作者大多佚名。李朝三百部左右的小说中，作者知名的作品只不过寥寥十几部。二、作品不能及时出版，它往往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读者之中。这虽然和当时的印刷技术还不够发达有关，但是和小说遭到统治阶层的歧视也是不无关系的。

从内容上看，这时期的小说所表现的主要是爱情、战争以及以朴燕岩的一系列汉文小说为代表的揭示封建末期社会问题的作品。爱情小说中，多与妓女有关；战争小说中，大多描写神魔道术等内容。此外，儒家思想的劝善戒恶，佛教思想的宿命论也是此时期小说常见的。中国典故和诗文以及汉文文章修辞手段的出现，更是许多作品中常见的现象。

第一节 《玉 楼 梦》

十七世纪肃宗时金万重创作了《九云梦》、《谢氏南征记》之后，在小说创作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于十八世纪末期的《玉楼梦》就是在这一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玉楼梦》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的总体安排上以《九云梦》为样本，而又掺进了类似《谢氏南征记》的有关朝政和贵族家庭中的善恶斗争的情节，以及劝善惩恶的思想。

关于《玉楼梦》的作者有种种说法，其中以作者为南永鲁的说法根据较为充足。南永鲁为李朝肃宗时期名臣南九万（1629—1711）的五世孙，书香门第出身。

《玉楼梦》篇幅数倍于《九云梦》，是长达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有十多种版本，其中多为朝鲜国语本，也有一些是汉文本，加上了朝鲜语的虚词（或词尾）。异本虽多，但内容出入不大。从异本的众多来看，可以断定它拥有大量读者，可以说这是李朝时期小说中流传最广的文人小说之一。

《玉楼梦》主要写才、德、貌三全的男子杨昌曲先后娶五女为妻妾的故事。其主要情节如下：

中国明代时，南方玉莲峰下杨处士年过四十方得一子，名昌曲。昌曲为“星宿”下凡，才智过人，十六岁赴京应科举考试途中参加苏州刺史的竞诗宴，结识名妓江南红，并与之定情。杨昌曲赴京后，江南红为苏州刺史所逼，投入西湖自杀，为人所救，漂流到南方脱脱国山寺中栖身。

杨昌曲以为江南红已死，在成为翰林学士以后拒绝了朝中大臣黄阁老与卢尚书的提亲，娶江南红曾推荐的尹尚书之女尹小姐为妻。为此受卢尚书的诬陷，被流配于江州。

杨昌曲于江州结识官妓碧城仙，并与她定情，五个月后蒙赦还京，应天子之命娶黄阁老之女为第二夫人。后来，杨昌曲派人去接碧城仙，但未等碧城仙抵京，就奉命去南方抵御南蛮的入侵。

碧城仙入京到杨府之后，为杨昌曲第二夫人黄氏妒嫉，受黄诬陷与迫害，不得不回故乡江州散花庵存身。

此时杨昌曲正与蛮国作战，蛮国的元帅恰巧是学会了武术与道术的女扮男装的江南红。江南红逃入明阵与杨昌曲元帅团圆，并任军职。蛮国失去江南红后又挑动祝融国王与明军为敌。祝融王的公主一枝莲又因爱上了杨昌曲而说服其父王投降明朝，并跟随杨昌曲、江南红离开故国。之后，杨昌曲又奉命征服了红桃

国。杨昌曲率军凯旋后，被封为燕王，江南红亦因军功卓著被封为红鸾侯。

此时，朝廷中形成了清浊两党。浊党以奸臣卢均为首，他与擅长音乐的董弘相勾结，使皇帝耽于声色，不务朝政，并怂恿皇帝大搞封禅求长生一类的活动。杨昌曲上疏极谏，皇帝不仅不采纳，反把他流放至云南。江南红为保护丈夫，扮作贴身书僮跟随杨昌曲同赴云南。途中，和奸臣派来的刺客等斗争，挫败了奸臣的阴谋。

后来，北方匈奴入寇，敌军攻陷京城，王室避难他乡。奸臣卢均则投降胡人。皇帝此时方才悔悟，重新起用杨昌曲，打败匈奴。杨立下了汗马功劳，备受恩宠。此时，第二夫人黄氏陷害碧城仙的阴谋败露，受到惩罚之后，黄氏顿悟前非，回心转意。杨昌曲派人将碧城仙接回京城。从此，杨昌曲与尹、黄两夫人和江南红、碧城仙、一枝莲三妾享尽富贵荣华。

卢均虽已遭诛，余党韩应德等人仍不甘心。他们向天子进谗言，企图陷害杨昌曲，为天子察觉，遭到惩办。

杨昌曲功成隐退，解甲归田，与妻妾优游度日。其子长星、庆星、机星等，又以少年及第。在南蛮入侵、楚国告急之时，杨长星被任命为元帅，禀承父志，率军远征，大胜回朝。由皇帝做媒，娶楚国郡主楚玉为妻。回朝廷后，又以计除去另一奸臣董弘。

不久，北方匈奴又勾结蒙古、女真、吐蕃入侵天山以西至玉门关地区，天子御驾亲征，杨长星又为元帅，大破敌军。

至此，杨昌曲父子两代人都成建奇功的朝廷重臣。杨昌曲与妻妾白头偕老，在享尽了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之后，重归天界。

从以上情节不难看出，《玉楼梦》全书总的主题思想是赞美功臣、名将、才子。作品的主人公杨昌曲矢忠皇上，为封建国家建立了卫国御寇、除邪扶正的巨大功勋，受到皇帝的宠爱，位极人臣。他位高爵显，又使他享尽艳福，娶一批才貌双全的女子为

妻妾。作品通过杨昌曲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幸运儿的形象，即最完美的东方男子的典型。

作品的首尾指出，杨昌曲只不过是天上谪降的一个星宿（文昌星），他在凡间走了一遭，最终又复归天上。意思是把尘世一切祸福看成一场梦。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对尘世生活的否定，但就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实际思想倾向看来，全书极力渲染描绘和宣扬的正是人间欢乐和建功立业的意义，只在首尾几句中提到红尘苦海的思想。这寥寥数语对读者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至于那些关于红尘苦海的说法，只不过是为了给作品涂上一层宿命论的色彩，用以证明杨昌曲的来历非凡。在佛教盛行，神佛小说广泛流行的情况下，这也是作者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手法与表现方式。在开头作为引子，在最后作为与引子呼应的结局的写法，是当时不少小说所惯采用 的。中国的 《水浒传》也是这样的。《玉楼梦》中所贯穿的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佛教思想，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最主要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佛、道思想除去在首尾出现以外，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是作为一种战争打胜仗的手段——魔法、道术而出现的，在人物性格上没有起很大作用。主人公的忠君、卫国、孝顺父母及其温良恭谦让的美德，都属于儒家思想体系。杨昌曲的功成身退，过田园生活含有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但也是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的体现。过一段田园生活之后，还是回到朝廷作大官。总之，《玉楼梦》中儒、佛、道思想俱有，但其中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入世有为，而不是佛道的超尘出世。

虽然如此，《玉楼梦》表现的并不仅是一般的封建意识，它产生的时代使它带上了浓厚的封建末期的特色。十八、十九世纪市民阶层的兴起，使时调、歌辞等文学反映出了这一阶层的趣味，具体内容之一就是在爱情问题上冲破旧有的礼教框子拘束、追求自由爱情生活的倾向。《玉楼梦》中同样如此。作品中对于男欢女爱的大段描写和渲染，就是这种倾向的明显表现。虽然其中的当

事者是贵族或附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物，但它反映的却是市民阶层的趣味。这时，不论是社会上、经济上还是文学上，市民阶层都还没有达到足够强大和成熟的地步。文学中的市民趣味，还未能直接表现在对市民生活本身的描写上。在《玉楼梦》中，它是借对于贵族生活的描写来表现的。实际上，杨昌曲及其风流的儿子机星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很象是穿上了贵族衣裳的市民。

《玉楼梦》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文臣武将有杨昌曲、苏裕卿、尹阁老、雷天风、董超、马达、黄丞相、卢均；杨昌曲的妻妾有尹氏、黄氏、江南红、碧城仙、一枝莲；杨昌曲的儿子有长星、庆星、机星；婢女春月、莲玉，刺客大娘、泅水者，以及异国的王哪吒、祝融等等。从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活动、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上看，大体上可将作品的思想分为正反两个方面。这里先谈谈它积极的一面。

《玉楼梦》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它多次地写到了国家受南北异族或外敌的侵扰，被迫进行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情况。杨昌曲率大军御敌，多次战败敌军。江南红身在敌营，不忘祖国，回归本国军队之中，屡立奇功。雷天风将军七十高龄痛斥投降派，宁愿战死疆场也不苟全性命。此外，杨的部将董超、马达也是为国而拚死杀敌的骁将。作品通过卢均进谗媚上，败坏纲纪，最终完全卖国求荣的过程，揭露和谴责了当时的奸臣误国。

作品提倡忠诚耿直、对皇帝敢于直谏的精神，反对借阿谀奉承君王、危害朝廷的行为。卢均推荐善歌的董弘给皇帝，并怂恿皇帝大搞封禅求仙等活动，最后招致国家灾祸，就是作者对善于奉迎阿谀者的揭露。第五十回、第五十一回（《紫辰冬雷破奸党》、《辨忠逆天子颁纶》）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卢均余党韩应德等人，把冬天打雷说成是祥瑞，诬蔑杨昌曲提出皇帝要警惕冬雷、经常关心“生民困苦”及“励精图治”是“欺君”。韩应德的阴谋最终被皇弘识破，并受到惩罚。作品还通过杨昌曲第二夫人黄氏的阴谋败露、痛悔前非的经过，表现出了作者对道德低

下、品质卑劣的人是憎恶的。

《玉楼梦》中反面角色几乎都是上层人物，上述奸臣卢均、韩应德二人如此，仗权欺人的大臣黄阁老及陷害无辜者的黄氏母女二人也是如此。但是在作品涉及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当中，却极少出现反面角色。相反，作品对这些人物大力赞扬，这主要表现在对妓女的态度上。

作品中的主人公一男五女中，除杨昌曲以外，最着力表现的人物就是江南红了。她出身妓女，文武全才，热爱祖国，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巾帼英雄，功劳仅次于杨昌曲，取得了“红鸾侯”的爵位。这不但在现实中难以想象，即便在其他小说中，也是少有的。作者没有因为她在封建社会中地位卑下而对她有任何歧视，反而用大量的篇幅，以极其美妙动人的传奇式的情节突出表现了她的品德、才能、功勋和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一般世俗之见的一种大胆挑战。

作品中的另一主人公碧城仙也是妓女。她虽无武艺，但音乐修养甚高，志高行洁，人格高尚。她虽然已许身于杨昌曲，但不愿与之苟合。她在天子冤屈忠良时，能以乐歌讽谏他。她度量宽宏，在蒙冤受屈时，能冷静对待，对陷害她而最终悔悟的人能有所谅解。更可贵的是，面对强徒暴力胁迫，她敢于坚决反抗。

总之，作品中的妓女，在德才两方面，全都高出于黄氏这样的贵族小姐。作品的第六十一回中，作者通过一个有志气，不愿以色媚人，甘愿贫困的妓女冰娘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 妾虽不敏，甚耻颜色。妾本皇城青楼，世世国娼……娼妓虽贱，持心无异于士族妇女，娼妓之志操，即君子之道德，娼妓之歌舞，即君子之文章。（六十一回）

这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迥然不同于封建道学之士，也和玩弄妓女的两班贵族完全不同。作者的这种思想，形成了《玉楼梦》在思想上的一大重要特色。

作品中的另外两位社会下层人物，即以采莲为生的孙三娘与

黄氏派去刺杀碧城仙的刺客七十岁老娘。这两人，都是见义勇为、不顾自身安危的侠义人物。采莲人下水救出江南红，刺客老娘目光敏锐、是非分明，不愿受贵族小姐收买妄杀无辜，弄清黄氏的恶毒阴谋之后，还严惩了黄氏的帮凶。

作者对于因饥寒所迫起来暴动的人民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认为他们之所以流落为"盗"，是因为"上而父母冻馁，下而妻子离散"、"关系口腹"之故，而且指出"此系守令之过"，还写杨昌曲之子杨庆星太守"倾仓廪而赈恤"他们。作者虽然还未完全离开统治阶级的基本立场，但同咒骂和残酷镇压造反者相比，毕竟是开明的。

作品的思想具有上述积极的一面，它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思想倾向。

《玉楼梦》中最主要的消极思想是对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所持的欣赏和赞美态度。这种一夫多妻制是建立在封建的经济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丈夫是一家之主，而妻子则属于丈夫的私有财产。作品不但没有表现出主人公对妻妾的虐待、轻视的态度，和这些妇女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心理和苦恼，相反，却反复强调这些妻妾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寻求另一些美貌的妇女，标榜这是一夫多妻制家庭融洽和睦的表率。江南红推荐尹氏为杨昌曲的正妻，为丈夫考验另一小妾碧城仙对杨的忠贞态度，促进杨昌曲与一枝莲的结合以及尹夫人对江南红的关心等等，都是作者津津乐道的。

不仅仅对杨昌曲，即便是对杨昌曲的儿子机星之狎妓寻欢，作者也是以欣赏的笔调写出的。尤其是第三卷中，贵族与妓女的亲狎、交往和对她们的玩弄，被写成了风流韵事。作品通过对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渲染表现出了封建贵族以醇酒美女为乐的享乐主义和颓废情绪。

绝对和极端的忠君思想，逆来顺受和封建家长制下的绝对服从思想，也是作品中所出现的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例如当外

敌侵入京城，王室蒙尘，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之际，蒙冤受屈者为效忠国家组织武装奋起与外敌斗争，并去救驾时，首先是向皇帝请罪。请罪的原因竟然是未经皇帝的批准就组织武装。可以说达到了愚忠的程度。

又如碧城仙先遭黄氏恶毒诬陷，后又几乎遭到黄所派刺客的毒手，但在刺客老娘激于义愤要去惩罚黄氏时，她竟然这样对刺客老娘说："妻妾之分，如君臣之义，何可为其臣而害其君耶？此非有义理之事，老娘若固执，则妾之颈血先污娘剑！"自己宁愿受冤屈而死，也不愿让那迫害她、谋害她的主犯受到惩罚。这也是一种令人难解的愚忠。

《玉楼梦》中多次写到明朝与南北异民族的战争，这本无可厚非，但其中常流露出一种鄙视少数民族的思想，如说到北匈奴、蒙古、女真时，说他们"本性凶恶，聚散闪忽，即与禽兽一般"；说小国国王"眼目闻见，无异于井底之蛙"；把中国说成"上国"，说他们的国王见到明朝诏书以后"莫不悚凛"、"稽首请罪"等等。作为一部朝鲜文学作品，《玉楼梦》中的这些称颂中国明朝、鄙夷异民族的思想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应指出，这种思想来自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一贯宣传的大国思想。就朝鲜来讲，则有所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壬辰、丙于战争以后，朝鲜人民思明恶清的态度。

《玉楼梦》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的情节曲折复杂，场面也很大，它在这两方面都超过了《壬辰录》、《谢氏南征记》及与它同类的小说《九云梦》。全书洋洋洒洒四十多万言，在朝鲜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长篇巨著。光就一男五女这六个主人公而言，除大夫人尹氏出现的场面较少其经历也较平淡以外，其他五人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杨昌曲遇妓定情，奋战疆场，遭受流配，重逢故人，家庭团圆，与浊党斗争……江南红与杨的结识，被迫投水，湖中遇救，栖身异域，女扮男装，成为将军，沙场立功，遭受暗算，护卫亲人……；碧城仙的与杨邂逅，遭受陷害，

流落他乡，讽谏君王 …… 人人的经历几乎都是出人意料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几乎每个主人公的经历都可以单独成篇。主人公的这些情况，再加上朝廷内清党、浊党各种人物的活动，敌国各个将领的表现等等，在作品情节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更迭、交叉出现，使得作品必须有一个复杂庞大的结构才能与之相适应。《玉楼梦》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把这些人物及其活动一一安放在一个整体建筑的适当部位中，眉目清楚、穿插自然，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才能。

《玉楼梦》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比较成功。和一些中古时期的小说不同，《玉楼梦》中的一些人物性格具有一定的个性，其性格也不是象戴上脸谱那样一成不变。同为杨昌曲之妻，黄氏端庄，尹氏好妒，个性迥异。同为妓女出身的妾，碧城仙的柔弱、纤细、谦卑，而江南红则坚决、果敢、聪慧。同为战场上的巾帼英雄，一枝莲和江南红也不尽相同。性格的发展变化明显地表现在黄家父、母、子、女身上。他们由邪恶逐渐悔悟改变，成了比较正派的人。另外，江南红由一个娉婷的妓女变为勇敢善战，"多赳赳之风，无柔顺之色"（第二十二回）的武将，也明显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

作品对人物心理也有所刻画。这方面写得最好的是第二十二回《杨都督携酒听鹧鸪，红元帅望气送狐裘》中的一段：杨昌曲与江南红夫妇两人彼此关心对方的健康相互体贴。江劝杨勿多饮酒，杨念江体弱不让她上阵，二人彼此爱护，却引起一些不愉快与烦恼。用作者的话来概括是"情极则有蔽，亲深则易怒"，"此则夫妇之间恳切逼尽之情"，作品写这对夫妇的心理活动是很真实、很合情理的。

当然，《玉楼梦》在人物描写上也有它的缺陷，这就是过分的、不近情理的、接近怪诞的夸张。如写江南红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女子竟成了无所不能百战百胜的将军。她能布各种阵势，有神机妙算的本领。善射，一下子连发七箭，射下了展翅飞翔在天

空的七只海燕，使善射的蒙古王也大吃一惊。她武艺高强，精通剑术，“许多列国猛将勇兵”都不能捕捉，“投枪不得刺，放火而不能犯”，“如风如雷，莫知其往来”的一只飞虎，被她单独一人，轻而易举就杀死了。按照全书对江南红才能的叙述看来，她一身所具有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武艺、本领超过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关、张四人才能的总和！杨昌曲之子长星，十三岁就文武全才，当上了元帅，率领大军打败了入侵之敌，也是难以想象的。

《玉楼梦》的诗歌也多为汉文，但其中也有以朝鲜国语作的时调和歌辞。即便在“汉文悬吐”①的版本中，这些时调歌辞也仍保持原有的朝鲜国语。如第四十九回铁贵妃所唱的《长城曲》就是以四音节为主的歌辞。六十二回中雪梅与冰娘两妓所唱的就是时调。这就使得这部以中国为舞台的朝鲜小说，带有了不少朝鲜乡土气息和平民风味。

《玉楼梦》既继承了金万重两部长篇小说的影响，又把李朝后半期盛行的各种小说内容包括了进去。从主题、题材、情节与人物上看，《玉楼梦》明显是师承《九云梦》，甚至可说是它的摹拟之作。《谢氏南征记》中的正派女子受嫉妒与迫害，忠臣受奸臣排挤的情节事件与扬善戒恶的思想，也被吸收进来。此外，这一时期还广泛流行看爱情奇缘、战地英雄、神魔鬼怪、家庭伦理、忠奸之争等小说，这些内容，在《玉楼梦》中全都具备。它既证实和体现了金万重两部小说的巨大影响，也综合地反映出李朝后半期各类小说的内容，成了这类作品的集大成之作。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此时期朝鲜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种种情形。

① 汉文悬吐：汉文中夹以朝鲜语词尾，以便朝鲜读者阅读和理解的一种表达方法。

第二节　爱情小说《彩凤感别曲》及其他

李朝后半期出现了一批爱情小说，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彩凤感别曲》。

《彩凤感别曲》以国语写成，作者不明，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向封建黑暗势力作斗争，最后结为幸福夫妇的故事。

平壤城外金进士的独生女彩凤在后花园游玩时结识了前宣川府使之子张弼成，两人相爱定情。张弼成派媒婆找彩凤的母亲李氏夫人求婚。由于彩凤的坚持，李氏同意将她许配与张弼成。

此时，彩凤父亲金进士已带着大批金钱去京城，希望买到一个官职，并为彩凤选择佳偶。金进士通过中间人金阳柱，从权势人物许判书那里买到了果川县监的官职，同时还答应把彩凤许配给许判书为妾。

金进士返回平壤后，不顾李氏和彩凤的反对，变卖了家产，把她们母女二人带往京城。在途中遭劫，彩凤趁机逃回平壤，金进士被洗劫一空，带着李氏进京。许判书见金进士未能将彩凤送来，一怒之下，把金进士投入监牢，并威胁他：要么将彩凤找来，要么以五千两银子赎身，否则，就休想出狱。

李氏无奈，只得返回平壤设法筹款，却意外地在彩凤侍婢翠香家中见到了彩凤。李氏希望彩凤去京城当许判书的妾以赎出父亲。彩凤宁愿卖身为妓，将卖身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去京城赎父亲出狱。

彩凤沦为妓之后，录出她写给张弼成的汉文诗句，表示愿许身能解诗句者，众人皆莫能解。张弼成闻讯前往，二人终于重逢。

但彩凤身为妓女，不能久与张弼成同居，于是便投身于平壤监司清官李辅国门下当秘书。张弼成得知此事以后，也到李辅国门下为吏房。半年以后，李辅国知道了彩凤二人的身世，惩办了

许判书，为金进士申了冤。彩凤与张弼成终于结成了百年之好。

《彩凤感别曲》歌颂了彩凤和张弼成两人为摆脱封建势力束缚、争取婚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其中，更着力地歌颂了彩凤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这里，彩凤对爱情的态度已不仅限于封建社会中的青年对礼教约束的反感了，它已带上了封建末期市民阶层蔑视封建传统观念和道德的性质。封建社会中讲究“孝道”，彩凤爱父母，但是她决不盲从。她不愿牺牲自己的爱情充当父亲升官发财的工具。张弼成家境不富裕，就连张母也顾虑：“贫富悬殊，（彩凤）能和我家儿子结婚吗？”但彩凤却丝毫不嫌张家贫寒。她并不嫌贫爱富，宁愿把自己的卖身钱贴给张弼成。她坚定勇敢，敢于在乱中只身逃走，摆脱一心当官的父亲。她机智聪明，为了寻找和心上人重新见面的机会，巧妙地使用了解诗的方法。从她开始说服母亲李氏同意将她许配张弼成时起，她所做的种种努力，直到她以一片深情写成长诗《秋风感别曲》打动李辅国，都表现了她思想纯洁、感情真挚、意志坚定、斗争果敢、机智灵活。正是凭着她的这些才能和努力，她才赢得了胜利。作品所热情歌颂的正是这一点。

作品也描写了张弼成对彩凤的一往情深。张弼成和彩凤交往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彩凤随父上京，中途逃走、寄居翠香家，所有这些，他都不知情。彩凤的突然失踪在他心中引起了某种感慨和埋怨，但他并未把彩凤忘却。后来，在彩凤当了妓女与他重逢的时候，他并不嫌弃她，向她表示一定要娶她为妻。最能表现张弼成真挚感情的，是他不顾自己的两班身份，宁愿屈居人下，当李辅国的吏房，争取和彩凤见面的机会。张弼成为爱情所经历的磨难和付出的代价虽不如彩凤那么多，但在男尊女卑盛行的封建社会中，张弼成能做到上述的几点，应该说是难得的了。张弼成没有辜负彩凤对他的一片真情。

作品中暴露出了十八、十九世纪李朝社会和官场上的一些黑

暗、丑恶现象。它们集中地表现在金进士、许判书和金阳柱身上。

金进士官迷心窍，不仅用钱财去买得一官半职，而且竟不惜拿独生女的一生幸福当进身价。他嫌贫爱富，把彩凤的意中人有为青年张弼成骂为乞丐，拆散他们的美满婚姻，这种人虽然后来财物被劫女儿失踪、被捕入狱，但是，引不起读者的同情。

另外两个反面人物是许判书与金阳柱。前者是李朝贪官污吏的典型。他窃据高位，公然接受贿赂，以卖官鬻爵为能事。他利用金进士急切求官的心理，想靠威胁利诱霸占彩凤，未达目的就翻脸不认人，把金进士关入牢房。在许判书身上集中了贪婪、残暴、虚伪、腐败等恶劣品质。

金阳柱身份不如许判书，但他们是一丘之貉。作者说他是个"阿谀小人"，凭着他钻营和夤缘上司的本领，他从许判书那里搞到了杨州牧使的官职。又借这个官职及他与许判书的关系，成了"买官卖职中的头号中间人"。在许判书向金进士诈骗钱财的过程中，他是同谋。许判书需要金阳柱这样的奸猾的"阿谀小人"充当他的爪牙，而金阳柱也借要许判书这样的权贵作为靠山。金阳柱许判书，奴才主子狼狈为奸的关系和丑恶嘴脸，是行将崩溃的李朝官场的写照。作品对他们二人落墨不多，但是他们的嘴脸已跃然纸上了。作品最后给了他们应得的下场：许判书灭三族，金阳柱处以绞刑。这种下场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人民的意志和希望。因为在那种社会中，许、金这样的人物更大的可能性是逍遥法外，而得不到应有的报应。

作品中所触及到的其他人物，也一一代表社会现实中的各个侧面。见钱眼开、靠着剥削妓女养肥自己的鸨母，同情女儿而又不敢反抗丈夫的性格软弱的李氏夫人，自始至终尽力帮助彩凤的善良的婢女翠香等人物，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彩凤的悲喜剧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

作者还摆脱不了中古小说的"大团圆"的公式，它构思并设

置一个能让彩凤、张弼成逢凶化吉获得幸福的力量。在作者看来，这种力量又只能来自上层人物，于是就出现了李辅国这样的清官。他反对买官卖职，他清廉正直，将彩凤从妓院赎出，爱如己出。他不但对彩凤与张弼成私定终身不指责，反而十分赞赏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大力成全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他还上书朝廷，惩办了许判书金阳柱一类的奸官佞人，救出含冤受屈的金进士。作品中的李辅国，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既是清官廉吏，又是开明人士，也是通情达理的长者。

虽说在黑暗的李朝官场中，不可能没有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作品通过对李辅国的描写，多少美化了李朝末期的官场。当然这也是当时人民要求政治清明的愿望的一种反映。

《彩凤感别曲》是一部充分反映李朝社会现实的作品。它既不象多数作品那样把舞台设置在中国，把时代背景设置在几百年以前，也不曾使用神怪荒诞、现实中不可能有的"巧遇"之类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和展开故事情节，也没有令人无法置信的离奇的夸张。整个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非常可信。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卖官鬻爵、中途遇盗、卖身为妓……等事件及贪官污吏、阿谀小人、深情女子、笃实书生、爱财鸨母、愚蠢官迷等各色人物，都是李朝社会中常见的。其中风土习俗、人物对话，也都是带有浓厚的朝鲜乡土气息。

同《春香传》相比，《彩凤感别曲》有它更加高明的地方。除上述的反映现实比《春香传》更深刻和真实以外，就主人公的思想境界来看，彩凤也比春香更高一些。彩凤所爱的不过是家境不如自己、地位不高于自己的清贫书生张弼成。此外，春香是在顺从母命的情况下追求爱情自由并与梦龙结成夫妇的，而彩凤则是面对满脑袋封建意识的父亲的阻挠，以勇敢的反抗、机智的脱逃，甚至作出牺牲来争取和弼成结合的。

另外，在对贪官污吏罪行的揭露，以及对这类人物性格的刻

画上，《彩凤感别曲》也比《春香传》要具体、现实一些。许判书和金阳柱的不法行为，就其反映的社会问题来说，也是相当深刻的。

《春香传》中解除主人公苦难是依靠主人公当上大官，《彩凤感别曲》则是由于遇到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春香传》的结局是夫妇同享荣华富贵，《彩凤感别曲》的结局则只是一对情人的幸福结合。

两部作品的两种处理手法说明：《彩凤感别曲》具有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它是李朝后半期文人小说中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在同时期的小说中，《彩凤感别曲》的篇幅虽不算长，但是其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作品的结构不复杂，但紧凑；一些情节安排得合情合理，且不使人觉得平淡无味。

例如许判书本来只要金进士用钱来换取官位，别无他求。但金进士因看到许判书的书僮相貌秀美，联想到自己的女儿，自言自语起来："这孩子长得倒和我那孩子一般，若是做我女婿该多好！"从而使许判书知道了金进士有个美貌的女儿，起了邪念。这一情节是导致彩凤的苦难的关键，但它却出现得这样自然。又如李辅国解救彩凤，也只是因为在彩凤忧愁中昏昏入睡时发现了她所写的《秋风感别曲》，从而知道了她的心思。这一细节形成了彩凤、弼成由悲苦踏上幸福之途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出现，也是那样平常自然，毫无牵强之感。

作品对人物心理描写也是很突出的。例如彩凤听说，如果不给许判书五千两银子，或她不去给许当妾，父亲就不能出狱时，作品这样写道：

> 彩凤默默独坐，前思后想："可怜的父母双亲已陷入虎口，家产荡尽，一无所有。想想自己，宁死也不能改变初衷，到底如何是好？我如去京城，那就成了张郎的罪人，再说，也仍然弄不到钱。我如不去京城，父母的患难怎能消

除？唉！倒不如一死了之！但一死，我倒是白玉无暇了，可父母也就从此陷入绝境！真难啊！死也不好，活也活不成，伤心啊！天地广阔无垠，却容纳不下我这个可怜的薄命女子一身！”

一个陷于困境的女子的矛盾心情跃然纸上，真实动人。这一段生动的心理描写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一段文字铺垫，这位心地纯洁感情专一的少女走上卖身为娼的道路，就不可理解了。

此外，彩凤流落烟花后，和别后杳无音信的张弼成骤然见面时，两人的矛盾心理和默默相对无言的场面，以及彩凤作《感别曲》时的无限惆怅忧愁的感情，都描写得十分细致入微。

时令已是深秋，南窗外九月望日的月光明朗皎洁，空中孤雁飞翔，如失伴侣，后园松林之中，杜鹃啼鸣，一声声“不如归”，更显凄凉。此时此景，别无心思之人尚不免陡生感伤之情，松伊（彩凤）独守空房，能不落泪断肠？她强忍心酸，力图摆脱愁思，旁倚几案，闭目打盹。忽地戛然一声雁鸣，将她惊醒。睁眼望去，南窗上一轮明月，照满窗帘，萧萧落叶声，倍增人愁。暂时忘却的相思又复从胸中涌起，泪珠不禁滚滚滴下。

这一段情景交融的描绘，为她作《秋风感别曲》安排好了一个背景，为作曲子烘托出了一个相应的气氛。

《彩凤感别曲》的写法和语言比同时期的小说都大有进步。它虽分章回，但不加什么“却说”、“且听下回分解”。尤其是全书的开头，人物自然出现，并没有陈旧的套语，它不大使用旁观者的叙述法，而是具体描绘，用人物自己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和事件的进程。

全书文笔简炼浅显，不用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无关的汉文典故。作品尽量避免借助汉诗文的辞藻去形容事物和人，而是选用了民间常用的比较纯粹通俗的朝鲜语。全书不用过度的夸张，而是以朴素的文句，娓娓动人的叙述打动人们的心，使读者和作

品中的人物共悲喜。

《彩凤感别曲》的主要时代局限性在于它仍是因袭了中古小说的传统作法，以“大团圆”结尾。这是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旧框框，李朝时期的小说也有类似情况，即他们称之为“苦尽甘来”的结局。《彩凤感别曲》主题很积极，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因为它反映的时代的特点更为深刻鲜明。而然，从作品产生时的李朝社会和官场的黑暗腐朽的实情际形看来，一个象彩凤这样的妓女，是很难得到李辅国那样高级官吏的同情与帮助，和情人重逢团圆的。

再以作品的主题歌《秋风感别曲》而言，据传它本是由一个遭受遗弃的女子——平壤妓女妍妍红为思念情郎而作，是一篇哀伤的作品，带有悲剧性。不管是《彩凤感别曲》借用了它，还是妍妍红由小说中借来抒发自己心中的积郁，都可以看出它的悲剧性。小说的作者摆脱不掉当时小说的套式，给它以喜剧性的结局。说明作者还不敢正视现实，从而或多或少地对统治阶级起了一点美化和粉饰的作用。

不论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彩凤感别曲》都完满地体现出中古小说向近代小说过渡的情形，这使它比其他爱情小说高出一筹，在朝鲜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爱情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以朝鲜为背景的。它们不但比其他小说更多地反映出了朝鲜的社会现实，而且正如时调、歌辞等国语文学作品一样，这种以爱情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很能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表现出这个新兴阶层对于封建末期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从而也为当今读者提供了一些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各阶层动态的比较实真、生动的情况。

除《彩凤感别曲》以外，还有不少爱情小说也有一些独到之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玉丹春》、《淑英娘子传》、《青年悔心曲》等。

《玉丹春》的情节是：京城的金真喜与李血龙两位公子有通家之好，彼此相约先作官者一定不忘对方，并加以提携和荐举。两人的父亲去世以后，金真喜中举任平壤监司，李血龙则落第，生活贫困艰难。他想起昔日与金真喜的誓言，就去平壤找他，未能得见，不得不在平壤靠乞讨度日。一日金真喜于练光亭设宴作乐，李血龙闻知，前去找他。金真喜不但不履行前约，反而声色俱厉命令船夫把金血龙投入大同江淹死。

正在宴席上伺候金真喜的平壤名妓玉丹春见此情景，对李血龙深表同情，悄悄离开宴席买通船夫，嘱咐他不要淹死血龙，将他藏在沙滩上。玉丹春夜间乘船潜至沙滩，将李血龙接回，热情照顾他衣食，并与他结下百年之好。

李血龙在玉丹春劝告下回京城应试，见母亲与妻子温衣饱食，才知是玉丹春所为，心中倍加感激。

血龙中举后任平安道微服察访的"暗行御史"。他化装为乞丐到平壤见玉丹春，以试其心。玉丹春毫不以血龙落魄为念，依旧热情款待。血龙听说平壤监司金真喜又于练光亭设宴寻欢作乐，就以乞人打扮前去找金真喜，并严厉责问金为何不认旧友。金大怒，命逮捕血龙并将先前承命淹死血龙的船夫找来严刑拷问。得之实情之后，金命令将玉丹春和血龙一起淹死。此时血龙显出御使的身份，惩办了金真喜。李血龙与玉丹春从此在一起安享幸福。

和一般的世俗之见相反，《玉丹春》把两班贵族的玩物妓女，塑造成作品中最值得敬佩的人物。落难公子李血龙靠她的救援得以死里逃生，以至后来取得功名，作了御史。相形之下，官僚金真喜的背友、害友的行为显得那么龌龊可耻；金真喜的罪行虽非玉丹春直接揭露的，但正是由于她憎恶金人格卑鄙，救了李血龙，才使金的罪行终于暴露于世，受到惩处。作品歌颂了一个妓女，把她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写得高于腐败的官僚贵族，并让她亲手救一个两班公子。在作者笔下，妓女高尚，而某些官僚则是

势力小人；妓女是救援者，而儒生则成了蒙恩之人。这种敢于把世俗之见颠倒过来，向封建阶级偏见挑战的思想，是作品在思想上最可贵的一点！

作品中的玉丹春机智、不畏强暴，敢于从虎口中救出无辜；她不嫌李血龙贫穷，即便在她眼见李血龙名落孙山落魄归来时，也丝毫不嫌弃和埋怨。在她和李血龙都面临死亡的时刻，她不但对李血龙无一句怨言，还甘愿替李血龙去死。《玉丹春》的作者所创造的这个机智、勇敢、高尚、贤淑的妇女形象，成了一个人格完美的理想妇女的典型，在玉丹春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民间妇女的许多美德。

作品的缺点是仍带有男尊女卑、男性为中心的明显痕迹。李血龙尽管被玉丹春搭救并得到了她的深挚、忠实、纯洁无暇的爱，连他的家庭也得到了玉丹春的周济。但他中举以后，竟然扮成乞丐去"考验"玉丹春，就未免显得薄情寡义。这正是上述男性中心思想的一种表现。

《玉丹春》的情节与《春香传》有类似之处，可以看出模仿的痕迹。但《玉丹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玉丹春的形象比春香要高大些。在不以贫富贵贱取人方面，玉丹春更彻底些。另外，她对意中人一生命运的转折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春香所欠缺的。

《玉丹春》和《春香传》一样，在开头以陈词滥调对王朝的"国泰民安"进行了歌功颂德，结尾让主人公夫妇富贵荣华。这是一般中古小说难以避免的通病。

《玉丹春》在写法上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艺术手法简单，缺乏生动的描绘，艺术水平不如《春香传》。

《青年悔心曲》也是一本有时代意义的爱情小说。李朝仁祖时期有一青年名叫金真性，在松都本和一位心地善良、不贪财的妓女弄月相好，并和她订了婚。但后来，金真性为一个巧言令色的贪财妓女琼贝所惑，被骗走了十五万两银子。他一急之下，病

倒客店里。弄月得知以后把他接回家中，精心照料，并在他痊愈后周济他路费，劝他回故乡以慰父母。真性归乡途中经过京城，入场应试，竟得中为官。他荣归故乡后，派人去松都接弄月，却发现弄月因松都官员李春华的逼嫁而失踪。真性一怒之下向朝廷上疏弹劾李春华，却反被李所诬，被流配于全罗道楸子岛。

此时，李春华因参与金自点谋反之事败露而伏诛。朝廷于是重新起用真性，任以弘文馆校理之官职。避居于云水庵中的弄月得知此事后，上京找到了真性，两人团圆，白头偕老。

《青年悔心曲》是反映朝鲜李朝英正时期（十八世纪）社会的一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它通过弄月与琼贝两个思想性格完全不同的妇女，反映出李朝社会中的一些人情世态。它又通过对松都官员李春华欺压百姓，坑害忠良罪行的揭露，表现出当时官场和朝廷中的黑暗现象。

《青年悔心曲》中有几处出现了一些与情节进展密切配合的歌辞，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作品中涉及到一个历史的真实事件，即金自点谋反问题，这种情况在讲史小说以外的小说作品中，还是少见的。

此外，《芙蓉相思曲》也是写书生和妓女恋爱，妓女为好色的贪官所逼而受难，后来书生当了大官，惩办了贪官，然后是大团圆结局。也反映了当时官场的一些腐败现象。

此外有以朝鲜为背景的爱情小说《淑英娘子传》，写一对恩爱夫妻，丈夫外出，侍婢因嫉妒而趁机陷害女主人，逼她自杀。后来丈夫回家弄清了真象，将妻子救活，惩办了侍婢。作品内容平淡，又穿插了一些仙道的神力情节，既不反映出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也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

此外，以朝鲜为背景的爱情小说还有《柳绿传》、《李进士传》、《英英传》等等。前二者是和妓女恋爱的故事，后者写的则是宫女与宫外青年恋爱的故事。

以中国为背景的爱情小说有《权龙仙传》、《白鹤扇传》、

《河陈两门录》、《红白花》、《淑香传》等等。《权龙仙传》写男主人公敢于向公主拒婚，坚持与自己的心上人相爱并终成眷属。作品表现出不慕权势，追求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是一部较好的作品。《河陈两门录》也有类似的内容，同时还表现出了女主人公河玉珠坚强的个性。也是一部较好的作品。

以中国为背景的爱情小说，大多数是表现一夫多妻的，其中往往还加进去一些道仙（如《淑香传》）和战争一类的情节（如《河陈两门录》）。

第三节 其他小说

除爱情小说以外，此时期还产生了不少其他小说，如军功小说、志怪小说、家庭伦理小说、讽刺小说等。

军功小说在朝鲜又有“英雄小说”、“武勋谈”、“军谈小说”之称，这类小说一般都有赴疆场击退敌人、为国立功的情节。背景通常是中国，大都以神奇的道术和仙法取胜，内容常有男女恋爱、朝廷忠奸斗争及个人的曲折经历、由逆境到顺境等等。也有女子为大将，连挫敌军的离奇故事。小说最后总以胜利、光荣和个人幸福为结局。

军功小说的产生与盛行不外三点原因：一，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上叶不到半个世纪内相继发生两次重大战争，即壬辰反倭和丙子反清战争，在朝野上下莫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留下深刻的印象。战争中的故事和它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感情波澜，需要一种形式加以表现。二，朝鲜《壬辰录》一类小说，尤其是《九云梦》中杨少游建立军功故事的影响。三，中国《三国演义》、《西周演义》、《封神榜》一类战争小说大量传入朝鲜。

军功小说中，以朝鲜为背景的有《申遗腹传》、《李泰景传》等；以中国为背景的有《刘忠烈传》、《赵雄传》、《张国振传》、《洪桂月传》、《郑秀贞传》等等。

《申遗腹传》写主人公申遗腹幼年少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及以后为国立功的故事。申遗腹是孤儿，贫穷无依，被人收养，备受虐待。后来，他得到了养父的第三个女儿琼贝的同情，并与她结婚，迁出另居，乞讨为生。申遗腹后在某僧人大师处学得诸子百家的理论及兵法韬略等，应试中举，为府吏，又升为兵曹判书。在中国明朝奸臣当道，并受胡人侵略，国势危急之际，他接受朝鲜国王派遣，以大元帅身分率大军赴明，与明军联合大破胡兵，威震中原，被明朝封为魏国公，荣归朝鲜。

作品中表现了朝鲜对明朝的友好感情。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朝鲜与汉文化、政治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壬辰战争中明朝给予朝鲜的援助，在明朝受满人进攻时，朝鲜朝野上下莫不同情明朝。在明朝的请求下，李朝孝宗王曾派遣姜弘立、金景瑞两元帅出征，攻打清军。明朝覆灭以后，朝鲜对清朝的统治表面上服从，心中仍怀念明朝。这种思想感情，在纪行歌辞《燕行歌》中有很充分的流露。《申遗腹传》的作者，实际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出朝鲜在丙子战争时期未能实现的理想。

此外，《李泰景传》写朝鲜人李泰景当上了朝鲜、明朝、胡国三国的大元帅的故事，和《申遗腹传》的思想倾向是相似。

《刘忠烈传》则是完全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说的是中国明朝名臣之子刘忠烈的英雄业绩。刘忠烈七岁时，父刘鐔遭奸臣郑汉潭之谗被流配，其母张氏也因逃避奸臣及水贼的祸害流落他乡。刘忠烈被贼人投入水中，但幸免于难，他得到父亲的故友姜丞相的好感，并被招为婿。后来，姜丞相也因为刘鐔的事得罪朝廷，被流配，妻女也避居他乡。刘忠烈则入山向僧人学道习武。

奸臣郑汉潭与入侵的胡国勾结，倒戈攻入皇城。天子避难于金山城。此时刘忠烈按老师指示下山，凭借一身道术与武艺，单枪匹马救出天子，复入皇城救出太后、皇后及太子，又单枪匹马去胡国受降。他在途中将父亲救出。以后他又远征南蛮，救出丈人并找到了母亲、丈母和妻子。刘忠烈功高盖世，被封为大司马

兼大将军及丞相。

忠奸之争、忠臣遭难、外敌入侵、权奸误国、忠臣英勇杀敌救国，直至最后取得胜利。这些战功是凭借道术的作用——这就是《刘忠烈传》一类以中国为背景的军功小说通常的情节与内容。从思想容上看，这类作品中的忠奸之争，都是在儒家忠君思想的框子内得到解决的。作品中的卫国与投敌的矛盾，多少也反映出人民的爱国和仇恨侵略者的思想，有一定积极意义。至于佛、道之类的道术，只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神化英雄人物的手法，为的是迎合当时读者趣味。

军功小说中有以女子为英雄人物的，如《洪桂月传》、《郑秀贞传》。它们也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内容无非是女扮男装，去深山古刹，向僧人道士学得一身法术武艺，文武全才，状元及第，外敌入侵时当了元帅，大败敌军，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立功荣升高官等等。时代一般是明代，外敌则多是胡人、北匈奴、西蕃、南蛮之类。

以女子为主人公的军功小说，虽然表现出作者想借神奇的情节与人物吸引读者的意图，但它也多少表现出长期遭受封建制度与习俗禁锢的妇女，其社会作用和地位开始受到注意。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走向崩溃，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中妇女的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变。军功小说中女子英雄的出现，就是这种情况在文学中的一种朦胧、模糊、曲折的反映。

就作品所包含的非现实的、幻想的和神奇的因素来说，与军功小说类似点较多的，是传奇小说。如《崔孤云传》、《金圆传》、《金铃传》等。

《崔孤云传》又名《崔致远传》，有朝鲜国语本与汉文本两种，是有关新罗大诗人崔致远的一部传奇性作品。其中内容除崔致远来中国写过声讨黄巢的檄文及回新罗后隐居于伽倻山以外，都是虚构的。情节相当神奇，富于趣味性。例如，关于他儿时的事情，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崔致远母亲曾被金猪抓去过，崔致远出生以后，父亲怀疑他是金猪之子，把他扔在路旁。白天牛马经过时皆避开他，夜晚仙女下凡来喂他奶水。当他被抛在荷花塘中时，荷花把他托住，一对白鸟从天上飞下，用翅膀遮护他，养活他。几个月后，他在沙上行足，足迹都是文字模样。他母亲得知此事以后，派人去把他接回来，孩子却认为，既然父亲认为自己是金猪之子，有何面目见爹娘。父亲听到此话很惭愧，就建造了寻儿台，招他回来。

又如写崔致远的才学：中国皇帝闻崔致远的诗才，就命令将一鸡蛋密封于石匣之中，派使臣送往新罗，要新罗国王找人作诗，写出匣内藏的是什么。新罗一时无人能写。只有崔致远作成一首诗："团团石中物，半白半黄金。夜夜知时鸣，含情未吐音。"中国皇帝见此诗后，再打开石匣一看，鸡蛋已孵化出了小鸡，正符合诗中写的事物。中国皇帝大为惊叹。他在诗会上所做的诗极好，连天上的青衣童子也下凡，将诗取走，带到天上。

作品中还提到中国才子、诗人与崔致远比写诗，都不如他。还说中国大臣因嫉妒他的诗才，诬告他等等，表现出《崔孤云传》的作者是以这位新罗大诗人而自豪的。

《崔孤云传》作者以他的作品表明，他反对本国封建统治阶级人物中存在的事大思想。他以这种神奇的故事，表现了民族独立精神，是当时李朝进步文学民族意识成长的一种表现。

《金圆传》是以中国为背景的传奇。主人公金圆武艺超群，被任命为元帅，奉皇帝之命与副元帅去洞窟中搭救被九头怪兽抢走的公主。他冒险入窟救出公主，却被嫉妒的、存心不良的副元帅封住洞口，不得出来。他在洞窟徘徊时遇到被怪兽囚禁的龙太子。他解救了龙王太子，二人赴龙宫，他成了龙王的女婿。之后，他回国见君王，报告了实情。副元帅罪行暴露被诛。金圆享尽富贵，后与龙女化为仙人升天而去。

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在饶有兴味的神奇情节发展过程中，谴责了嫉才贪功、损人利己的卑劣行径，歌颂了英勇无畏、舍己

救人的高尚精神，是一篇思想健康的传奇。

此后出现的《金铃传》则以一个神妙莫测的、金子制成的小铃为故事主人公。这个小小的金铃来历不凡，而且富于正义感。它能为人上树摘果，能温暖人的胸膛，能帮助受义母虐待的海龙，为他暖房，做事。最后它化为女子从洞中救出公主，并在反对北匈奴侵略的战斗中立大功，与海龙结为幸福夫妇。《金铃传》结构虽较为复杂，但思想性稍逊于《金圆传》，部分情节与《金圆传》类似，似为模仿之作。

此外，《王郎返魂传》、《唐太宗传》及以波斯为背景的《金牛太子传》都是以佛教思想为内容的作品。

家庭伦理问题也是李朝后半期小说所涉及的主题之一。除去前面叙述过的以传说为基础的说唱体小说《沈清传》、《兴夫传》等以外，还有一些个人创作的小说，即《彰善感义录》、《鱼龙传》、《张韩孝记》等。

《彰善感义录》作者为金道洙（一说是赵圣期），有汉文本与朝鲜国语本，写的是一夫多妻制在对待子女问题上产生的矛盾。大夫人在丈夫死后，与亲生子合谋，虐待、坑害二房及三房所生的子女，而这些子女都对嫡母竭尽孝道，对兄长友爱尊敬。历尽磨难之后，受虐待者终于走入坦途，立功升官，而干尽坏事的嫡母与其亲生子也终于悔悟，一家和睦，安享富贵。

正如《彰善感义录》的书名所显示的，它是一部劝善戒恶的小说。它虽然暴露了大官僚家庭中一些人的丑恶灵魂，但是对他们没进行应有惩罚。它还提倡对恶人要屈从、忍让和克尽"孝悌"之道。这是一部用儒家思想进行伦理说教的小说，虽然批判和谴责了恶行，但对待恶人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非不清、调和折衷的，显然想遮掩贵族家丑和补救其致命缺陷。其思想性较差，但从艺术上看，它情节复杂，事件逐步展开，有条不紊，表现手法比较细致，有一定艺术水平。

还有表现继母虐待丈夫前妻所生子女的小说，如《鱼龙传》

表现妻妾之争的，如《梁风云传》、《郑乙善传》。这些作品也涉及继母问题的内容。

表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思想的小说有《报心录》、《金鹤公传》。前者侧重报恩，后者主要写复仇。后者以向一群图谋杀主夺财的奴仆报仇为题材，实际上宣传了奴仆必须对主子尽忠、不得抗拒的思想。

表现夫妇情义的作品有《玉娘子传》和《张韩节孝记》。《玉娘子传》写一位女子丈夫蒙冤下狱后，她冒千辛万苦与丈夫会面，愿意代丈夫受刑的故事。《张韩节孝记》写的则是丈夫被害，妻子冒死为丈夫复仇的故事。

以上以家庭伦理问题为主题的小说，宣扬的都是儒家的道德信条。小说的舞台，除《郑乙善传》以外，背景都是中国，时代则以宋、明为多。

随着李朝封建制度走向没落，两班逐渐变得徒有其名，只有空架子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中也出现了讽刺没落的两班、腐朽的官场，和以攀附于没落阶级的平民为对象的讽刺小说，《李春风传》就是其中之一。

《李春风传》写的是李朝肃宗时代京城的一个两班李春风的故事。他生活放荡，寻花问柳，挥霍无度，结果负债累累。他妻子金氏拼命干活挣钱，他却把这些血汗钱都送给了平壤妓女秋月，弄得身无分文，走投无路，只得去秋月家当佣工。妻子金氏得知此事以后，女扮男装来到平壤，找到秋月家中，痛斥了妓女的骗财行为，索回了被她骗去的全部金银，帮助丈夫摆脱了困境。

《李春风传》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内容却较丰富。首先，它通过主人公李春风这个形象，描绘了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溃，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逐渐成长的情况下，某些两班已濒临穷途末路的状况。象春风这样的两班，竟靠出卖劳力的妻子来解除困境。作品还表现了李朝晚期官场卖官鬻爵的腐败风气。官职的商品化

说明了官僚的尊严已消失在金银的威力之下。

作品中所出现的妓女，已不是《玉楼梦》、《玉丹春》中出现的那类风流多情、情感真挚的女子，而是善于要手腕骗钱，见钱眼开的势利眼了。在商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作品中妓女之所以能玩弄两班于股掌之上，也说明她们已不是一千多年前郑袭明在《怜妓诗》中描写的那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可怜虫了。随着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她们也和平民阶层中的某些人一样，境遇有了若干变化。

妇女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在李春风的妻子金氏的身上。这位妇女不靠丈夫养活，而是用自已劳动所得一再为丈夫解忧排难，并且化装成平壤监司的裨将，维护了丈夫的体面。

《李春风传》富有喜剧性，但很少故弄噱头或不合理的夸张，却能引人发笑。其喜剧性的讽刺手法是比较高明的。

作为取材于李朝末叶社会现实的作品，它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阶层人物的思想和性格，而又没有中古小说借助鬼神的表现手法，是一部现实主义因素较强、平民文学色彩较浓厚的作品。

此外，手抄本的汉文小说《乌有兰传》也是一部讽刺两班人物沉迷酒色，丑态百出的喜剧性作品，揭露了当时官场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李朝后半期讽刺小说作者中，以实学派文学家朴燕岩的作品数量较多，思想最为深刻，态度也最严肃。

第四节　国语记事文的出现

尽管汉文是朝鲜封建统治阶级自古以来使用的官方文字，文人作诗记事也多用汉文，但随着十五世纪朝鲜文字的创造和朝鲜国语文学时调、歌辞、小说的逐步发展，也有人使用朝鲜国语文字来记事。早在十七世纪李朝光海君时期以及肃宗时期，就在宫

廷中先后出现了由宫人根据亲眼看到的宫中秘事写成的记事文：《癸丑日记》(《西宫录》)、《仁显王后传》。前者记录了宣祖的继妃仁穆大妃被光海君废黜、囚禁于西宫的悲惨史实；后者记录了肃宗的继妃仁显王后受肃宗宠姬张嬉嫔排挤、陷害的事实。

到十八世纪，继续有人用国语文字记事，除另一部记录宫中秘事的《恨中录》以外，还出现了《华城日记》、《戊午燕行录》、《意幽堂日记》等记事作品。

《恨中录》作者为惠庆宫洪氏（1735—1815）。由于"恨"、"闲"二字的朝鲜语发音完全相同，也有写成《闲中录》的。作者洪氏为英祖次子思悼世子的嫔妃。世子于十五岁时摄政，二十八岁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被赐死。此后，洪氏就在郁郁寡欢的心情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恨中录》六卷，是她在晚年应晚辈要求写成的回忆录，其中记载了思悼世子被赐死有关的某些党争的复杂背景材料，以及她所亲身经历的惨变。文笔生动，情调凄切，其中有不少优雅的宫中语，是宫廷文学中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也是朝鲜国语记事散文中的上乘作品。

《华城日记》为李义平所作，记录了他于正祖十九年去华城参加王太后宴会的经过。

《戊午燕行录》是李朝正宗二十二年（1798）书状官徐有闻中国之行的见闻录，全书共六卷。当时来中国的朝鲜官员较多，写成的有关中国的纪行文章也不少，但多为汉文，此书用流畅易懂的朝鲜国语写出，和洪淳学的纪行歌辞《燕行歌》是姊妹篇，具有特殊意义。

《意幽堂日记》（一名《意幽堂关北游览日记》）作于纯祖二十九年（1829）。作者为李义赞夫人金氏，记录她随夫赴任咸兴判官途中看到的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

李朝国语记事体作品的作者，有不少是妇女。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或为宫中近侍，或为嫔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妇女很少能有机会学习文化，缺乏较高的汉文写作技巧，所以多用朝鲜国

语记事。

总的来看，国语体记事散文的出现，说明国语的使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也是在文学上民族精神抬头的表现。

第四章　实学派文学家朴趾源及其小说

朴趾源生于李朝英祖十三年(1737)，卒于纯祖五年(1805)，字仲美，号燕岩，是李朝后期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系列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的作者。

朴趾源主要创作活动时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这期间，李朝由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诞生的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因素逐渐增长，城镇手工业比前一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商品流通、货币经济及对外贸易也趋于活跃。李朝货币“常平通宝”在国内广泛使用，封建地主及商人的财产积累刺激商品经济越发兴旺。农村中，农业生产有一定发展，但城市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成长，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官僚、贵族和士人——即所谓两班人物，相形之下，大为逊色。不能获得或保持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两班，则日益没落。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成长，也冲击了由来已久的盲目崇拜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朝鲜的民族意识有所增长。

社会经济上的变化发展，对旧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在封建阶级日益腐朽没落的新形势下，一些敏感的、关心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学者，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文化和改革社会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在同清朝频繁来往中担任朝鲜使节的一些人，在中国接受了由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欧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影响，人们对陈旧腐朽、空谈性理、难以推动社会前进的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一些学者提出要研究有益于国计民生和社会进步的学问，实学派的思想就这样诞生了。早于朴趾源一百多年出生的柳馨远（1622—1673）、十八世纪的李瀷（1682—1764），都是实学派的先驱。朴趾源继承了他

们的思想，为实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朴趾源是世称“冠冕大族”的两班潘南朴氏的次子，他的先祖中有著名学者和壬辰战争的功臣。他幼年丧父，由祖父朴弼均抚养成人。朴弼均刚直不阿，廉洁不苟，家境清贫。朴趾源受祖父的良好教育，年轻时就刻苦攻读，遍读经史子集。但由于他耿介孤高，不愿与一般儒生和官场人物周旋。人到中年，仍无一官半职，生活贫困潦倒。四十三岁时才任开城留守之职，四十三岁（正祖四年，1780年）他堂兄朴明源被任命为赴清朝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的“入燕使节团”正使。他作为随从人员到过北京、热河省承德等地。归国以后，写下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即《热河日记》。六十余岁时，他曾将他论述农业问题的书《课农小抄》献与正祖，深得嘉奖。晚年当过襄阳府使，为官清正廉洁。后告老归里，专事著作，直至去世。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内容丰富。它介绍了西欧的先进科学，其中的地球公转论，引起了朝鲜国内学者的震动。书中对中国的戏剧、音乐均有评介，对清朝政治的腐败也有所批评，涉及经济、军事、天文、文学、社会、风俗等等，笔锋犀利，表现出他见识广博，眼光敏锐。

由于受到儒学者的鄙视，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长期未能出版。直到二十世纪才刊行于世。

朴趾源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世界的根源始自微尘，即物质的微粒子，由于微粒子的各种方式的配合，产生了万物，也包括人类。他赞成地圆地转说。在《课农小抄》中，他叙述了选种、收割、打谷等农事操作方法。

他有民主主义的倾向，并主张改革社会经济。在《限民名田议》中，他主张把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他还主张废除嫡庶差别，并反对地方、身份差别。他提出防止银子外流、稳定物价。他提倡关心和救济灾民，力主执法公正严明。他还反对封建的贞操观念，主张寡妇可以再嫁。

朴趾源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的短篇小说。在美学思想上，他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盲目追随中国古典诗文。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他的作品的主题，往往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他著作的《放琼阁外传》和《热河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八世纪朝鲜社会某些阶层的人物形象。

朴趾源创作了十余篇小说，在李朝，可以说是位短篇小说大家。这些小说，都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除《虎叱》以外，都是以"传"字为题。他所写的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作者所揭露、讽刺、抨击的对象，如《两班传》中的两班、《虎叱》中的北郭先生、《许生传》中的御营大将李公。作者或嘲弄其寄生性，或讽刺其愚蠢无能，或暴露其伪善面目，或抨击其不讲道德，人品低下。

第二类：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如《秽德先生传》中的粪夫、《许生传》中的许生。作者热情歌颂他们对人类的实际贡献和高洁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抱负。

第三类：是作者同情的人物。如《虞裳传》中的虞裳，空怀奇才，却因出身关系，境遇坎坷，终至郁愤早逝。又如《金神仙传》中的金弘基，《广文传》中受虐待、靠乞讨度日的广文，《闵翁传》中的"有志之士"而"老死莫施"的闵翁等等。

下面，分别介绍他的几篇代表作。

《两班传》：篇幅只不过一千字左右，却对处于穷途末路的两班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情节是这样的：一个"贤而好读书"的两班，因家贫，向官家借米度日，结果欠了不少官债。一个财主，羡慕两班的称号及其威风，愿意以代偿官债为代价，买下两班的称号。两班同意，决定订立买卖文书。在文书中最先写下的是两班的资格、应遵守的规矩和习惯。财主对这些深感乏味，希望写下两班的权力。文书上所写的善权表明：原来两班竟是个不劳而获，横行霸道的人。财主一看大吃一惊，再也不愿要两班的

称号了。

作者没有用自己的话来褒贬两班，而完全通过客观的叙述这个两班的处境和人物的对话，把两班的嘴脸暴露在读者的眼前。这既是实际现象的揭露，也是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嘲笑、挖苦。举若干实例如下：

两班欠下累累官债而被巡行地方的观察使发现，向他讨债时，他一筹莫展，竟至于“日夜泣”，妻子骂他说：“咄，两班，两班不值一钱！”

平素，每逢新郡守到任，都要先去拜访这个两班。可是当财主为他还清债，买下他的两班头衔之后，他立即自认为属于平民、小人之列，见到郡守时，竟然是“衣短衣，伏涂谒，称小人，不敢仰视”，丑态毕露。作者的这段描写，也说明了“两班”的称号和两班本人的思想学问道德无关，而只不过象一件外衣，一旦穿上，就俨然是位可钦可敬的君子，一旦脱下外衣，就成了不屑一顾的受鄙夷的小人。两班的称号可以买卖，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两班的莫大讽刺。

再看买卖文书上是怎样形容这位两班的。他有一套生活方式和习惯：

盥无擦拳，漱口无过。长声唤婢，缓步曳履。

暑毋跣袜，饭毋徒髻。食毋先羹，饮毋流声，下箸毋舂，毋饵生葱。

他尽管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也还是要摆架子：

忍饥耐寒，口不说贫……手毋执钱，不问米价。

一旦中举当了官，两班就可以摆威风，享受权势带来的奢侈生活了：

耳白伞风，腹皤铃诺。室珥冶妓，庭谷鸣鹤。

没当官的两班，也有权利任意占用邻里耕牛和劳动力：

穷士居乡，犹能武断。先耕邻牛，借耘里氓。孰敢慢我，灰灌汝鼻！

这里刻画的两班无疑是一副恶霸嘴脸！

财主听到两班这种种陋习和仗势欺人的劣迹，吓得吐舌叹息，最后说出了："孟浪哉，将使我为盗耶？"作品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品中的富人（财主）虽然只是用来加强对两班丑态的描绘和讽刺，但它也有一定典型意义。他是新兴市民阶级的化身，与两班对比，说明了封建贵族在日益发展的商业资本面前，已无能为力，变得可笑可憎了，暗示出两班的寄生性和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两班传》文句简炼，刻画入木三分，以犀利的笔锋勾勒出了处于封建社会崩溃期的没落的两班阶层的可憎面目，是一幅极好的人物素描。

另一短篇小说《虎叱》也是讽刺两班中的儒生的。在这篇小说中，朴燕岩借一只老虎之口痛斥了迂腐、虚伪、道德堕落的儒学士——北郭先生。北郭先生"学问渊博"，"行年四十，手自校书者万卷，敷衍九经之义，更著书一万五千卷。"这位受到天子及诸侯嘉奖与尊敬的大学者，却偷偷和一个出了名的"节妇"，即五个儿子的姓名不相同的寡妇私通。

一天，北郭先生正在和这寡妇寻欢作乐，被寡妇的儿子撞见。他狼狈不堪，仓惶逃出，慌忙之中竟跌进粪坑里。他带着满身臭屎爬出，却遇到了一只老虎。他向老虎说了许多奉承话，请求饶他一命。老虎听后，痛斥了儒学者的种种劣迹，最后因他过于肮脏龌龊，竟不屑吃他。

《虎叱》通过北郭先生的丑恶行径，揭露了士大夫的卑鄙无耻、伪善堕落。老虎见到北郭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儒乎臭矣"！当北郭先生向它苦苦求饶时，它说："毋摄也吾闻之，儒者谀也，果然。"对于他们在礼教外衣掩饰下的无耻勾当和丑恶灵魂，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抨击。

作品还对统治阶级施于人民的各种残忍的刑罚——割鼻、削

趾、文面等进行了谴责，虎这样对北郭先生说：

汝千言万语，不离五常，戒之劝之，恒在三纲。然都邑之间，无鼻无趾文面而行者，皆不逊五品之人也。

这里的“汝”实际上是泛指士大夫。作者在这里尖锐地指出：统治者满口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却对人民实行极残酷野蛮的刑罚，而受刑之人，往往是无罪的，甚至其道德品质往往高出于五品官之上。

作者还借虎之口进一步指出：“虎之家自无是刑，由是观之，虎之性不亦贤于人乎？”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用刑之人，即和北郭先生同类的官吏，意思是这些统治者连以凶恶著称的老虎都不如！

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指的是“苛政”。朴趾源却把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实行暴政、酷刑的“人”了。

《虎叱》的结尾带有很强的戏剧性。当老虎因不屑吃臭气冲天的儒生而离去时，北郭先生却仍然趴在地上磕头，不敢仰视。早起的农民看到了他，问他为何一人大清早趴着，这位先生竟恬不知耻地说：

君闻之：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

似乎他在恭恭敬敬地向天地神灵礼拜！打肿脸充胖子，这副嘴脸简直象个小丑！

朴趾源小说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许生传》，这篇作品中大体上包括了其他作品的内容，例如认为统治阶级腐朽无能、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新兴的商业资本势力的看法等等。它还塑造了一个体现他本人的社会思想的人物，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描绘出了一幅粗略的蓝图。

《许生传》的情节也较为复杂曲折一些：

儒生许生学习勤奋，居住草屋数间，不蔽风雨。他虽读书七年，但无所成就，于是外出，打算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他向富人卞氏借一万两银子去经商，五年之中，获利百万。他将大量银钱

分给因为生活无着而海边的“群盗”，让他们每人娶亲买牛，去荒岛上务农过活。之后，他自己则离开荒岛回家，以十万两银钱偿还了富人的债，而自己则依然清贫度日。富人深敬许生的才能，把他介绍给大官僚御营大将李浣。李浣以许生为奇才，欲向朝廷荐举许生，却不能接受许生所提的救国主张。许生大怒，拔剑欲斩李浣，李跳出后窗逃走。次日再去访问许生，许已不知去向。

《许生传》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作品的主题是对李朝社会现实的不满，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作者塑造了一位敢于实践的进步人物。作品中贯穿着实学派的思想，也反映了这些思想家的个人品德。具体来说，作品中有以下几种思想：

一、它表明了实学派的重视实用，重视经济问题，尤其是重视商业作用的思想。许生一反儒生的以读书求官为高和轻视商业的习惯，毅然从事商业活动。他先在交通要道安城贩卖梨、栗、柿、枣，一本十利。后来又去济州岛买下全部的马鬃，等待时机以高价卖给经营网巾的商人，获得了高额利润。他还在日本长崎遭灾歉收时，把粮食运往日本销售，从中获取大量利润。当时商业资本已有所发展，经商可以促进商品交流，给农产品打开销路，有利农民还可以富民富国，繁荣经济。这是当时的现实，也是作品中所强调的一个思想。许生商家的第一项事业就是经商，经商的收入成了许生建立理想国的物质基础。

但作者是矛盾的，他在肯定商业资本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用额积居奇以获暴利的办法是“贼民之道也”。他看出了商业的发展会造成贫富不均的现象。许生以经商始，后来又回乡过清贫的生活，也说明了作者的这种矛盾。但在他的“理想国”中，人们还是以农为主的，他还没有完全摆脱重农思想的框子。

二、作品对于生计困难，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流离失所，相聚为“盗”的现象，表示同情。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应设法救济。他未明确表示支持农民起义，但在对待为饥寒所迫，不得不

铤而走险的百姓方面，态度完全不同于一般士大夫。

三、许生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身份等级制度的社会。他把流离失所的人民带到无人岛，让他们"伐树为屋，编竹为篱"，靠农耕过日子，取得了"百种硕茂"、"一茎九穗"的大丰收。人人靠劳动过活，除了吃饭时应让年长者先吃的礼貌以外，没有人有其他特权。朴趾源当时看到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和农民、腐朽的两班官僚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他的这种"人人平等"、"个个劳动"的理想社会，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与经济纲领不一样，基本上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一种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

朴趾源反对贫富不均。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没有经商一项，除非是对外贸易。他让许生把船全部烧掉，杜绝这个世外桃源与外界社会的往来，反映出他憎恶处于崩溃阶段的李朝封建社会中种种恶劣、腐朽的风气和人剥削人的制度。

四、《许生传》严厉谴责了李朝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作法：

古来沉冥者何限？赵圣期可使敌国，而老死布褐。柳馨远足继军食，而逍遥海曲。今之谋国政者，可知已。

腐败的李朝政府不重用人才，也不能发挥财力的作用以发展实业，振兴国家。许生接着说：

君善贾者也，其银足以市九王之头，然投入海中而来者，无所可用故耳！

对人才得不到重用的叹息，在他以前的《虞裳传》等小说中也曾有过。

五、许生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当时的朝鲜由于与明朝的亲密关系及历史上与汉人政权的长期友好关系，对于清廷统治中国和压迫朝鲜极为不满。一些统治者提出反清复明的主张，但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实践。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只起了转移国内矛盾的作用。许生针对这点，对御营大将李浣发表了有远见卓识的意见。他提出，对明朝流亡于朝鲜的遗民，应让他

们和朝鲜宗室通婚。他提出：正是为了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朝鲜人才应废除广袖的朝服，换穿满人的服装以便于驰马、击剑、刺枪、拉弓、飞石，战胜敌人；还应当派遣朝鲜人入清朝去留学，做官，做生意。得到满人信任，可以在中国活动，“觇其虚实，结其豪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反清的目的。

许生比当时流行的迂见高明，赋予了反清复明以新的意义，即反对腐朽的清朝统治，以争取社会进步，他提出的办法，也是很实际的。

最后，作品歌颂了许生这类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朴趾源以前，象许生这样才德兼备的人物，在朝鲜小说中还是罕见的。他的行为与思想，表现出了朝鲜爱国志士的崇高志向与理想。

《许生传》的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在传记体的短篇小说中，表现许生这个人物的性格本不容易，但作品是比较成功的。例如，作者就卞氏借万金给许生一事，通过卞氏之口，道出了许生的外表和个性：“衣履虽敝，辞简而视傲，容无怍色……”。又如在卞氏表示要退还他十万金时，许生却怒斥他。在李浣慕名去拜访许生时，他让李浣久立门外等候等等，都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许生的思想性格。

朴趾源歌颂正面人物的作品，还有一篇，即《秽德先生传》。它写的是一位粪夫。所谓“秽”，就是指粪夫整日与粪接触，身上所沾上的臭味；而“德”，则指道德。朴趾源认为，粪夫身上虽臭，但有德行。他一反士大夫轻视体力劳动，尤其是嫌弃粪夫的习惯，对这些自食其力，而又能不怕脏臭，为农业作出贡献的劳动者表示敬意，称之为“先生”。

作者如此热情地肯定、歌颂这位粪夫，是有其用意的。他借秽德先生的形象来批判高官厚禄而不干好事的官僚、士大夫。认为这种人“苟非其义，虽万钟之禄，有不洁者耳。”而粪夫尽管“其处身也至鄙污”，但“其守义也至抗高”。作者的结论是“洁

者有不洁，而秽者不秽”。其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

在朝鲜文学史上象这样热情赞扬劳动人民的作品，除李奎报的《代农夫吟》等诗篇以外，在小说中，《秽德先生传》要算首屈一指的作品了。

朴趾源早期的小说作品有《广文传》、《闵翁传》、《金神仙传》、《虞裳传》。《广文传》的主人公是乞儿出身，他诚实、善良、不慕虚荣与富贵。《闵翁传》写一个自小怀有大志，终身未酬的人。《金神仙传》写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隐居者。《虞裳传》写的是一个翻译官，他的诗才蜚声海外，却未能在国内得到应有的评价，二十七岁时就悲愤而亡。朴趾源早期作品的共同点都是表达人才不为腐败当局重用的愤懑，其中也都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

上述这四篇早期作品的写法都是由作者介绍和说明人物，一般也都是作者亲眼所见或接触过的人物，有真实感，但作为小说来说，其艺术技巧还不够成熟。

创作年代不明的《马驵传》通过写买卖双方的勾心斗角和商人唯利是图的行为，表现当时虚伪、欺诈等世风，还揭露了士大夫阶层阿谀奉迎、诬陷无辜等谄上欺下的现象。

朴趾源的《烈女咸阳朴氏传》是一篇扣人心弦的作品。在这篇作品里，他描写了一个终身守寡的老妇一生的痛苦，和一位刚举行完婚礼便成了寡妇的少妇朴氏守寡三年自杀的悲剧，强烈地控诉了“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不人道、残忍和罪恶。

朴趾源的社会小说都是有意识地为提出和解答当时的社会问题。一般地说来，和其他小说的主要不同点是：它不以情节的离奇引人入胜，不以人物性格和情意浓烈感人，也不以细腻的景物描写动人，而是直接表达作者的实学思想，带有十分强烈的政论性。更由于它的矛头直指一切消极、黑暗现象，它具有很强的讽刺性。有的文学史家把朴趾源看做是讽刺小说作家，虽不全面，但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

朴趾源小说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两班、儒生、官僚等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他的颂歌是对劳动人民和为祖国富强作出贡献的人物而唱的，表明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爱憎多么的分明！他对于“有才而莫能施者”的同情，也是对腐败的封建社会的一种抗议，同时也是作者对自己的社会理想不能充分实现而发出的慨叹。

朴趾源的小说充分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他揭露和诅咒了李朝封建末期社会的消极、腐败现象。他的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

朴趾源在文学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在纪行文方面的卓越成就，表现在他记录中国见闻的《热河日记》中。

由于朝鲜与中国、日本交往的频繁，纪行文就盛行起来。十八、十九世纪出现有关来中国和去日本的纪行文。如《老稼斋燕行录》（1712年，金昌业作）、《燕行录》（1773年，严璹编）及洪大容用国语和汉文写的中国纪行文等等。随着实学运动进一步发展，来到中国的朝鲜使节团，几乎都写了纪行文章。而其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朴趾源的《热河日记》。

《热河日记》中的文体是多样的，它有日记体，有政论体，也有假托为作者在中国偶然发现的小说（《虎叱》）。它们并不光是对客观情况的简单记录，而且还包括着作者的评论和见解。《热河日记》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它包括哲学、政治、经济、交通、古迹、风俗、天文、地理等。

《热河日记》不仅是朝鲜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商业等各方面的情况。

朴趾源还是一位诗人。李朝后半期著名的汉文诗“四大家”（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都出自他的门下。但可惜他本人留下的诗不多，仅有四十二首，其中以《丛石亭观日出》、《田家》、《渡鸭绿江回望龙湾城》等为最优秀。

《丛石亭观日出》是一首七言旧体长诗，是他二十八岁时所作。年轻的朴趾源登上东海岸丛石亭，目睹大海东方日出的壮观景象，写出了他对祖国冲破黑暗，争取光明未来的强烈愿望。全诗气势磅礴。那奔腾的热情，激动人心的力量，是以往一般描写东海岸日出的诗所达不到的。

七言诗《田家》描绘了秋收季节农村的情景。七律《渡鸭绿江回望龙湾城》，表现了作者离开朝鲜时对祖国乡土无限留恋的心情，寄托着他伤时忧国的情怀：

孤城如掌雨纷纷，芦荻茫茫塞日曛。
征马嘶连双吹角，乡山渲入万重云。
龙湾军吏沙头返，鸭绿禽鱼水际分。
家国音书从此断，不堪回首入无垠。

朴趾源一生著作丰富，但生前未能及时出版，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出版了他的六卷《燕岩集》，其中包括《放琼阁外传》、《热河日记》等。他的大部分小说收于前者。《虎叱》、《许生传》则收于《热河日记》中。

第五章　李朝后半期的汉文诗

十八、十九世纪李朝的汉文诗依然有所发展，作品与诗人的数量也都有所增加，作品的题材也随着诗人的增加而有所扩大。

随着平民在文坛上渐趋活跃，一批所谓“中人”阶层人物也创作了不少汉文诗。所谓中人阶层即胥吏（官府办事员）、译员之类。由于封建等级制的限制，他们虽有汉文修养，却不能作官，这反而使他们能有较多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从而使他们的汉文诗能够较多地反映民间生活。

另外，由于实学派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出现了一些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诗歌，丁若镛（茶山）就是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第一节　文人士大夫的优秀诗篇与四家诗

从诗的风格上看，这个时期产生了由宋诗诗风转向唐诗诗风的倾向。而在内容上，则较多地反映出进入崩溃时期的李朝封建制度的黑暗面和人民的痛苦，也出现了一些表现不满意清廷压迫，有爱国倾向的诗篇。取材于民间的爱情诗、民俗诗也比前时期有所增加。

朝鲜这时虽无对外战争，但人们对十六、十七世纪的壬辰与丙子两次战争，记忆犹新。朝鲜本国在丙子战争中所受的屈辱和痛苦，以及壬辰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明朝援助的深刻印象，使一些爱国的文人士大夫常怀念壬辰战争中的英雄和与朝鲜友好的明朝。他们在涉及这些历史事件的诗歌中，颂扬了民族独立精神和

爱国热情。

表现爱国主义内容的作品有：赵相遇的七绝《江界受降亭》，回顾了对女真的胜利；金昌翕的七言长诗《红衣将军歌》，歌颂壬辰战争中的义兵英雄郭再佑；李瑞胄的七律《景福宫》，凭吊毁于壬辰之战的宫殿遗迹，指出应警惕倭寇卷土重来；姜溍的五绝《鸟岭》抒发了对壬辰之乱的感慨，表示了对倭将加藤清正的憎恶。

李观吾的七律《忠烈祠》歌颂的对象是李舜臣将军的英雄业绩：

匹马南来往事寻，数间祠宇竹林深。
风涛时作将军怒，星日昭临烈士心。
云锁闲山苍海远，桥横凿浦晚潮侵。
至今拥节多遗裔，龟首艨冲系古浔。

申惟翰和金若愚都以《矗石楼》为题，歌颂在此处与倭军奋战，直至最后壮烈牺牲的三位烈士。前者写的是七律，后者则为七绝。

晋阳城外水东流，丛竹芳兰绿映洲。
天地概君三壮士，江山留客一高楼。
歌屏日暖潜蛟舞，剑幕霜侵宿鹭愁。
南望斗边无战气，将坛笳鼓伴春游。

金若愚的诗除缅怀三烈士外，还提到了把敌将推入江中，与之同归于尽的妓女论介的动人事迹：

凄凉千古晋阳州，水到城根咽不流。
三士堂堂男子是，又何殉节一青楼！

壬辰战争时，中国援朝将军麻贵曾在素沙坪一地痛歼倭将，朴文逵的《过振威县素沙坪》就是歌颂这位将军的：

八月明南宿雨晴，黄沙漠漠展归程。
兔臾敌国江山在，麻贵新营草树平。
地向烟尘皆廓落，秋高云日倍清晶。

自怜劳碌终何事？白首为儒愧此行。

在明朝与清室斗争的过程中，朝鲜曾派兵支援明朝，在深河战斗中牺牲的朝鲜军人金孙国，就是一位援明英雄。传说因他的事迹壮烈感人，连敌将也曾用马奶酒祭他，以表敬意。金迈淳所写七绝两首《咏金烈士事》就是歌唱他的。现举其一：

深河高柳老难僵，猿鹤悲吟古战场。

长遣胡儿浇马酒，三韩烈士死堂堂。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写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诗。金昌协的五古《山民》，写的是居于深山的贫苦农妇，丈夫外出耕田，日暮犹未归，山林猛虎多，农妇惦念亲人。诗的结尾两句是："乐哉彼平土，欲往畏县官"，暗示出县官比猛虎还可怕。金昌翕的五古《拾橡》写出断炊的农民靠拾橡子过活的苦况。金春泽的七绝《济州岛所见》则描写了该地贫女含泪挖野菜度日的辛酸。安重观的五律《观刈稻》道出了老农耕作的艰难。崔亮衍的五律《劝农》写出了农民遭受官家残酷削削的惨状："地废独征税，身亡尚索钱"，令人愤慨。洪良浩的五言长诗《流民怨》写的是"三世为农夫"的男耕女织的一家，在天灾和人祸（官税）的逼迫下背井离乡、流浪四方的悲惨故事，是李朝农民痛苦生活的一幅真实写照：

……　　……

县吏日至门，叫呶何太急？

奔走备酒食，征责殊未已。

乳下数岁儿，又充闲丁籍。

家中无所有，厩上一黄犊。

将犊之东市，输官有余逋。

机中断几匹，尽作京军袍。

宁留尺寸布，可以掩吾髀。

无衣复无食，何以卒此岁？

……　　……

金履万的《哀丐者》写的是乞丐冻馁交加的惨状，结尾以“君视貂裘锦帐暖如春，浆酒覆肉仆骄奴”这样的诗句来描写豪门贵族的穷奢极欲，同乞丐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力地揭示出了社会的矛盾。

刘光泽的七绝《贫家女》把穷家妇女的辛苦、烦恼表现在偶然所见的情景之中：

拾穗山田薄暮归，稚儿匍匐啼柴扉。

吹火湿薪烟不起，夕餐还到鸡鸣时。

尹谦善的七绝《织妇》写的也是妇女，其中点出了官吏的敲榨勒索使这位劳动妇女陷于“织者无衣”境地。

邻灯伴作缫车归，才辍晨炊即上机。

剐尽门前官吏督，未曾尺寸补寒衣。

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必然导致对苦难制造者——剥削者、统治者的憎恶。李瑞胄的五律《鹰》，就表现了这种情绪。作者借鹰的雄姿寄托自己的心愿，希望出现像鹰这样的人，把一切害人虫全消灭光：

蹁跹仍骄企，日暮意何骄？

草动留双眼，风鸣忆九霄。

千林毛羽静，百里窟巢摇。

安得人如尔，奸凶气自消。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写田家生活和乡村民俗的诗歌，其中佳作不少。李献庆的七绝《樵童》写孩子上山打柴的幼稚气，作品清新可爱：

山险樵童小，雪中取湿薪。

暮归石似虎，岭上急呼人。

李承薰的五绝《促织》写的是深夜虫鸣，充满了乡土气息。他的七绝《鸟谷田家杂咏》用木桥、石径、豆棚、杏花，烘托出田园的宁静气氛：

独木桥西石径斜，飞飞鸟雀乐山家。

春来门巷皆相似，红豆棚前白杏花。

郑昌时的七绝两首《通州途中》、《苍峰途中》，以平淡朴实的笔触，生动地画出了农村妇女的姿影：

通州馌妇烂成群，熨着翻翻白布裙。

问路含羞不能对，回身遥指岭头云。（《通州途中》）

茉莉花开夹岸香，岸头女伴折花忙，

阿郎贩米忠州去，布谷声声劝插秧。（《苍峰途中》）

赵成夏的《淮阳道中》写山谷中小酒店主人的生活和生意，充满了对他的同情。赵五的《田家杂咏》五绝四首，也是一幅幅小巧精致的农村风景画。

严启膺的五古《村中实记》写的是农村嫁女，绘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风俗画：

村女往舅家，舅家在他乡。

今日为新妇，临水照严妆。

大兄担橡栗，小兄持壶觞。

原头拜阿母，垂涕遥相望。

萋萋芳草路，驾牛故彷徨。

上述写村民、田家的诗，虽没有直接揭露和谴责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所造成的苦难，但是在大多数作品中，都隐隐地流露出一种哀愁和难言的隐痛，含蓄地反映当时李朝农村的凋蔽和农民的困苦。

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感情真挚，语言朴质无华。如李匡吕的《章台枝》就是一例。此诗是为一侍女而写的，她被高官（尹尚书）始乱终弃，最终以二十岁的青春年华郁郁身亡。诗歌反映出官僚的冷酷无情和封建等级制对爱情的束缚。全诗共五首，现举其二：

章台路傍树，东风二三月。

妾身此一枝，只许一人折。

望郎在天上，天上隔无期。

亦知君怜妾，宁知妾死时。

黄五的五古《望夫石》，借咏石写出了女子对丈夫远行不归的失望、惆怅和哀愁。李根洙的《竹枝词》三首，写女子见郎君不归来，触景伤情。共三首，现举其一：

送君远向渡头去，忆君时向渡头来。

人情不似东流水，日日潮回君未回。

此外李履奎的五绝《捣衣曲》、许薰的五古《拟古》也都是写女子思念郎君的。黄五的七绝《秋千词》则写出了一个少女初恋时的羞怯：

小姑十四大于余，学得秋千飞燕如。

隔窗不敢高声语，柿叶题投数字书。

爱情诗中写男子心情的作品极少。其社会原因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更不自由，处境既悲惨，爱情上波折亦大，诗中反映的也比较多。但这一时期的崔大立的《丧室后夜吟》，则写得委婉含蓄，情意深挚，表现了老夫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睡鸭薰消夜已阑，梦回虚阁枕屏寒。

梅梢残月娟娟在，犹作当年破镜看。

前面已经提到，李朝后半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均是朴趾源的弟子。他们四人都受朴趾源实学思想的影响，有进步倾向，又都先后来过中国，结交过一些中国朋友，作品受到过中国诗人的好评。四人的诗选辑为一书，名《四家诗集》（一名《韩客巾衍集》）。清代李调元总评此四家的诗，说："今观四家之诗，沈雄者其才，铿锵者其节，浑浩者其气，郑重者其词。"这一评价是比较高的。

李德懋（1741——1793）为人内行修洁，任检书官，参与内阁编书。曾随沈念祖来北京，与中国诗人交游。因系庶子出身，官阶仅至县监。

李德懋工于七律。他的七律《牙山白岩洞》写的是他访李舜臣祠堂的感怀。他的两首七绝《碧蹄馆》、《碧蹄店》写出对壬

辰战争的回忆。由农民刨地发现的当年倭人的火枪铁丸，而追昔抚今，对明援军将领李如松表示了追思、怀念。

往往锄头触铁丸，村娥缀珮爱团团。

太平生长那由识？透甲曾成壮士瘢。（《碧蹄馆》）

天兵癸巳齿倭锋，铁马啼劳腻土浓。

未抵轻儇蝴蝶阵，临风痛哭李如松。（《碧蹄店》）

柳得恭（1747——？）也是庶子，也曾作过检书官。爱写怀古诗，其《二十一都怀古诗》写了西京（平壤）、松京（开城）及新罗、百济的故都等，颇负盛名。其诗有“才气纵横”、“格律独高”等好评。他的《西京杂绝》中的一首写出了西京歌舞繁盛的景象：

练光亭子浿江边，浿水西流似逝年。

才子佳人回首地，匆匆歌舞夕阳前。

（《西京杂绝》之一）

雨冷风凄去国愁，岩花落尽水悠悠。

泉台寂寞谁相伴，同是江南归命侯。

这是咏百济故都两首中之一，诗中引用了百济宫女在城破国亡时纷纷投江殉国的落花岩故事，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他的七律《满月台怀古》富有唐诗绚丽典雅的风格，是以往同一题材的各家诗中，较好的一首。其五古《田家》二首，亦为写农家苦辛的佳作。

朴齐家（1750——1805），为实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北学议》的作者。曾三度来中国，在燕京与名流交游酬唱。也因是庶出，未能做高官。曾任检书官。其七绝《西京》、《白云台》为写景抒怀佳作。七绝《牧童》写出了十岁村童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

雨牧风樵十岁初，村童生长野中居。

生丝解捕云中雁，赤手还探浦里鱼。

他的七律《北汉文殊寺》意境幽深，足以代表他的诗歌水平。

天光漏处乍窥关，鸟道萦回总是攀。

落日烟生悬度国，秋风客在铁围山。
形如倒瓮三峰坼，鸣似冲牙一水还。
初到寺前频顾影，红明衣袂入枫间。

李书九（1754——1824），名门后裔，官至右议政，是四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个。他最善五言诗，以《晚憩四冈口作》为例，可见一斑：

被酒村南去，溪山入迥眺。
雨余积翠多，樵径隐半峤。
深崦起暮烟，晴川媚潇照。
遥见巷牛返，时闻水禽叫。
田园洵可乐，尘世臂已掉。
永怀苏门子，振策发孤啸。

他的五绝也写得很好，如《自白云溪复至西冈》、《晓起观涨》、《村暮》等都写得意境深远。

李朝末叶，以“诗书画三绝”闻名的申纬（1769——1847）也是一位诗坛上的名手。他也深受实学思想的影响。他崇尚清代的诗风，曾来中国与江南名士广泛交游。尹定铉在《寿申紫霞七十生朝》一诗中称赞他“盟主词坛七十年”，可见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他的《春日山居》、《朴渊》、《淮阳》、《玉仙洞》及《秋雨叹》等，均为佳作名篇。

俯栈盘盘下，回看所历悬。
岩飞山拔地，溪立瀑垂天。
空乐自生听，众喧殊寂然。
方知昨宿处，幽绝白云巅。（《朴渊》）
城中十日雨，柴商不入城。
无柴尚毁车，无米炊不成。
衾裯任凄湿，墙屋日颓倾。
一晴待已久，百忧何时平？
厨烟不起寂无事，已到午时钟自鸣。（《秋雨叹》其一）

第二节　实学派诗人丁若镛

在实学派小说家朴趾源诞生后二十五年，实学派的诗人丁若镛出世了。

丁若镛（1762——1836）字美镛、颂甫，号茶山、犹堂，一般以号来称呼他为丁茶山。他出生于两班贵族家庭，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文科及第。曾任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同付承知、谷山府使等官职。由于清廉正直，忠于职守，敢于弹劾营私舞弊的贪官，遭到权贵的忌恨和排斥，被贬谪至康津等地，长达十多年之久，直到五十六岁时才被释放归里。后来不复为官，潜心治学，从事著述十八年，七十四岁去世。

丁若镛是实学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诗人。他力主改革，一生以"新我旧邦"为己任，希望除去弊政，实现民富国强。他的思想代表了正在成长的市民和日趋贫困的农民群众的愿望。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反对大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要求"农者得田，不农者不得之"。他提倡发展实业，使工商业自由发展。在政治上，他反对君主世袭制和君权神授说，认为掌权者应以民为主。在哲学思想上，他有唯物主义因素，反对人性"本善"或"本恶"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实事求是。他反对事大主义。在创作上，他反对"吟风弄月"的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主张诗应起到"美、刺、劝、惩"的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和教育意义。

丁若镛的主要贡献是诗。在诗创作上，他的最主要的特色与功绩是诗中所饱含的对劳苦人民疾苦的极为深挚的同情关切，对腐朽、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憎恨。

他所作的四首七言诗《长鬐农歌》、《耽津农歌》、《耽津村谣》、《耽津渔歌》描绘了农民、渔民的艰苦劳动和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这位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的诗人对社会下层人民的

深厚感情。这些诗虽没有直接揭露统治阶级，但多处流露出对官吏巧取豪夺、民不聊生等情况的愤懑。如“平生不种西瓜子，惟怕官奴惹是非”（《长髻农歌》）、“今年比目犹难得，尽作乾鲭入县门”（同上）、“岂惟莲子输官里，兼怕官人暇日渔”（《耽津农歌》）、“园丁日日培新笋，留作朱门竹沥膏”（《耽津村谣》）、“漏田督税如星火，三月中旬道发船”（同上）、“官里由来虎守门”（《耽津渔歌》）等等。

诗人有时也带着亲切的微笑描写了渔民淳朴可爱的风俗，如：

儿女脂脂簇水头，阿娘今日试新泅。

就中那个芄凫没，南浦新郎纳彩紬。

写渔家女儿竞游泳，青年男子从中选偶的场面，饶有风趣。

丁若镛描写人民困苦生活的诗，最典型的是《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简称《积城村舍》）。这首长达四十句的七言诗，写的只是一个村舍，却全面地写出了乡村的凋敝、农家的痛苦以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

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约十四句，写的是诗人所见该农家的破落凄凉情形：座落在溪边的破茅屋，屋顶的苇帘子已被北风卷起，露出了椽子。“旧灰和雪灶口冷，坏壁透星筛眼豁”，雪透过有窟窿的屋顶飘落在冻冷的灶口边，墙壁已倾颓，从墙的缺口处可以窥见天上的星星。房屋如此，屋里的“陈设”又怎样呢？三根粟穗子、一串红辣椒，破缸是用布糊的，搁架用绳子勉强吊着，“室中所有太萧条，变卖不抵钱七八”。

诗的第一段写物，第二段写人，描绘的是孩子与父母的情形。孩子穿着露出肩膀的破单衣，没裤子穿，更谈不上袜子！更令人愤慨的是，大孩子才五岁，就被登记为骑兵，小孩子三岁也被记入军籍薄。两个孩子还得年年交五百钱贡钱。诗人以孩子父母的语气发出悲愤的呼声：“愿渠速死况衣褐？”贡钱太多，大了还要送到军队中去当兵。负担太重，只愿孩子都快死掉，还

能谈得上给他们衣服穿？孩子们无处可睡，只得跟狗睡在一起。夜里听得见虎豹的呼啸。

白天里，这家是看不见主人夫妇的。“郎去山樵妇佣舂，白昼掩门气惨怛”。主妇为了节省，直到日落西山丈夫快回来时才点火做饭！“昼缺再食夜还炊，夏每一裘冬必葛”，夏天穿的是破羊皮，冬天却穿着麻布衣。

更可怕的还是高利贷主和官家的逻卒：

饷米前春食五斗，此事今年定未活。

只怕逻卒到门扉，不愁县阁受鞭挞。

去春借了五斗粮食度荒，今年连本带利要归还，日子怎么过？诗的最后一段是作者的叹息：“鸣呼此屋满天地，九重如海哪尽察？”意思是，这样生活凄惨的农家比比皆是，国君居于深宫之内，那能知道百姓的苦楚呢？

诗以“远摹郑侠流民图，聊写新诗归紫阙”两句结尾，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朝廷上。作为士大夫，丁若镛只能这样想，也只能这样来结束他的这首诗。对此，除了丁若镛的阶级地位带给他的思想局限性以外，我们还应看到这两句诗中所隐含的对李朝最高统治者的责难。尽管这责难是很委婉的，却是有深意的，它点出了民生凋敝的根源和罪责所在。联系作者在政论文《原牧》中所阐述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可以肯定，上述的两句诗，更多的是对统治者的责难！

丁若镛的五古长诗《饥民诗》也是一首反映人民灾难痛苦的作品，其中讽刺了官府中的那些伪善者，他们平时吮吸百姓血汗自肥，在饥饿的灾民面前，装出一副伪善的脸孔，把一些稀薄得连猪狗都不愿吃的粥，分给难民：

县官行‘仁政’，赈恤去捐私。

行行至县门，喁喁就汤糜。

狗彘弃不顾，乃人甘如饴。

诗人还以难民的口吻指出官吏的钱财正是自人民的血汗，贵

族的豪华生活，正是建立在人民贫困的基础上。诗的最后写出了灾民求告无门、走投无路的惨状：

哀号出县门，眩旋迷路歧。

暂就黄莎岸，舒膝抚啼儿。

低头捕虮虱，汪然双泪垂。

在官府重税的压迫下，本来已经就生活艰难的老百姓，还要为生下的孩子交税，孩子生得越多，就越糟糕。有的人为了避税不生孩子，采取了极其原始的办法绝育。在七古《哀绝阳》中，丁若镛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揭露出了他所亲眼目睹的这在惨绝人寰的事实：

芦田少妇哭声长，哭向县门号穹苍。

夫征不复尚可有，自古未闻男绝阳。

舅丧已缟儿未澡，三代名签在军保。

薄言往诉虎守阍，里正咆哮牛去皂。

磨刀入房血满席，自恨生儿遭窘厄。

作品的前半部分，就把惨剧发生时的情景、经过都叙述清楚了：一位年青的妇女去县衙门哭诉：公公死了已三年，孩子刚生下不久，可是官府却把他们连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总共祖孙三代都登录在军籍册上，要他们纳税。丈夫毫无办法，一急之下，采用了野蛮的去势绝育的办法。

诗的后半部分，着重写诗人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感想。可贵的是，诗人在这里就社会的矛盾现象进行了强烈的对比，"豪家终岁奏管弦，粒米寸帛无所捐！"同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均吾赤子何厚薄？"在这一尖锐的质问中，包含着丁若镛对李朝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看法，他的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意见，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

丁若镛留心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苦难。他为轿夫写下了五古《肩舆叹》，以"人知坐舆乐，不识肩舆苦"两句开头，引出有关轿夫劳动与痛苦生活的一连串描述。写到了轿夫抬轿上山下山时的

苦楚，写出了他们在“领吏操鞭扑”的情况下抬轿奔走，“喘息杂湍瀑，汗浆彻褴褛”的艰难、凄惨的情形：

压绳肩有瘢，触石骿未愈。

自寿以宁人，职与驴马伍。

诗中表现出了丁若镛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这些“被驱如犬鸡”、“职与驴马伍”的劳动者十分同情，提出了“尔我本同胞”，却为什么遭遇如此不同、苦乐如此不均的问题。

四言诗《有儿》记述了失去了父母的姐弟两孤儿的惨状。诗小序中说“夫弃其妻，母弃其子，有七岁女子携其弟，彷徨街路，哭其失母焉。”作品以极其简练的笔法，把“伉俪不爱，慈母不慈”、“二儿伶俜，无门可窥”的情形展现在读者眼前。被遗弃的母亲不告而别，丢下二儿而去的情节，最能引人一洒同情之泪。下面就是七岁女孩所说的经过：

母携我手，丐而饲之。

携至水市，啖我以饴。

携至道越，抱儿如麋。

儿既睡熟，我亦如尸。

既觉而视，母不在斯。

且言且哭，涕泗涟洏。

除在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中流露出的对统治者的不满与谴责之外，丁若镛还有些诗着重揭露和抨击腐败残暴的统治者。他仿照杜甫的《三吏》所写的《波池吏》、《龙山吏》、《海南吏》，就是这样的作品。

《波池吏》写的是官吏扑向波池村去抽壮丁、抓役夫的事。村中早已无壮丁可抽，恶吏们连孤儿寡妇也不放过，把他们捆绑起来，用鞭子赶着他们走去。

《海南吏》写的是催租。酷吏如虎似狼，把平民辛勤所得全都搜刮一空，使全村出现了“嗷嗷百家哭”的惨象。

《龙山吏》写的是恶吏为夤缘上司，到村中去抢村民的耕

牛。他们所抢走的耕牛，有的是寡妇家的，有的则是孤苦老人的。恶吏抢走这些贫民仅有的谋生手段，作为自己升官的进身阶。

吏打龙山村，搜牛付官人。
驱牛远远去，家家倚门看。
勉塞官长怒，诓知细民苦？
…………
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戌。
德音竟不至，万命相枕死。
穷生尽可哀，死者宁智矣。
寡妇无良人，翁老无儿孙。
泫然望牛泣，泪落沾衣裙。
村色剧疲衰，吏坐胡不归？
瓶坛久已罄，何能有久炊？
坐令生理绝，四邻同呜咽。
脯牛归朱门，才谓以甄别。

在"三吏"以外，丁若镛还写了"三行"，即《僧拔松行》、《猎虎行》、《狸奴行》，这些也都是揭露统治者的。

《僧拔松行》说的是官家以风吹折松树为借口，指控松树的种植者僧人是有意滥伐，僧人被鞭挞之后，还赔了官家一万钱才了事。其实滥伐者恰恰是官府。他们以造船防倭为借口，把松树砍个精光，却不见他们造成一艘战船！僧人辛苦植松，努力护松，见到这种情形，一气之下，亲手将幼松一一拔去，一则可以避免贻祸于未来，再则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府夺去。

《猎虎行》说的是官家派出捉虎兵丁，以除虎患为名到村子里强迫村民烹鸡杀猪，把村民折腾得苦不堪言。捉到虎后，则抬入官府，为县官霸占。弄得村民"生憎悍吏夜打门，愿留余虎以御侮"，宁愿让老虎为自己"守门"，也不愿接受贪官悍吏对遭虎患的人民的"同情"！

《狸奴行》以对老鼠的诅咒和对猫的谴责来揭露大小贪官污

吏沆瀣一气，枉食俸禄、坑害人民的情形。“民被鼠割日憔悴，膏焦血涸皮骨枯。”鼠类猖獗，负责捕鼠的猫，不但玩忽职守，而且比老鼠的危害更大。此后，老鼠越发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诗中以生动的形象表现出老鼠得意扬扬、与猫相勾结的情形：

自今群鼠无忌惮，出穴大笑掀其须。

聚其盗物重赂汝，泰然与汝行相俱。

由于群鼠的拥戴，猫更显得威风了：

吹螺击鼓为法部，树纛立旗为先驱。

汝乘大轿色夭矫，但见群众争奔趋。

诗人笔下写的是猫、鼠，但读者联想到的却是贪官污吏这伙群丑。

丁若镛的《狸奴行》明显是受了前人的影响。他吸收了李奎报的《责猫》、林悌的《鼠狱说》等优秀文学遗产的精华，创作了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寓言诗篇！

《虫食松》也是借诅咒蚕食松树的害虫表示诗人对贪官污吏的憎恶。“汝今私欲恣殄瘁，我欲言之气上冲。安得雷霹劈斧，尽将汝族——秉畀炎火洪炉熔！”表面上指松树害虫，实际上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蟊贼。

四言诗《豺狼》记叙了一件实事。据诗人在诗序中说，有龙、凤两村。龙村有某甲，凤村有某乙。甲乙二人偶然相戏至于相殴，乙受伤未愈，死去。两村百姓畏惧官府得知，商议决定令甲事自杀偿。甲欣然接受，自杀而死。事情已就此了结。没想到隔数月，为官府所知，怪罪两村百姓，课以罚金三万钱。两村家家户户为此倾其所有，连寸布粒粮全都交出。村民无以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四方。诗人愤怒地质问道：

杀人者死，又谁戕兮？

杀人者死，又谁灾兮？

平素官吏对百姓疾苦从来熟视无睹，对这件已公平了结的事件，却如此大做文章，把人民血汗榨干。这种官吏简直是豺狼。

豺兮虎兮，不可以语。

禽兮兽兮，不可以诉！

这就是诗人的痛心的结论！

丁若镛还看到腐败的政治制度对人才的压抑。在七古《夏日对酒》这首借酒抒怀寄愁的诗中，他除了对土地不均、贫富悬殊、苛酷的租税和高利贷等表示了愤怒以外，还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封建的身份制度对于人材的压制，慨叹“如何贤路隘，万夫受局促”：

西北常摧眉，庶孽多痛哭。

落落数十家，世世吞国禄。

就中析邦崩，杀伐互翻覆。

弱肉就之食，豪门余五六。

这就是朝鲜西北道一带地方豪门世世代代把持官位的写照。大批庶出人才受到压制，于是形成了这种情况，寒门子弟，感到读书无用做不了官；而出身豪门的子弟又感到不必读书，照样可以做大官。一代年轻人，就这样“荒嬉不成材”，造成了李朝末期的那种令诗人忧虑的“举世无贤淑”的情况。

丁若镛笔下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和人物是广泛的。农民、渔夫、孤儿、寡妇、轿夫、小僧、饥民、科举制和等级制下的牺牲品，乃至贪官污吏、衙门役卒等都成了他描写的对象。

丁若镛的诗有宋诗风，他爱作平易的叙述和白描，在诗中发议论，爱作旧体诗。在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诗中如此，即便在写景诗如《馒渊瀑布歌》、《苦雨行》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丁若镛还善于抓一些一般人熟视无睹的事例，加以艺术渲染，使之具有典型意义，发人深省。如《哀绝阳》、《豺狼》、《僧拔松行》、《有儿》、《肩舆叹》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另外，他还长于用对比和比喻的方法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豺狼》中最后以“父兮母兮，粱肉是啖。房有妓女，颜如菡萏”来和官吏借龙凤两村的人命案大肆敲诈、迫使村民流离

失所的情形对比，把恶吏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狸奴行》中鼠、猫的比喻，也极生动。

丁若镛的政论文逻辑性较强，论述浅易，笔锋犀利。他的《原牧》、《田论》等文章，政治上具有很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经济上则力主耕者有其田，反对大土地兼并现象。

丁若镛还能写长短句（词），如《满江红·渔夫》就写得如闲云野鹤，超尘脱俗，表现出他为人耿介，不随俗流的性格。

丁若镛的大小作品汇合在一起，犹如一幅长卷，反映出处于崩溃中的李朝社会的各个侧面。他是继高丽时期卓越现实主义诗人李奎报之后在写社会诗方面取得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不论是对人民、对统治者的态度，还是诗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乃至诗的风格、写法，丁若镛与李奎报都十分相似。可以说，丁若镛就是李朝时期的李奎报。当然，尽管两者都属于优秀诗人行列，也应看到，丁若镛诗歌的政治与哲学思想基础与李奎报有所不同。他的实学思想中包含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社会的因素，就历史发展进程上看，是更具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节　“委巷诗人”与赵秀三

在李朝后半期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学因素的作用下，在当时的汉文诗坛上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现象，即一批“委巷诗人”的涌现和“乡土诗”的大量产生。这两种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文学进一步带有民间性，逐步摆脱文人士大夫文学旧传统和习气，社会中下层的色彩明显增强的一种突出表现。

“委巷诗人”的出现与乡土诗的流行，和学术界实学思想的兴起有一定关系，尽管其影响和意义还比不上实学派，却是和实学派同是汇合在李朝后半期进步思潮中的两股水流。它们是同一种社会因素所孕育的一对孪生子。实学派着重于学术与政治、社会的改革，委巷诗人的活动舞台则为汉文诗坛。

所谓"委巷诗人"是指那些出身微贱的诗人，即所谓"中人阶层"中的人。他们比起所谓常民与贱民（即手工业和农业劳动者、奴仆一类人）社会地位要高些，但他们又因门第或出身之故多数不能升为官僚、两班贵族，从而属于社会中间阶层。其所从事的职业往往是供职于官厅衙门的胥吏（书吏、录事、会计、绘图员一类的办事人员）、出访使节的随员，以及医生、译员、天文气象的观象员等等。由于他们住不进豪华的官员寓所，而只是住处在普通街巷之中，所以被称为"委巷人"或"闾巷人"。

这类诗人中也有一些人是两班的姬妾生的孩子，注定作不了大官。由于李朝后半期统治阶级的封建门阀观念更深，等级制度更森严，他们既不能和高门贵族子女通婚，也不能作官。由于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职业上的需要，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有的人还具有高度的汉文文学和学识修养。但他们受等级制的限制，不能参加科举，其中少数文才极高又幸而在士大夫中得遇知己者，可以被荐举为官，但绝大多数则怀才不遇，抱恨终身。

这些被称之为"委巷人"的中层人物中，出现了不少善作汉文诗的人，具庠在《华谷集序》中说：

> 噫，通古今，达天下，清官美职之观门第者，唯我东而已。中人下人之称，区别已甚，而至于尊之不得齿于士夫而极矣。故自顾无用而暴弃其才能……古已有"穷而能诗"之言，而我东四百年委巷之以诗著者，可数而知。

由此可见当时门阀制度的森严以及中层人物遭受排挤的种种情况。

由于十八世纪的英、正两祖崇尚文学及正祖对中层人物中优秀诗人的同情和优遇，委巷人写诗的风气相当盛行，陆续出现若干佳作。因为身份等级较为低下，他们的诗作往往很难象士大夫那样印成个人作品专集传世。但由于某些名人对委巷作品的关注和爱好，印成了一些专门收录他们作品的诗集。最早在显宗九年（1668年）出现了崔奇男、南应琛、郑礼男、金孝一、崔大立、

郑楠寿六位胥吏出身的诗人作品集《六家杂咏》。在肃宗(十七、十八世纪)时又出现了由洪世泰(1653——1725)编辑的《海东遗珠》。但是委巷诗人的最主要的作品集,则是《昭代风谣》、《风谣续选》、《风谣三选》三部诗集。

《昭代风谣》由高时彦(一说蔡彭胤)主编,于英祖十三年(1737)刊行于世,共收录了委巷诗人一百六十二人的作品六百八十五首。

《风谣续选》由千寿庆、张混两人合编,于正祖二十一年(1797)刊行,共收了三百三十三人的诗作。

《风谣三选》由刘在建、崔景钦两人编成,收录了三百零五人的诗,其中还包括少数无名氏、僧人、女诗人的作品。

上述诗集对"风谣"一词的使用是不确当的。在中国,文学上的"风"是指民歌,《文心雕龙·乐府》中说:"匹夫庶妇,讴吟土风"。在朝鲜的新罗乡歌中有一首名为"风谣"的诗(《来如歌》),也是首民歌。到李朝后半期编辑上述《昭代风谣》等三部诗集时,编辑者因为诗的作者是两班士大夫阶层以外的无官职或职位低微的所谓"委巷人",也就把它们视为民间作品,叫作"风谣"。其实这是不合适的。

从阶级实质上看,委巷诗人属于"中人"之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世界观、政治见解,基本上属于两班士大夫范围。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大有区别。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过着四体不勤的悠闲寄生生活。他们的作品所流露的思想感情,有不少是和士大夫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把这些诗歌称之为"风谣",是不合适的。

有的文学史著作将描写民间风土、人情、世态的诗歌称之为"风谣",这也是不确当的。有些士大夫文人早就开始写民间的习俗了,如新罗的崔致远写了《乡乐杂咏》,高丽李奎报也创作过一些以民间事物、习俗为题材的诗歌。他们的这些作品,却从未被称为"风谣"。可见,人们从来就没有把文人的这类作品视为

风谣，因为它们并非民歌。

由于李朝时期对“风谣”一词使用得较为混乱，不大科学，本书不使用这一名词。

“风谣”一词的使用虽不贴切，但委巷诗人作品的喜好者和编辑者的思想认识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三部“风谣”集，是提倡、发扬和保存委巷诗人作品的重要文献。《昭代风谣》等诗集的编辑者，为朝鲜诗歌史的研究保全了极宝贵的材料。他们之中如高时彦对于“委巷人”作品被排斥于士大夫文坛之外，是很不满的。他在《昭代风谣》卷首所题的诗就表现出了这种情绪：

与东文选相表里，一代风雅彬可赏。

贵贱分歧是人为，天假善鸣同一响。

《昭代风谣》的若干《序言》作者对诗集的编辑宗旨的说明和对作品的评价，也有助于当今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些作品集的情形。如尹光毅就写道：“兹书不取缙绅大夫之作，而只采委巷风谣，合为一秩。”另一位序言作者吴光运说：

有人手昭代风雅示余，求开卷之文，大抵不出于都下里巷之作。

我国閭井之人限于国制科举，无所累其心。生于京华，又无方外孤绝之病，得以游闲孟社，歌谣文化。大者能追古作者，蔚然为家数。小者亦能嫋娜成腔调。

他们的这些言论，说明了《昭代风谣》一类书的性质和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们对委巷诗人作品的赞赏态度和对门阀制度的反感情绪流露在字里行间。

委巷诗人中比较著名或应予以注意的人物有崔奇男、金孝一、崔大立、金忠烈、李得元、洪世泰、郑敏桥、高时彦、宋奎斌、洪禹弼、安命钦、李养游、车佐一等等。但因其经历大多不见于经传，对他们的生平与事业也难以详述。下面将其中的主要作者的若干主要作品，作些介绍。

委巷诗人不少作品内容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终生落拓的，

大多情调忧郁，色彩晦黯，牢骚很多。但因他们比士大夫接近社会下层及普通百姓，他们的诗中也有一些是描述民间生活，同情贫苦人民的，也有若干作品具有爱国思想。

金孝一的七绝《秋思》借弃妇相思之苦表达自己的失意心情：

满庭梧叶散西风，孤梦初回烛泪红。

窗外候虫秋思苦，伴人啼到五更终。

他的五律《过故乡》、《夜坐》，明显地写出了对宦途绝望的心情。《夜坐》中的“安排但知命，此外更何营？”是沉痛的叹息。

十八世纪的诗人崔大立的《风中花》，写妇人的相思苦，怨尤之情甚是深切，语言平易，和所写对象——委巷邻居妇女的身份相适应。

风中花，怨阿郎，东家离妇怨阿郎。

阿郎薄幸奈妇何？恨郎不如风中花。

花飞绕树依恋枝，阿郎出门行不返！

他的五古《宿临津村》写他暮投临津村与七十旬村叟问答对话。诗的结语是“我久厌城市，他年卜邻居”，表示了他对乡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他的《艳歌行》写东西两家少年，东家的住“连云甲第”，拥美姬慧婢，不思读书学习，虚度年华。西家的寒士整日在书桌前埋头读书。诗人抑前扬后，意在批评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一代青年的迥然不同的两种现象：有人沉溺于享受，消沉、堕落，有人则苦学而前途渺茫。

金忠烈的七绝《塞下曲》写出了诗人身临古战场时的感怀，境界苍凉，对边疆士兵征战之苦寄予了同情：

萧条独上李陵台，落日悲风万里来。

陇水亦知征战苦，至今呜咽向人哀。

朴颖的《沈中咏盆姜》借姜抒发诗人在沈阳怀念故国朝鲜的心情。

生出吾南土，移来种北方。

低垂数茎叶，稍似怨离乡。

李得元（1600—1639），当过翻译官，是高时彦的岳父，他的五言排律《题金将军应河传后》热情歌颂了在援明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李朝金应河将军（1580—1619）。此次战争中，后金出兵六万，明兵三万，主将阵亡以后战败。金应河率三千士兵与兵力悬殊的后金军作战，英勇顽强，奋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金应河的壮举表现了朝鲜对明朝的友谊和朝军将士们的可泣可歌的斗争精神。李得元此诗是在他读金应河传以后有感而写的。在歌颂逝者的同时，流露出他对英雄的钦佩与对明朝的友好感情。诗末"何由睹雄略，南北扫妖尘"两句，寄托了他反对外族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心愿。

洪世泰（1653—1725）的五律《登川倚剑亭忆金军应河》也是一篇歌颂金应河的作品：

当日宣川守，深河战不归。
大东臣独有，中国事全非。
尺剑余秋色，孤城半落晖。
悲歌塞天阔，倚马看云飞。

他的七律《送郑惠卿往日本》也是一首爱国诗，表现出他对经常威胁朝鲜的日本统治者的警惕：

此去扶桑大壑东，孤帆上拂日轮红。
曾闻汉使从天上，即见蛮王坐岛中。
瘴海风涛何日息？仇廷玉帛至今通。
君能用笔如霜戟，一扫殊邦亦战功！

他的七古长诗《铁车牛行》写的是牛车为官家铸钱币运输铜铁的情形，其中提到当时的铜来自国外，水船运到釜山，再运到冶炼和制造钱币的炉旁，"炉中一日得千万"，铸成的钱币就作为买铜铁的钱再付给铜铁商人。造成了"莱商日富钱日贱"的后果。对此现象，官府则是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最后，诗人以劝说车夫莫要狠鞭拉车的牛，来暗示官家不要任意大量铸钱，搜刮民脂民膏。"官家铸钱何时毕"的叹息，表现出诗人对货币和商

业资本的发展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甚为担忧。作品虽然表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过程的不理解，但反映了当时货币发展情况的一个侧面。

洪世泰的五律《满月台》写高丽旧地怀古，七律《统军亭》写壬辰战争时期朝廷避乱之地，都写得意境深远苍凉，感情深沉。以《满月台》为例：

故国青山在，荒台落日斜。
当时一统地，残郭几人家。
玉树翻樵唱，铜驼隐野花。
千年有衰柳，夜夜怨啼鸦。

郑敏桥（1697—1731）的七古长诗《军丁叹》写李朝所制定的征兵制为穷苦百姓带来了灾难。叙事具体，形象感人，说理透彻，是一篇优秀诗作，反映出当时官吏集团的种种苛政。

夫死幸有儿遗腹，生男毛发尚未燥。
里任报官充军额，襁褓儿付壮丁案。

新寡的妇女刚生下遗腹子，婴儿就被登入军籍薄，被迫交纳人头税了。

县官惟知畏上司，利己宁复恤民戚。
只存虚名混侵虐，白骨之征尤为酷。

所谓“白骨之征”就是在军籍簿上注册的男子即便死了，也必须由亲属代交人头税。

高时彦的七律《七月夜纳凉树下》，写出了他“家贫不恤还忧国”忧时伤世的情怀。他的《关东歌》通过对关东地方经济贸易等情形的描写，反映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商品流通现象，及其对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作品揭露了贵族官僚廉价将朝鲜的珍贵矿产与物品卖给外国换取奢侈品的现象，并为深受其害的百姓叹息。

洪禹弼的五律《芦原村舍》写秋日村庄的安谧幽静，体现出文人的田园情趣，但其中也流露出农民厌恶苛捐杂税的情绪。

寥落秋山下，人家共暮烟。

影高松外月，声远复深泉。

砧杵时犹动，牛羊各已眠。

自官征旧粜，民不喜丰年。

他的七绝《山下一家甚孤寂》、七古《峡居》都是描绘乡村景物的佳作，表现出诗人厌弃城市、喜爱村居生活的思想。他的七绝《夜别》流丽自然，比喻巧妙，情在语外，颇有韵味：

一曲离歌夜已阑，故人家在外云端。

多情谁似门前雪，留得明朝马迹看。

宋奎斌的五古《戊子秋哀丐者》是一首长达四百字的叙事诗，写的是一个乞丐的身世，反映出农民因雹灾、蝗灾及官府差役逼租、劫掠而破产、甚至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四月下霜雹，五月遍螟蝗……半岁费辛苦，逢秋却成荒"——这是遭天灾的惨状。"粜期忽已迫，身布又遑遑。官差猛如虎，临门肆抢攘"——这是遭人祸的情景。有的家庭"哀哀幼稚哭，索饭呼爷娘"，全家都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诗人对于以"民之父母"自居的官府坐视百姓痛苦的冷酷态度大为不满：

立视不拯溺，焉用彼黄堂？

黄堂皆如此，黎民安所望？

作者以这种质问对官府进行了谴责。

李养游的五古《担夫叹》也是一首同情劳苦人、谴责当权者的诗。诗中把"寒天肌尽折，热日汗如沐"，却仍难以养家活口的挑夫和当官的进行比较，为挑夫的遭遇抱不平。他指出：那些"尸位以窃禄"的官僚，地位虽高，但其品德与贡献，皆不如这些普普通通的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受苦人。

车佐一的五古《农夫》则拿农民的艰苦耕作和游手好闲的公子加以对比，肯定了劳动的可贵，指斥了剥削者的寄生生活：

农夫最可怜，秋获又春耕。

一岁汗几斗，孳孳少不宁！

白手谁家子？临风又锦扇。

露寒天迥际，夺尽满畴功！

委巷诗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同情，往往和他们自身的遭遇有关。从安命钦的五律《下第》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安命钦一生勤奋读书，但因出身寒门，终生未遂高升之志。最后满腹怨尤，飘泊四方，死于街头。这首《下第》抒发了他落第时的感慨，很能代表一般委巷诗人的心情，使人能由此更深地理解到这些人能深深同情贫苦人民的原因：

下第嗟华发，田园计已非。

亲朋一以隔，旅雁竟何归？

薄雨冥还坠，微霜飒欲飞。

十年半行李，九月又寒衣。

风谣集中还收入了下层妇女和普通劳动者的诗作。妇女作者多为妓女。她们的人格与身体都受到蹂躏与践踏，但是其中有些稍有文化者，能得到贵族文人的赏识，她们自己也竭力以诗文来作为攀附达官贵人的手段。因此她们力求在作品中写出迎合上层人物需要的东西。这就使得她们的作品带上了一些文人色彩，而与一般劳动妇女的作品有别，但也有一些悲叹不幸身世、表露真挚爱情的好作品。

桂生的五绝《赠醉客》通过罗衫被撕破这一细节表现出她担心自己被心上人遗弃的心情：

欢子挽罗衫，罗衫随手裂。

不惜罗衫裂，但恐恩情绝。

早在高丽国语歌谣《西京别曲》中，就流露过类似的心情。妓女作为被玩弄的对象，几乎是无权得到、也不可能得到某一男子的真挚爱情的。上面这首诗把男子的醉态和女子的心情都写了出来，平淡浅显的语言中，隐含着女子内心的忧愁。同一作者的七绝《愁思》，借景抒情，写出了自己难以得到真挚爱情的悲哀：

雨后凉风玉簟秋，一轮明月挂楼头。

洞房终夜寒蛩响，搏尽中肠万斛愁。

桂月的七绝《赠别李匡德》写两人伤离别的情景，相对无语泪，尤其真实感人：

流泪人看流泪人，断肠人对断肠人。

曾在卷里寻常见，今日那知到妾身？

委巷诗人中最接近民间，最注意描绘社会下层生活，成就最大的是赵秀三。

赵秀三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年），出生于全罗道全州沙川津。由于出身微贱，一生未能作高官。八十三岁时才考中乡试，到他去世的五年前为止，只不过任武官中的末职。他受实学思想影响，关心国事民情，对社会现实不满，甚至敢发牢骚。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在诗中敢于接触其他诗人不敢涉及的问题，如洪景来农民战争等。他极为同情人民的困苦处境。他的许多作品体现出他对人民的热爱，对民间生活的关切。有些诗作中还流露出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友人多为出身低微的文人，四家诗人之一的李书九即是他的一位好友。他常参与“松石园”诗社的活动，与其他委巷诗人过从甚密。委巷诗人们对他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多才多艺，精通医学，善于书法，颇有辩才。他于一八四九年逝世。

赵秀三还曾六次来过中国北京，与当时中国朱文翰，江莲等知名文人友善，交往甚密。

赵秀三善于写组诗，他的《陇城杂咏》二十二首，《北行百绝》（一百首五绝），《次耕织图韵》四十六首及《纪异》五十首是他的精心之作，堪称是他的代表作。和一般俗流诗人不同，他不是坐在书斋中冥思苦想，也不只是徘徊在花前月下或局限在一固定的地方去搜寻写诗的材料。他注重从社会现实、从民间取材。他的足迹遍及各地，以对生活现实的敏锐而细致的观察来猎取题材。上述的四部组诗多来自他旅途所见所闻，即便是咏耕织图的四十六首诗，也是他根据对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活长期

观察的材料，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如果说司马迁遍历中华大地对他撰写《史记》起了很大作用的话，那么，赵秀三在朝鲜各地的游历和对民间生活的深入体验，则是他作品中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陇城杂咏》作于他五十岁时。在这一组诗中，他对于洪景来农民战争中奋起造反的人民群众表示同情。他认为西北地方的农民起来反抗官府，是因为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忍能为寇盗，本不耐饥寒"。诗人对官军残酷镇压起义农民，把农民弄得家破人亡感到悲愤："中原多暴骨，忠愤竟谁赍？"他以讽刺的笔调谴责和讥讽官府把搜刮来的财物囤积在仓库中，任其长草、发霉和腐烂，却不用以救济灾民，以致引起暴动：

岁岁官仓峙万钟，蕨蕺沈绿锁陈红。

早知为贼三春饱，悔不散之沟壑中。

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饥民、对被迫揭竿而起的人民的同情。

《北行百绝》是记叙他白头山之行的作品。他六十一岁时曾由汉城去白头山，历时两百多天，行程万里。途中他"穷绝海山，跋履深险。蛟龙虎豹，魍魅鬼怪之所，皮服侏音，奸宄盗贼之事，无不躬造脚踏。"饱尝旅途艰辛。这一庞大的组诗就是他这次旅行的成果。

《北行百绝》内容极为丰富，它既是祖国山川名胜景物画，也是反映民间疾苦、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全部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是历来朝鲜汉文诗中罕有的乡土诗珍品。下面，重点介绍其中的若干片断。

残山弓裔国，古木铁原城。

有墓无人祭，年年入火耕。

这是第六首，写铁峡所见的古弓裔国遗迹，慨叹后人们对这个昙花一现的古国的忘怀。

饿殍多横道，淮阳可卧治。

借问涉长獯：发仓能及时？

涉长孺是中国汉代善理政务的淮阳官。这首诗写他在邹家岭见到灾民饿死的惨状，对地方官僚不顾民间疾苦的冷酷态度表示愤恨。

对关心民情，善于理政的官吏，诗人也作了肯定。第二十二首写鹤城所见，就提到了由于当地一贤明太守的德政，在各地普遍遭逢凶年的情况下，唯独在他管辖下的百姓衣食周全，没有饿死。

割俸充租钱，开仓赈饥口。

翁媪至愚者，啧舌夸贤守。

第二十六首写鼋湖所见，道出了渔民的艰辛，讽刺了坐享其成的官吏：

渔艇不胜网，飘摇截海行。

官人坐深屋，顿顿吃鱼羹。

诗人在马廊岛也见到了类似的情形。这次是写官家剥削农民：秋收时农民给官家交上十斗米，春天缺粮时却只能从官家得到五斗糠。诗人质问："精凿归何处？日饱吏人肠！"

在第六十六首《银矿》一诗中写出了采银工在苛捐杂税的威逼下被迫昼夜干活的情形：

采银银已竭，空穴如网眼。

淘沙忘昼夜，恐过公税限。

在第六十五首《战场坪》中，诗人歌颂了李朝初期爱国将领南怡将军：

深山穷谷里，犹有战场名。

昔日南元帅，挥刀斫虏兵。

在第九十一首《造山》中，诗人歌颂李舜臣将军开边屯田的功绩。由于江水泛滥，两百年前所开的屯田已被水冲毁，但诗人身临此地，一代爱国英雄的这一伟绩却浮现于眼前：

桓桓李忠武，田牧大开边。

只为江沱决，陈荒二百年。

在第九十三首《西水罗》中，诗人热情赞美了一位中国人

——宋朝出使金国的使臣洪皓。洪皓被金国无理囚禁于朝鲜疆土西水罗，长达十年之久。诗人来到此地，想起了这位坚守节操，矢志不屈的使臣：

天意悯东方，沧溟续土疆。

冷山幽宋使，何处旧看羊？

冷山即西水罗。壬辰战争期间，朝鲜人姜源曾被拘留在日本，他始终坚贞不屈，并写下《看羊录》，“看羊”即指此。诗人以朝鲜爱国志士的典故赞扬宋使臣，表现了他对中国友善的感情，对洪皓的敬佩。

如果说《北行百绝》有如一部诗体的游记，那么赵秀三的另一代表作《次耕织图韵》则是表现朝鲜李朝时期农村男耕女织的交响乐。总共四十六首之中，耕、织各占二十三首。全部为七言绝句，按生产过程写，一首诗写一道工序，俨然成为完整的稻、蚕两业实况的诗体记录。

前二十三首关于水稻生产的诗题是：《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割》、《登场》、《持穗》、《舂碓》、《筛》、《簸扬》、《砻》、《入仓》、《祭神》。

以上诸诗，除最后一项《祭神》是属于农村中带有宗教性的庆丰收仪式和娱乐以外，其他则是水稻生产的全过程。

象这样完整、详细地叙述几千年来的朝鲜人民最基本的社会劳动——水稻生产的诗，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它使当今读者了解到一百多年以前朝鲜水稻技术，并使人们对农民产生一种亲切感，仿佛随着他们参加了从浸种到粮食入仓的全部劳动。

关于种稻的第一道工序浸种，诗人这样写道：

潜滋时物肇农功，嘉种坚园万颗同。

雨过长堤春水活，八家相告下是笼。

他是这样写插秧的：

青青刺破自弥弥，曾见培栽雨及时。

倘待莎鸡愁晼晚，莫教秧马坐依迟。

收割和扬场的劳动场面是这样的：

犊鼻凉多晓露晞，渐开田水并余晖。

腰镰白似天边月，破尽黄云向夕归。（《收刈》）

细镂高阳着力深，秕穅如雨散前林。

珠圆雪白非甚爱，珍重农家费寸心。（《簸扬》）

后二十三首描写养蚕与纺织的诗是“《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提绩》、《分箔》、《采桑》、《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练》、《蚕蛾》、《祀谢》、《纬》、《织》、《络纬》、《经》、《染色》、《攀华》、《剪帛》、《成衣》。

赵秀三的《次耕织图韵》组诗中，洋溢着农家终年辛勤从事生产的赞赏之情以及劳动者的开朗、乐观情绪，如“女悦男欣见物情”（《持穗》）、“千枝鼓腹乐熙熙”（《舂》）等等，也包含着对他们艰苦劳动的同情。“踏水冲泥未暂闲”（《耖》）、“炙肩赤脚太劳生”（《二耘》）、“行雨田间半夜归”（《灌溉》）、“蚕愈肥蚕娘愈瘦，灯前犹复看殷勤”（《捉绩》）、“夜深呵手强鸣梭”（《织》）、“几日求桑未觉疲，我饥不念念蚕饥”（《上簇》）等，都表现出农民耕织的丰硕成果是人们用汗水换来的。

在这一长篇组诗中，虽然没有明显揭露封建剥削的地方，但也有对统治者的嘲讽之词，如：“御屏闻有幽风画，应轸农家食力情”（《二耘》）。

赵秀三的这一长篇组诗，可以和国语文学中的歌辞《农家月令歌》相媲美。两者基本上出现于同一时代，作品中对农事的看法和对农民的思想、感情、态度也基本相同。至于美化封建“王恩”的内容，《农家月令歌》似稍多一些。

《次耕织图韵》集中地表现了赵秀三受实学思想影响之深，

也表现了这位属于“中人阶层”的委巷诗人对农民和乡村的了解、熟悉和深厚感情。

赵秀三的另一部以七绝组成的长篇组诗《纪异》，也是一部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作品。它既不象《北行百绝》那样局限于旅途见闻，也不象《次耕织图韵》那样只集中于描写农桑。它广泛而自由地触及了他认为值得记叙和描写的各种人和事，让多种多样的人物出现在更为广大的舞台上。这些人和事又都是来自民间。高高在上的士大夫文人囿于传统庸俗偏见，不能也不愿看到这些人和事，当然它们也就难以登上士大夫高雅的诗坛。然而，它们却为赵秀三所欣赏，作为诗的题材。

《纪异》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失意秀才、汲水人、卖柴人、樵夫、卖瓜翁、采药人、卖艺人、寡妇、烈女、僧人、居士、民间画匠、琴师、古董收藏家、老光棍、钓鱼人、盗贼、打虎人、侠客、孝子、妓女、穷诗人等等。

《汲水者》写了一位有恩必报诚实人。城中一穷人，因饥饿时受过人的周济，就在天旱井枯时，去山中寻找泉水，彻夜守在泉边，直到清晨，取得泉水，分给众人，用以报答人们对他的“粥饭之恩”。“卧借青莎枕石根，五更先起汲泉源。无家有累休相问，‘未报东邻粥饭恩’！”

《卖瓜翁》写的是大邱城外一位慷慨的种瓜人。《福洪》赞美了一位好读书的老乞丐。《负贩孝子》歌颂一个以打短工为生、孝敬母亲的青年。《一枝梅》称道了一位专门劫富济贫的侠客，为避免牵连他人，他总是在窃完财物后，在失主家画上一枝梅花为记。

血标长记一枝梅，施恤多输污吏财。

不遇英雄千古事，吴江昔认锦帆来。

《报仇媳妇》中写熙川一农家寡妇的侠义行为。寡妇的公公为邻居恶人所杀。她隐忍两年之久，却夜夜潜磨霜刃，练习刺杀。一次，她趁仇人赶集，突然奋身而出，将他杀死，并且剐出仇人心肝祭奠公公。完事以后，要求邻里和她一同去官府自首。

除上述四部组诗以外，赵秀三还创作了不少单篇诗，其中也不乏优秀作品。如七古《采桑女》，就描写了养蚕女子"彩筐盈盈滴粉汗"的繁重劳动。诗以"蚕到三眠欲成茧，且待促织鸣我杼。可怜蚕女空辛苦，官箱匹帛皆出汝"作结，为蚕女受官家剥削鸣不平。另一七字《牛车行》写一田家老翁世世代代靠着驾牛车过活。描绘了乡村牛车冬日在雪水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行进的情景，诗末以"翁今抱孙牛生犊，世上陇亩长相随"两句为老翁穷困艰难的生活叹息。他的七绝《德津采莲》是描绘乡村女子乘舟采莲的一幅美妙图画：

莲唱初高刺棹频，水禽惊起绿粼粼，

画舫渐入花深处，一色红妆不见人。

赵秀三是一位重要的委巷诗人，也是一位卓越的乡土诗人。

第四节　乡　土　诗

委巷诗人的大量涌现，促进了乡土诗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象赵秀三这样写出了大量乡土气息作品的文人并不多见，但是文人开始创作乡土诗却不晚。早在新罗时代的崔致远的《乡乐杂咏》和高丽时代的李齐贤所译的《小乐府》中就可以看到乡土诗的萌芽，到了李朝中期，沈光世（1577—1624）的《海东乐府》，就已露出乡土诗发展的端倪了。其后实学派先驱者之一的李瀷（1682—1764）写了《星湖乐府》，申光洙（1712—1775）写了《关西乐府》与《成都乐府》，属于委巷诗人之列的洪良浩（1724—1803）收集并加工民谣，用汉文写成了《朔方风谣》、《北塞杂谣》，还写了《青丘短曲》，十八世纪末金铲编写了类似的乡土诗集《黄城俚曲》、《上元俚曲》、《思牖乐府》，十九世纪初李学逵写了《岭南乐府》，权用正（1801—？）编写了《汉阳岁时记》，此外还有《海东竹枝》（崔永年）、《岁时记俗诗》（洪锡模）等等。至此，乡土诗已发展达到了繁荣阶段。

乡土诗在当时有各种各样正式和非正式的名称，如"风谣"、"乐府"、"俚曲"、"短曲"、"杂谣"、"记俗诗"等等。这些名称中，有的是沿用中国诗歌文学中的旧名称而赋予新意，有的则是诗作者自题的。这些名称各自反映了乡土诗的一定内容和侧面，但都不甚全面。因此，本文学史不采用这些名称，而称它为乡土诗。

上述各首乡土诗集的侧重而也都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以汉语文对民歌进行加工、翻译，有的是从民歌中汲取灵感写成的，有的则是诗人直接取材于对民间种种情况的观察，进行构思创作的。总的来讲，其内容大致不外是乡间生产劳动、风土习俗、人情世态、民间人物素描、郊野历史遗迹、名胜及与之有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民间传说、民间贸易、人民疾苦等等。

乡土诗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有五绝、五律、五古，也有七绝、七律、七古，还有歌行等。由于要表现的内容是民间的各种现象，它偏重于描写，有时夹叙夹议，而抒情则不很多。这样的内容，决定它的体裁多为古体诗或绝句、歌行，而律诗则相对地少一些。

这里按内容的不同，分别对其中较好的作品加以介绍。

描叙乡间生产劳动的作品有收于洪良浩的《北塞杂谣》中的由民谣译为汉文的《叱牛》、《北地》、《豆江》、《海棠花》等，还有他的《青丘短曲》中的《山上去》也是由国语歌谣译成汉文的。

《北地》描写北关一带乡民植麻和对麻的多种利用。《豆江》写朝鲜北部与中国交界的江边渔民的生产活动，豆江即"豆满江"的简称，中国称之为图们江。

《山上去》写乡民腰插镰刀上山割柴，稚子啼饥，老妻等柴举炊的情形：

腰镰山上去，背薪雪中归。
老妻涤釜待炊，稚子候门呼饥。
翻嫌燧人氏，教人火食真多事。

不如餐木饮水时，人生百忧从此始！

金铲所作的《村翁》（见《上元俚曲》）描写老农看月预测当年庄稼歉收的情形：

村翁斗酒夕阳天，扶醉登高看月圆。

厚薄高低前验在，硖农争似野农便。

表现民间风土习俗的作品有译自民谣的《北人》、《赤狗皮》、《北俗》（以上见《北塞杂谣》），有个人创作的《狮子戏》（以上见申光洙《成都乐府》）、《跳板戏》、《引索戏》、《斗风筝》（以上见崔永年《海东竹枝》）、《藏履》、《换饼》、《角力戏》、《艾糕》、《豆粥》（以上见洪锡模《岁时记俗诗》）等等，篇篇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北人》写的是北方人爱蓄长发的习惯，语调诙谐。《北俗》写北方好鬼神、信巫师、爱求卜占卦，诗中对装神弄鬼者作了委婉的讽嘲。《赤狗皮》叙述北人身披狗皮、足穿牛皮的习俗。

《端午》写妇女端午节打秋千的情形，这也是朝鲜民间的习俗：

青苎裙加白纻衣，一时端午着生辉。

桐花别院秋千索，推送空中贴体飞。

摔交也是朝鲜民间端午节常举行的一种竞技活动。《角力戏》就是写摔交的：

壮丁角戏盛端阳，拿股披腰决一场。

中国亦称高丽技，元来快手势无当。

《跳板戏》等一类作品，如诗题所示，是写民间爱好的游戏、娱乐、体育竞技的。《艾糕》、《豆粥》则是写饮食的，都富有朝鲜民族特色。

用素描手法写民间人物的作品有：《省墓》（申光洙《关西乐府》）、《问安婢》（《岁时记俗诗》）、《浦村少妇》、《癸田处女》（金铲《黄城俚曲》）等。

《省墓》中写村姑去扫墓。《癸田处女》也是写村女的：

癸田处女貌如花，石井南边是爸家。

绿鬓云鬟浑不整，月中汲水晓沤麻。

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有《山有花》[1]和《破镜词》等。《山有花》写李朝肃宗年间善山地方的民妇香娘为纪念亡夫，不愿再嫁，但受父母所逼，不得不投洛东江自尽的故事。山有花的朝语发音与儿媳妇相近，常被用以歌唱作儿媳的哀愁。

洛东烟水碧于纱，肠断春歌踏浪沙。

如见贞娥红泪滴，满山风露血斑花。

这首诗载于崔永年《海东竹枝》。另有一歌行体的《山有花》载于李学逵的《岭南乐府》，也是写同样的题材。

《破镜词》为李瀷所作，载于《星湖乐府》，写新罗时代民女薛氏和嘉实的故事。

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的诗有申光洙《关西乐府》中的《桂月香》及《海东竹枝》中的《红衣将》、《萨水捷》、《龟头船》、《鸡述岭》等。

青阳馆里小西飞，血溅鳞身透铁衣。

当日剑痕犹着柱，将军不与桂仙归。（《桂月香》）

这首诗歌颂了壬辰战争时桂月香和金应瑞两人处决敌将小西飞的史实。

《红衣将》则写的是壬辰战争中义兵领袖人物之一郭再佑在岭南一带英勇杀敌的故事。

苞山壮士发冲冠，猩血团袍背上寰。

雷神恍惚从天降，一见红光胆已寒。

《萨水捷》赞美了大败隋军的乙支文德将军。《龟头船》歌颂了李舜臣将军。《鸡述领》赞扬了新罗爱国的外交家朴堤上的妻子因思念丈夫投海的史实。

---

[1] 山有花：一种农谣的名称。

以历史遗迹和名胜为题材的作品有《咸关平》（《朔方风谣》）、《南公墓》、《忠烈祠》、《彰烈词》（以上三首见《海东竹枝》）等。这些诗大都结合标题所示的名胜或历史遗迹描叙了李朝开国君王李成桂、高句丽开国君王东明王朱蒙、李朝爱国将领南怡、反清英雄林庆业、壬辰年晋州三烈士的事迹。沈光世所作《古长城》（《海东乐府》）写的是高丽德宗时所建的由鸭绿江入口处的古国南城东伸至朝鲜东海都连浦的古长城，语言浑厚朴质，气魄雄伟，写出了长城的风貌与历史作用：

古长城，基尚在。

尾都连，首国内。

二十五尺高，一千三百里。

筑此防胡虏，劳苦亦云至。

我朝据天堑，重关仍复岭。

地理陪古胜，如何犹不竞？

苟能守其要，虏岂敢窥境！

还有一些作品，描叙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乐曲、诗歌，反映出当时民间文艺的动态，是今人研究有关诗歌发展过程很好的参考资料。如《时调》（《关西乐府》）及《海东竹枝》中的《强强曲》、《春香歌》、《阳山途》等。

军歌一曲下戎台，队队儿娘彆夜回。

至今海郡秋天月，争唱强强渡海来。

《强羌水越来》一曲早在十六世纪壬辰战争时就传唱于士兵和百姓中，用以提高警惕，鼓舞斗志，防止倭寇越海来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崔永年时，此歌仍在民间传唱，妇孺皆知。这种情况在《强强曲》中有所反映。

乡土诗既然歌唱的是民间的种种人和事，它当然也就免不了反映民间疾苦，并对压迫者有所揭露。《耳麦粥》、《戍卒怨》、《铁文鱼》、《馋吏》、《黄肠木》、《怨恨》、《船主》等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耳麦粥》为洪良浩《北塞杂谣》中收录的民谣，它沉痛地诉说穷人缺食、饥饿难熬的困境：

朝食耳麦粥，暮食皮辨核。

麦糜尚难继，安得豆与粟？

无知小儿莫啼饥，此物虽薄亦充腹。

即今四野无青草，来月以后更无食！

《戍卒怨》是收入洪良浩《朔方风谣》中的民谣。它虽然写的是边疆士兵的痛苦，但这些来自穷苦人家的士兵受压迫、虐待的痛苦情形，也同民间疾苦同出一源，密切相关。请看这些远离家乡亲人长年驻守边疆的士兵生活："刈薪汲水手自炊，糜粥哪能充肚肠？"他们"皮衣风扑冻欲裂，足皲口笑向谁诉？"图们江两岸山地多虎，他们时时有被吃掉的危险："隔水往往猛虎蹲，电视雷吼吁可怖。"军队的长官还压迫虐待他们："巡点将校不时来，跬步阻离逢瞋怒。"

《铁文鱼》、《黄肠木》、《馋吏》都是金铲的作品，它们分别揭露了贪官污吏"爬民之肉吮民腴"、"本官矫旨私营度"的罪行。其中以《恶吏》揭露得最深。在回顾了去年来过的一位好官以后，作品这样写道：

今年巡使李尚书，刻剥猜忌好侵渔。

斗曾箕敛苦不及，铁门以北皆为鱼。

馋吏登褒廉吏逐，闾里荷担总蹙缩。

弘羊不烹天不雨，农夫田妇沟头哭。

诗人为廉吏被逐，恶吏横行，人民遭殃而叹息，表现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

金铲《黄城俚曲》中的《船主》写的是利用凶年进行投机活动、竭力搜刮民财的船主。

李朝后半期的乡土诗内容极为丰富。比起一般两班士大夫的吟风弄月之类作品中的狭隘的陈旧题材，乡土诗取材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诗人视野也宽广得多，诗风也较为清新可喜。再加上诗

中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人民性，它成了朝鲜文学史上的一大珍贵遗产，在朝鲜汉文诗歌发展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　流浪诗人金笠

李朝末期，在委巷诗人早已进入诗坛和乡土诗盛行一时的情况上，出现了一位独特的诗人——流浪诗人金笠。

金笠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既出身于两班士大夫家庭，又丝毫没有得到这种出身的益处。他不是在书斋中吟风弄月，而在朝鲜全国村镇四处流浪中，度过他抑郁苦闷的一生。他在长期飘泊不定的生活中创作了不少诗，他的诗有的是讽刺，有的是接近谩骂和怪诞的，有的则甚至类似文字游戏。这些诗大都是他在流浪途中即兴创作的，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流传到了人民群众之中。伴随着关于他流浪的逸闻传说，这些诗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甚至连识字不多的村童和村学先生也都吟咏，使他成了不同于历来汉文诗人的、具有特殊风格的一位流浪诗人。

金笠（1807—1863）原名炳渊，字性深，号兰皋。生于李朝簪缨之家。祖父——宣川府使金益淳因曾投降洪景来农民起义军而被处死，受到了“灭三族”的严惩。金笠其时六岁，被金家仆人救出带回故乡养大。金笠自幼聪明好学，科举名列前茅，但因出身于叛逆之家而被排斥，不能为官。为此，他看破尘世，无意于功名富贵，甚至拒绝了他的好友郑显德的荐举，对朝廷的特赦并不领情，终生不仕。他头戴斗笠，身穿破衣，长期流浪于各地。他将友人所赠的新棉衣及金钱分送穷人和乞丐，而自己则走村串户，靠人周济过活。他由二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于全罗道某农家去世时为止，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足迹遍及朝鲜各地。他流传至今的一些诗，有不少是由民间保存下来的。“金笠”这个外号，也是由于他头戴斗笠周游各地而得来的。

他曾以“而鸣”为号，取“不平而鸣”之意，表明他对自身

的遭遇和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心怀不平的态度。

这里先介绍他写自己身世的诗作。这类作品在其所有作品中带有较强的抒情性，写得较为严肃、正规，并不怪诞，可以窥见他真正的内心感情。《自叹》、《咏笠》、《兰皋平生诗》、《矗石楼》都是这类诗。七律《自叹》中回顾了他多年的流浪生涯："萍水三千里浪迹，琴书四十年虚词"，哀叹"知我平生者有谁？"《兰皋生平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他家原先为"簪缨之家"，"富贵人"，顷刻之间，突然沦为比平民还不如的罪人。他从中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早先他刚生下时是"花柳长安名胜在，邻人也贺弄璋庆"，但家境衰败下来后，就成了：

发毛稍长命渐奇，灰劫残门翻海桑。

依无亲戚世情薄，哭尽爷娘家事荒。

从此，造成了他"身穷每遇俗眼白，岁去偏伤鬓发苍"的不幸的一生。

七律《咏笠》写的是他流浪生活中日日不离的斗笠，是他的一幅自画象，也最能代表他看破世情、清高洒脱、孤芳自赏的思想性格：

浮浮我笠等虚舟，一着平生四十秋。

牧竖轻装随野犊，渔翁本色伴沙鸥。

醉来脱挂看花树，兴到携登玩月楼。

俗子衣冠皆外饰，满天风雨独无愁。

诗中反映出了他洁身自好，不愿随波逐流与俗流文人同流合污的思想。

《矗石楼》写得较为悲壮、深沉、在金笠的作品中是意境比较深远的一篇。

燕赵悲歌士，相逢矗石楼。

寒烟凝短堞，落叶下长洲。

素志违黄卷，同心已白头。

明朝南海去，江月五更秋。

金笠由于对世道深感不平，发展到对处于崩溃期的李朝末期社会统治阶级人物的不满。他的七律《尽日垂头客》揭露了官场上买卖官职的丑恶现象，活画出一个奔走于豪门，靠行贿和拍马换得官职的不学无术之徒的丑态。讽刺他们不靠学问专靠吹嘘和行贿求官是“诗读一卷能言律，财尽千言尚用钱”。一旦他们奔走于豪门的努力有了成果，这个曾经是“朱门尽日垂头客”的人，立即“若到乡人意气全”，在同乡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他的《两班是非》、《嘲两班儿》和《是非歌》矛头都是针对两班的，表现出他对这些人物的憎恶。内容接近于谩骂，用语带有文字游戏的味道：

男鸢身势隐冠盖，何人咳嗽吐枣仁？

若使每人皆如此，一腹可生五六人！

两班贵族的一个十来岁的矮小孩子，也和大夫一样头戴峨冠，俨然贵族模样。金笠写此诗嘲弄他，用“枣仁”和“一腹可生五六人”骂他个子矮。这种对两班子女的挖苦攻击，虽表现了金笠对两班的厌恶态度，但作品并未说明什么问题，缺乏思想深度。

在七律《狗》中，描写了狗的“挑前挑尾偏蒙爱”的摇尾乞怜、阿谀主人的样子，却又表扬了它“职察奸偷司守固”的忠于职守的态度，同时又指出狗的这种责任心“反愧无力尸位臣”，足可以使那些尸位素餐的官老爷们感到惭愧。这也是一种责骂，但比上面所引用的嘲“两班儿”要高明些，能够刻画出两班的丑恶嘴脸和触及他们的痛处。

他的《是非歌》是很著名的：

是是非非非是是，是非非是非非是。

是非非是是非非，是是非非是是非。

朝鲜自古有对现存政治秩序紊乱、是非不分表示不满的诗歌，如崔致远写的“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尽笼山”，以及其他一些痛斥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时调。金笠的这首《是非歌》

虽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但用的却纯粹是文字游戏的手法。

他的《两班是非》也是游戏笔墨，艺术价值不高。但他的七绝《贫吟》（“世今随富不随贫”）则揭露了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世风。他的七律《钱》，抨击了唯利是图的风气，客观上说明了货币经济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意义较深刻。

金笠也写了点同情贫苦人的诗，如《贫家》、《路上见乞人尸》。

盘上无肉权归菜，厨中乏薪祸及篱。

妇姑食时同器食，出门父子易衣行。

这首《贫家》，写出了一家餐无肉、炊无薪、缺碗少匙、衣服不周全的穷苦状态。

不知汝姓不识名，何处青山子故乡？

蝇侵腐肉喧朝日，乌唤孤魂吊夕阳。

一寸短筇身后物，数升残米乞时粮。

寄语前村诸子辈，携来一簣掩风霜。

这首《路上见乞人尸》如实地描绘了倒毙路旁的乞丐惨不忍睹的情形，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金笠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恶作剧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是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风气、习俗和偏见的一种消极抗议，也是“寄沉痛于悠闲”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他的一些怪诞的、文字游戏式的诗，就表明了这一点。如《火三月不灭》借秦朝灭亡时首都咸阳大火这一史实来嘲弄专制制度“火炎直冲飞上天，天帝抚臀曰热热”。《元生员》借汉字中一些字的朝语音，来讥笑那些进士、生员、佥知之类的地方缙绅。骂他们为猿、鼠、蚊、跳蚤。《还甲宴诗》是诗人在庆祝一老人六十岁寿辰的宴席上所作的诗，表面为祝寿，实则在字里行间把这老人一家骂为“不是人”，“皆为贼”。

他的《青山倒水来》是写他在一户穷人家中受招待的情形。

那家很穷，给他吃的是稀粥。诗人临行，主人向他表歉意，他就以粥为主题写了此诗。

他的《赠寡妇》嘲弄坚持守节的寡妇。他的《九月山》、《三嘉亭》也是类似的戏笔，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均不高。

流浪途中，金笠还就经过的名胜地和所见的景物写过一些较好的诗，如七律《开城》、《百祥楼》、《飘然亭》、《入金刚》等。七绝《淮阳过次》写村中少女，情态逼真，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山中处子大如娘，缓着粉红短布裳。
赤脚跄踉羞过客，松篱深院弄花香。

流浪诗人金笠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誓不为官，与李朝统治者坚决对立，彻底决裂的立场，形成了他那种讽刺诗和怪诞的破格诗。在李朝封建统治渐趋解体的情况下，金笠的诗标志着两千年来盛行于朝鲜文人中的汉文诗的发展也已进入尾声。即将来到的将是近代朝鲜社会的国语文学兴盛的时代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朝鲜文学史
作者＝
页数＝４３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９２４４０６９２